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 与经济起源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英] 卡尔·波兰尼 著

Karl Polany

冯钢 刘阳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一辑主编 景跃进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虹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丛书第一辑总序

作为一项计划工程，本丛书第一辑的书目选择乃是众多考量平衡的结果，其中三个因素值得说明。

最先进入视野的是可持续性问题。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中，理性算计是任何事业得以展开的必要环节。这一变量对于本丛书目录选择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选译之书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潜在读者群，而不应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专家读物。于是，跨学科性便成为选书的一个操作性标准。

令人宽慰的是，尽管这一标准具有实用的品格，但它并不影响所选之书的学术品位。这固然是由于跨学科性本身并不与学术质量有什么矛盾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书目选择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范围。在横向维度上，丛书第一辑涉及政治学、社会学、两者杂交的产品——政治社会学，以及经由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脉络而扩展到旁临学科。在纵向维度上，它涵盖了历史研究与当代学术的前沿性探索。

在这一广泛领域中，对书目选择发挥指导或定向作用的坐标是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这自然成为选书的第二个操作性标准。丛书第一辑所选作品虽然涉及不同的学科，且具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但它们之间有着一个相似或共同的主题。借用扬(Iris Marion Young)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的政治化”(扬使用该术语来描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理论的研究概况)。

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改革前后数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高度政治化，到解/去政治(全能国家的消退，非意识形态化，以商品为核心的消费生活的兴起等)，再到重新政治化的过程。所谓“重新政治化”并非是指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治的回归，而是指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纳入公共领域的视野，或

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或成为需要政府加以解决的政策议题。从理论上讲,重新政治化过程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方面,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频发,以及公民权利意识和法治建设的进步,基于公民行动基础上的广义的利益政治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与此相应的是,政府在众多社会问题上——诸如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生态环境、性别平等、社会公正等方面——将承担起与公众期望相适应的政治责任。质言之,市场经济产生的某种程度的同构效应,使得以前被认为只有在西方国家才发生的事情或现象,我们今天也开始程度不同地面临了。

选书的第三个操作性标准来自学科建设方面的考虑,我们希望通过选择性的译述以窥见西方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和最新发展趋势,为本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

上述诸种考量虽各有侧重,但都围绕着一个总体目标: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对中国特色的追求(从制度层面到学术品格)是在世界文明这个大舞台上展开的,了解“他者”(尽管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西方”,但其实不止是西方)的过去、当下及发展趋势,乃是追求中国特色的一个必要环节和基本背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西方与认识中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翻译与本土研究之关系,亦当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景跃进

2006年冬

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前 言(约瑟夫·斯蒂格里茨)	1
导 言(弗雷德·布洛克)	10
2001年版附注	28
作者致谢	29

第一篇 国际组织

第一章 百年和平	3
第二章 保守的20年代,革命的30年代	17

第二篇 市场经济的兴衰

第一卷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居住VS.利用”	29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制度	37
第五章 市场模式的演进	49
第六章 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 劳动力、土地与货币	59
第七章 斯品汉姆兰,1795	67
第八章 前奏与后果	75

第九章	贫困与乌托邦	89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96

第二卷 自我保护的社会

第十一章	人、自然与生产组织	112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	116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续): 阶级利益与社会变迁	129
第十四章	市场与人	140
第十五章	市场与自然	152
第十六章	市场与生产组织	164
第十七章	自我调节的削弱	171
第十八章	破坏性张力	178

第三篇 进行中的转变

第十九章	大众政府与市场经济	189
第二十章	社会变迁中的历史	200
第二十一章	复杂社会里的自由	211

资料来源注释

1. 作为政策、历史法则、原则和体系的势力均衡	221
2. 百年和平	226
3. 金线的突然断裂	227
4. 钟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摆动	228
5. 金融与和平	228
6. 对“诸社会与经济诸体系”的选择性注释	229
7. 对“市场模式演进”的选择性注释	233
8. 关于斯品汉姆兰的文献	238
9. 济贫法与对劳动的组织	242
10. 斯品汉姆兰与维也纳	253
11. 为什么不采用惠特布雷德议案?	254
12. 迪斯雷利的“两国度”与有色种族的问题	256
索引	260
译后序	275

前言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能够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这本经典著作撰写前言,是一件荣幸的事。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变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他的观点——以及他的关切——与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动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在R. M. 麦基弗(R. M. MacIver)为这本书的1944年首版所写的导言中——那个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还仅仅只是存在于纸上——他以一种与波兰尼相似的预见能力写道:“这本书在当下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们揭示了历史教训。”如果这些人当时认真地读了这本书,并认真对待了它所揭示的教训,那么他们所鼓吹的政策就会比实际提出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vii

试图用不多的几行字来概括这样一本复杂而微妙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从语言 and 经济学方面看,一本半个世纪以前写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会不大好理解,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渗透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

viii

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是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的利益有要求时，他们照样会要求政府干预。

波兰尼是在现代经济学家界定自发调节市场的局限性之前写作《大转型》的。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无论何时，只要出现信息不完备或者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本质上总是如此——那么干预就存在，而且从原则上讲，这种干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大体上，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立场，已经能够既认识到市场的力量，也认识到它的局限，认识到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尽管大家对这种角色的边界还在争论。例如，人们对金融市场需要政府管制这一点，已经达成普遍共识，但还没有就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获得一致意见。

自现代以来，有非常多的证据支持以下历史经验：增长可能会导致贫困的增加。但我们同样知道，增长可以为社会的绝大部分带来巨大的好处，正如在一些更开化的(enlightened)发达工业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

波兰尼强调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和自发调节的货币机制这三个信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由此，他的著作成为今天占支配地位的系统研究方法(它是由 20 世纪之初一般均衡论经济学家们所预示的)的先驱。现今仍然有少数经济学家在坚持金本位的信条，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问题正是由于偏离了金本位体系而造成的，但这使得自发调节市场的鼓吹者的地位更易于受到挑战。浮动的汇率是那个时候的常规，人们可以认为这将支持那些信奉自发调节的人所持的立场。毕竟，凭什么外币汇兑市场应该由不同于支配其他市场的规则来统治呢？不过也恰恰是在这里，自发调节市场的软肋暴露了出来(至少对那些从来不注意这个信条的社会后果的人而言是如此)！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类市场(与许多其他资产市场一样)表现出过度的变动性(*ix* volatility)，也就是说，表现出超出构成要素的变化所能解释的变动性。同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价格——以及更广泛而言的投资者的预期——表现出来的过度变动性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灾难。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当代人又记起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教训：自发调节的市场并不总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甚至美国财政部(the U. S. Treasury)(不管是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治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MF)这些自由市场体系信仰的堡垒，都不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汇率，尽管它们从来没有给出一

个内在一致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市场应该与其他市场区别对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相矛盾——在表明信仰自由市场体系的同时,却作为一个公共组织而经常干预汇率市场,为外来债权人解套(bail out)提供基金,与此同时却索要高利率而使国内企业破产——已经在19世纪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被预示了。事实上,劳动力和货物的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鼓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人已寥寥无几了,并且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在教导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避开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的邪恶,而另一方面,它们却并不怎么乐意向代表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尽管它们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

不过,今天,战线的位置与波兰尼写作时的情况已大有不同。如我在早些时候所观察到的,如今只有顽固分子还肯——在一个极端——为自发调节的经济辩护,或者——在另一个极端——为政府运转的经济说话。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市场的力量,也遵从于它的局限性。但在这之上,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之间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中有些区别是容易摒弃的:装扮成经济科学和良善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最近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推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发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另外,人们很少会不同意,在许多国家规制既没有加强它们的金融体系,也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很明显这些规制应该被剥离掉。但“自由市场分子”走得更远,并给听从他们建议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即使是在这些最近的事件发生之前,已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样的自由化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将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身上,而支持这样的自由化会促进增长的证据——往好里说——却是明显不足的。不过与上述例子不同,还有一些问题的结论远非清晰可见。自由国际贸易使一个国家得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增加平均收入,尽管它会使一些个人失去工作。但在失业率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由贸易自由化而毁掉的工作机会可能明显要比它所创造的多,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贸易自由化与高利率捆绑起来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使得创建工作岗位和新企业成为不可能。没有人可以宣称,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工作中转移出来进入失业状态,会减少贫困或者增加国民收入。自发调节市场的信徒完全相信某种形式的赛伊定律(Say's law),即劳动力的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对于一个由低工资而发家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甚至可能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

它会对工人的工资要求产生压制力量。但对经济学家而言,失业工人表明的是运转不良的经济,我们已经在太多的国家看到了这种或那种运转不良的极大证据。自发调节经济的某些鼓吹者把这些运转不良归罪于政府本身;但不管这种归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在今天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

但是波兰尼强调了自发调节经济的一种特殊缺陷,这种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为讨论对象。它包括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或者经济变革——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此外,随着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认识到,词汇已发生了改变。例如,我们现在谈论社会资本。我们认识到,在拉美许多地方,过长的失业期、持续的严重不平等,以及无处不在的贫困和污秽,已经对那里的社会整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并成为那里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暴力现象的助推剂。我们认识到,俄罗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蚀了社会关系,破坏了社会资本,导致了俄罗斯黑手党(the Russian Mafia)的出现乃至它的统治地位。我们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消了对印尼的食品补助金,正如工资的直线下降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一样导致了可预见的(并且确实被预见到的)政治和社会骚乱。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本该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仅经济政策造成了古老(尽管有些比较脆弱)的社会关系的崩溃:社会关系的这种崩溃本身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经济效应。投资者不会情愿把他们的钱投入到那些社会中存在高度紧张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内的很多人也会把他们的钱抽离出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绝大多数社会都在自己的历史中演化出一些照顾穷人和社会底层的人(the disadvantaged)的办法。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个人越来越难以担负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诚然,一个农民可能会失去他的收成,并且一个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可能会因为要为一个阴雨天气(或更准确地说要为一个干旱季节)储备钱财而备感艰辛。但他从来不会缺乏有报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个人会遭到他们不可控的力量的打击。如果失业率很高——像大萧条中所发生的那样,或者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情况一样——那么个人所能做的就极其有限。他们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场分子关于让工资保持弹性很重要(也就是说,接受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应降低工资)的说教,但他们自己却对推进这样的改革无能为力,即使这些改革确实具有促进充分就业的美好效果。明显不能成立的是,

通过让自己满足于更低的工资,个人就能够立即获得就业。效率工资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以及一系列其他理论,已经提出了许多强有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劳动力市场并不像自发调节市场鼓吹者所认为的那样运作。但无论这些解释是怎样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失业不是一种幻觉,现代社会需要有应对它的方式,而自发调节的市场并没有这样做,至少是没有以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这样做(对这一点甚至也是有解释的,但讨论这些解释会让我离题更远)。快速的转型破坏了旧有的应对机制和旧有的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发展出来之前,它已经产生了这方面新的需要。很不幸,来自 19 世纪的这个教训已经太过经常地被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它是自由主义正统观念的现代版——的鼓吹者们遗忘了。

xii

这些社会应对机制的失败反过来已经导致了对早先被称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的侵蚀。最近的 25 年中发生了两起这方面的重大事件。前面我已提到作为东亚危机一部分的印尼灾难。在这场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其他鼓吹者抵制本该成为解决方案重要组成部分的措施:不偿还债务。这些债务中的绝大多数是私人部门向私人借贷者的贷款;当借贷者无法偿还借款时,本来是有处理这一情况的标准办法的:破产。破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说不,因为破产将造成对契约神圣性的侵犯。然而这种对更为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的侵犯,他们却全然没有一丁点儿的顾虑。他们更喜欢为政府提供基金,使外国债权人得以解套,而这些人其实在出借时并未守持应有的谨慎态度。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让那些旁观者付出沉重代价的政策,尽管这些工人和小企业在危机的最初来临中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更富戏剧性的是俄国的失败。这个曾经成为一场实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的国家,又成为一次新实验的对象。这个新实验就是,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让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付诸实施。正如大约 70 年前布尔什维克强制推行了一次快速社会转型一样,现在新自由主义者在强制推行另一场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快速社会转型。这个国家的人民曾得到承诺,一旦市场的力量释放出来,经济就会欣欣向荣:那种资源配置被扭曲的、因社会所有制而导致激励不足的、低效率的中央计划体系,将被分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取代。

然而繁荣昌盛并没有发生。经济大约萎缩了一半,贫困比例(以每日四美元为标准)从 2% 上升到接近 50%。在私有化使少数寡头变成亿万富翁的同

xiii 时,政府甚至没有钱给穷人支付年金——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被认为是向世界表明这里是一个吸引人的投资场所,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无底洞。所以毫不奇怪,资本成群结队地逃了出来。由于私有化进程缺少合法性,所以私有财产权的背后并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撑。把钱留在俄罗斯的那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旦一个新政府上台,他们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即使撇开政治上的问题不谈,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理性投资者会将他的钱放在繁荣的美国股票市场,而不是投在一个处于不折不扣萧条中的国家。现在,尽管有点太晚,但这些错误政策的后果正在被意识到;而想要把逃逸了的资本重新吸引回来几乎已经不可能了,除非保证无论财富是如何获得的,都能够保有下去,可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实际上是必然导致——寡头结构本身的继续维持。

经济科学与经济历史已经开始认识到波兰尼论点的有效性。但经济政策——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信条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政策,它们教导发展中世界和那些转轨经济体应该如何完成它们的大转型——看起来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在美国,第一条电报线于1842年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而农业生产力的突破性提高——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有赖于政府的研究、传授和其他扩展性服务。在西欧,对资本的限制性规定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美国政府威胁对欧洲实行贸易制裁,除非后者向加勒比地区的美国公司所拥有的香蕉开放市场。尽管有时这些干预是正当有理的,因为它能被当做针对其他政府进行的干预的必要应对措施,但确实存在无数不知羞耻的保护主义和补贴的例子,比如农业方面的那些例子。在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例子,从墨西哥土豆和鳄梨到日本电影,到乌克兰的女式大衣,再到俄罗斯的铀。香港长期作为自由市场的堡垒而被宣扬,但当香港发现来自纽约的投机者正试图通过同时对股票和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来摧毁它的经济时,它对两者进行了大量的干预。美国政府大声抗议,说这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废弃。然而香港的干预成功了——它稳定住了那两个市场,避开了对它的通货的未来威胁,而且从交易中大赚其钱。

xiv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强调,问题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在于“让价格就位”,以及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这种观点看来,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样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误解了转型本身的性质——它是社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并且即使是这种转型的经济方面也比他们的简单药方所蕴含的要深刻得多。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正如波兰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样。

如果波兰尼是在今天进行写作,就会有额外的证据支持他的结论。例如,在东亚——整个世界中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真正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认保持社会团结的价值,以及不仅致力于保护而且还努力提高社会和人力资本。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不仅有迅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贫困也大量减少。如果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为市场体系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那么东亚的成功则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经济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优越性提供了同样强有力的证明。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市场意识形态的持有者才在东亚危机期间几乎表现出某种愉悦,因为他们觉得这场危机暴露出积极政府模式的致命弱点。尽管他们的说教一方面确实提到了对加强金融监管的需要,但他们更多是抓住这个机会促成更大的市场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消除那些社会契约的代名词,而正是这些契约提供了增强社会和政治稳定——而这种稳定是东亚奇迹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经济安全。当然,事实上东亚危机正是自发调节的市场失败的最戏剧性的例证:正是短期资本流的释放,在全世界晃荡着想寻找最高回报的大量美元——它们只受情绪化的快速理性和非理性变化的支配——成为这场危机的根源。

xv

让我通过回到波兰尼的两个中心主题来结束这篇前言。第一个主题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可以替代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它们代表了对自由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但正如波兰尼所言,“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根植于一个无法再运转的市场社会”。新自由主义信条的鼎盛时期大致在1990—1997年,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人也许会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终结标志着市场经济以及自发调节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相信,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毕竟,在发达国家内部,这个阶段的特征在于所有地方都发生了对这些信条——里根—撒切尔自由市场信条——的拒斥以及对“新民主党(New Democrat)”或者

“新工党(New Labor)”政策的支持。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冷战期间先进工业化国家只不过是无法承担采取这些政策的风险,即如此伤害穷国的风险。这些国家原本是有选择余地的,它们同时受到西方和东方的劝诱,而西方对策的失败实例面临使它们站到另一个阵营中去的危险。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些国家就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含有巨大风险的主义于是毫无顾忌地强加在它们身上。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仅不谨慎,同时也是无知的:因为对于一个不能给多数人——或者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带来好处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用无数种声名狼藉的方式来加以拒绝。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一个黑手党政治体系——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

xvi

波兰尼把市场看做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把这个广阔的经济看做一个还要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不是把市场经济看做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做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太多地被当做改革的目标本身来对待。记分卡被用来记录不同国家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却从来不去想私有化本身是很容易的:要做的一切就是把财产分给自己的朋友,并期望对方回报以租金。但总是没有记分卡用来记录被推向贫困的个体的数量,或者相对于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而言那些被毁掉的就业机会的数量,或者暴力的增加,或者不安全感的增加以及无力感的增加。波兰尼谈论的则是一些更为基本的价值。在这些基本价值与自发调节市场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断裂(disjunction),在今天和在波兰尼写作时同样清晰可见。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要性,但当涉及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些影响他们生计的问题,即经济时,他们被告知:经济学的铁律让你无从选择;并且由于你(通过你的民主政治进程)很可能把事情搞糟,你必须放弃做那些关键性经济决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力,把它交给一个独立的、几乎总是由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银行;为了保证你的行为与这个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你被告知要全力避免出现通货膨胀——至于就业和经济增长,不必去管它;为了保证你确实如此行事,你被告知要全心信靠中央银行的措施,诸如以固定比率扩大货币供给;当一种措施未能奏效时,就搬出另一种,比如通胀目标管理(inflation targeting)。简而言之,当我们的左手似乎是在通过民主向前殖民地中的个人赋权的同时,我们的右手又把它收了回来。

波兰尼非常恰当地以对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讨论来结束他的这本著作。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eleano Roosevelt)说,在大萧条中,“我们没

有什么可以害怕的,除了害怕本身”。他不仅谈论了那些古典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也讨论了免于恐惧和饥饿的权利的重要性。规制可能会剥夺某些人的自由,但这样做可以促进另一些人的自由。将资本任意在一国移进移出是某些人所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实践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不幸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无论是在自由放任的旧伪装下,还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新伪装下,都并不代表着对这些自由的平衡协调,因为穷人比其他人面临着更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且在有些地方,比如俄罗斯,处在贫

xvii

困境地的人数急剧上升而生活水准已然下降。对这些人而言,自由更少了,连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权利都没有了。如果波兰尼在今天进行写作,我相信他会认为全球社会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它能不能重新调整这些不平衡——在一切都太迟之前。

导 言^①

弗雷德·布洛克

[Fred Block]

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在回顾多年来《大转型》的接受和影响史时感叹道：“有些书是挥之不去的。”这是一个恰当的判断。尽管写作于 1940 年代早期，卡尔·波兰尼作品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尽管如今的书很少具有超出几个月或几年的参考价值，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大转型》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新鲜价值。的确，对于理解 21 世纪之初的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持久性价值。《大转型》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即相信不管是民族国家社会还是全球经济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来组织——最强有力的批判。自从 1980 年代、特别是 1990 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这种市场自由主义——在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新自由主义

① 在准备这篇导言的过程中，我欠下了重大的债务。最主要的感谢要给 Kari Polanyi Levitt（波兰尼的独生女儿，曾任 McGill 大学教授——译者注），她对这篇导言的几稿草稿提供了广泛而细致的评论，既包括内容上的也包括编辑上的。与她一起工作是一种珍贵的特权。Michael Flota, Miriam Joffe-Block, Marguerite Mendell，以及 Margaret Somers 同样给了我有意义的反馈。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Margaret Somers 一直帮助我更切近地理解波兰尼的思想；我所写的许多内容都反映了她的想法。另外，Michael Flota 为这篇导言的准备提供了帮助，也为这个新版的大部分工作提供了帮助。

我同样要对 Kari Polanyi Levitt 和 Marguerite Mendell 作为坐落在魁北克蒙特利尔的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卡尔·波兰尼政治经济学研究所（the Karl Polany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主任为我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我对波兰尼思想的理解由于她们的合作以及对波兰尼的手稿档案的接触而大大深化了。期望更多地了解波兰尼思想的读者，以及国际社会在这个传统中工作的学者，应该联系卡尔·波兰尼研究所，并参考在蒙特利尔的 Black Rose 出版社出版的重要系列著作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 Issues*。

和“华盛顿共识”的标签下——已经开始支配全球政治。但在本书 1944 年首版后不久,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就加剧了,这种紧张模糊了波兰尼贡献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捍卫者与苏式社会主义辩护者之间的高度极端化的辩论中,波兰尼那复杂的、辨析入微的立场毫无用武之地。然而,具有某种公平意味的是,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波兰尼的著作开始得到它本该拥有的显著地位。 xix

这个后冷战时代的核心争论在于对全球化的态度。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通信和交通的新技术使得下面这种趋势既不可避免也值得追求:通过不断扩张的贸易和资本流,以及对盎格鲁—美利坚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的接受,使世界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全世界,层出不穷的运动和理论家从不同的政治视角抨击了这种全球化的理念——有的从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和地区的认同的角度拒绝它,另一些则持有与此不同的全球协作与合作的理念。这场争论中所有阵营的人都能从对《大转型》的阅读中获得教益;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他们的批评者,都能获得对市场自由主义历史更深刻的把握,以及对早期经济全球化努力的悲剧性后果的深入了解。

波兰尼的生平与著作

卡尔·波兰尼(1886—1964)在布达佩斯长大,成长在一个社会承担和智识成就都非常突出的家庭环境中^①。他的弟弟迈克尔(Michael)成了一位其著作至今仍被广泛阅读的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波兰尼本人早在“一战”之前就已是匈牙利学生和知识分子圈中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在 1920 年代的维也纳,波兰尼作为资深编辑为中欧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周刊《奥地利国民经济》(*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工作。在这期间他首次接触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他那著名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x.x

^① 波兰尼的详尽传记还不曾出现,但大部分相关材料已被 Marguerite Mendell 和 Kari Polanyi Levitt 的下述文章所涵盖:“Karl Polanyi—His Life and Times,”载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No. 22(spring 1987): 7—39。亦参见 Levitt 编: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Montreal: Black Rose Press, 1990); 以及她的论文:“Karl Polanyi as a Socialist,”载 Kenneth McRobbie 编: *Humanity, Society, and Commitment: On Karl Polanyi* (Montreal: Black Rose Press, 1994)。广泛的生平资料也可以从 Kenneth McRobbie 与 Kari Polanyi Levitt 编的 *Karl Polanyi in Vienna* (Montreal: Black Rose Press, 2000) 一书中获得。Peter Drucker, 一位熟识维也纳的波兰尼家族的管理学家,在他的回忆录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New York: John Wiley, 1994) 中写了一段妙趣横生的描述,但许多特定事实——包括一些波兰尼亲属的名字——都是不准确的。

Hayek)的观点。米塞斯和哈耶克当时正试图重建市场自由主义在智识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当时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魔力严重动摇了。^①在当时短时间之内,米塞斯和哈耶克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从1930年代中期直到1960年代,能够为政府积极管理经济提供合法性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念支配着西方的国民政策。^②但在“二战”之后,米塞斯与哈耶克在美国和英国不知疲倦地鼓吹市场自由主义,并直接启发了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样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哈耶克一直活到1992年,这么长的寿命足以使他由苏联的解体而感到自己得到了平反。在去世之前的那段岁月里,他被广泛地尊为新自由主义之父——启发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追求去规制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但是,早在1920年代波兰尼就已经直接挑战了米塞斯的论点,并且此后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一直是他的中心理论关切。

在为《奥地利国民经济》工作期间,波兰尼见证了预示后来的大萧条以及法西斯兴起的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和1931年维也纳信贷的失败。但随着希特勒1933年攫取了政权,波兰尼的社会主义观点就变得在政治上可疑了,他被要求从周刊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他流亡去了英国,在那里作为工人教育协会(the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这是牛津和伦敦大学的校外部——的一个讲师。^③对课程的准备引导波兰尼将自己沉浸在英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材料中。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将这些历史材料与他对米塞斯和哈耶克那些在今天看来极有影响的观点的批判熔为一炉。

xxi

这本书的实际写作是在波兰尼1940年代早期在美国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④在一项奖学金的资助下,他可以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而且环境的改变有助于波兰尼综合他思想

① 对从1920年代直到1990年代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叙述与分析,见Richard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Think Tanks and the Economic Counter-Revolution, 1931—1983*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5)。Cockett强调了这种具有讽刺性的现象:发明了市场资本主义的是英国,可是它却不得不从维也纳把它重新进口进来。

② 巧合的是,波兰尼的著作首版的年份与哈耶克出版其最著名的*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Chicago Press, 1944)的年份相同。波兰尼的著作赞许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为市场力量的影响设限,而哈耶克的书则坚持认为新经济政策改革把美国推向了既可能导致经济毁灭又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统治的危险边缘。

③ Marguerite Mendell, "Karl Polanyi and Socialist Education," 载 Kenneth McRobbie 编: *Humanity, Society, and Commitment: On Karl Polanyi* (Montreal: Black Rose Press, 1994), 第25—42页。

④ 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波兰尼从小就流利地掌握了英语。

中的各种脉络。实际上,这本书的持久贡献之一——它对规制全球经济的那些制度的关注——是直接与他 的多国流亡经历联系在一起 的。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到英国以及美国的经历,与一种深沉的道德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使波兰尼成为某种世界公民。在生命垂暮之际,他给一个老朋友写信时说:“我的一生是‘世界性的’一生——我经历了人类世界的生活……我的著作是为亚洲,为非洲,为新生民族而写的。”^①尽管他一直保留着对祖国匈牙利的深沉感情,波兰尼已经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并且认识到各种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是如何被某种全球经济安排所推动和支持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月里,波兰尼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在那里和他的学生展开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贸易和市场的人类学研究。他与C. M. 阿伦斯伯格(Conrad M. Arensberg)和H. W. 皮尔逊(Harry W. Pearson)一道出版了《早期帝国中的贸易与市场》;后来,他的学生们准备以波兰尼这一时期的工作为基础为他出版身后著作。A. 罗特斯泰因(Abraham Rotstein)帮助出版了《达荷美与奴隶贸易》,G. 多尔顿(George Dalton)编辑了一个由从前出版过的文章——包括《大转型》的节选——组成的文集《原始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经济:卡尔·波兰尼文选》;皮尔逊也根据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笔记编辑出版了《人类的生计》。^②

波兰尼的论点:结构与理论

xxii

《大转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和第三部分聚焦于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的兴起、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以及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等这些事件的直接环境。在这些导论性和结论性的章节中,波兰尼构建起一个谜:为什么在欧洲,一段延长了的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从1815年持续到1914年——突然让位于一场尾随着经济崩溃的世界大战?第二部分——全

^① 致 Be de Waard 的信,1958年1月6日,转引自 Iлона Duczynska Polanyi(波兰尼的妻子——译者注):“我1920年第一次遇见波兰尼……”载 Kenneth McRobbie 与 Kari Polanyi Levitt 编: *Karl Polanyi in Vienna* (Montreal: Black Rose Press, 2000), 第313页、第302—315页。

^②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与 Harry W. Pearso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7); Polanyi, *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 An Analysis of an Archaic Econom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6); George Dalton 编,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c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1968; reprin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Harry W. Pearson 编, *The Livelihood of Ma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书的核心——给出了波兰尼对这个谜的解释。通过回溯到 19 世纪最初岁月的英国工业革命,波兰尼表明了当时的英国思想家是如何通过发展出市场自由主义理论来对早期工业化困扰作出反应的,这种理论的核心信念在于,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从属于自发调节的市场。他解释道,作为英国“世界工厂”式领导地位的一个后果,这些信念成为世界经济的组织原则。在第二部分的后半段,即第十一章到十八章,波兰尼论证说市场自由主义产生出了一种必然的反应——以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为目的的不约而同的努力。这些努力的存在意味着市场自由主义无法像想象中那样运转,意味着统治全球经济的那些制度,在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制造了不断加剧的紧张。波兰尼追溯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崩溃的根源,并且表明,导致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乃是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组织全球经济这种企图的直接后果。第二次“大转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第一次“大转变”——市场自由主义——的一个后果。

在展开他的论证的时候,波兰尼仰仗于他对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广泛阅读。^① 针对从 15 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事件,《大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看法;它也对如下这些广泛多样的议题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互惠和再分配在前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古典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把自然商品化所带来的风险。许多当代的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已经从波兰尼的论述中得到了理论启发。今天越来越多的书和文章通过对《大转型》的核心征引而得以成型。

由于该书异常的丰富性,试图概括它的努力是徒劳的;这里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详细阐述波兰尼论证中的某些主要线索。但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重新组织他理论立场的独创性。波兰尼并不适用于政治版图的标准划分;尽管他同意凯恩斯对市场自由主义的许多批判,他也很难被看做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终其一生,他都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它与包括主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都有深刻的区别。^② 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

^① 关于对波兰尼的一些关键思想来源的分析,见 Margaret Somers, “Karl Polanyi’s Intellectual Legacy,” 载 Levitt 编: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Montreal: Black Rose Press, 1990), 第 152—158 页。

^② 波兰尼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文献中最复杂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见 Marguerite Mendell 和 Kari Polanyi Levitt: “Karl Polanyi—His Life and Times”; Fred Block 与 Margaret Somers, “Beyond the Economic Fallacy: The Holistic Social Science of Karl Polanyi,” 载 Theda Skocpol 主编,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第 47—84 页; Rhoda H. Haperin, *Cultural Economies: Past and Presen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主义的定义本身就与对这些概念的惯常理解大异其趣。

波兰尼的“嵌入”(embeddedness)概念

解释波兰尼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嵌入”概念。作为他对社会思想所作的可能是最为著名的一个贡献,这个概念同时也已经成为无数混乱的根源。波兰尼的论证起始于对下面这一点的强调,即直到当下为止,现代经济思想的整个传统都奠基于这样一种概念——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连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即使是在经济学家承认市场体系有时需要政府来克服市场失败时,他们还是依赖于把经济视为经由有机整合的市场组成的均衡体系的概念。波兰尼的意图在于表明,这个概念与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现实的差距是多么大。他坚持认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

“嵌入”这个词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说的那样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①波兰尼赋予这个术语的内涵超出了人们今天已熟知的那种理解,即市场交易有赖于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他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强调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尔萨斯(Malthus)和李嘉图(Ricardo)——与从前的思想家之间的根本决裂。和历史上将经济附属于社会的常规模式不同,他们的自发调节市场体系要求社会从属于市场的逻辑:他在第一部分中写道:“终极而言,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②不过这个段落以及其他类似的段落本身导致了对波兰尼观点的一种误读。经常有人错误地认为,波兰尼的意思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在

xxiv

^① 波兰尼的“嵌入”概念已经被一些重要的当代学者所借用和不断阐释,包括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载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spring 1982): 第 379—415 页;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载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November 1985): 第 481—510 页; 以及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到底是什么启发了这个术语的创造还不清楚,不过看起来比较可能的是,波兰尼借用了来自采煤业的隐喻。在研究英国经济史的时候,他广泛阅读了关于英国采矿业的历史和技术材料,而采矿的任务就是把嵌入矿井石壁中的煤炭分离出来。

^② 这段话实际是在第二篇第五章的开始。——译者注

19 世纪的兴起,经济已经成功地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①

这种误读模糊了波兰尼论点的独创性和理论丰富性。波兰尼确实说过古典经济学家们想要创造一个经济已经有效脱嵌的社会,而且他们鼓励政治家们去追求这个目标。可是他同样坚持认为他们不曾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实际上,波兰尼反复说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建构;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例如,在第一部分的开篇他就写道:“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为什么脱嵌 (disembedding) 不可能成功

波兰尼认为要想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成纯粹的商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在他眼中,自发调节市场理论家及其同盟者经常把人类社会推到悬崖边。但当不受限制的市场所产生的后果变得昭然若揭时,人们会抵制它;他们拒绝像旅鼠那样前赴后继地走向悬崖,自蹈死地。相反,他们会通过从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中抽身而退来挽救社会并使自然环境免于毁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让市场脱嵌就好比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让市场得到更大程度自治的努力同时也增加了张力的程度。随着进一步的拉伸,或者橡皮筋绷断——意味着社会解体——或者经济回复到更嵌入的状态。

这项论证的根本逻辑在于波兰尼在真实的和虚拟的商品之间所作的区分。对波兰尼而言,商品就是那些为了在市场上出卖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根据这个定义,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是虚拟商品,因为它们最初生产出来并非用于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不过是人类的行为,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而现代社会中货币与信用的供给必然是政府的政策创造的。现代经济始于假设这些虚拟商品会像真实商品那样起作用,但波兰尼坚持认为这种手法会产生致命后果。因为这意味着经济理论的建立基于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恰恰使人类社会处于危险之中。

^① 像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迪南德·布罗代尔这样的人物都是这样解读波兰尼的。见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Fifteenth Eighteenth Century*, Vol. 2, *The Wheels of Commerce*, trans. Sian Reynol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第 225—229 页。

波兰尼的论证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一项道德论证：认为把自然和人类当成物品且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明显是错误的。这种想法亵渎了数百年来统治着社会的那些原则：自然与人的生命几乎一直都被认为有其神圣的一面。这一神圣的维度与将劳动力与自然从属于市场这种做法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波兰尼拒绝将自然当做商品来对待，这预示了当代环保主义者的许多主张。^① xxvi

波兰尼论证的第二个层面集中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② 即使经济被假定为自发调节，国家也必须持续地调整货币和信用的供给，以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危险。同样地，国家还要通过在失业期间提供救济，通过教育和培训未来的工人，通过试图影响人口流动等措施来管理不断变换的雇佣需求。在土地方面，政府已经通过使农民免于波动不定的收成和价格的压力而努力维持粮食连续生产。在城市地区，政府通过环境和土地使用法规来管理现有土地的使用。简而言之，管理各种虚拟商品的角色使国家置身于三种最重要的市场之中，维持市场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外在于”经济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可能。^③

虚拟商品解释了脱嵌经济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它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类型的技术或行政功能。^④ 当国家政策向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会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容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为了保证这些群体在承担这些代价的 xxvii

① 想要管窥这一点对环境经济学的影响，见 Herman E. Daly 与 John B. Cobb Jr.，*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of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② 在波兰尼的论证中所隐含的是对作为一个自发调节机制的市场的更为特殊的批评。在制造业商品的情况中，一种供给充裕的商品的价格下跌既可以通过鼓励更多的消费，也可以通过抑制新的生产来重新达到均衡。而在虚拟商品的情况中，价格机制的有效性减小了，因为无法假定供给能够自发增加或削减。

③ 对于其他类型的商品而言，政府的涉入是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见 Steven Vogel 标题恰当著作：*Free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货币银行学家已经反复尝试建立一种固定法则，以使用它来管理货币供给的增长，而不必依靠中央银行家的判断力。可这些尝试都没能成功。在找不到这种一劳永逸的公式的情况下，第二种策略就是通过赋予中央银行家半宗教的、近乎神谕性的权威，来模糊他们角色的政治性。见 William Greider, *Secrets of the Temple: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同时不卷入破坏性的政治行动，国家要花费更大的气力。这就是波兰尼宣称“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这一论断的部分含义所在：它要求通过治国术和压制来把市场逻辑及其所伴随的风险强加给普通大众。^①

追求不可能性的后果

自由市场理论家将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市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识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弹性的根源之一。因为诸社会无一例外地在全盘市场自发调节化的悬崖边上退缩了，所以它的理论家就总是可以宣称，任何失败都不是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缺乏贯彻它的政治意愿造成的。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由此就无法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它的鼓吹者也有了无懈可击的理由来为它的失败辩护。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下面这个最近的事例中：通过“休克疗法”将市场资本主义施加于前苏联国家。尽管这一努力的失败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休克疗法”的辩护者继续将失败归咎于政客们太软弱以致很快就在政治压力面前缴械投降；认为只要他们顶住了压力，允诺中的、迅速转入市场能带来的好处就会实现。^②

波兰尼对经济脱嵌的努力的极端怀疑同样也是他关于“双重运动”的有力论证的一个来源。因为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相反方向的抵制，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尽管工人阶级运动一直是保护性反向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波兰尼明确指出，社会中的所有群体都参与了这项事业。例如，当周期性的经济不景气破坏了银行体系的时候，商业群体就会主张强化中央银行，以使国内的信

① 这是波兰尼讨论英国新济贫法时的中心论点；劳动力市场的创生要求国家压制力量的巨大增长。在这一点上，波兰尼的解释已经得到了后来学者的支持，特别是 Karel Williams, *From Pauperism to Poverty* (London: Routledge, 1981)。关于斯品汉姆兰，波兰尼的一系列论点都被质疑。关于旧济贫法的两个重要的、但却相互冲突的讨论，见 K. D. M. Snell, *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 Social Change and Agrarian England, 166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以及 Geoge Boyer,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oor Law, 175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明确用波兰尼视角对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转型展开的讨论，见 Maurice Glasman, *Unnecessary Suffering: Managing Market Utopia* (London: Verso, 1996)；John Gray,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Books, 1998)；以及 David Woodruff, *Money Unmade: 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贷供给能够不受全球市场的压力。^① 一句话,即使是资本家,也会周期性地抵制市场的自发调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也会努力参与旨在增加稳定性与可预见性的各种保护性运动。

“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这一点,是波兰尼一贯的主张。他明确抨击市场自由主义者,后者指责说妨碍全球市场运行的保护主义壁垒的树立是一种“集体主义阴谋”的产物。与这一观点相反,波兰尼论证道,这些壁垒是自发和无计划的反应的产物,是社会上所有群体对难以忍受的自发调节市场体系压力的反弹。保护性反向运动必须发生,因为一个脱嵌的经济会导致的灾难必须被阻止。波兰尼暗示,指向自由放任经济的运动需要这种反向运动来构成稳定。例如,当趋向自由放任的运动过于强大时,就像 1920 年代(或者 1990 年代)的美国,过分投机和不断增大的不平等就会破坏持续繁荣的基础。而且,尽管波兰尼一般是同情保护性反向运动一方的,但他也同样认识到它有时会造成危险的政治经济停滞。他在对法西斯在欧洲兴起的分析中承认,当两种运动都无法解决危机时,张力就会不断增强,直到法西斯主义获得了攫取权力的力量,并与自由放任和民主同时决裂。^②

xxix

在对任何特殊时刻的历史可能性范围的想象上,波兰尼的双重运动主题与市场自由主义和教条马克思主义两者都形成鲜明对比。市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社会只能有两种真正的选择:市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尽管它们的偏好相反,可这两种立场在排斥任何其他可能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与之相反,波兰尼坚持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真正的可选项;它不过是一种乌托邦视野。更进一步,在第 19 章中,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这个定义允许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扮演角色。波兰尼认为,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许多不同的能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实现嵌入。确实,这些方式中的某一些会相对易于做到扩大产出和鼓励创新,而另一些则在将市场从属于民主指导方面更“社会主义”一些,但波兰尼暗示,既有效又民主的那些选择不管是在 19 世纪还是 20 世纪都

^① 波兰尼在第 16 章里写道:“实际上,现代中央银行本质上是一种旨在提供保护的工具有,没有这种工具,市场将会毁掉自己的孩子——所有类型的商业企业。”

^② 波兰尼在“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中对法西斯主义的讨论见 J. Lewis, K. Polanyi 与 D. K. Kitchin 编,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Gollanz, 1935), 第 359—394 页。

是可能的。^①

全球政体的中心位置

然而作为一个老练的思想家,波兰尼当然不会去设想单个国家能够自由选择调和双向运动双方的方式。相反,波兰尼的论点之所以与当前的全球局势相关,恰恰是因为他把统治着世界经济的那些规则置于他框架的中心。他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论述,集中于国际金本位制与各国内部行动者能够采取的政治选择之间的冲突。想要理解波兰尼这方面的论证,要求简要涉及金本位制的逻辑,但这种涉及很难说是一种回归,因为金本位制的潜在目标仍旧对当代市场自由主义者具有强大影响力。波兰尼将金本位制视作一项非同寻常的智识成就,^②它是一种使自发调节的市场理论得以付诸实施的制度创新,并且,一旦被应用,它就有力量让自发调节的市场看起来像是出于自然。

市场自由主义者希望创造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扩展市场范围的世界,但他们必须寻找出能让不同国家、拥有不同货币的人民得以自由交易的方式。他们推断说,如果每个国家都遵循这样三个简单的原则那么全球经济就能拥有完美的全球自发调节机制。首先,每个国家把本国货币的价值与固定数量的黄金联系起来,并保证以这个价格购入和卖出黄金。第二,每个国家都以其黄金储备的数量作为自己国内货币供给的基础,这样它的流通货币就会由黄金来支撑。第三,每个国家都尽力给自己的居民以最大的自由去从事国际经济交易。

金本位制为全球自发调节创造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机制。英国的企业能够向全世界各个地方出口货物和进行投资,充满信心地认为它们所挣的通货将会“像黄金一样好(good as gold)”。在理论上,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年份中由于它的公民在海外所花多于所挣而处于赤字地位的话,黄金就会从该国

^① 波兰尼启发了兴盛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一派思想,这派思想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变体”,表明市场在美国的嵌入方式与在法国、德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嵌入方式非常显著地不同。见Rogers Hollingsworth与Robert Boyer编,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以及Colin Crouch与Wolfgang Streeck,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 Mapp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7)。

^② 在18世纪,首先阐述了这个理念的是Isaac Gervaise和David Hume。见Frank Fetter,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onetary Orthodoxy, 1797—187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第4页。

的储备中流出,来清偿外国人该得的支付。^① 国内货币和信用的供给则会自动缩减,利率上升,价格与工资下跌,对进口的需求下降,出口于是变得更有竞争力。由此这个国家的贸易赤字得以自我消解。在没有政府插手的情况下,每个国家的国际账户都能达到平衡。这样,在不需要某种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将被统一为一个单一市场;主权仍旧独立存在于许多民族国家之中,这些国家的自身利益将会引导它们自愿采用金本位规则。

金本位制的后果

金本位制的意图在于创造一个整合的全球市场,这种市场将减少民族单元和国家政府的作用,但实行金本位制的真正后果恰恰与之相反。^② 波兰尼指出,当金本位制在 1870 年代被广泛采用时,它产生了加强国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重要性的讽刺性后果。尽管市场自由主义者梦想一个太平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唯一争斗仅仅在于个人和企业努力做得比对手好的那种竞争,但他们通过金本位制实现这些梦想的努力却导致了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

现实情况是,金本位制的简单规则将令人无法忍受的经济代价加诸人们身上。当一个国家的国内价格结构与国际价格水平不符时,这个国家应对黄金储备枯竭的唯一合法调节手段在于贬值。这意味着允许其经济不断收缩,直到下跌的工资把消费削减到重获外贸平衡的水平。这进一步意味着工资和农业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失业的增加、企业和银行的大量破产。

发现这种调整代价过高的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工商界自己也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几乎就在金本位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的同时,整个社会就联合起来努力消解它造成的冲击。各国首先使用的办法就是增强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保护性关税的使用。^③ 通过降低贸易流对价格变化的

^① 黄金外流的机制也是非常精巧而无需政府行动的。因为赤字国家的人民向国外所花的多于他们赚回国内的,他们的通货——其供给偏大——相对于其他通货的价值就下降。当价值下降到一定水平——称之为金点(the gold point)——之下时,国际银行家就可以有利可图地用这种货币来购买黄金,并将买来的黄金运到国外卖一个更高的价钱。黄金就是以这种方式从赤字国流到盈余国的。

^② 正如波兰尼所了解到的,金本位制的实际运作与理论上所描绘的大相径庭。见 Barry Eichengreen,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第 3 章; Christopher Chase-Dunn, Yukio Kawano 和 Benjamin Brewer, "Trade Globalization since 1795: Waves of Integration in the World-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February 2000): 第 77--95 页。

敏感度,各国在其国际贸易中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可预见性,并使自己在面临突然的和意外的黄金外流时不那么脆弱。

进一步的权宜之计在于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在 19 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争相建立正式殖民地的竞赛。自由贸易的逻辑曾经是反殖民主义的,因为如果开发出来的市场和投资机会被所有贸易者共享的话,宗主国在殖民地市场开发后得到的利益就无法补偿自己的殖民成本。但随着保护主义在国际贸易中的兴起,殖民开发的得失计算就反过来了。新获得的殖民地将得到帝国主义关税壁垒的保护,而且宗主国的贸易者将拥有获得殖民地市场和原材料的特权。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风(rush to empire)”加剧了英国和德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敌对,这种敌对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①

对波兰尼而言,帝国主义冲动是不可能某些国家的基因密码中找到的;而是当各个国家面临金本位制无时不在的压力而努力寻找保护自己的途径时,帝国主义就出现了。从有利可图的殖民地流过来的资源可能会把一个国家从突然的黄金外流所造成的绞痛中拯救出来,对海外人口的剥削则可能避免国内阶级关系的继续恶化。

波兰尼认为,市场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倾向使他们发明出金本位制度,希望由此制度带来一个无国界的、不断增长和繁荣的世界。但事与愿违,金本位
xxxiii 制度无止境的冲击却迫使国家通过不断加固的国家乃至帝国边界来巩固自己。金本位制继续对各国施加惩戒性压力,但它的功能却被从关税壁垒到帝国主义等种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严重削弱了。然而,甚至在这个完全悖谬的体系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崩溃时,它依然被视作当然,以至于政治家们也行动起来,致力于恢复它。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整出戏又再次悲剧性地地上演了,各国被迫在保护汇率和保护自己的公民之间作出抉择。正是在这个僵局中,法西斯主义浮出水面。在波兰尼眼中,法西斯主义冲动——通过牺牲个人自由来保护社会免于市场的侵害——是普遍的,但地方偶然性决定了法西斯主义政体能否夺取权力。

^① 波兰尼的论点与列宁的论点有很大区别,列宁认为不断加剧的帝国主义冲突乃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后阶段金融资本膨胀的一个产物。而波兰尼则费力地解释,金融资本家可以是阻止战争的一种主要力量。

当下的相关性

对当下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波兰尼的论点是重要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乌托邦视野与激发了金本位制的信念如出一辙。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在坚持:全球经济的整合在于摒弃国家边界,这种整合能够为这个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打下基础。一旦各国认可了全球市场的逻辑并将其经济向自由流动的商品和资本开放,国际间的冲突就会被温和的竞争所取代,这种竞争不过是攀比谁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如同他们的先辈所做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国家必须做的,不过是信任自发调节市场的功效。

确实,当下的全球金融体系与金本位制有很大不同。汇率和国家货币不再与黄金挂钩,绝大多数通货的价值被允许在外汇市场上波动。同时也存在着强有力的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管理着全球体系。但在这些重要的区别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一种信念,认为只要个人和企业有了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自由,全球市场就会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这种基本信念是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拆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消除政府对经济生活组织的“干预”这些系统尝试的基础。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全球化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辩护者,写道:“当你的国家承认……今天全球化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法则,并决定遵循它们时,它就穿上了我所谓的‘金色紧身衣’。这种金色紧身衣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外衣。冷战的衣着是毛套装、尼赫鲁夹克和俄国皮衣。全球化只有金色紧身衣。如果你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挑到一件合身的,那么不久就会有的。”^①弗里德曼继续说,“金色紧身衣”要求缩减政府,消除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并减少对资本市场的管制。更进一步,他还愉快地描述了在外汇和金融市场上,国际贸易参与者的“电子牧羊人”是如何施加这件紧身衣中蕴含的限制的。

xxxiv

波兰尼对三种虚拟商品的分析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这种全球水平的自发市场调节的视野乃是一种危险的幻想。正如国民经济有赖于一个活跃的政

^① Thomas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1999), 第 86 页。

府角色一样，全球经济也需要强有力的规制机构，包括一个最终借款人^①。在缺乏这样一些机构的情况下，特定的经济——可能尤其是全球规模的经济——将会遭遇致命的经济危机。

但我们从波兰尼那里学到的更为基本的一点还是在于，市场自由主义对普通大众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工人、农民和小生意人片刻都无法忍受那种让他们的日常经济环境处在周期性的剧烈波动中的经济组织模式。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那种无国界的、平安祥和的乌托邦要求全世界千百万普通人拥有一种韧性，以便忍受——也许每隔五年或十年——一个相当长期的萧条，在这期间，他们必须仅靠从前收入的一半或更少来过活。波兰尼相信，期望这样一种韧性，既是道德上的不正当，也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动员起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经济震荡之苦。

实际上，新近走大运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见证了遍及全世界的抗议，在这些抗议中，人们试图抵制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破坏。^② 随着这些不满的加剧，社会秩序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且政治领袖通过将国内或者国际敌人作为替罪羊而转移不满的危险与日俱增。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愿景就是这样导致冲突加剧而不是带来和平。例如，在非洲的许多地方，结构调整政策的灾难性效应已经使社会解体，并制造了饥荒和内战。在其他地方，后冷战时代已经出现了军国主义政权，它们对邻国和自己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充满了攻击性意向^③。而且，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武装冲突——通常都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相互纠缠——总是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来遂行其事。如果波兰尼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失序的信号就是将来更危险情势的预兆。

作为替代选择的民主

尽管波兰尼是在“二战”期间写作《大转型》的，但他对未来还是很乐观的；他相信国际冲突的怪圈能够被打破。关键性步骤在于扭转社会生活应该从属

^① “a lender of last resort”，意指一个类似于一国中的中央银行的角色。——译者注

^② John Walton 与 David Seddon, *Free Markets and Food Riot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Adjustment*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4).

^③ 认为许多最近的全球骚乱的例子可以归因于国际经济政体 (regime)，见 Michel Cossudovsky, *The Globalisation of Poverty: Impacts of IMF and World Bank Reforms* (Penang, Malaysia: Third World Network, 1997)。

于市场机制的理念。一旦从这种“陈腐的市场观念^①”中解放出来,让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都从属于民主政治的道路就敞开了。波兰尼把罗斯福新政作为这些未来可能性的一种模型。罗斯福的改革意味着美国经济继续通过市场和市场活动组织起来,但一系列新的规制机制使得人类与自然摆脱市场强力所造成的压力成为可能。^②通过民主政治,人民决定应该通过社会保险为年老者提供保障,使他们不必费力争取收入。同样地,通过《全国劳动关系法》(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民主政治扩展了工人们形成有效结社的权利。波兰尼把这些创新视作一种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的目标就是社会通过民主手段来保护个人和自然免于某些经济性的威胁。

xxxi

在全球层面上,波兰尼预见的是一种拥有高水平国际贸易与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他并没有给出一整套蓝图,但他明确了有关原则:

随着金本位制自发调节机制的消失,各国政府都会发现他们已经可以放弃使用绝对主权国所能采取的最具妨碍性的措施,即在国际经济领域拒绝合作。与此同时,愿意容忍其他国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来构造他们国家的制度也开始变得可能,这样就超越了19世纪的有害教条——在世界经济的要求下各国政体必须整齐划一。

换言之,政府间的协作将会产生一系列促进高水平国际贸易的协议,但各个不同社会将拥有保护自己免受全球经济压力之害的多种方式。而且,由于把自己独特的经济模式作为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就会在提高自己人民的福利方面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这种愿景也假定了一系列全球性规制结构的存在,这种结构将对市场力量的肆意发挥施加限制。^③

波兰尼的愿景有赖于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增强政府的角色。他挑战了当前新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更大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好的经济后果和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过度控制。而对波兰尼而言,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角色

^① “陈腐的市场观念”是波兰尼给1947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所定的标题,这篇文章重印于Dalton,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② 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对保护环境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当后来的环保主义者获得了进行改革的政治权力时,像环保局(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这样的机构就采取了新经济政策中的规制模式。

^③ 对这一视野的具体化努力,见John Eatwell和Lance Taylor, *Global Finance at Risk: The Case for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对于掌控各种虚拟商品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没有理由把市场自由主义关于政府在本质上就是无效率的这条公理当真。但他也明确拒斥了那种认为政府扩张必然会形成压制性的论断。波兰尼恰恰认为,“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法律的和实际的自由能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普遍的方式存在;规制和控制不仅仅使少数人,而是使所有人获得自由。”^{xxxvii}不过他所勾勒出的自由概念超越了消除经济和社会不公正的涵义;他同样呼吁民权自由(civil liberties)的扩展,强调“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nonconformity)的权利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个体必须能够自由地遵从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惧社会生活某些领域中那些受行政委托的权力”。

波兰尼以这样一些雄辩的句子结束了这部著作:“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这正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涵义,它给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确定性。”当然,波兰尼对接下来的战后世界的乐观并没有被事件的实际进程所证实。冷战的来临意味着新经济政策成了美国改革的终结,而不是开始。有计划的全球经济合作相对迅速地让位于扩张市场的全球角色的新倡议。诚然,欧洲社会民主政府的可观成就——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从1940年代直到1980年代一直在用具体事实证明,波兰尼的愿景不仅在理论上是强有力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可以实现的。但在那些更大的国家,波兰尼的愿景则成了被遗弃的孤儿,而像哈耶克这样的市场自由主义者的相反观点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在1980和1990年代大获全胜。

不过今天既然冷战已成历史,波兰尼最初的乐观有可能会最终得到确证。相对于市场自由主义的不可持续性所产生的经济危机和威权主义政权以及攻击性政权的重现,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方案。替代性的选择在于,全世界各国的普通大众都加入到让经济从属于民主政治,以国际合作为基础重塑全球经济的共同努力中去。的确,在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有清晰的迹象表明,这样一种旨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跨国性社会运动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了。^{xxxviii}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家,都已经组织起了反对那些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

① 见 Peter Evans, “Fighting Marginalization with Transnational Networks: 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 (January 2000): 第230—241页。

富于战斗性的抗议。世界各地的团体已经在重构世界金融秩序的问题上展开频繁的对话。^①

这个新生的运动面临着许多障碍；建立这样一个持久联盟是不容易的，因为它要调和南北两个半球人民之间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更经常的是相互冲突的。而且，这样一个运动越成功，它要面临的战略挑战就越可怕。目前还非常不确定的是，能不能对全球秩序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同时又不至于使世界经济因投资者的恐慌而陷入危机。

这种跨国运动是波兰尼愿景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一种标记。在波兰尼看来，市场自由主义最深刻的缺陷在于，它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他则认为人类应该使用民主治理的工具来控制和指导经济去满足我们的个体和集体需求。波兰尼表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未能成功应对这一挑战，人类遭遇了巨大的苦难。他对新世纪的预言是再清楚不过了。

^① 对在北美发生的这类讨论的概览和对进一步探究的资料指引，见 Sarah Anderson, John Cavanaugh 和 Thea Lee, *Field Guide to the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2001 年版附注

在准备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这个修订版的时候,我对波兰尼 1957 年的文本作了一些细小的变动。首先,对正文作了波兰尼在美国首版发表之后所作的一些小的编辑变动;这些变动已经被引入了果兰茨(Gollancz)1945 年在英国出版的版本。其次,1957 年版中被放到笔记最后的关于济贫法的“附加笔记”,已经被移到了“资料来源注释”中的适当位置。第三,一些固有名词已经得到了修正,其拼写和标点已经得到更新。最后,文本页码已经被重新编排,所以再也没有早期美国版本中的 258A 页和 258B 页了。

F. B.

作者致谢

这本书“二战”期间写于美国。但写作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英国，作者当时是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校外部的讲师。这本书的主要论题是在1939—1940学年中，随着作者的授课而发展起来的，这门课程的组织者是工人教育协会(the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这个组织在伦敦莫利学院(Morley College)，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和拜克斯希尔(Bexhill)都有分支机构。

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有关慷慨友谊的故事。许多功劳要归于作者的英国朋友们，特别是 Irene Grant，作者与以他为首的团队一起工作。共同的研究把作者与维也纳的 Felix Schafer 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位经济学家，现居于新西兰的威灵顿。在美国，John A. Kouwenhoven 作为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阅读和编辑了书稿；他的许多建议都被吸收进了书稿。其他有助益的朋友包括作者在伯灵顿学院的同事 Horst Mendershausen 与 Peter F. Drucker。后者与他的妻子是给予作者持续激励的源泉，尽管他们对作者的结论存在热心诚挚的不同见解；前者对作者观点的全面同情增加了其建议的可用性。作者同样要对 Rutgers 大学的 Hans Zeisel 的仔细阅读表示感谢。在美国这本书得以出版，全赖 Kouwenhoven 的关照，以及 Drucker 与 Mendershausen 的帮助，对这些饱含友谊的举动，作者深怀谢意。

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作者1941—1943年两年时间的研究资金，这使得作者得以在福蒙特州的伯灵顿学院完成这部著作，在这之前，该院院长 Robert D. Leigh 向作者提出了访学的邀请。1940—1941年一系列公开演讲和一次研讨会促进了该书的写作。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以及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塞利格曼(Seligman)图书馆对研究人员的热情服务令人称道。作者要对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

第一篇

国际组织

第一章 百年和平

19 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本书论及的是这次事件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以及它所引发的巨大转变。 3

19 世纪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之上。首先，是一个世纪以来防止大国之间发生任何持久和破坏性战争的势力均衡体系(the balance-of-power system)。其次，是象征着一个独特的世界经济组织的国际金本位制(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第三，是造就空前物质福利的自我调节的市场(the self-regulating market)。第四，是自由主义国家(the liberal state)。按一种方法来分类，这四种制度中的两种是经济的，另两种是政治的。按另一种方法分类，那么其中两种是国家性质的，另两种是国际性质的。正是这些制度勾勒了我们西方文明之历史的特有轮廓。

在这些制度中，金本位制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的瓦解是大灾难的近因。当金本位制要瓦解的时候，大多数其他制度也在为拯救它的徒劳努力中牺牲了。

但是金本位制度的源泉和基体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正是这个创新制度引起了一种特殊的文明。金本位制仅仅是想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部分地通过金本位制来运转；而自由主义国家本身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19 世纪各种制度体系的关键是统治市场经济的那些法则。

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活，从 4

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且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

像这样解释人类历史上最深的危机之一必然显得过于简单。没有什么比这样一种尝试更显无知了，即把一种文明——包括它的物质实在和精神气质——化约为数目确定的几项生硬制度；以及选择其中之一作为这些制度的基础，并接着推论这一文明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是源于其经济组织的某些技术性质。文明，正如生命一样，源自一系列独立因素的交互作用，通常是不能化约为一些有限制的制度的。从制度机制来探寻某种文明衰落的原因看起来是一种无望的努力。

然而这就是我们所要着手做的。在此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目标向这一主题的极端独特性调整，因为 19 世纪文明之所以独特，恰恰在于它是以一个明确的制度机制为核心的。

不能说明这种社会灾变的突发性的解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仿佛变化的力量已经被郁积了一个世纪，一系列事件倾泻在人类身上。一场全球范围的社会转变被战争推向高潮，在这前所未有的形态的战争中，许多国家被摧毁，而新帝国的轮廓在血海之中显现出来。但是这一恶魔般的暴力仅仅只是浮于湍急而寂静的变迁洪流上的事物，这道洪流在波澜不惊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吞噬了人类整个过去！对这一大灾难的详尽的分析必须既能说明暴烈的行动，又能说明寂静的分崩离析。

本书不是一本历史著作；我们所探求的不是重大事件令人信服的发生次序，而是从人类制度角度对这些事件的趋势作出解释。我们将自由细想过去的情景，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关照当下现实；我们也将详细分析某些关键时期，而几乎完全不考虑彼此之间的连接时期；我们还将跨越不同的学科领域，以追求实现这一单一目标。

5 首先我们要讨论国际体系的崩溃。我们将试着说明一旦势力均衡体系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崩溃，它就不能确保和平。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断裂发生得如此突然，为何瓦解会以如此不可思议的速度进行。

如果说我们文明的分崩离析与世界经济的崩溃在时间上是合拍的，那它也肯定不是由经济崩溃所引起的。它的起源可追溯到 100 多年前西欧的那场社会和技术的剧变，正是从其中产生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a self-regulating market)。这场冒险终于在我们这个时代结束了；它结束了工业文明史上一个独特的阶段。

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我们将论及在我们这个时代支配社会及国家变迁的一些机制。明确地说,我们认为人类的现状应该从危机的制度起源角度来加以解释。

19世纪产生了一个在西方文明的历史记载中前所未有的现象,即1815—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除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几乎是个殖民地事件)之外,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以及俄国之间的战争加起来总共只有18个月。相应数据的统计表明,先前两个世纪平均各有60—70年的主要战争。但即使是19世纪最猛烈的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为期也不到一年,并以战败国能够支付数额空前的赔款而未引起任何有关通货的骚乱而告终。

实用和平主义的这次胜利当然不是缺乏冲突起因的结果。强国和大帝国的国内国外环境几乎持续不断的变幻,一直伴随着这一和平盛况。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内战、革命和反革命干涉很是常见。在西班牙,10万军队在丹格林公爵(Duc d'Angoulême)率领下攻占了卡迪兹城(Cadiz);在匈牙利,毛焦尔族(Magyar)的革命在激战中几乎打败了皇帝,最后直到一支俄罗斯军队开到匈牙利境内才将其镇压。此外,在日耳曼诸邦、比利时、波兰、瑞士、丹麦和威尼斯等地出现的武力干涉表明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无处不在。而在该世纪的下半叶,进步的动力被释放;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埃及、西律番帝国(Sheriffian)或者解体或被瓜分了;中国在入侵武力的迫使下向外国人打开门户;在巨大的拉扯中非洲大陆也被瓜分了。与此同时,两个强权,美国和俄罗斯,上升到世界性的重要地位。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国家统一;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获得或者重新获得了在欧洲版图上作为主权国家的一席之地。一系列无尽的公开战争伴随着工业文明向着古老文化或原始民族的领域进逼。俄罗斯对中亚的军事征服,英国在印度和非洲发动的无数战争,法国在埃及、阿尔及尔、突尼斯、叙利亚、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暹罗的剥削,都引起了强权之间的争端,这些争端通常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然而这些冲突中的每一个都是局部化的,无数其他暴力变动事件也不是遭遇了强权的联合行动就是在达成妥协中被平息了。无论方式怎样变化,结果都是相同的。在这一世纪的上半叶,立宪主义是遭到禁止的,神圣同盟则以和平的名义压制自由;到了下半叶——并且又是以和平的名义——宪法被具有商业头脑的银行家硬塞给狂暴的专制君主。因此,在形式多样、不断变幻的意识形态下——有时是以进步和自由的名义,有时凭借权杖和圣坛的权威,有时借用股票交易和支票本的魅力,有时通过腐败和行贿,有时采用道

德说辞和开明的诉求,有时则使用舰炮和刺刀——取得了一个完全相同的结果:和平得以维持。

这一不可思议的成就要归功于势力均衡机制的运作,该运作在此产生了一种并非机制本身所固有的结果。按照其性质,均衡机制应该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即相关权力单元的生存;但事实上,它仅仅假定三个或更多能施加力量的权力单元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运作,即较弱的权力单元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最强大权力单元的力量的任何增长。在世界历史的领域里,势力均衡体系是与那些凭借它来维持独立的国家相关的。但它只能通过不断变换盟友的持续战争来实现这一目标。古希腊或北意大利城邦的实践,就是这样一个实例:不断变换盟友的战争在漫长的岁月中维持了这些邦国的独立状态。相同原则的运用在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维护了一些国家的主权,正是这些国家根据芒斯特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y of Münster and Westphalia)形成了欧洲(1648)。75年以后,在乌却克条约(the Treaty of Utrecht)中,所有签约国宣布他们正式遵守这一原则,因此他们在一个体制(system)里将其具体化,就这样,以战争为媒介为强国和弱国建立了这种生存的相互保证。在19世纪,同样的机制不是导致了战争而是产生了和平,这一事实是对历史学家们的一大挑战。

我们认为存在一个全新的因素,那就是鲜明的和平利益(peace interest)的出现。传统观点认为,这样的利益是在国家制度的范围之外的。和平以及随之产生的手工业和艺术的繁荣只能属于生活的装饰品。教会可能会像祈祷丰收那样祈祷和平,但在国家行动领域它将仍然提倡武装干涉;政府都将和平置于安全与主权之下,即放在那些不通过使用最后手段(即武力)就无法达到的目标之下。对一个共同体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比其中存在一个组织化的和平利益更加有害的了。直到18世纪下半叶,卢梭(J. J. Rousseau)还指责商人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因为他怀疑商人喜欢和平胜过喜欢自由。

1815年之后的改变是突然而彻底的。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加强了工业革命在以建立和平事业为符合全民利益之事业方面的上升发展势头。梅特涅(Metternich)宣称欧洲人民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和平。根茨(Gentz)称爱国主义者为新野蛮人。教会和君主开始了欧洲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他们的论点找到了两方面的支持:作为当时流行形式的战争的残暴,以及正在萌芽的经济下和平激增的价值。

新“和平利益”的鼓吹者依然首先是那些从中受益的人,即那些王公贵族

等行会联盟,而他们的世袭地位受到横扫欧洲大陆的爱国主义革命浪潮的威胁。这样,在大约 1/3 世纪的时间里,神圣同盟采用强制力量和意识形态来推动积极的和平政策;它的军队在欧洲四处出击镇压少数派,压迫人民大众。从 1846 年到大约 1871 年——“欧洲历史上最混乱喧嚣的四分之一世纪”^①——和平被较不稳妥地建立了,反动势力正在衰退的力量遭遇了工业主义不断成长的力量。在普法战争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发现和平利益被一个新的强有力实体(entity)所代表,这个实体就是欧洲协同比(the Concert of Europe)。

8

然而,利益像意念一样必定仍然是空想的,除非它们依靠一些社会机制转化到政治层面。表面上看,这样一种实现手段是缺乏的;神圣同盟和欧洲协同比最终都只不过是独立主权国家的分组小集团,并且从属于势力均衡体系及其战争机制。如此一来,和平又何以维持呢?

不可否认,任何势力均衡体系都倾向于阻止这类战争,即由于某个国家想要改变现状而无视国际势力的重组所引发的战争。著名的实例是 1875 年因为俄国和英国的干涉,俾斯麦(Bismarck)叫停了新闻界攻击法国的运动(奥地利对法国的援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这时欧洲协同比一起反对德国,德国发现它自己被孤立了。1877 至 1878 年间,德国无力阻止俄土战争,但是通过支持英国因俄国人逼近达达尼尔海峡而产生的妒忌,成功使得本场战争局部化;德国和英国支持土耳其对抗俄国——因此保住了和平。在柏林会议上,一个关于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的长远计划被提出;尽管现状因此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但这终究使得强权之间避免了战争,因为有关各方能够预先确知他们在战场上将遭遇怎样的敌人。这些实例中的和平,是势力均衡体系一种受人欢迎的副产品。

此外,如果只是小国的命运被牵连,那么战争有时也能通过有意识地消除起因而被避免。小国被监控以防止其用任何方式扰乱现状,因为这有可能引发战争。荷兰在 1831 年对比利时的侵略最终导致比利时被强权国家中立。挪威在 1855 年被中立。1867 年荷兰把卢森堡卖给了法国;德国抗议此事,于是卢森堡被中立。在 1856 年,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被认为是维持欧洲均势的必要条件,欧洲协同比竭力维持这个帝国;到了 1878 年之后,当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被认为对维持欧洲均势必不可少时,对它的瓜分也以同样有序的方式进

9

^① Sontag, R. J., *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 1871—1932*, 1933.

行,尽管这两个事件都涉及几个小民族的存亡。在1852到1863年间是丹麦,1851到1856年间是日耳曼诸邦威胁了这种平衡;每一次都是小国被强权强迫服从。在这些实例中,体系给予强权的行动自由被它们用于获得一个共同利益——恰巧是和平。

但是,无论通过对力量形势的及时认清或通过控制弱小国家来偶尔避免战争,这都远远无法解释百年和平这一事实。有无数原因可以导致国际关系的失衡——从一个王朝的风流韵事到河口的淤塞,从一个神学争论到一个技术发明。财富和人口的增长或是减少,都必定会引起政治力量的运动;而外部的均衡总是能反映出内部的状况。即使一个有组织的势力均衡系统,只有在它能对这些内部因素直接起作用并防范失衡(imbalance)于萌芽状态,才能避免战争的永久威胁而确保和平。一旦失衡的因素积聚成动力,就只有武力才能纠正它。要想确保和平就必须消除战争的起因,这是常识;但是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的是,要想达此目的,掌控必须从源头开始。

神圣同盟借助自己独有的条件实现了这一点。欧洲的国王和贵族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血缘关系;罗马教会在南欧和中欧为他们提供了从最高社会阶层到最低社会阶层的一整套志愿的行政服务。于是血缘与恩典的等级制度被熔铸进一个有效的地方统治工具,这个工具只要稍加一点武力就可以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

但是继承它的欧洲协同比既缺少封建的又缺少教会的触角;它最多相当于一个松散的联盟,在一致性方面比不上梅特涅的杰作。它只有在极稀罕的情况下才能召集起强权们开会,而列强之间的猜忌导致频繁发生阴谋、逆行及外交破坏;共同的军事行动变得极少。然而神圣同盟凭借其思想和目标上的完全一致,加上频繁的军事干预才能在欧洲实现的持续和平,在这里却被这个叫做“欧洲协同比”的影子实体,通过不经常地、不强烈地使用武力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要想解释这个令人惊异的成就,我们必须去寻找那些在这一新背景下发挥作用的、未被发现却强有力的社会手段,这些手段能够扮演旧时期王室和主教的角色,并使得和平利益发挥有效作用。这个匿名的因素就是**国际金融**(haute finance)。

对于19世纪国际银行业性质的全面研究还没有人做过,这种神秘的机构几乎无法从政治—经济(politico-economic)神话的忽明忽暗中显现出来。^①

^① Feis, H.,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1930, 我们经常引用的一本作品。

有些人认为它只是政府的工具,另一些人认为政府是它满足无法抑制的逐利欲望时的工具;有些人认为它是国际纷争的播种者,另一些人认为它是柔弱的世界主义逐渐侵蚀强国之力量的工具。没有一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国际金融**这个独特的组织,尤其是在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的前30年,的确作为这一时期世界政治和经济组织间的主要纽带而发挥作用。它为国际和平体系提供了多种工具,这个体系借助强权们的帮助而运作,但强权本身却并不能建立或维持这个体系。当欧洲协约国只是间或性地起作用时,**国际金融**则作为最富弹性的持久性机构发挥了作用。它独立于哪怕是最强大的单个政府之外,但同时与所有国家政府保持联系;它独立于所有中央银行哪怕是英格兰银行,但同时又与它们紧密相连。金融和外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金融与外交双方在尚未确定另一方良好意愿之前都不会考虑任何长远计划。而全面和平得以成功维持的秘密,毫无疑问就在于**国际金融**的地位、组织和手法。

这个独特机构的人员和动机赋予它这样一种地位,这个地位的根源稳固地基于纯粹商业利益的私人领域。罗斯查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就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府;作为一个家族,它具体体现了国际主义的抽象原则;他们的忠诚是对一个公司的忠诚,其信用已成为快速成长的世界经济中联系政府和工业力量的唯一一个超越国家的纽带。作为最后一个手段,他们的独立性来源于时代的需要:当时急需一位能够博得政治家和国际投资者信心的独立自主的代理人;而定居在欧洲各国首都的犹太银行家家族所享有的形而上的治外法权,正好为这个至关重要的需求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通过资助战争而大发其财,他们不顾及道德,他们从不反对任何小型的、短期的、局部性的战争。但是如果强权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而干扰到国际均衡体系的货币基础,他们的生意则会受到损害。出于这些事实的逻辑,当全世界人民都在经受革命性转变时,他们却不得不努力维持一个大体和平的局面。

从组织方面看,**国际金融**是人类历史上产生过的最复杂机构(institution)之一的核心。尽管它的存在只是短暂的,但在其普遍性、形式和手段的丰富性方面,只有人类在工业和商业上所有追求的总和才可与之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它正是工商业的典范和相对物。**国际金融**本身除了国际中心外,还有大约半打国家中心(national centers)蜂拥于其发行银行和股票市场周围。国际银行业也不限于为政府融资,它们在战争与和平中冒险;它也包括在工业、公

共设施、银行领域的国外投资,以及长期贷款给外国的公共或私人企业。国家金融是它的又一微观体现。单单英国就能数出五十种不同类型的银行;法国和德国的银行组织也具有自身特点;而上述每个国家财政部的实际措施以及它与私人金融的关系都有着显著的以及细节上微妙的不同。货币市场(the money market)处理大量的商业票据、海外承兑、纯金融票据(commercial bills, overseas acceptances, pure financial bills),以及活期存款和其他股票经纪人的设施(call money and other stockbrokers' facilities)。其形式则随无限多样的国家政体(national group)和特性而多变,每种形式各有其特殊的声望和地位,权威及忠诚,有其货币和合同资产,保护人和社会关系的资产。

12 国际金融不是作为和平工具而设计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说这一功能只是意外落在它头上的,而社会学家则更倾向于把它称为有效性法则(the law of availability)。国际金融的动机是获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与追求权力和征服的政府友好相处。在我们所分析的这个阶段,在政府角度我们可以忽略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民族—国家的特性使得这种区别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无论它们的目标是什么,政府都是通过使用和增加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另一方面,虽然国际金融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是国际性的,但并不因此完全独立于国家组织。因为国际金融作为银行家们参与 to 企业联合组织和国际财团、投资团体、国外贷款、金融控制或其他领域交易的一个活动中心,必须要寻求与国家银行、国家资本、国家金融的合作。尽管通常情况下国家金融比起国家工业来说较少屈从于政府,可是它仍然足以让国际金融极力想与政府本身保持紧密联系。但是由于它的国际性地位和人员、它的私有财产和私人关系,它实际上独立于任何一个政府,并且它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利益——这种利益并没有自己的机构——而且这种服务其他制度提供不了,这种服务对国家金融共同体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即和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甚至也不是以牺牲独立、主权、既得荣誉、未来获得霸权等因素为代价的和平,假如有可能不作如此的牺牲而获得和平,和平仍然是和平。

除此之外则别无他法。强权(power)优先于利润。无论这两个领域如何亲密地相互渗透,最终还是由战争决定商业的法则。例如,从1870年起,法国和德国就是敌国。但这并不排斥两国仍有私下的交易。偶尔也因为两国短时间的目标而组成银行财团;一些德国投资银行会对国境线另一边的企业进行私下投资,而投资额却并不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在短期贷款市场上,法国银

行方面给予德国贸易期票贴现,并根据担保物和商业票据给予短期贷款;直接投资可见于铁矿和焦炭密切结合的例子,或者诺曼底的泰森(Thyssen)工厂,但这种投资被限制在法国的特定地区,并且长久以来受到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批评;直接投资更频繁地出现在殖民地,例如德国十分努力想要得到阿尔及利亚的高品质矿石,或参与摩洛哥的相关事务。但这仍然是一个严肃的事实:1870年以后,法国官方对于德国证券在巴黎证券交易所(the Bourse of Paris)的管制从未放松过。法国只是“不愿冒险让借贷资本的力量”^①作用在它自己身上。奥地利也受到法国怀疑;在1905—1906年的摩洛哥危机中,这种管制被延伸到了匈牙利。巴黎的金融界为匈牙利证券的流入而辩护,但工业界却支持政府坚决反对向一个可能的军事对手作出任何让步。政治—外交的对抗持续不断,毫不减弱。任何可能增加假想敌的潜力的一举一动都被政府否决。从表面上看,这种冲突几次看来都好像已经被平息了,但内部人士都知道,冲突仅仅是被转移到和平表面下更深程度地隐藏起来了。

13

或者我们以德国在东方的野心为例。在这里,政治和金融也是相互混合的,但政治仍是至高无上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艰难争执后,德国和英国在1914年6月签署了一份关于巴格达铁路的全面协议——但正如通常所说,这对于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太迟了。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协议的签署最终证明了英德之战并不是由经济扩张主义的冲突所引起的。这两种观点都不能被事实所证明。协议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主要的争论。德国铁路线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仍然不能越过巴士拉城(Basra),而协定中划分的经济区域也必定会在未来导致双方的正面冲突。在此期间,各强权也将继续为战争爆发之日做准备,这一天甚至比他们料想的来得更快。^②

国际金融必须应付大小霸权们相互冲突的野心和阴谋;它的计划屡受外交策略的阻挠,它的长期投资屡遭破坏,它的建设性努力屡受政治的阴谋破坏和间接阻挠。它不得不依赖的各国国家银行组织却常常充当着各自政府的帮凶,没有一个计划是安全的,除非参与者的战利品在事前就分配好了。然而,强权金融(power finance)通常不是金元外交的受害者,而是受惠者,正是金元外交为金融的天鹅绒手套提供了钢筋铁骨。因为商业的成功包含着对弱小国家无情地使用武力,对落后的政府行政部门大规模行贿,以及不惜使用所有阴

14

^① Feis, H., 同前,第201页。

^② 参见资料来源注释第273页(英文版页码,以下同。——译者注)。

险手段以实现目标,就像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样激烈混战地带所熟悉的那样。由于其功能上的决定性作用,国际金融注定了要承担避免全面战争的任务。政府债券的大部分持有者以及其他投资者和商人,必定成为这类战争的首批受害者,尤其是如果货币受到影响。国际金融对霸权施加的影响一向有利于促进欧洲的和平。而且这种影响是如此有效,以至于政府本身在不止一方面依赖它的合作。因此,在欧洲协同体的会议上每一次都会讨论到和平利益。如果我们把已经培养了投资习惯的那些国家中日益增长的对和平的关心纳入视野,我们就会明白为何那许多实际上已被动员的国家中,武装和平(armed peace)这一可怕的新生事物会在1871—1914年间一直笼罩欧洲却没有引发毁灭性的冲突。

金融——有这样一种渠道来发挥其影响力——即作为许多较小自主国的议会和政策中一个有力的调解者。贷款与再贷款(the renewal of loans)依赖于信用,而信用则取决于自身良好的行为。因为在立宪政体之下(非立宪政体则受到激烈反对),政府行为会反映在预算以及不能与预算的评价相分离的货币的国际价值之中,负债方政府会被建议谨慎关注它们的外汇兑换(exchanges)并避免那些会损害预算实况稳固性的政策。一旦一个国家采用金本位制——它限制许可范围内的金融波动到最低限度——上述这一有用格言就成为强有力的行为准则。金本位制和立宪主义是使得伦敦的声音能够被许多较小国家获悉的工具,这些小国已采用了遵循新国际秩序的那些标志。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the Pax Britannica)有时候通过舰炮来维持其统治,但更多时候是通过适时牵动国际货币网络的细线来实现的。

15 国际金融的影响也通过对世界上广大半殖民地——包括处于战火易燃的近东和北非地区的正在衰败的伊斯兰帝国——的金融的非官方管理来确保。在这里,金融家们的日常工作会涉及隐藏在内部秩序下的细致微妙的因素,并对这些和平最为脆弱的地区提供实际的行政管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地区长期资本投资的大量先决条件面对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却通常能够得到保护的原因。在巴尔干地区、安纳托利亚、叙利亚、波斯、埃及、摩洛哥和中国修筑铁路的壮举是一个关于耐力和充满惊险的故事,令人回忆起北美大陆上相似的功绩。然而,威胁欧洲资本家的主要危险不是技术或财政上的失败,而是战争——既不是小国之间的战争(这很容易将之隔离),也不是一个大国凌驾一个小国的战争(这是经常并且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而是霸权之间的全面战争。欧洲不是空无一人的大陆,它是成千上万古代和现代民族的家园;每一条

新铁路都要穿越变化多样的各类民族实体的边界,有些民族可能在由此建立的联系中受到致命的削弱,另一些则会大大变强。只有对落后地区的衰弱政府实施财政铁腕控制才能避免灾难。当1875年土耳其拖欠债务时,军事灾难立即爆发,从1876年一直持续到1878年柏林协议签署为止。其后和平维持了36年。这一令人吃惊的和平是由1881年的穆哈伦法令(the Decree of Muharrem)来贯彻实施的,该法令也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小奥图曼国(Dette Ottomane)。国际金融的代表们承担管理大部分的土耳其财政。在很多情形下,他们阴谋策划了霸权之间的妥协;另外他们也防止土耳其自己制造麻烦;此外他们还单纯地作为霸权的政治代理人;总之,他们为债权人的金钱利益服务,并且如果有可能也为试图在这个国家牟利的资本家的金钱利益服务。该任务被以下事实弄得更为复杂:这个债务委员会并非私人债权人的代表机构,而是欧洲公共法律下的一个机构,国际金融在此只是一个非正式的代表人。但正是这种双重特性使其能够沟通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组织。

贸易已经变得与和平相关联。以前的贸易组织是军事性的、好战的,它是海盗、流浪者、武装旅行队、捕猎者和设陷阱者、佩剑商人、武装市民、冒险者与探险家、殖民者和征服者、搜捕者和奴隶贩卖商、特许公司的殖民军队等的附属物。现在所有这些都已被忘却。贸易现在依赖于一个国际货币体系,这个体系在全面战争中就不能起作用。这就需要和平,列强们也尽力去维护和平。但是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势力均衡体系自身并不能确保和平。和平由国际金融来实现,国际金融的存在具体体现了贸易依赖和平的新原则。

16

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毫无和平可言的过程,而把金融资本的扩张作为无数殖民罪恶和扩张侵略的主要煽动者。它与重工业的密切相关使得列宁断言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原因,尤其是对势力影响范围、特许权、治外法权的争夺,以及西方霸权压制落后地区——以便投资铁路、公共设施、港口和其他使得重工业能够从中牟利的永久性设施——的无数形式的原因。事实上,商业和金融的确是许多殖民地战争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全面灾难得以避免的原因。它们与重工业的联系——尽管只有在德国才是真正紧密的——同时可以说明上述两方面。作为重工业的庇护组织(roof organization)的金融资本以太多种方式与工业众多部门有关联,以致没有哪一组人能够单独决定它的政策。若有一方能从战争中获益,那么同时必定会有其他几方因战争受损。当然,万一战争发生,国际资本一定是受害者;但即使是国家资本,也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从中捞到好处,尽管它常常足以成为许

多殖民地战争的理由——只要它们是孤立事件的话。每一场战争基本上都是金融家筹备的,但和平同样也是由他们组织安排的。

17 这种完全实用的体系——它一方面极力反对全面战争,一方面在永不停息的小冲突中提供和平的贸易——的本质可以从它带给国际法的改变中得到最好的证明。当民族主义者与工业势力显然趋向于战争打得更惨烈、铺开面更广时,使得战时的和平贸易得以持续的有效屏障也被建立了起来。有历史记载,腓特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1752年“报复性地”拒绝偿还所欠英国的西里西亚贷款。^①“但这类举动此后再没有发生过,”赫舍(Hershey)说,“法国大革命战争提供给我们最后一个在战争爆发时在交战国领土上没收敌方国民私有财产的重要例子。”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敌对国的商人被允许离开口岸,这样一个先例在其后五十年被普鲁士、法国、俄国、土耳其、西班牙、日本和美国所遵守。从那场战争开始,交战国之间很大程度的贸易往来被容许了。因此在美西战争期间,中立国的船只——装载着美国所属货物,只要不是战争禁运品——就可以获得通行驶向西班牙港口。那种认为18世纪战争在所有方面都比19世纪战争的破坏性来得小的看法是一种偏见。从敌对国国民的地位、敌对国公民的贷款服务、敌对国财产或者敌对国商人离开口岸的权利等方面来看,19世纪表现出了一个有利于保障战时经济体系的决定性转变。只是到了20世纪,这股趋势才被逆转。

18 所以说,经济生活的新组织提供了百年和平的背景。在第一个阶段,如同在拿破仑一世时期的骚乱中所显示的,新生的中产阶级主要是一种威胁和平的革命力量;正是为了对抗这个国内动乱的新因素,神圣同盟组织起了反向作用的和平(reactionary peace)。到了第二个阶段,新经济获胜。此时中产阶级自身已是和平利益的信使,甚至比它们的保守先辈更有力,并且受到了新经济体制的国内—国际特性的滋养。但在这两种情况中和平利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能够通过为势力均衡体系提供可以直接应对和平地区活跃的国内力量的社会机构——从而让这个体系为和平利益服务的。在神圣同盟时代,这种机构是由教会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支持的封建制度和王权;在欧洲协约体时代,它们则是国际金融以及与之联合的国家银行体系。在此已无需夸张两者之间的区别。在1816—1846年这“三十年和平”期间,大不列颠已急切向往和平与

^① Hershey, A. S.,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nd Organization*, 1927, pp. 565—569.

贸易,神圣同盟也不鄙视罗斯查尔德家族的援助。在欧洲协约国时代,国际金融仍经常必须依赖它与王公贵族的关系。但这些事实只会加强我们的论点,即在每一种情况下和平并不能仅仅通过霸权国的大臣来维持,还要仰仗于为普遍利益服务的具体组织机构的帮助。换言之,只有在新经济的背景下势力均衡体系才能避免大范围的战争。但是欧洲协约国的成就要远远大于神圣同盟;因为后者只是在尚未发生变革的欧洲大陆的一个有限地区内维持了和平,而前者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了相同的任务——并且当时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正在促使整个世界版图发生变革。这一伟大政治功绩是一个特殊实体(entity)出现的结果——这一实体即**国际金融**,它是国际生活中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天赐纽带。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和平系统是建立在经济组织基础上的。但这两者却很不一致。只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才可以说欧洲协约国是一个世界政治和平组织,因为它本质上不是一个和平机构,而只是一个受战争机制保护的、各独立主权国家的体系。与此相反,世界经济组织则是存在的。除非我们遵从那种未经批判的用法把“组织”这一概念限定于受中央控制、且由自家官员来运作的实体(body),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组织赖以建立其上的、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更加明确的了,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它的实际构成要素更加具体的了。预算和军备、对外贸易和原料供应、国家独立和主权这时都已成为通货(currency)和信用的功能。到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世界商品价格已成为欧洲大陆数百万农民生活中的首要现实;伦敦货币市场的波动每天受到全世界商人的注意;而各国政府则根据世界资本市场的情形来讨论未来计划。只有疯子才会怀疑国际经济体系是人类物质生存的轴心这一事实。因为这个体系的运转需要和平,势力均衡体系就被制造出来为它服务。把这个经济体系拿走,和平利益便会从政治中消失。除此之外,既没有充足的理由来追求和平,即便存在,也没有捍卫这种利益的可能性。欧洲协约国的成功源自这个新国际经济组织的需要,自然也会随着该组织的解体而终结。

19

俾斯麦时代(1861—1890)正值欧洲协约国的巅峰时期。在德国崛起成为一大霸权之后的二十年中,她是和平利益的主要受益者。她以奥地利和法国为代价挤入前列;维持现状、防止一场只可能是对她实施报复的战争,对她是有利的。俾斯麦故意把和平理念培育成为霸权国家的共同使命,并且避免做出可能将德国挤出和平霸权地位的承诺。他反对扩张主义者对巴尔干地区或

海外的野心；他一贯地使用自由贸易的武器打击奥地利甚至法国；他凭借势力均衡游戏的帮助阻挡了俄国和奥地利对巴尔干的野心，因此保住了潜在盟友并避免了可能使德国卷入战争的局面。这个 1863—1870 年间诡计多端的侵略者，到 1878 年却变成了诚实的经纪人以及殖民冒险的反对者。他有意识地引导他所感觉到的当时的和平趋势，以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

然而，到了 70 年代末自由贸易的插曲（1846—1879）即将结束；德国对金本位制的实际采用，标志着保护主义和殖民扩张时代的开始。^① 通过与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结成仓促而稳固的联盟，此时的德国加强了她的地位；此后不久俾斯麦就失去了对德国政策的控制。自那以后大不列颠成为欧洲和平利益的领导者——此时的欧洲仍是一个由众多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团体，因而仍受势力均衡原则的支配。到了 90 年代，国际金融处于其巅峰，而和平似乎比从前任何时候都稳定。英国和法国在非洲有着不同的利益；英国人和俄国人在亚洲互相竞争；欧洲协约国尽管步履蹒跚却仍然继续运作；尽管有三方联盟（the Triple Alliance），但是仍然有两个以上的独立霸权相互猜忌地注视着对方。然而好景不长。1904 年，英国就摩洛哥和埃及两地与法国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几年之后她又与俄国就波斯达成妥协，于是敌对的联盟也形成了。欧洲协约国这个由独立霸权们所组成的松散同盟，最终被两个敌对的权力阵营所取代；作为一种体制的势力均衡此时已寿终正寝。由于只剩下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它的机制停止运作。再也没有第三个集团可以同两者之一联合起来以阻止试图扩张势力的另一个。大约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既存体制解体的征兆——殖民地的争夺和国外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国际金融阻止战争扩散的能力迅速下降。和平此后又苦苦维持了七年，但 19 世纪经济组织的瓦解所带来的百年和平的终结仅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根据这种认识，和平所赖以存在的那种高度人为的经济组织的真实本性，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变得极端重要。

^① Eulenburg, F., "Aussenhandel und Aussenhandelspolitik," In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Vol. VIII, 1929, p. 209.

第二章 保守的 20 年代,革命的 30 年代

金本位体制的崩溃是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瓦解与 30 年代整个人类文明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无形链环。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个因素的至关重要性,否则我们既不能正确认知这个将欧洲引向绝境的机制,也无法正确认知那些能够解释令我们惊骇的事实——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其内容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如此不稳固的基础上——的有关情势。 21

直到国际体系崩溃之时,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对它的真正性质仍然一无所知。几乎没有人明白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作用,因此这种令人恐怖的突发性转变使整个世界完全震惊了。到那时为止,金本位制度是传统世界经济所剩的唯一支柱;所以一旦它倒塌了,其后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金本位制度是一个纯经济的制度,他们甚至拒绝将其看成是社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民主国家总是最后一个认识到这一灾难的真正本质,也是最迟一个去估计它后果的国家。甚至当灾难临头时,这些国家仍然看不到国际体系崩溃背后,正是在这些最先进的国家中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使得这个体系越来越不合时宜;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本身的失败并没有被他们察觉。

这种转变的到来甚至比一般所认为的还要突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革命仍是 19 世纪的延续,1914—1918 年的冲突不过是加速和无限加重了并非由它所产生的危机。但在当时,困境的根源并未被人们发现;而且在战后的幸存者看来,大战带来的恐慌和破坏对于突然出现的国际组织而言是明显的障碍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突然停止运转的情况。但事实上,战后和平稳定的障碍与大战本身爆发的原因是相同的。自 1900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 22

解体,是1914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战争及战后条约通过排除德国的竞争,只是在表面上减弱了这种压力,然而,这却更加剧了紧张的产生根源,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实现和平的政治、经济障碍。

从政治上看,战后签订的条约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矛盾。通过对战败国的单方面永久裁军,他们实际上已经预先阻止了一切重建势力均衡体系的可能性,因为武力是这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无论是日内瓦会议试图构建作为欧洲协同体的扩大和改进形式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还是为联盟的盟约而要求采取的磋商与联合行动,都是徒劳的,因为作为所有这些的根本前提的独立国家力量单元是缺失的。这种联盟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来,关于强制执行的第16款以及关于和平的修正案的第19款都从未得以执行。解决这种严重的和平问题唯一可行的方法即恢复均势体系,却根本无法实现;这种状况如此严重,以致于即使20年代最有建设性的政治家也不能被公众所理解,他们继续生活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持续混乱状态之中。面对这样一种糟糕的事实——一些国家被裁军,而另一些国家则继续武装自己——这种情况排除了一切通向建立和平组织的可能,一种情绪化的观点也盛行开来,这种观点认为联盟可以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成为这个时代和平的先驱,而这种和平仅需要经常不断的口头上的鼓励就能永存。在美国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只要美国加入到这个联盟中,情形就会大不一样。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适合用来表明人们对所谓战后体系缺乏理解这一事实了,之所以称它为“所谓的”战后体系,是因为如果这种称谓还有一点意义的话,欧洲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政治组织系统。一个像这样的赤裸裸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能存续的时间将以有关各派的力量耗尽为限,这样我们就不会为把恢复到19世纪的体系视为唯一的出路感到奇怪了。同时,联盟议会应该至少发挥一种欧洲的管理者的职能,就像欧洲协约体当初达到顶峰时的情形那样,而不是为了那种致命的一致通过的原则而运转——这个原则竟然使那些不服约束的小国成了世界和平的决定者。这种荒谬的对战败国永久裁军的设计排除了一切建设性的解决方式。处理这种可怕状况的唯一可选的途径,是由有组织的强制力建立一个超出国家主权范围的国际秩序。而这种解决方式在当时却完全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更不要说美国了,会服从这样一个体系的安排。

从经济上看,日内瓦公约体系在致力于让世界经济的恢复作为世界和平的第二道防线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更有连续性的,因为即使均势体系得以重建,它也只会因为重建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肯致力于维持和平。如果像过去一样,

缺少了稳定的交换和贸易的自由,各国政府就会把和平看成是次要的利益。此时他们可以为这种和平而努力,但前提是不要触犯他们的任何主要利益。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威尔逊(Woodrow Wilson)最早意识到和平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不仅是贸易的保证,也是和平的保证。这就难怪国联总是致力于国际货币组织与信用组织的重建,并将其看成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实现和平的唯一可能的保证。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国际金融。摩根(J. P. Morgan)现在取代了罗斯查尔德。

按照 19 世纪的标准,战后的头十年看起来很像是革命的时代,而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结论却刚好相反。那个十年的目标十分保守并且散布着一种普遍的观点:只有重建 1914 年以前的“这一次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那种体系,才能恢复和平与繁荣。事实上,正是这种回复到过去的努力的失败,导致了 30 年代真正转变的发生。虽然战后十年的革命运动与反革命运动如此壮观,但它们仅仅是对军事上失败的机械的反应,或者,至多也不过是在中欧和东欧广大的背景下,重新上演我们所熟悉的西方文明的自由和宪政的戏剧;只有到了 30 年代时,全新的因素才进入到西方的历史进程中来。

24

除了俄国,中欧和东欧在 1917—1920 年所发生的骚乱与反骚乱,不管其情节怎样,都只是在以迂回的方式来重现那些被战争压垮了的政权。当反革命的烟雾散尽时,人们发现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的政治体系与战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芬兰、波罗的海诸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甚至意大利和德国到 20 世纪中期也大体上如此。也有些国家在民族自由和土地革命上取得很大进展,而这些成就在 1789 年以来的西欧已经很普遍。在这方面,俄国也不例外。时代的趋势只不过是建立(或重建)体现英国、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理念的体系。无论是兴登堡(Hindenburg)、威尔逊,还是列宁、托洛茨基(Trotsky),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都与西方传统保持一致。

在 30 年代早期,变化突然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包括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苏联的五年计划,罗斯福新政的启动,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崇尚专制帝国的倾向导致了国联的崩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19 世纪的理念仍然极为重要,它的影响支配了之后的十年。到 1940 年,旧的国际体系的残骸已不复存在,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块地区,所有的国家都生活在一种全然不同的国际秩序之中。

我们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体系崩溃的威胁。在世纪之初它已经只是一瘸一拐地发挥着作用,大战及战后条约最终将它彻底毁灭了。这在

25 20年代已变得很明显了,当时几乎没有一场国内危机不是受了国外经济事件的影响而达到高潮。当前的政治学者对各国进行分类,不是根据地理界限,而是根据它们坚持稳定的货币体系的程度。苏俄因卢布的贬值而令世界惊讶,卢布因为通货膨胀变得一文不值。德国重复使用这种孤注一掷的招数,以揭穿协约国的欺骗,觉醒之后继而对**食利**(rentier)阶层财产进行剥夺,为纳粹革命奠定了基础。日内瓦的威望来源于它成功地帮助奥地利和匈牙利恢复了它们的通货,由于对奥地利克朗的成功手术,维也纳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圣地,可惜这个病人却未存活下来。在保加利亚、希腊、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流通体系的恢复使反对革命者提出了分享政权的要求。在比利时、法国和英国,左派也在稳定货币体系的名义下被赶出了政坛。一系列通货危机通过国际信用体系的橡皮筋,将贫穷的巴尔干地区与富裕的美国联系在一起,这个橡皮筋传导着不完善地重建而成的通货体系带来的张力,先是从东欧到西欧,再由西欧至美国。最终,美国自身也被欧洲通货体系不成熟的稳定性带来的影响所吞没。最后的崩溃开始了。

这种震荡最早发生在各国内部。一些国家如苏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的通货体系在一年之内就垮台了。除了通货价值变化的速率空前之外,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这个变化的背景是经济已经完全货币化了。一种“蜂窝化”的过程被引入了人类社会,它所产生的效果超出了人类已有的经验范围。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缩小流通都意味着分裂。各国发现它们与它们的邻居们像被鸿沟给隔开了。与此同时,国内各阶层的人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甚至通常相反的影响。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不折不扣地被贫困化了,金融巨头则积累起了令人憎恶的大量财富。一种巨大无比的既融合又分解的力量进入了这个场景。

“资本逃亡(flight of capital)”其实是一个新事物,无论是在1848年,还是1866年,甚至是1871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然而,它却在1925年和1938年法国自由政府的颠覆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也在1930年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26 货币已成了国家政策的支点。在现代货币经济下,没有人不是每天感到金融扩张和收缩的尺度的影响。人们变得对货币非常敏感,都能事先计算出通货膨胀给实际收入造成的影响,所有的男人女人们好像都将稳定的货币看成人类社会的至高需要。但是,这种意识是与另一种意识分不开的,即认为通货体系的基础可能是依赖于国外政治因素。于是社会的**动荡**不仅仅动摇了人们对货

币媒介内在稳定性的信心，而且也粉碎了在相互依赖的经济体制中的金融自主的天真观念。故而，由国内通货问题引起的危机会产生严重的国际问题。

对金本位的信任是这个时代的信念。有些人是天真地接受，有些人是批判地接受，而在其他人那里，这是一个意味着能在肉体上接受而在精神上排斥的魔鬼信条。然而，这一信念自身却是一成不变的，即一张银行支票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代表着黄金。而黄金是具有价值的，不管是因为像社会主义者认为的它体现劳动，还是因为像正统学说认为的它是有用而稀缺的，这本身并没有差别。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战争居然忽视了货币问题，而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奇迹般地联合在了一起。在这里，李嘉图与马克思是没有区别的。19 世纪的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俾斯麦和拉萨尔(Lassalle)，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和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米塞斯(Mises)和托洛茨基都同样地接受了这一信念。卡尔·马克思费尽心力地揭示蒲鲁东(Proudhon)的乌托邦式的劳动券(它用以代替货币)，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之上；《资本论》(*Das Kapital*)则以李嘉图的方式隐含着货币商品理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索科涅科夫(Sokolnikoff)是战后第一位以黄金的方式来恢复该国货币价值的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希法亭(Hilferding)因坚定地拥护稳定货币原则而使其政党陷于危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奥托·鲍尔(Otto Bauer)支持旨在恢复克朗价值的货币政策，而这正是其政治对手塞佩尔(Seipel)努力尝试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菲利普·斯诺登，当他认为英镑的黄金价值在工党手中会变得不稳定时，就开始反对工党；墨索里尼则将里拉的黄金价值定为 90 并将其刻在石头上，发誓要誓死捍卫这个标准。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很难发现胡佛(Hoover)与列宁、丘吉尔(Churchill)和墨索里尼(Mussolini)的意见之间有任何分歧。事实上，对金本位制在当时国际经济体系运转中的根本必要性的认识，是各国、各阶层、各宗教和各种社会哲学观念的人群中唯一的共识。当人类使自己堕入不得不竭力恢复其已经变得支离破碎的生活境地时，他们的求生意志所攀附的，只有这个看不见的实在。

这种失败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空前广泛的。这种试图稳定实际上已无可救药的通货的努力，不仅是奥地利、希腊、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这些弱小国家的信义行动，他们在通往黄金海岸的路上一直勒紧着腰带，而且也是对他们强大而富裕的发起人——西欧的战胜国——的严峻考验。只要这些战胜国的货币仍在波动，紧张就不会太显著，他们会继续像战前一样向国外提供

贷款,帮助战败国维持本国经济。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回复到金本位制,稳定汇率的负担就开始显现。最终,对英镑安全问题的关注,悄然成为美国这个处于领导地位的金本位制国家的视线焦点。这个横跨大西洋两岸的令人关注的事物出乎意料地使美国处于危险境地。这一点看起来只是技术性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理解。美国在1927年对英镑的支持意味着纽约利率的低水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大量资金从伦敦转移到纽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故而承诺英格兰银行,将会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但在这时,美国自己却需要高利率,因为她自己的价格系统已经开始危险地膨胀了(但实际情况却被稳定的价格水平给遮蔽了,这种表面上的稳定其实是由成本的急剧下降维持的)。在1929年当钟摆终于从七年之久的繁荣中摆回来,并带来延迟已久的崩溃时,各种问题早已被一直存在着的隐性通货膨胀状况所无限加剧了。债务人因通货紧缩而消解,眼看着膨胀的债权人破产。这是一个警示。美国由于其避害的本能于1933年放弃了金本位制,这是传统世界经济最后痕迹消失的征兆。虽然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洞察到这一事件的深刻含义,但是历史却立即发生了转向。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金本位制的恢复被看成是世界稳定的象征。无数的会议,从布鲁塞尔到斯帕和日内瓦,从伦敦到洛迦诺再到洛桑,各种会议都是为了实现稳定货币的各种政治前提。国际劳工局(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的建立弥补了国联的不足,其部分宗旨是使各国得以公平竞争,这样,贸易就可以自由开放,而不至于危及生活水平。货币处于华尔街所策动的各种运动的核心地位,这些运动旨在解决转换问题:首先是使赔款商业化,然后是让赔款流动起来;日内瓦(公约)扮演了恢复过程的倡导者的角色,伦敦与维也纳新古典货币主义者的双重压力都被用来服务于金本位制;每一次国际性的努力最终都被引向这个目标,而各国政府通常都会制定政策以保护货币,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对外贸易、贷款、银行业和汇兑的政策。虽然每个人都知道通货的稳定最终依赖于自由贸易,但是除了教条主义的自由贸易论者之外,所有的人都知道此刻必须立即采取一些必定会限制对外贸易和国际支付的措施。进口配额,延缓和停止偿债的协议,结算系统和双边贸易协议,易货约定,限制资金外流,外贸控制,汇兑平衡基金等在大多数国家实施起来以适应这一大环境。然而,自利自足的幽灵却总是缠绕着保护通货的脚步。各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自由贸易,结果却恰恰相反。各国政府不是积极地去寻找与国际市场接触的途径,相反却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以阻止自己国家与国际市场有任何接触,为了保持哪怕一丝贸易流,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为了让通货成为

对外贸易的媒介，人们疯狂地捍卫它的对外价值，可是事与愿违，人们被这种努力逼入了一种专制的经济之中。最终使我们与传统经济学彻底背离的这一整套限制性手段，确切地说，正是由保守的自由贸易的目的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趋势随着金本位制的破产而发生了突然的逆转。那些曾经为恢复金本位制而作出的牺牲现在需要再重复一次，以使我们能够不再依靠它而生存。那些曾经由我们创制的用来限制生活和贸易以求维护稳定的金融体系的公共机构，现在再次被用来调整工业生活以适应永久性不稳定的金融体系的现状。也许这就是在金本位制破灭后所形成的压力下，现代工业社会的机械和技术结构还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吧。在竭力维护金本位制的时候，世界已经无意识地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和组织形态，以便能适应金本位制的失败。然而现在的意图却恰恰相反；在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的而做的长久的奋斗中承受最多的那些国家，在振兴过程中却释放了巨大无比的力量。国联和国际金融都没有比金本位制存活更长的时间；随着金本位制的消失，联盟组织化了的和平利益和它的首要执行工具——罗斯查尔德家族和摩根家族——都从政治中消失了。黄金线的突然崩断是世界革命即将发生的一个显著标志。

29

但是，金本位制的破灭仅仅只是为一个更为重大的事件确定了日期，这一事件是如此重大，以致于不可能是由金本位制的失败所引起的。蔓延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大危机伴随着 19 世纪式的国家制度的彻底崩溃，这些制度在世界各地都被改变和重组，导致我们几乎不能再将它们辨认出来。许多国家的自由政权被独裁极权所代替，19 世纪的核心制度，即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被新的经济类型所代替。当一些大国重新塑造它们的思想模式，在闻所未闻的理念的名义下使自己卷入战争以重新奴役世界时，另一些更大的国家则急于保卫自由体系。自由这一概念在它们手中同样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虽然是国际体系的失败引起了这一改变，但这却不能解释它的深度和内容。即使我们知道那些发生的事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但我们还是不明白从根本上说它为什么会发生。

伴随着转变而来的是规模空前的战争，这绝不是巧合。历史其实是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国家的命运也直接与它在制度变革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关。这种共生关系长久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虽然国家集团和社会制度都有它们自己的起源，但它们还是倾向于在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彼此勾连。一个著名的有关这种共生关系的实例就是资本主义与大西洋沿岸的海洋国家

联系在一起。商业革命与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兴起如此紧密地联系着，共同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先后获取霸权的手段，它们都从这一广泛而深入的过程所提供的机遇中获利匪浅。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本主义本身也正是通过这些强权的前后兴起而得以在全球扩张。

30 这一法则也可以反过来用。一个国家在争取生存的奋斗中，由于它的制度或者制度中的一部分恰巧属于趋向衰落的类型，从而使其奋斗受到严重阻碍——“二战”期间的金本位制就是这种衰落制度的一个典型。从另一角度来说，那些出于它们自身原因而违背这一制度的国家，可能很迅速地就发现现存国际组织秩序的弱点，从而期望创造更加适应自己利益的制度。这些国家集团一方面努力摆脱正在衰落的制度，另一方面牢牢紧跟那些正在稳步前进的新潮流。于是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他们发动了社会变迁过程，然而事实上他们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受益者，或者说他们可能会诱导这一倾向为他们自己的目标服务。

因此，可以说德国一旦成为战败国，它就能洞悉 19 世纪世界秩序的潜在缺陷，并利用这种认识去加速这一秩序的破灭速度。那些 30 年代的德国政治家们险恶的智识优越性与日俱进，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如何扰乱这一秩序上来，在他们尝试让事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时，他们把这种破坏意图贯彻到对金融、贸易、战争、社会组织的新模式的发展过程中。然而，确切地说这些问题本身并非是由这些想借此获益的政府所创造的；它们是真实的——客观给定的——并一直伴随着我们，无论个别国家的命运将如何。再强调一遍，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前者仍然是典型的霸权之间的简单冲突，对于 19 世纪的国家类型来说，这种冲突是因为势力均衡机制的破灭导致的；而后者则已经是世界剧变的一部分。

这种认识允许我们将这一时期各民族的辛酸历程从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中分离出来。这将使我们很容易看到，德国、俄国、英国和美国，作为强权国家是如何由于与潜在的社会进程的不同关系而被促进或阻碍的。但就社会过程本身而言，同样真实的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以个别霸权的崛起为工具，帮助它们推广自己的信条。德国、俄国各自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代表。不论是好是恶，这些社会运动的真正意图，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被辨认清楚，即把它们与其致力于服务的那些国家利益分离开来，此时我们才会发现它超越的特性。

31 虽然说，德国、俄国或者是和它们相类似的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日本、

英国、美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都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并不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要关注的问题；然而，作为制度转型中的活生生的力量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却是我们着重关注的研究对象。激发德国或俄国或美国人民产生不可思议的强烈欲望要求获取更大份额生存条件的那种**生命力量**（élan vital），必须被当成一种事实材料，正是以此为背景我们的故事才得以展开；而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者罗斯福新政构成我们的故事本身。

这些又引出我的另一个结论：引起灾变发生的根本性源头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这种理论要赋予自我调节市场体系以几乎神秘的力量；它意味着势力均衡机制、金本位制、自由主义国家这些 19 世纪文明的基础要素最终都是由共同的基质（matrix）——自我调节的市场——来塑造的。

这种断言如果不是因其粗俗的唯物主义倾向而令人震惊，至少也显得非常极端。但是，我们目睹的这一崩溃的文明的特色确实是以经济基础为依托的。其他社会和文明也同样受它们身处其中的物质条件的限制——这是人类生活的共同特征，也是所有生命有机体的共同属性，无论是宗教信仰者还是非宗教信仰者，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所有社会都受其经济因素的限制。不过，只有 19 世纪的文明是建立在不同的或独特意义的经济之上的，即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某个动机之上，而这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被当作是正当有效的，更从未被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动、行为的正当性标准：这个动机就是获利。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从这个原则中被引发出来的。

由获利动机引发的这种机制的影响力，在历史上只有宗教狂热的大爆发堪可与之相比。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整个人类社会都受到它的丝毫不曾衰退的影响。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它在 19 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中的英国趋向成熟。大约 50 年后，它传到了欧洲大陆和美国。最终在英国、欧洲大陆甚至是美国，相同的选择塑造了日常事务的模式，这些模式的主要特性在所有西方文明国家里都是相同的。为了说明大灾难发生的原因，我们必须转而研究市场经济的沉浮史。

市场经济诞生于英国——但是，它的缺陷导致的最悲惨的并发症，还是发生在欧洲大陆。为了充分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时期的英格兰。19 世纪是英国的世纪，这么说当然是毫不夸张的。工业革命是英国的事件，市场经济、自由贸易、金本位制都是英国发明的。这些制度到了 20

年代在所有地区都崩溃了——在德国、意大利或奥地利，这一现象仅仅比在别的地方更加政治化和戏剧化罢了。但是无论这最后一幕的场景和热度如何，破坏这个文明的久远因素，还是应该从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开始探讨。

第二篇

市场经济的兴衰

第一卷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居住 VS. 利用”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关于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与之相伴的是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 35

我们试想着去搞清楚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紊乱。在英国,这种紊乱在一个世纪前达到了顶峰。是什么样的“撒旦的磨坊”把人们碾成了乌合之众?这在何种程度上是由新的物质条件引起的?又在何种程度上是由新物质条件下运转的经济依赖性造成的?是什么导致了旧的社会纽带被破坏,而让人与自然的新的整合尝试如此失败?

再没有比自由主义哲学解释变迁问题更失败的了。由于对自发性的情绪化信念,关于变迁的常识观点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经济增长的社会后果的神秘接受,不管这些后果可能会是什么。那种基本的关于政治科学和治国才能的真理首先被怀疑,然后被忘却。一个注定速度过快的、无人指导的变迁过程应该减慢速度(如果可能的话),以维护共同体的福祉,这个道理原本不需要详细讨论。这些家喻户晓的关于传统治国术的真理,通常只不过反映了一些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社会哲学的原则;可是到了 19 世纪,这些真理已经从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思想中被抛弃了,导致这种结果的,是粗俗的功利主义的腐蚀和对所宣称的自发增长和自我治疗机制的盲目信仰的共同作用。

经济自由主义误解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因为它往往坚持以经济学的视角

36 来判断社会事件。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视线转向一个乍看起来好像是关系并不密切的事件：把空旷开阔地和可耕地改造为牧地，这一事件发生在早期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在那个时期，田野和公地都被贵族圈围起来，整个农村都受到人口不断减少的威胁。提醒人们意识到由于圈地和改变农田的作用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我们的意图在于：一方面想证明，最终都是有利的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两者，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是相似的；另一方面，从更广阔的意义讲，在于澄清社会在面临经济无节制增长所带来的剧痛时可能做出的选择。

如果不是将耕地改造为牧场的话，圈地运动是一明显的进步。被圈土地的价格是未被圈的土地价格的两至三倍。只要哪里还维持耕作，哪里的就业就不会减少，粮食供给就会增加。土地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是那些出租土地更是如此。

但即使是将可耕地转变为牧地，也不完全对当地居民有害，尽管这包含着对居住方式的破坏和对就业机会的限制。家庭手工业在 19 世纪后半叶广泛传播，并在一个世纪后成为农村地区的一个特色。牧羊农场的羊毛生产给小佃农和无法从事耕种活动的无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新的羊毛工业中心也能够保证手工业者的稳定收入。

但是——这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补偿性的有益效果才可能是真实的。在缺乏这一条件的情况下，这一高利润的养羊和羊毛买卖反而可能毁灭乡村社会。这些能够“变黄沙为黄金”的羊同样也能够将黄金变为黄沙。正如 17 世纪富裕的西班牙最终所发生的那样，在那里由于羊群放牧的过分发展，被毁坏的土地至今还没有恢复生产力。

1607 年的一份为王国范围内的贵族们拟定的官方文件，用很有力的语句提出了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问题：“贫穷的人们应该满足于他们的目标：居者有其屋；而绅士们的致富要求同样不该受到阻碍。”这个公式显示了纯粹经济进步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然而实际上，它所获得的进步是以社会紊乱为代价的。同时，它也暗含着由富人们以公共进步为口实而行自己私利所造成的穷人滞留在肮脏小屋中的悲剧的必然性。

37 圈地运动已被正确地称之为——一场富人对抗穷人的战争。地主和贵族搅乱了社会原有的秩序，破坏了古老的法律和传统习俗，有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当然，惯用的还是威胁和压力。他们不折不扣地抢夺了穷人在公共利益中所

占的份额,拆毁了穷人们世代居住的房屋,而依据牢不可破的传统习俗,这些房屋应该是属于穷人和他们的后代的。社会的组织结构被破坏了,乡村的荒凉、居民住所的破败不堪证明了这场战争的猖獗程度。它破坏了农村的自我防护体系,废弃了城镇建筑,大量削减了人口,将那些过度垦殖的土地变成沙地。它骚扰居民,将他们由淳朴的农民变成一群小偷和乞丐。虽然这仅仅在局部地区发生,但是这些小污点仍有可能集合为一场大灾难。^① 国王和他的枢密院、内阁大臣以及主教们都在为保护公共福利,以及实际上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的本质主旨而与这些暴行作斗争。从1490年到1640年,一个半世纪以来他们都在与人口减少作着斗争,几乎没有任何间歇。伴随有几千农民被残杀的凯特叛乱(Kett's Rebellion)被挫败后,保护者萨默塞特勋爵(Lord Protector Somerset)在与反革命斗争中丧命,反革命者将圈地法从国家法令中删除,并建立了畜牧业贵族的独裁统治。他们指控索姆塞特爵士(并非毫无道理地)是由于他对圈地运动的谴责鼓舞了那些反叛农民的斗争勇气。

大约100年之后,同样两类对手间的第二场角力又开始了,但在这一刻,圈地者大多是些很富有的乡村绅士和商人,而不再是过去的土地主和贵族了。世俗和教会的高层政治都卷入到了相关斗争中,在这一斗争中,国王巧妙地利用他的特权去阻止圈地运动,同样也巧妙地利用圈地争议以壮大自己在立宪斗争中的地位以对抗乡绅。在这场斗争中斯特拉福德(Strafford)和劳德(Laud)都是死于国会之手。但是,他们的政策不仅在工业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反动的,更为重要的是圈地者较之以前,现在更倾向将土地用于耕作而不是用于畜牧。此时,内战大潮已经淹没了都铎王朝和早先斯图亚特王朝的公共政策问题。

38

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谴责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前期的政策问题时表现了高度的一致,认为那些政策若不是彻底反动的的话,也是蛊惑民心的。他们的同情心自然放在议会方面,而后者却是和圈地者站在一起的。尽管吉宾斯(H. de B. Gibbins)是公众的热心朋友,他却写道:“然而,这样保护性的法规,就像一般的保护性法规一样,通常情况下是完全徒劳无效的。”^②英尼斯(A. D. Innes)则更进一步加以明确:“法规对于流浪者的惩罚和试图强行把工业推向不适宜的区域,以及为了保护就业而把资本导向较少营利的投资项

① Tawney, R. H.,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16th Century*, 1912.

② Gibbins, H. de B.,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95.

目上的尝试像往常一样，必然是失败的”^①。盖尔德纳(J. Gairdner)则果断借助自由贸易这一概念作为“经济法则”：“经济法则当然没有被人理解，”他写道，“地主们发现把耕地专门用作牧场来促进羊毛生产是有利可图的，但立法者却试图阻止地主们推倒农民的居所。这种频繁往复的尝试只能表明相关法令实际上是何等无效。”^②近来，经济学家赫克舍(E. F. Heckscher)强调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重商主义基本上应当是由一个人们并不充分理解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来阐释的，那是一个人类显然需要更长时间乃至几个世纪才能把握的主题。^③实际上，反圈地法规似乎从来就没有阻止过圈地运动的进程，更别说已经很严重地妨碍了其进程。约翰·黑尔斯(John Hales)，显然对联邦国民原则投入了最大的热情，但是他也承认不可能收集到对圈地者不利的证据，圈地者经常指使其仆人在陪审团上做宣誓，况且，“陪审团里尽是他们的拥护者和依附者，以至于没有这些人，陪审团也就不存在了”。有时候圈地者只要在被圈地里随便犁出一道沟就能免于处罚。

39 这样一种简单通行的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正义之上的情形被看做是立法无效的标志，而这种被徒劳地阻挠的趋势最终获得的胜利随后则被引用为确证，以证明“反动分子的干涉主义”的徒劳。然而，这种看法似乎完全忽略了重点。为什么圈地运动的胜利要被看做是企图延缓其进程所做努力的最终失败的证明呢？为什么反圈地立法的意图不能通过它们所完成的任务，例如，延缓了变迁的速度而被人们清晰地看出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圈地立法虽然没能全面阻止圈地运动，但也并不是完全无效的。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虽然后者常常是不依赖于我们意志的，但我们所能承受的变迁发生的速度却是可以由我们来控制的。

相信自发的进步，这种信仰会使我们对经济生活中政府这个角色视而不见。通常，政府这一角色要视情况来调整变迁的速度，是促进还是延缓。如果我们认为速度是不可改变的——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认为干涉变迁的速度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那样的话，当然也就没有可以干涉的余地了。圈地运动就提供了这样的例子。回顾便知，没有比西欧的经济所呈现的进步趋势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了。这一趋势致力于消除依靠人为维持的单一农业技

① Innes, A. D.,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1932.

② Gairdner, J., "Henry VIII," in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I, 1918.

③ Heckscher, E. F., *Mercantilism*, 1935, Vol. II, p. 104.

术和混合条块结构,以及原始简单共有制度。至于英国,羊毛工业的发展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笔资产,事实也如此,其发展也开拓了棉纺织工业——工业革命的火车头——的建立。更进一步说,国家纺织业的增长明显要依赖于国内羊毛供给量的提高,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把可耕地变为牧地以及随之而来的圈地运动是经济进步的一种趋势。然而,对于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所一贯坚持的政策来说,这种进步的速度或许已经具有毁灭性,已经使这一过程本身变为一种退化的而非建设性的事件。在这些决策者看来,这种变迁的速度,主要取决于被剥夺者能否在其人性与生计、物质与道德等本质方面不遭受致命损伤的情况下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了的条件;取决于他们能否在与这种变迁间接联系的机会领域找到新的工作,以及取决于在因出口增加而带动进口增加的这一过程中,能否使那些因经济变迁而失业者获得维持生计的新资源。

无论如何,解决的办法依赖于与变迁和调适的相对速度有关的任何一种情况。经济理论中通常的“长远”考虑是不可接受的,它们会通过假定事件发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而对问题预先做出判断。尽管对我们而言,那种假定看起来是合乎常理的,然而它却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制度性结构,就像我们最易遗忘的,它只出现于我们这个时代,而且仅是部分地出现。除去这个假设,“长远”考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变迁的即刻效果是有害的,那么在相反证据出现之前,其最终的效果也是有害无益的。如果因可耕地变为牧地的这种转变导致了特定数量房屋的毁坏、一定数目的失业以及局部可用性食物供给量的缩减,这些后果就可以视为最后的结果,直到相反的证据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不考虑下述结果:由于出口增加而对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所产生的可能后果;因地方羊毛供应量的增长而创造的可能就业机会,对土地所有者将他们所增加的收入用在较长远的投资上或者用于奢侈品的开支上所起的作用。只有将变迁速度与人们调适的速度相比较,才能决定什么可能会被看做是变迁的净效果。但是,除非能够证明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是存在的,否则我们绝不假定市场法则的作用。只有在市场经济的结构背景下,市场法则才是恰当的有意义的。不是英国都铎王朝的政府官员们脱离实际,而是责难他们的现代经济学家脱离实际,他们的指责暗含着假定市场体系先前是存在的。

40

英国遭受了圈地所带来的苦难,但却没有受到严重的毁坏,因为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一直运用王权来延缓经济发展进程,直到发展的速度

达到了能被社会广泛承受的程度——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力来减轻变迁的受害者的痛苦,并试图把变迁的过程引导到破坏性较小的方向上去。从表面上看,当时那些具有特权的政府大臣、法官和法院并不是保守的;他们代表着新治国的科学精神,支持国外工匠手工艺者移民入境,热切地引进新的技术,采纳统计学方法和准确记录的习惯,藐视传统思想和传统习俗,反对依时效而取得的权利,削减教士的特权,不理睬习惯法。如果革新缔造了革命者,那么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革命者。他们承担着为平民大众谋福利的义务,颂扬君主的权力和统治;然而未来是属于立宪政体和国会的。君主统治的政府被一个阶级的政府所取代,这一阶级在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立宪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是与政治革命相结合,在革命中,王权被驱逐,那时王权的创造能力几乎全部散尽,而它的庇护功能对一个已经经受住变迁大动荡的国家而言,已不再是必要的。王权的财政政策现在已过分地限制了国家的权力,开始束缚其贸易的发展;君主为了维持其特权而越来越多地滥用特权,并由此而损害了政府的资源。它在劳资关系方面的出色管理,以及对圈地运动的谨慎控制仍然是它最后的成就。但是,由于资本家和作为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的雇主们是保护运动的主要受害者,这些成就便更易被人遗忘。一直到两个世纪以后,英国又再度拥有一个,如同曾经被共和政府破坏的政府一样的既有效率又良好运行的社会管理体系。无可否认地,这种温和的专制主义的管理体系现在是不太必要的。但是在某一点上,这个断裂却造成了无尽的伤害:它有冲刷这个民族的记忆,忘却圈地时期的恐怖以及政府的贡献——战胜了人口缩减——的危机!也许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150年后,当类似的以工业革命的形态出现的大灾难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和福祉时,人们却没能认清这个危机的真实性质。

这个时代和这样的事件都是英国所特有的;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成为使全国成为一个整体的源头;这一时期也把改善土地利用建立在对一般民众居住环境的前所未有的破坏之上。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到来之前,劳动者已经被挤到新的废墟地——所谓英国的工业城镇;乡下人被非人化地沦落为贫民窟里的居民;家庭处在毁灭的边缘;“撒旦的磨坊”呕出的大量煤渣和废料迅速吞噬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国土。持有各种观点的作家和政党,无论是保守派或自由派、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总是把这些归因于工业革命下的社会条件,认为这就是人类退化的真正的深渊。

42 对这一事件的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还没有被提出来。当时的人们猜想他

们已经找到了不幸的关键所在——一种支配着财富和贫穷的铁一般的规律，即他们所谓的工资铁律和人口铁律；而这些已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剥削被提出来，是作为对贫穷和财富的另一种解释，但它也未能说明这样的事实：总体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近一个世纪。更多时候，人们提出了许多繁复的原因，但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我们自己的解释绝不是简单的，实际上它占据了这本书的主要篇幅。我们承认这是在英国突发的社会紊乱和崩落，比在圈地时期发生的要严重得多，我们还认为这场灾难是一场追求经济增长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的伴生物。一种全新的制度结构在西方社会开始产生作用，其危险性在其一开始出现时就触及其痛处，可是却从未真正得以克服。19世纪的文明史主要在于为防止这一结构对社会的破坏所做的努力上。工业革命仅仅是一场类似宗教狂热那样激进而又极端的革命的开始而已，可是与狂热的宗教不同，新的信念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它坚信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物质用品，人类所有的问题就都能够得以解决。

故事已经重复无数遍了：市场是如何扩张的，煤铁的出现就像潮湿的气候一样有利于棉纺工业，18世纪的新圈地运动剥夺了大量民众的财产，自由制度的存在、机器的发明以及其他的原因互相作用相互影响而爆发了工业革命。已有的定论是，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不能够被单独抽离出来作为这一突发性事件的原因。

但是如何给这场革命自身下一个定义呢？它的基本特性是什么呢？是工业城镇的兴起、贫民窟的出现、童工的长时劳作、特定类型工人的低工资、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还是工业的集中？我们认为对于它们的共同基础而言，所有这些仅仅是偶然发生的，这个基础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制度的本质在机器对商品社会的冲击被认识之前是不可能被完全把握的。我们并非试图做出这样的断言：机器创造了所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们坚持认为：一旦商品社会运用精制的机器和工厂来生产，有关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观点就必然会形成。

43

专业化的机器在农业和商业社会的使用一定会产生典型的效果。这一社会由农民和从事农产品买卖的商人组成。依靠专业的、精细的、昂贵的工具和工厂进行的生产只能适应于买卖活动极易发生的社会。只有商人才能承担这个任务，并且是与其不至于因此亏本为前提。他出卖商品的方式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但获得商品的方式却大不一样。也就是说，不是通过购买制成品而是靠购买必需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按照商人自己的要求使两者结合，再加上可能

要承担的耽搁,新产品就产生了。这并不只是对家庭工业或“产出”的描述,而是对任何一种工业资本主义,包括我们自己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描述。它对社会体系产生的重要影响接踵而至。

精制机器的成本是昂贵的,所以要等到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才能得以补偿。^①只有商品的出路是有可靠保障的,而且生产不必因为机器生产必需的基本要素的缺乏而被中断,机器生产才能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持续运转。这对商人来说意味着所有相关的要素都一定是待售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准备为它们付钱的人来说,它们必须保证付钱人所需要的任何数量。除非这一条件能够得以实现,否则专业化机器生产就太冒险了,不仅下了赌注的商人们这样认为,而且依靠持续的生产来获得收入、工作和商品供应的共同体也这样认为。

这一条件在农业社会中不可能自然就具备;它们必须被创造出来。即使它们是被逐渐地创造出来,也决不会影响所发生的变化的令人瞩目的本质。这一转变必然包含着大部分社会成员行为动机的变化:生存的动机被获利的动机取代。一切交易都变成了金钱交易,而这又反过来要求把交易媒介引入到工业生活的各个环节。一切收入必须来自某种东西的出售,而且无论个人收入的真正来源是什么,都必须被看做是出售的结果。“市场体系”这个简单的术语所描述的意思,正是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制度模式。这一体系的最惊人的特性在于:它一旦建立,就自发地产生作用而不容外界干涉。利润没有任何保证,但是商人必须通过市场获取利润。价格必须被允许自我调节。这样一种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

44 早期经济向这一体系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以至酷似毛虫的蛹变,要想用持续增长、发展这些词语所能够表达的任何变化来形容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例如,拿商人—生产者的售卖活动与购买活动作个对比;当他所卖的仅仅是人工产品,不管他能否找到买者,社会组织结构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他所购买的是原材料和劳动力——也就是自然和人。商业社会里生产的机械化实际意味的,就是把社会的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质转化为商品。这一结论尽管离奇,但却是必然的,其他任何说法都不够准确:所以很显然,由这些发明所引发的混乱一定会使人们的关系瓦解,并且毁灭性地威胁到人类自然的栖息地。

事实上,这种危险迫在眉睫。如果我们对支配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法则进行检查,我们将会意识到它的本质。

^① Clapham, J. H.,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III.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制度

在我们进入针对统治着市场经济——这正是 19 世纪所试图建立的——的法则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牢固掌握这种制度赖以建立的那些非同寻常的前提假设。

市场经济意味着一个由诸多市场组成的自发调节的系统；用稍稍技术化一些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这种能够在没有外界帮助或者干预的情况下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的系统当然值得被称作自发调节。这些粗略勾勒出来的特征应该足以表明，这样一项冒险事业具有在人类历史上完完全全前所未有的性质。

让我们把意思表达得更精确些。当然，如果没有某种类型的经济，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任何时间段存活；但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尽管 19 世纪学术咒语的大合唱是如此坚定一致，但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和利润这样一种动机，在此之前确实从未在人类经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尽管市场这种制度自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

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来不惜一切力量强调这一点。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存在，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依赖于人类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propensity to barter, truck and exchange one thing for another)”^①。从这句话里后来产生出“经济人”的概念。回顾起来，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对过去

^① 英文中“barter”“truck”“exchange”三词词义接近，很难分别用汉语对译，这里从王亚南先生的《国富论》译文予以意译。——译者注

46 的误读能够如此被证明是对未来的准确预言。因为尽管直到亚当·斯密的时代,这样一种秉性还不曾在任何已观察到的共同体的生活中彰显到值得注意的程度,并且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一直只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从属性特征,但100年之后,一个工业体系已经活跃于这个星球的主要部分,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这一事实都意味着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包括其政治的、智识的和精神的追求的话——都已经被那种秉性所左右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19世纪的下半叶,在对经济学仅有匆忙一瞥的了解的情况下,居然能够将劳动分工的原则与以物易物和交换等同起来。再过50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居然能够重复这个谬误。在那个时候,这种谬论竟然成了无须争论的自明公理。一大群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学、政治哲学以及一般社会学的从业者都步斯密的后尘,纷纷建立起相互交换的原始人的模型,并以此作为他们相应学科的公设。实际上,亚当·斯密对早期人类经济心理的假设与卢梭(Rousseau)对蒙昧人政治心理的假设是同样错误的。劳动分工,作为一种与社会本身同样古老的现象,源自性别、地理位置以及个人天赋等等事实中固有的差异;所谓的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几乎完全是人为发明的(apocryphal)。历史学和民族学已经了解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包含着市场制度,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哪怕仅仅在大致上,是由市场来控制 and 调节的。只要对诸经济体系的历史和诸市场的历史分别综览一下,这一点就会变得非常清楚。这种概览将表明,市场在各个国家内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不重要的;而翻身转向一个由市场模式所支配的经济,这一巨大变化的突兀性就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47 第一步,我们必须摒弃一些19世纪的偏见,这些偏见构成了亚当·斯密关于原始人倾向于从事牟利性活动这个假设的基础。由于他的假设与不远的未来而不是与模糊的过去之间更有相关性,这导致了他的追随者们对人类早期历史的一种奇怪态度。从表面上看,证据似乎表明,原始人所拥有的心理实际上是共产主义式的而非资本主义式的(后来这也被证明是错的)。结果,经济史学家就倾向于将他们的兴趣限制在相对晚近的历史中,即在交换和交易开始具有一定规模的时期,而原始经济则被贬入史前的范畴。无意识中,这导致天平向市场行为的心理学一侧倾斜,因为在最近几个世纪这一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中,每一种事物都可以被当成具有趋向于使那种最终被建立起来的

东西——即市场体系——得以建立的性质，而其他暂时潜伏下来的趋势则被忽略了。很明显，对这种“短期化”视野的纠正就在于将经济史与社会人类学联系起来，后者是一门一直被有意避开的学科。

今天我们不能继续延续这些路线了。将最近一万年以及一系列早期社会仅仅当成我们文明的真正历史——这段历史大致肇始于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的序曲的习惯，最客气地说，已经过时了。正是由于这个在我们的时代已经走向终结的插曲，也正是由于我们试图把握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的企图，我们应该按下自己的自然倾向，让它来跟随我们祖先的倾向。不过，使得亚当·斯密时代的人们认为原始人具有交换和交易倾向的同一种偏见，导致他们的后继者否认自己对原始人有任何兴趣，因为此时原始人被了解到并没有那些值得赞扬的激情。古典经济学家的传统——他们试图将市场经济的法则奠基于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所具有的所谓秉性之上——被另一种立场所代替，这种立场摒弃了对“未开化”人的文化的所有兴趣，认为它们对理解我们时代的问题毫无助益。

这种对早期文明的主观主义态度不应该对科学头脑有任何吸引力。开化的民族与“未开化的”民族间存在的差别被大大地高估了，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直到最近，欧洲农村的工业生活形式（即手工业的形式——译者）与几千年前的状况没有太大的差别。自从犁——本质上不过是一个由动物拉的巨大的锄头而已——被引入之后，直到现代开始之前，西欧和中欧的主要地区的农业生产手段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实际上，在这些地区，文明的进步主要是政治上、智识上和精神上的；在物质条件方面，公元1100年的欧洲很难赶得上1000年前的罗马世界。即使在此之后，变化也主要是在治国术、文学和艺术方面，特别是在这些领域的宗教和学术方面，而不是在物质技术(industry)方面。在经济方面，中世纪欧洲基本上与古代波斯、印度或者中国处在同一水平上，并很明显无法与两千年前新王国时期的埃及相提并论。在现代经济历史学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第一个反对将原始经济当做与文明社会的动机和机制毫不相干的对象而踢到一边的人。接下来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证明他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如果最近对早期社会的研究中有一个结论能够脱颖而出的话，那就是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不变的社会本性。人的天赋特征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各种社会中表现出惊人的恒常性，而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显示出同样的永恒性。

近期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突出发现是，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

(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物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不管是生产的过程还是分配的过程，都不曾与维系于财物占有的特定经济利益相联系；相反，这种过程的每一步都链合于一类特定的社会利益，是这些社会利益最终保证了必要的行动步骤被采取。一个小型的狩猎或捕鱼共同体中的这些社会利益，与一个巨大的专制社会中的相比，是非常不同的，但在以上每一种情况中，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

从生存角度看，对上述现象的解释是很简单的。以部族社会为例。个人的经济利益并非至关重要的，因为共同体会保护它所有的成员免于饥饿，除非共同体自身被灾难所打垮，纵使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威胁的也是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以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连结的维系则是命运攸关的。首先，如果个体不遵守关于荣誉或者慷慨的既定行为规范，那他就是自绝于共同体并成为一个弃儿；其次，因为从长期来看，所有的社会义务都是互惠的，从而履行社会义务也最符合个体礼尚往来(give-and-take)的利益。这样一种情势必然会对个体产生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他们从自己的意识当中消除经济自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但不是所有)他们根本无法从自利角度去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这种态度通过经常举行的公共活动——诸如分配共同捕猎所获得的食物或者分享某些大规模的、危险的部族远征所获得的战利品——而得到加强。从社会声望角度看，对慷慨无私的奖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除了忘我奉献，其他的行为都明显不划算。个人秉性与这种态度的形成并无根本性的关联。人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可以亲社会，也可以反社会；可以小肚鸡肠，也可以慷慨大度；既可以珍视此一系列价值，也可以珍视彼一系列价值。实际上，不允许任何人有嫉妒的理由乃是仪式性分配中既定的原则，如同公开赞扬是勤勉、技能熟练或者在其他方面成功的劳动者应得的奖赏(除非他太过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他活该被处死，因为人们认为他已经是邪恶巫术的牺牲品)一样。人类激情，好的或者坏的，仅仅被引向非经济的目标。仪式活动有助于激发最大限度的竞争，共同劳动的习俗则会使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最高标准。大量免费的礼物(free gifts)——这种礼物被预期将得到回馈，尽管这种回馈并不必然出自同一个个体——交换的行为是一个结构严密连续不断的过程，并且通过复杂的公开手段、魔法仪式以及不同团体之间基于相互义务而相互联系的“对偶结构(dualities)”来提供保护。这种礼物交换过程本身就解

释了逐利概念的缺失,甚至解释了在传统的有助于提高社会声望的物品所构成的财富之外的财富概念的缺失。

在这项对西美拉尼西亚共同体(Western Melanesian community)典型的一般特征的简单勾勒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它的性别和地域组织——这都要受到习俗、法规、巫术和宗教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目的只在于表明所谓的经济动机是源自社会生活的背景。因为正是在这个消极点上现代民族学家取得了一致:没有逐利动机;没有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没有省力的原则;以及尤其是,没有任何单独的和明确的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制度。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分配中的秩序又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呢?

主要而言,答案来自两个并非首先与经济相联系的行为原则:互惠(reciprocity)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①对西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岛民(Trobriand Islanders)——他们作为此类经济的一个示例——来说,互惠仅仅在社会的性别组织——即家庭和亲属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再分配主要对所有那些在同一个首领支配下的人发挥作用,从而具有一种地域特征。让我们来分别讨论这些原则。

供养家庭——女人和小孩——是其母系亲属的责任。男人向自己的姊妹及其家庭提供自己收成的最好部分,他的主要收获是得到对他的良善行为的承认,但极少能以此收获什么直接的物质利益;如果他懒惰的话,首先受损的是他的荣誉。互惠原则之运转是为了他的女人和孩子的利益,并由此使他符合社会美德的行为从经济上得到报偿。不管是在他自己园子里,还是在受惠者的仓库里的粮食展示仪式,都会保证他高超的园艺被所有人了解。很明显,这里的园艺和家庭经济成为与出色的持家能力和良好公民身份相关连的部分社会纽带。互惠的宽泛原则既有助于维护生产,又有助于家庭生计。

再分配的原则同样有效。岛上物产的相当部分被村庄头人移交给氏族首领,后者将其储藏起来。由于所有的公共活动都集中于宴饮、舞蹈以及岛民招待其他邻岛上来的邻居的各种场合(在邻居到来时,长途贸易的成果被奉上,根据礼节的规则馈赠和回馈,首领向所有人分发由习俗规定的礼物),储藏系统的极端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从经济上说,它是现存劳动分工体系、对外贸易和公共税收以及防卫储备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的

^① 参照“关于资料来源的笔记”,第277页。马林诺夫斯基和图恩瓦尔德的著作在本章已经被广泛地使用了。

这些功能本身，完全被强烈而生动的仪式体验所吸收，这种仪式体验为整个社会体系框架内完成的每一个行为提供了异常丰富的非经济动机。

51 但是，除非现存制度模式有助于此类行为准则的实施，否则这些行为准则就无法产生效力。互惠和再分配之所以能在没有书写记录和复杂行政管理的情况下保证一个经济体系运转，是因为这些社会的组织结构本身符合适用这种解决方案的要求，这些组织结构包括对称(symmetry)和辐辏(centricity)^①模式。

互惠，由对称性的制度模式而得到极大助益，这种制度模式是各种无文字民族的社会组织的常见特征。我们在氏族^②中发现的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对偶性(duality)”非常有助于个体之间结为成对的关系，并由此在没有永久记录的情况下促进了财物与服务的取与予(give-and-take)。未开化社会中倾向为每个氏族产生出一个“对等单位(pendant)”的部族对分(moieties)现象，其实是起源于也有助于互惠行为的进行，互惠行为是整个体系赖以存续的基础。对这种“对偶性”的起源，人们知之甚少；不过，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每一个沿海村庄似乎都在岛内有一个对等的内陆村庄，这样，面包果和鱼之间的重要交换就能够顺利地得以实现了，尽管这种交换是以取与予并不同时的互赠礼物作为掩饰的。同样地，在库拉贸易交换中，每个个体都在另一个岛上有自己的对等伙伴，并由此将互惠关系私人化到相当程度。要不是对称模式在氏族中、聚落中乃至部族间关系中频繁出现，广泛的互惠关系将变得无法实行，因为后者有赖于相互分离的取与予行为的长期运作。

同样，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所有人类群体中的辐辏型的制度模式，也为财物与服务的收集、贮存和再分配提供了轨迹。一个狩猎部族的成员通常将猎物交给头人来进行再分配。由于狩猎的特殊性质，其产出往往是不规则的，因而就存在着集中猎物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使群体不至于在每次狩猎活动之后就分裂，除了集体分配猎物之外别无他选。不过在所有的实物经济中，都有类似的需要，即使群体的规模比狩猎部落大得多。并且领土的范围越大，物产的差异程度越高，再分配所形成的劳动分工就越有效，因为它必然有助于把地理上分散的生产者群体联系在一起。

对称和辐辏结构既倾向于满足实行互惠和再分配的需要，后两者也反过

① “centricity”直译为“中心性”，不适合作为波兰尼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模式之用，故借助古汉语译为“辐辏”，虽略显生僻，但生动形象，以为佳。——译者注

② 原文为“tribal subdivisions”，即“部族的细分”，这里意译为氏族。——译者注

来有助于前两者的维持；制度模式与行为原则其实是相互调节的。只要社会组织依照既有的轨迹运行，就不需要任何个体经济动机来发挥作用；也不需要担心任何个人不努力；劳动分工会自动地得到保证；经济义务会必然地被履行；并且，最重要的是，在所有公共节日上，充分展示富足的聚会所需要的物质手段都将由此提供。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利润的观念是被禁止的；讨价还价是被谴责的；不求回报地给予(giving freely)被认为是一种德行；人们假想的那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人类秉性不曾出现。实际上，经济制度仅仅只是社会组织的功能。

无论如何也不能由此推断，此类社会经济原则仅仅局限于初民状态或者范围狭小的共同体当中；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不追求获利、没有市场的经济一定是简单的。西美拉尼西亚的库拉圈(the Kula ring)，虽然以互惠原则为基础，却是人类已知的最为精致复杂的贸易形式之一；而再分配曾以庞大的规模出现在埃及金字塔文明中。

特罗布里恩诸岛属于一个大致构成环形的群岛，这个群岛上的大部分人都把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花在库拉贸易活动中。我们将其称为贸易，尽管它并不涉及任何利润，不管是实物形式的还是货币形式的；没有任何货物被囤积或长久占有；享受所收财物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再转送出去；不存在讨价还价，没有物物交换、互相交易^①；而且整个过程都完全是由礼节和巫术来调节的。然而，它确实是贸易，在这个大致呈环形的群岛上土著人会定期进行大型的远航，以便把某种贵重的东西运给居住在顺时针方向上的其他岛屿居民，而另一些远航队的目的则在于把另一种贵重的物品运到位于逆时针方向上的其他岛屿上。从长期看，所有这两类物品——传统制作的白贝壳手镯和红贝壳项链——将会环游群岛，这样传送一圈有时可能要花十年时间才能完成。不仅如此，一般而言，库拉交换中还有个体的交换伙伴，他们互相交换各自的库拉礼物，这些礼物同样是贵重的首饰和项链，如果是从前属于某个地位显赫的人物的东西，则更好。显然，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经过长途运输而有组织地进行贵重物品交换的系统活动恰当地称为贸易。然而这个复杂的系统完完全全是按照互惠原则运转的。涵括数百英里距离、几十年时间，关联成千上万人和数以万计的具有严格个体性物品的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时一空一人的体系，

^① 原文这里仍然是“barter, truck and exchange”，若依前文则依旧译成“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而“互通有无”的意思这里是有的，所以省去，剩下后两个短语。——译者注

53 在没有任何记录和行政管理,也没有任何获利和进行交易的动机的情况下,确实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操控。在此起支配作用的不是交易的自然秉性,而是社会行为中的互惠原则。然而,结果确实是经济领域里令人瞠目结舌的组织成就。的确,考虑下列假设将会饶有趣味:用最先进的市场组织,并以精确的会计核算为基础,看看能不能应付得了这样一个任务——假如有人愿意尝试的话。人们不得不担心的是,那些可怜的商人将会面临无数这样的垄断者,他们买进卖出的都是个体物品,并在每次交易中都附加令人匪夷所思的限制,那些商人将无法获得标准利润,并可能因此选择撒手不干。

再分配也拥有漫长而多姿多彩的历史,这段历史几乎一直持续到现代。从狩猎征程中凯旋的伯格达玛族(Bergdama)男人,采集完块茎、果实或者树叶满载而归的女人,都被预期会将其收获的大部分贡献给共同体所需。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活动的产出被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分享。到这一点为止,起作用的依旧是互惠的观念:今天的给予将会由明天的索取而补偿。但是,在某些部落中,存在着一个中介,即头人或者群体中其他地位突出的人;正是由他接受和分配物品,特别是当物品需要被贮藏时。这正是再分配。很明显,这种分配方式的社会后果是深远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像原始狩猎部落那样民主。不管进行再分配的是一个有影响的家族,还是一个杰出的个体,抑或一个统治性的贵族阶层或者一群官僚,他们通常都会试图通过对物品的再分配来增加自己的政治权力。在夸扣特尔人的夸富宴(the potlatch of the Kwakiutl)上,展现兽皮财富并将其分赠出去这种举动,对首领而言固然是一种荣耀;不过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将受赠者置于一种义务之下,让他们成为他的债务人,并且最终,成为他的扈从。

54 所有大规模实物经济都是在再分配原则的帮助下方才得以运转的。巴比伦的汉默拉比王国,尤其是埃及的新王国,都是以这样一种经济为基础的科层制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在这里,家长制家庭(patriarchal family)的家计经济在一个无限放大的尺度上被复制了,所不同的是,家长制家庭的“共产主义式的”分配被逐级评估所取代,这种分级导致了配给数量的尖锐分化。数目巨大的仓库被用来接收农人生产的产品,不管他们是牧民、猎人、面包师、酿酒师、陶工、织工还是别的什么人。这些产品被详细登记,并且——只要它们不被就地消费——被不断地从小仓库转移到大仓库,直至法老朝廷所在的行政中央。在那里,有分别贮藏布料、艺术品、装饰品、化妆品、银器和戏装的各个储宝室,也有巨大的粮仓、军械库和酒窖。

但是金字塔建造者所实践的大规模的再分配,并不仅仅存在于没有货币的经济中。实际上,所有的古老王国都用金属货币来支付税收和薪金,但其他的支付都用各种粮仓和货仓中的实物完成。正是通过这些仓库,他们分配各种各样的物品,以供使用和消费,这种分配主要针对人口中的非生产者,即官员、军人和有闲阶级。这种制度在古代中国、印加帝国、印度诸王国,以及同样在巴比伦都被施行过。在这些和其他众多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文明中,一种精细的劳动分工就是从再分配机制中生发出来的。

在封建状况下,这个原则也仍然有效。在非洲种族分层的社会中有时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处在较高等级的是牧民,他们散居在仍旧使用掘杖或者锄头的农耕者中,牧人所收集到的礼物主要是农产品——诸如谷物和啤酒——而他们分赠出去的礼物则主要是动物,特别是绵羊或山羊。在这些情况中,社会的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着劳动分工,尽管通常是不平等的分工:分配可能通常掩盖了一定程度的剥削,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共生关系对两种等级的生活水平都有好处,这种好处源自改进了的劳动分工。从政治上说,这是一些处于封建统治之下的社会生活,不管特权价值之所在是牲畜还是土地。“在东非,普遍存在着牲畜采邑,”图恩瓦尔德(Riccard Thurnwald)——我们在再分配问题上紧紧追随着他——由此认为,在每一个地方,封建主义都意味着一个再分配的制度。但只有在非常先进的条件下,在非常例外的环境中,这个制度才会像在西欧所表现的那样,变得以政治作为压倒性的主要性质,在西欧变异起自封臣们对保护的需要,礼物由此变成了封建的纳贡。

这些例子表明,再分配反过来也倾向于将经济制度本身融入社会关系当中。我们发现,一般而言,再分配的过程形成了当下政体的一部分,不管这种政体是部族的,城邦的,专制的,还是以牲畜或土地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的。财物的生产和分配主要是通过集中、贮存和再分配来组织的,这种模式的焦点在首领、僧侣、僭主或者领主身上。由于领导群体和被领导者的关系根据政治权力依赖的基础各不相同,所以再分配原则所涉及的个人动机也大异其趣:可以是猎人对猎物的自愿分享,也可以是古埃及农民(fellaheen)对拒绝上缴实物税带来的惩罚的恐惧。

在以上叙述中,我们有意忽略了同质的和层化了的社会之间的至关重要的区别,也就是说,忽略了总体上整齐划一的社会与分化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之间的差别。尽管奴隶和主人之间的地位差异与某些狩猎部落那些成员的人人自由而平等有着天壤之别,并且相应地,两种社会的动机之间也相去

甚远,但经济制度的组织依然可以基于同样的原则,纵使与经济制度纠缠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的差异使得伴随着这种原则的文化特征极为不同。

第三个原则——注定要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并且我们称之为家计(householding)的原则——即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希腊人称之为家计(conomia),也正是“经济(economy)”这个词的字源。只要把民族志的记录列入考虑,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为个人或群体自身需要的生产比互惠和再分配要来得更古老。相反,在这个主题上的正统教条和某些相对晚近的理论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所说的那种为自己或家庭而采集食物及捕猎的个体主义的野蛮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实际上,为自己家庭之需而备办食物仅仅是在更为先进的农业阶段才成为经济生活的一个特征;但即使在那时,这种特征也与逐利动机和市场制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此,经济组织的样式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尽管形成一个自给自足单元的是家庭、村落或者庄园等非常不同的统一体,原则本身却是不变的,即为满足群体成员的需要而生产和贮藏。这个原则的实际运用方式,既可以是互惠,也可以是再分配。制度核心本身的性质并不重要:既可以像家族长制那样以血缘^①为核心,也可以像村落那样以地域为核心,还可以像诸侯庄园那样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群体的内部组织也不重要:它既可以像罗马家庭(familia)那样专制,也可以像南斯拉夫庄园(zadruga)那样民主;可以像卡罗琳王朝要人们的领地那样广大,也可以像西欧的普通农家那样微小。对交易或市场的需要并不比对互惠或再分配的需要更大。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试图当做典范来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家计经济。站在正在迅速回落的世界性市场经济浪潮的顶点上往回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政治学》(Politics)的导论一章中对家计和获利(money-making)的著名区分,很可能是社会科学领域迄今为止最具预言性质的贡献;它也肯定依然是对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的最好分析。亚里士多德坚持把为使用而生产——不同于为逐利而生产——作为家计经济的本质;不过他也指出,为市场而进行的附带性生产并不必然会破坏家计经济的自给自足,只要作为经济作物的牲畜或谷物还是产自以家计为目的的农地;对剩余产品的出售并不必然会摧毁家计经济的基础。只有像他这样富于常识智慧的天才能够断言,逐利是在为市场而进行生产时所特有的一种动机;只有他才能意识到,货

^① 原文是“sex”,直译为“性”,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其意译为“血缘”。——译者注

币因素会把一种全新的元素引入生产之中,然而与此同时,只要市场与货币仅仅只是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中的附属,那么为使用而生产的原则就仍可照常运行。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尽管他没能认识到在整个希腊经济已经依赖于大宗贸易和借贷资本的时候,忽略市场的存在是多么不现实。因为在同一个时代,狄勒斯(Delos)和罗德斯(Rhodes)已经发展成为货运保险、海上借贷以及汇兑银行业的商业中心,与之相比,一千年后的西欧实实在在只是一幅蛮荒景象。而乔伊特(Jowett),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的院长,大谬不然地认为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会比亚里士多德更深入地理解家计经济与逐利经济之间的区别。他这样为亚里士多德开脱:“与人性相关的各种知识是相互冲突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很难对它们作出明确区分。”确实,亚里士多德不曾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分工的深远意涵,也没能认识到它与市场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认清货币作为信用和资本的作用。到此为止,乔维特的责难都是对的。但对逐利的人性意涵迟钝不敏的,恰是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而不是亚里士多德。他没能认识到,在使用的原则与逐利的原则之间所作的区分,正是理解我们这个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关键所在。亚里士多德早在这个文明到来的两千年前,仅仅根据他能接触到的市场经济的原始基质(rudiments),就准确地预告了它的轮廓;而乔维特,尽管有一个已经完全盛开的(full-blown)样品摆在眼前,却对这个文明视而不见。实际上,当亚里士多德把为逐利而生产的原则斥为“违反人类本性”、无所节制的时候,他已经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即一个在所有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受到种种自然限制的经济动机已经从中分离出来了。

57

宽泛而言,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这些原则在特定社会组织结构的帮助下得到制度化,这些组织结构的模式包括对称、辐辏和自给自足(autarchy)。在这个框架中,财物的有序生产和分配是由通过普遍的行为准则规训过的各种个人动机来保证的,在这些动机中,逐利动机并不突出。习俗和法规、巫术与宗教相互协作,共同引导个体遵从一般的行为准则,正是这种行为准则最终保证他在经济体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希腊—罗马时代,尽管有高度发达的贸易,却并不代表在这方面有例外;它的特征是巨大规模的再分配:罗马行政当局的做法是在一种具有家计性质的经济上进行的大规模粮食再分配。它并不构成以下规则的例外: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市场不曾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盛行的是其他种类的制度模式。

58 自 16 世纪之后,市场变得既有规模又有重要性。实际上,在重商制度下,它们成为政府的首要关注对象;不过那时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市场将会控制人类社会。恰恰相反,规制和管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格;连自发调节的市场这样一个观念都是没有的。为了理解面向 19 世纪那种全新的经济类型的突然转向,我们现在必须转而去考察市场的历史,本来,在回顾过去各种经济制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将这种机制忽略掉的。

第五章 市场模式的演进

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扮演的支配角色,以及交换或者交易在该经济中的基本重要性,要求我们对市场的性质和起源作细致的探究——如果我们想要摒弃 19 世纪的经济迷信的话。^① 59

交换和交易^②是这样一种经济行为的原则,它的有效性有赖于市场模式的存在。市场就是人们为了交换或者为了买卖而汇聚的场所。除非这样一种模式已经存在,至少是局部地存在,否则交换的秉性就无法找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它无法产生价格。^③ 因为如同互惠要依靠对称式的组织模型,再分配由辐辏结构得到助益,家计模型必须以自给自足作为基础一样,交换原则的有效性有赖于市场模式。与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可能在社会中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相同,交换的原则同样可以在一个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而由其他原则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然而,在某些其他方面,交换的原则并不与其他三个原则相对等。与这个原则相联系的市场模式,与对称的、辐辏的和自给自足的模式相比,有其特殊之处——后三者仅仅是“特征(traits)”,并没有创生出仅为某一种功能而设计的制度。对称不过是一种社会学安排,并没有产生分殊的制度,仅仅只是把已经存在的制度进行配对(不管是一个部族还是一个村庄被加以对称性地配对,都不涉及明确的制度的产生)。而辐辏模式,尽管经常创生明确的制度,却并 60

① 参见关于资料来源的笔记,第 280 页。

② 再一次地,这里原文是“barter, truck and exchange”三词并列,为了方便行文和读者的阅读,我们只译作“交换和交易”。——译者注

③ Hawtrej, G. R., *The Economic Problem*, 1925, p. 13. “个人主义原则的实际可行性完全有赖于交换的实践。”但是,Hawtrej 错误地以为市场的存在仅仅是交换实践的产物。

未暗含一种动机,这种动机的作用是将产生的制度挑出来以便执行一种特定功能(例如,一个村庄的头人或者一个中央官员可能肩负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或者经济的等等多种不加区分的功能)。最后,经济的自给自足仅仅是一个既存的封闭群体的附属特征而已。

而在另一方面,与一种自身特有的动机——交换或交易的动机——相联系的市场模式,是能够创生一种特定制度的,这种制度就是市场。从根本上讲,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存续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结果。因为一旦经济体系通过分立的、以特定动机为基础并被授予特殊地位的制度来运转,社会就必须以使该体系得以根据自身的法则运转的方式来形塑自身。这正是人们熟知的那个断言的意涵: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

把相互孤立的市场转变成整个的市场经济,把诸多被规制的市场转变成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这样一个步骤确实具有关键意义。19世纪——不管是把这个事实作为文明的顶峰加以欢呼,还是把它作为癌变发展而感到惋惜——天真地认为,这样一种发展是市场扩张的自然结果。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诸市场之链合为一个具有无穷力量的自发调节的体系,并不是它们要发生癌变的内在倾向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而是被植入社会机体的高度人为的刺激物所产生的效应,而出此下策的动机则是为了应对由机器这种同样人为的现象所引发的情势。同样地,人们并没有认识市场模式所具有的这种有限的和非扩张性的本质;不过,带着令人信服的清晰性从现代研究中脱颖而出的正是这一事实。

61 “市场并非随处可见;它们的缺乏,尽管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孤立和隔离,却与任何特殊的发展无关,正如我们同样无法从它们的存在推论出什么。”这个从图恩瓦尔德的《原始社会中的经济》中挑出来的毫无偏向的句子,很好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现代研究所得到的重要成果。另一个作者从货币方面重复了图恩瓦尔德关于市场的论断:“仅仅通过使用货币这一事实,并不能将一个部落从经济上与处于同等文化水平上的不使用货币的其他部落区别开来。”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指出这些论断的一些更为特殊的意涵而已。

市场或货币的存在或缺席并不必然会影响到一个原始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否定了那个19世纪的神话(myth):货币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发明,它

将通过市场的形成改变社会面貌,推动劳动分工的步伐,释放人类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自然秉性。实际上,正统的经济史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无穷夸大市场重要性的基础之上的。其实,从市场的缺席中所能正确推导出来的唯一经济特征只是“某种程度的孤立”或者一种“自我封闭的趋势”;就一个经济的内部组织而言,它们的存在还是缺席并不必然意味着任何差异。

原因很简单。市场并不是主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而是在其外部运转的制度。它们是远距离贸易的汇聚场所。地方市场本身的重要性微不足道。而且,不管是远距离贸易市场还是地方市场,本质上都不是竞争性的,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种市场都不会造成区域贸易,即所谓国内市场或者全国性市场的压力。这些论断中的每一个都是对被古典经济学家当做公理来运用的某些假设的沉重打击,可是它们全都非常严格地符合现代研究所发现的事实。

确实,事实的逻辑几乎与古典经济学说完全相反。正统教义的起点是个体交换的秉性;从这种秉性推导出地方市场和劳动分工的必然性;然后,推导出贸易,最终甚至包括远距离贸易在内的对外贸易的必然性。就现有知识来看,我们几乎应该倒转这一推理的次序:真实的起点是远距离贸易,它是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据此形成的地域分工的结果。远距离贸易经常会产生各种市场,不仅包含着以物易物,并且如果使用货币的话,它还包含买和卖,这样,最终,但在任何程度上也不是必然地,为某些个体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沉浸在那种他们所谓的讨价还价的秉性之中。

这个学说的支配性特征在于,贸易的起源存在于同经济体的内部组织无关的外部领域之中:“运用在狩猎民族中观察到的从住地范围之外获取货物的原则,导致了后来我们视为贸易的某些形式的交换。”^①在寻找贸易的起源时,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在像狩猎社会那样的远距离获取货物的活动中。“澳大利亚中部的迪埃里人(Dieri)在每年的七月或八月,都会进行一次朝南方向的远征,目的是获取用来涂染自己身体的红色赭石……他们的邻居彦楚温塔人(Yantruwunta),也组织起同样的探险队来猎取红赭石以及用来给草籽脱壳的砂岩石片,目的地在800公里之外的弗林德思山。双方都需要通过战斗才可能得到想要的物品,如果当地人抵制他们的企图的话。”很明显,此类猎宝探宝与强盗和海盗有相似之处,也与我们通常认为的贸易具有相似之处:尽管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单方面活动。但它也能变成双方面的,即“某种形式的

62

^① Thurnwald, R. C., *Economics in Primitive Communities*, 1932, p. 147.

交换”，这往往是通过强者向过往路人勒索的形式实现的；或者像在库拉圈、西非的彭维人(Pengwe)的访问聚宴，或者像库佩尔人(Kpelle)那样由首领通过盛情款待所有客人来垄断对外贸易，通过互惠的安排而形成。确实，这样的来访并不是顺便进行的，而是——用我们的术语，而不是用他们的话来说——真正的贸易旅行；但是，货物的交换永远是在互惠赠礼——并通常通过回访的方式——的伪装下进行的。

我们达到的结论是，尽管人类社会似乎从未完全放弃进行对外贸易，但这些贸易并不必然涉及市场。就其起源而言，对外贸易的性质更接近于冒险、探险、狩猎、海盗和战争，而不是以物易物。对外贸易可能既不意味着双边性，也不意味着和平，即使它具有这种意涵时，也通常是在互惠而不是以物易物的原则下组织起来的。

63 向和平的以物易物的转变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追溯，即以物易物的方向与和平的方向。如上所述，一次部族远征可能不得不遵从目的地的强者所设定的条件，后者可能会向这些外来者索要某种对等物；这样一种关系，尽管并不完全是和平性质的，却可能导致物物交换的出现——即从单方面的获取转变为双方面的获取。另一种发展的路径是类似于非洲丛林中的“默契交易(silent trading)”，即通过一种有组织的休战来避免打斗的风险，就这样，和平、信任和信用的要素就被谨慎地引入了贸易当中。

众所周知，在后来的阶段中，市场在对外贸易组织中取得了支配地位。但从经济角度看，外贸市场与地方市场或国内市场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们的区别不仅在于规模，而且是功能和起源都不相同的制度。对外贸易是一种贩运；关键在于该地缺少某些种类的货物；英国的羊毛与葡萄牙的酒之间的交换就是一个例子^①。地方贸易则局限于当地的一些货物，这些货物很难运输，因为它们要么太笨重，要么太庞大，要么太容易腐烂。因此无论对外贸易还是地方贸易都与地理距离相关，后者限于不能克服这种距离的那些货物，前者则限于能够克服这种距离的货物。此种类型的贸易被正确地描述为互补性的。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地方性贸易，不同气候带之间的对外贸易，都基于这个原则。这样的贸易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并且如果竞争有可能打乱贸易进程，那么消除竞争的努力就不会显得奇怪了。与对外和地方贸易相反，国内贸

^① 这个例子在经济学史上非常著名，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曾分别用它来说明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原理。——译者注

易在本质上则是竞争性的：除了互补性的交换之外，它更包含了不同来源的同类货物在一起相互竞争的大量交易。相应地，只有在对内贸易或国内贸易出现之后，竞争才倾向于成为贸易的普遍原则。

这三种经济功能差异悬殊的贸易类型的区别也体现在它们的起源上。我们已经叙述了对外贸易的起源问题。在贩运者不得不略作逗留的地方，譬如浅滩、海港、河源，或者两条陆地运输路线的交会处，市场都会非常自然地产生出来，而“港口”则会在那些转运的地方发展起来。^① 欧洲著名的定期贸易会（fairs）的短暂兴盛就是远距离贸易产生特定类型的市场的又一例证；英格兰的贸易中心镇（staples）也是一例。不过尽管定期贸易会和贸易中心镇的再次消失让教条的进化论者仓皇失措，但这些市集（portus）却注定要在西欧城镇的兴起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即使是在那些建立在对外贸易市场旧址上的市镇，地方市场通常也保持着独立，不仅在功能上，也在组织上。无论是港口还是定期贸易会或者贸易中心镇，都不是国内市场或全国性市场的前身。那么，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它们的起源呢？

64

或许这种假定看起来很自然：假如个体倾向于进行交换，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导致地方市场的形成，并且这些市场一旦存在，就会同样自然地导致国内市场或全国市场的建立。可是，以上两种推论无一属实。只要所在社会中占优势的是其他经济行为原则，交换或交易的个体行为——此乃明显存在的事实——一般而言并不导致市场的形成。个体交换行为在几乎所有初民社会中都很常见，但它们是当成附带的东西，因为它们并不能提供生活必需品。在古代巨大的再分配体系中，交易行为和地方市场都是常见的，但总是只具从属性的现象。在互惠原则占主导地位的场所，情况也是如此：在这里，交易行为通常是嵌入在包含着信任和信赖的长期关系之中的，这种关系往往能消除交易的对立性。从社会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这种限制性因素：习俗与法律、宗教与巫术都能达到限制交换行为的目的，使交换行为局限于特定的个人和货物、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一般而言，交易者完成的仅仅是这样一种交换：不仅交换的对象，而且交换对价^②的数量都早已给定。提克匹亚（Tikopia）语中的兀突（Utu）^③指的就是互惠交换中根据传统而来的这样一种

① Pirenne, H., *Medieval Cities*, 1925, p. 148(footnote 12).

② 原文是“equivalent”，通常译作“等价”，这里从文意脉络译作“对价”。——译者注

③ Firth, R., *Primitive Polynesian Economics*, 1939, p. 347.

对价。交易中的自决要素和自由的讨价还价——对 18 世纪思想来说这是交换的本质特征,能够将交换动机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只有零星的体现;纵使这种动机潜伏在交换过程之中,它也极少被允许浮现出来。

65 其实通常的行为方式是表现出相反的动机。给予者可能仅仅只是把物品遗落在地上,而接受者则会假装偶然地拾起它,甚至只是让其扈从来替他做此事。细加审视对价物,这是最不合礼俗的行为。正如我们有充足理由所相信的那样,这种谙于世故的态度并不是由于人们对交换的物质方面真的缺乏兴趣,相反,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种交换的礼节:它是为限制这种交换的范围而设计出来的一种抵抗性的(counteracting)措施。

确凿无疑的是,从已有的证据看,断言地方市场曾发源于个体的交换行为是一个很轻率的举动。尽管人们对地方市场的起源了解甚少,但作下述判断是有把握的:从一开始,这一制度就被一系列防护措施加以隔离,以保护社会中的主要经济组织免受市场活动的干扰。市场的和平存在是以各种仪式和礼节作为代价的,这些仪式和礼节一方面限制了市场的规模,另一方面保证了市场能够在给定的狭窄空间中运转。实际上,市场最为重要的成果——城市和城市文明的诞生——恰恰是某种悖论性发展的产物。因为,城镇,作为市场的衍生物,不仅仅是市场的保护者,同时也是阻止它们向乡村扩张,防止它们侵蚀社会主要经济组织的手段。“容纳(contain)”这个词的两层意思也许最为贴切地表达了城镇的这种双重功能:它既屏护了市场,又阻止了市场的发展。

如果说交易行为的周围环绕着各种禁忌,以便阻止这种人类关系侵害经济组织本身的各种功能的话,那么市场所受到的戒律控制则要更加严格。这里有一个来自扎伽(Chaga)国的例子:“在举行集市的日子里,必须定时巡查市场。如果有任何事件导致一天或几天不能开市,那么生意就不能恢复,一直到市场(market-place)被净化为止。……在市场上发生任何流血的伤害事件都要求立即予以偿赎。从那一时刻起,任何女人都允许离开市场,而且不能触碰任何货物;货物必须先被清洁,然后才能被运走和食用。至少需要有一只山羊立即作为牺牲。如果一个女人生了小孩或者发生流产,那就需要举行更昂贵和更严肃的偿赎仪式。在这种情况下的牺牲一定要用产乳的动物才行。不仅如此,头领的宅地必须用作作为牺牲的奶牛的血加以净化。乡间所有的女人都必须像这样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通过播洒牺牲的血得以净化。”^①正是

66

① Thurnwald, R. C., 如前书, pp. 162—164.

像这样繁杂的规矩使市场的扩张十分困难。

典型的地方市场是这样的：家庭主妇从中获取部分日常所需，粮食和蔬菜的种植者、地方上的手艺人则在其中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一般都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这样的地方市场见于各个时代、各个地区。此类集市不仅在初民社会中十分常见，而且直到18世纪中叶仍旧以几乎不曾改变的面貌存留于西欧最为先进的国家中。它们乃是地方生存(local existence)的附属物：不管是作为中非部落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作为梅罗维京时代的法兰西(Merovingian France)城市(cité)，或者亚当·斯密时代苏格兰村庄的一部分，它们都大同小异。不但村庄情况如此，城镇情况也一样。从本质上说，地方市场是邻里市场，并且尽管对社区生活十分重要，它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显示出将当时主导的经济体系化约为它自己的模式的迹象。它并不是国内或全国贸易的起点。

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直到商业革命(Commercial Revolution)时代，对我们而言似乎是全国性贸易的那些活动其实并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地方性的。汉泽同盟(the Hanse)其实并不是由德国商人组成的，它们是一个由贸易寡头组成的法人团体，其成员来自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城镇。汉泽同盟所做的远非将德国经济生活“国家化”，而是有意将内地从贸易中撇掉。安特卫普或者汉堡、威尼斯或者里昂的贸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荷兰或者德国、意大利或者法国。伦敦也不例外：它属于“英国的”成分就像鲁贝克(Luebeck)属于德国的一样少。这个阶段的欧洲贸易地图仅仅通过城镇来表示，乡村处在空白之中——就有组织的贸易而言，乡村存不存在都没什么不同。所谓的国家在当时仅仅是非常松散的政治单元，它在经济上是由无数大小不一、自给自足的家庭和乡村中不起眼的地方市场组成的。贸易局限于有组织的城镇，这些城镇要么组织起邻里性的地方贸易，要么担负起远程贸易——这两者之间被严格区分，并且任何一个都不允许渗入周围的乡村之中。

对进化论者而言，城镇组织中地方贸易与远程贸易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隔绝一定又是一次沉重打击，因为在他们看来，事物看起来总是那么易于发展成另一种状态。尽管如此，这一特定事实构成了理解西欧城市生活的社会史的关键。它强有力地支持我们对市场起源的判断，该判断来源于我们依据初民社会的状况所做的推测。地方市场和远程贸易之间的鲜明区分看起来似乎太过严格了，特别是当它使我们得出以下这个多少让我们有些惊讶的结论时：不管是远程贸易还是地方贸易，都不是现代国内贸易的起源。这很明显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转而依靠国家干预这样一个“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

来提供解释。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在这方面,晚近的研究同样也证实了我们的结论。不过,还是让我们先略微勾勒一下城市文明史的轮廓吧,看看它是怎样在中世纪城镇内由地方性贸易和远程贸易之间的彻底隔绝而形成的。

实际上,这种隔绝乃是中世纪城市制度的核心。^① 城镇是市民的组织。只有他们才有市民权^②,而且整个体制正是建立在市民与非市民的区分之上的。自然,不管是乡村里的农民还是其他城镇来的商人,都不是市民。尽管城镇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可以对付周遭的农民,但这种权威却无法适用于外来商人。结果是,市民们发现自己在与地方贸易和远程贸易的两种关系中分别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

在食物供给方面,城市的管制办法包括强制性公开交易并且杜绝中间商贩,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控制贸易并平抑价格。但这样的规制只能有效应对城镇与其周围乡村之间的交易。在远程贸易方面,情况完全不同。香料、咸鱼或者酒类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运送过来,并由此处于外来商人的掌控之下,通过他们资本主义式的大宗批发来销售。此类贸易处在地方管制之外,城市居民所能做的仅仅是尽可能地在这种贸易排除在地方市场之外。完全禁止外来商人从事零售活动这项措施,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主义式的批发数额越大,进口货物就越严格地被排除在地方市场之外。

在工业产品方面,地方贸易和远程贸易之间的分殊更加彻底,因为在这里,出口生产的整个组织都被牵涉其中。缘由在于工业产品的生产得以组织起来的手工行会的性质本身。在地方市场上,生产是根据生产者的需求而得以调节,以便把生产限制在一个获利较为丰厚的水平上的。这个原则自然不能用在出口生产上,因为在出口生产中生产者的利益并不会对生产施加任何限制。因此,一方面地方贸易被严格管制,另一方面出口生产只是在形式上受行业公会的控制。那个时代的主导出口行业,即纺织品贸易,实际上就是以资本主义工资劳动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将地方贸易日益严格地区别于出口贸易,乃是城市生活面对流动资本威胁所产生的反应,后者有可能打乱城镇制度。典型的中世纪城镇并非试图通过弥合可控的地方市场与变幻莫测、无法驾驭的远程贸易之间的鸿沟来摆脱这种危机,而是相反,通过推行最严格的排斥和保护政策来应对危机:这是它

^① 我们的阐述乃是基于 H. Pirenne 的诸本知名著作。

^② “citizenship”通常译作“公民权”,这里根据文意脉络译作“市民权”。——译者注

生存的理由。

就实践而言,这意味着城镇会尽可能树立障碍来阻遏资本主义批发商渴望的那种全国性市场或国内市场的形成。通过努力维持非竞争性的地方市场和存在于特定城镇之间的、同样非竞争性的远程贸易,市民们竭尽全力阻止乡村融入贸易范围以及城乡之间的贸易开放。正是这种发展情势迫使各地政府不得不出面,促成市场“国家化”以及充当国内贸易的创造者。

在15和16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有计划地将商业制度强加于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城镇和公国头上。通过打破横在地方性贸易和城市间贸易这两种非竞争性的商业之间的隔阂,重商主义摧毁了这两种贸易所体现的特殊化,并由此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扫清了道路,这种全国性市场日益消除了城镇与乡村之间以及众多的城镇之间和省份之间的差别。

69

实际上,重商主义是面对诸多挑战的一个反应。从政治上说,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这一革命将西方世界的重心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并由此迫使农业大国中的落后人民组织起来从事商业和贸易。对对外政治来说,主权的兴起是时代的需要;相应地,重商主义治国术所包含的乃是:整合整个国家领土内的资源,为国家的对外竞争提供力量。对对内政治来说,把被封建的和地方排他主义所分割的国家统一起来乃是这种努力的必然产物。从经济上说,统一的工具是资本,即通过货币贮存方式而方便运用的私有资源,这特别适用于发展商业。最后,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所依赖的行政管理技术,恰恰来自于传统城镇制度向范围更大的国家疆域的扩展。在法国,由于手工业行会(craft guilds)的逐渐变成国家机构的倾向,行会体系向整个国家领域延伸;而在英国,设防的城镇的衰败导致行会体系被致命地削弱了,所以乡村在没有行会监督的情况下进行了工业化。两国的相同点在于,商业和贸易扩展至整个国家疆域,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正是这种情势成为重商主义对内贸易政策的起源。

将贸易从特许城镇的范围限定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干预,现在要应对两个密切相关的危险,而这两个危险是先前的城镇早已成功应对了的——垄断与竞争。早在那个时代,人们就已经很好地理解了这条真理:竞争最终必然导致垄断;而那时人们对垄断的恐惧更甚如今,因为它往往关系到生活必需品,并由此很容易膨胀为对共同体的致命威胁。对经济生活的全方位管制——只是这一次是在全国,而不只是城镇水平上——就成为唯一可行的疗救方案。在现代人看来,这也许是排斥竞争的短视行为,然而实际上,它是在给定条件下

70 维护市场运转的必要手段。因为在市场中,任何买方或卖方的临时性侵扰都会破坏既有平衡,使常规的购买者和售卖者受挫,导致的结果就是市场停止运转。先前的供给方因为不能肯定其货物是否能够获得一个好的价格,所以他们就会停止提供货物,而一个没有充足供给的市场将会变成垄断者的牺牲品。在相对较弱一点的程度上,同样的危险会出现在需求一方,因为需求的快速回落也会导致需求的垄断。随着国家对特殊限制、通行税费和流通禁令的废除,既有的有组织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也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不受节制的竞争和闯入者的入侵,他们闯进市场只为了“捞一票”,却不提供任何持久的承诺。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新产生的全国性市场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性的,然而起主导作用的仍是“管制”这样一种传统特征,而不是“竞争”这样一种新元素。^① 为生存而辛劳的农民自给自足的家计依旧是经济体系的广泛基础,尽管这种经济体系经由国内市场的形成而被整合进庞大的国家单元之中。这时的国内市场与地方市场和国外市场鼎足而立,并且部分重合。农业现在通过国内商业——一组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而得到增补,这一体系完全能够与乡村中占主导的家计经济原则相兼容。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直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市场的历史的概览。正如我们所知,人类历史(在此之后)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就是试图建立一个巨大的自发调节的市场。然而在重商主义这个西方民族国家所特有的政策中,没有任何成分预示了后来这样一种独特的发展。重商主义对贸易的“解放(freeing)”仅仅是将贸易从排他主义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扩大了管制的规模。经济制度仍然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着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

^① Montesquieu, *L'Esprit des lois*, 1748. “英国束缚商人,但支持商业。”

第六章 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 劳动力、土地与货币

我们对经济体系和市场发展脉络分别进行的简单勾勒已经表明，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中的，并且无论经济活动中主导性的行为原则是什么，我们发现市场模式都能与这种原则相容。我们不曾发现，市场模式所体现的交易或交换的原则有压制其他原则而独自扩张的倾向。在市场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地方——即在重商主义的情况下，它们也是兴盛于集权的中央管理者的控制之下，这种中央管理者的专断范围是如此广泛，从农民的家计到国民生活都被囊括其中。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的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只有在这些事实的烛照下，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那些构成市场经济之基础的、非同寻常的假定。

71

市场经济是一种仅仅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被委托给了这个自发调节的机制。这种类型的经济源自这样一种预期：人类以获取最大的货币所得为目标而行动。它假定：在特定价格下，市场中可得的货物（或劳务）与在该价格下的需求相等。它还假定货币的存在，并在其持有者手中作为购买力而发挥作用。由此，生产将被价格所控制，因为指导生产的那些人所能获得的利润依赖于价格；货物的分配也依赖于价格，因为价格形成收入，而只有在这些收入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货物才得以在社会成员间分配。在所有这些假定都被满足的情况下，货物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就能单独由价格而得到保证。

72

自发调节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以在市场上出售作为目的，而所有的收入

都来源于这种出售。相应地,就存在着关于所有工业生产要素的市场,不仅有关于货物(总是包括劳务)的,同样有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它们的价格分别被称为物价、工资、地租和利息。这些术语本身就表明收入来源于价格:利息是使用货币的价格,它形成了那些贷款提供者的收入;地租是使用土地的价格,它形成了土地提供者的收入;工资是使用劳动力的价格,它形成了劳动力出卖者的收入;最后,物价成为那些提供了企业服务的人的收入所得,被称作利润的收入实际上是两组价格的差额,即生产出来的货物的价格与其成本——即生产它们所必需的货物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那么所有的收入都将源自市场上的出售,而收入也将完全能够购买生产出来的所有货物。

由此产生与国家及其政策有关的进一步假设。对市场的形成构成阻碍的任何事物都必须被严格禁止,也不能允许收入通过市场销售之外的任何其他渠道获得。任何通过调整价格来改变市场状况的干涉行为都必须被禁止,不管这里的价格是关于货物、劳动力、土地,还是货币。由此,不仅必须存在关于所有工业生产要素的市场^①,而且将会影响这些市场运作的任何措施或政策都必须被否定。不管是价格、供给,还是需求,都不能被固定或管制。只有这样一些政策和措施才是适宜的:通过创造有助于市场成为经济领域唯一的组织力量的各种条件,保证市场的自发调节。

73 为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暂时回到重商主义以及全国性市场迅速发展起来的那段时期。在封建主义和行会制度下,土地和劳动力形成社会组织本身(那时货币尚未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元素)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封建秩序的轴心要素,乃是军事、司法、行政和政治体系的基石;其地位与功能由法律和习俗规范所决定。土地所有权能否转让;如果能,转让的对象是谁、要受到什么限制;其中包含什么样的财产权利;某些类型的土地可以派什么用途——所有这些问题都被移出买卖的组织之外,并被置于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制度控制之下。

劳动力的组织状况也是一样。在行会制度之下,与从前所有经济体系中的情况一样,生产活动的动机和环境是嵌入社会的一般组织之中的。师傅、熟练工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同业关系,学徒的数量,以及工人的工资等所有这些

^①Henderson, H. D., *Supply and Demand*, 1922. 市场的功能是双重的:要素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以及对影响要素总供给的各种力量的组织。

都是由行会和城镇的规章和习俗规定的。重商主义所做的不过是将这些规定统一起来,统一的方式或者是像英国那样通过颁布法规来实现,或者是像法国那样通过将行会“国家化”来实现。至于土地,只有在与地方特权发生关系时,其封建状态才被彻底废除;在其他情况下,土地仍旧是不准买卖的(*extra commercium*),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情况都是如此。直到1789年大革命之时,地产仍旧是法国社会特权的来源,甚至在那之后的英国,关于土地的普通法本质上还是中世纪性质的。重商主义,尽管以尽其所能地推进商业化著称,却从未试图将生产的两种基本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变成商业活动的客体,也从未攻击过相关的保护措施。在英国,通过《工匠法》(*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1563)和《济贫法》(*the Poor Law*)(1601)实现的劳工立法的“国家化”使劳工脱离了危险境地,而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圈地政策则是反对将土地财产作为获利之用的持久努力。

重商主义,无论其如何高调地坚持把商业化作为一项国策,却以与市场经济截然相反的方式理解市场。重商主义的这一面最集中地体现于它在工业中极大地扩展国家干预的这一举措中。在这一点上,重商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戴着王冠的计划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中央集权的官僚与保守的排他主义者之间并无区别。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管制的手段:行会、城镇和地方省份求助于习俗和传统的力量,而新兴的国家权威则偏爱法律和训令。但他们都同样反对将劳动力和土地商业化——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行业公会和封建特权在法国直到1790年才被废除;在英国,《工匠法》直到1813—1814年才被取消,而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创立的《济贫法》的取消要等到1834年。无论两国中的哪一个,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之前,还未曾有人提及建立一个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议题;而经济生活的自发调节的观念更是完全超出了那个时代的视野。重商主义者关心的是发展国家的资源,包括通过贸易和商业实现的充分就业;土地和劳动力的传统组织方式在他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这方面远离现代观念的程度并不亚于其在政治领域——他们没有任何民主倾向,而是信仰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开明君主的统治——远离现代的程度。就像朝着民主体制和代议政治的转变是对时代潮流的彻底逆转一样,18世纪末从被规制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

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必须把社会制度性地分离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实际上,这样一种二分法不过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重申了一个自发调节市场的存在。也许有人会提出,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存在于所有时代的任何社会。

然而,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论断。的确,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在缺少某种保证货物生产和分配秩序的体制的情况下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存在与社会其他部分相分离的经济制度;通常而言,经济秩序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前者寓于后者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管是在部族的、封建的还是重商主义条件下,社会中都不存在一个分离的经济体系。19世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活动被孤立出来并归于一种独特的动机——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转折点(singular departure)。

除非社会以某种方式屈从于它的要求,否则这样一个制度模式就不可能运转。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市场社会中。我们是通过对市场模式的一般分析达到这个结论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给出这个论断的具体论证了。市场经济必须囊括工业生产所需的所有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市场经济中,货币也是工业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货币之纳入市场经济将会产生影响深远的制度后果。)但劳动力和土地只不过是构成社会的人类本身和社会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将它们囊括进市场机制就意味着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

我们现在可以以更具体的方式分析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对社会构成的威胁。首先我们将描述市场机制用以控制和指导工业生活实际要素的手段;接下来,我们将努力把握这样一种机制对社会——此时社会已经屈从于这种机制的掌控之下了——产生的影响的性质。

只有借助商品(commodity)概念,市场机制才得以适合(g geared to)工业生活的诸多要素。在这里,商品被经验性地界定为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出来的物品;而市场则同样被经验性地定义为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实际接触。相应地,工业的每一种要素都被认为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成为与价格相互影响的供求机制的操控对象。从实践来讲,这意味着必须存在关于每一种工业要素的市场;在这些市场中,这些要素的每一种都被组织成一个供给组和一个需求组;每一种要素都有一个与供求状况相互影响的价格。这些市场——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相互勾连,形成一个总市场(One Big Market)。^①

关键就在于: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是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同样必须

^① Hawtrey, G. R., op. cit. 在霍特里看来,这个总市场的作用在于使得“所有商品的相关市场价值保持一致”。

被组织在市场之中；实际上，这些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绝对关键的组成部分。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显然都不是商品；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即任何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都必须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对它们而言显然是不成立的。换言之，根据商品的经验定义，它们不是商品。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最后，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者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76

然而，正是在这种虚构的帮助下，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实际市场才得以组织起来^①；它们实实在在地在市场上被购买和出售；对它们的需求和供给都数量巨大；而且任何阻碍这些市场形成的政策或措施都不可避免地会危及整个市场体系的自发调节。所以，虚构商品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命运攸关的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以最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了社会的几乎所有制度：该原则即是，任何可能妨碍市场机制沿着虚构商品的路线而运转的安排或行为都必须被禁止。

可是，当关涉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时，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就无法得到维持。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因为“劳动力(labor power)”这种所谓的商品不能被推来搡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的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dislocation)。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最后，对购买力的市场控制将周期性地肃清扼杀商业企业，因为对后者而言，货币供给的涨落不定会产生如同洪水与干旱

^①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的拜物教特征的论断所指涉的是真实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本文所谈的虚拟商品并无关联。

之于原始社会的巨大灾难。毫无疑问,劳动力和土地和货币的市场对市场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这样一种粗陋虚构(crude fictions)的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哪怕只是片刻之间。除非人类的和自然的实体以及商业组织都能得到保护,能够与这个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相对抗。

77 市场经济的极端人为性(artificiality)根植于以下事实,即在这里生产过程本身乃是通过买和卖的形式来组织的。在一个商业社会中,为市场而组织生产的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不可行的。^① 中世纪晚期,为出口而进行的工业生产是由富有的市民来组织的,并且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城镇,在他们的直接监控下完成的。后来,在重商主义社会,生产由商人来组织并且不再局限于城镇之中;这是一个“发包(putting out)”的时期,家庭手工业通过商业资本家提供的原材料进行生产,这些资本家以纯粹商业企业的方式控制生产过程。只有到那个时候,工业生产才明确地并大规模地处在商人的组织领导之下。商人熟悉市场,了解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并且能够保证原材料供给——顺便提及,这种供给只包括羊毛、染料,以及有时要加上的织机和梳毛机等家庭手工业所需使用的器具。如果原材料的供给不济,受到打击最为严重的是那些家庭手工业从业者,他们会暂时失业;但整个过程并不涉及成本高昂的工厂,因而商人也不会因承担生产责任而招致严峻的风险。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体系的力量和规模都在逐渐成长,最终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毛纺业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并覆盖了国土的广大地区,并且生产都是由布商们来组织。以买卖为生的布商,只是顺带促进了生产——他对生产的促进并不需要另外的动机。在这里,商品的制造既不涉及互惠互助的态度,也不存在家庭作坊对需求满足的关切;既没有手艺人由其劳动创造而生的自豪感,更与公共赞誉所带来的满足感无关。所需要的仅仅是赤裸裸的获利动机,这种动机是以买卖为职业者最熟悉不过的。直到18世纪末期,西欧的工业生产仍不过是商业的一个副产品。

78 只要机器还只是一种既不昂贵也不特殊的工具,这一状况就不会改变。能够在同样时间内大大增加产量这一点,足以诱使家庭手工业从业者采用机器,以便增加收入,但这一事实本身却并不一定会影响到生产组织。廉价机器是归工人所有还是归商人所有,显然会对双方地位形成一定影响,并几乎必然会造成工人收入上的差异:只要他自己拥有工具,生活就会好过一点;但这并

^① Cunningham, W.,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I.

不会促使商人成为一个工业资本家,或者迫使他不得不借钱给工人购买机器。货物的销路极少会成为问题;困难一直在于原材料的供应,这种供应有时不可避免地会被打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机器的商人遭受的损失也不是实质性的。完全改变了商人与生产之间关系的,并不是像上述那样的机器的到来,而是复杂精制的并因而是专门化的机器和工厂的发明。尽管新的生产组织是商人引入的——这是一个决定了整个转型进程的事实——然而,复杂机器和工厂的使用,以及工厂制度的发展,却导致商业和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转变。工业生产不再是商人通过买卖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活动的附属品;现在它包含了长期投资以及相应的风险。除非生产的连续性得到合理的保证,否则,这样一种风险是难以承受的。

然而,工业生产变得越复杂,要求保证供给的工业生产要素也就越多。当然,其中的三种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于是,它们必须被组织起来在市场上出售——换言之,它们必须成为商品。将市场机制扩展到这些工业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乃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引入工厂制度这一举措不可避免的后果。工业生产的要素必须处在待售状态。

这与需要建立一个市场体系这种说法是同义的。我们知道,只有通过相互依赖的竞争性市场所保障的自发调节,利润才有保证。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已经作为买卖过程的一部分而被组织起来,所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必须被转变为商品,以便保证生产的持续。当然,它们并不能真正被转变成商品,因为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被制造出来的。但针对它们的这种为市场而生产的虚构却成了社会的组织原则。在这三者中,有一个尤为突出:劳动力。作为一个技术性术语,劳动力是指人类本身,只要他不是雇佣者而是被雇佣者;由此,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对劳动力的组织将会随着市场体系的组织变化而变。然而,由于劳动力的组织不过是普通大众生活形式的另一种说法,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发展必将伴随着社会组织本身的变化。再往下推,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

79

我们曾拿英国历史上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破坏来比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我们说过,一般而言,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进程中被瓦解。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把英国从西班牙式的命运中挽救了出来,方式是通过控制变迁的进程,

并将其影响导向相对无害的方向,从而使变迁变得可以承受。但是没有人能把英国的大众从工业革命的冲击中解救出来。对自发性进步(spontaneous progress)的盲目信仰牢牢控制了人们的头脑,甚至当时最具启蒙意识的人也像宗教信徒一样狂热,一味追求无限止、无约束的社会变迁。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冲击。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

80 由此,19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成为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一方面,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显然,世界商品市场、世界资本市场以及世界货币市场在金本位制的庇护下为市场机制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动力;但是,一个深层次的运动已然形成,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

第七章 斯品汉姆兰,1795

18 世纪的社会不自觉地抗拒着任何使其成为市场的纯粹附庸的努力。无法想象一个市场经济可以不包括劳动力市场;但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市场,特别是在英国农业文明中,就意味着是对传统社会构架的总体性破坏。在工业革命最活跃的时期,也就是从 1795 年到 1834 年,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由于斯品汉姆兰法令(Speenhamland Law)而受到了阻碍。 81

事实上,劳动力市场是在新的工业体系下组建的最后一个市场,而且只有当市场经济开始启动,连普通大众自身都感觉到劳动力市场的缺失是一场比它的引入更加可怕的灾难时,这最后一步才跨了出来。尽管自由劳动力市场是通过非人的(inhuman)方式建立起来的,但最终,它还是证明了自己为所有与它相关的人都带来了经济上的益处。

然而,正在这时,关键问题出现了。自由劳动力市场在经济上的好处并不能抵消它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必须引入新形式的法规,以便使劳动力重新受到保护,只不过这一次,防范措施所针对的是市场机制本身。这些新的保护性制度,像工会、工厂法,虽然都尽可能适应经济机制的需要,但它们仍然妨碍着市场的自我调节,并最终将摧毁这个系统。

从这样一个宏观的演化逻辑上看,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出现有着战略性的地位。

在英国,土地和货币都是先于劳动力被动员起来的。由于严格的法律法规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一直未能形成,劳动者实际上都被限制在他所在的教区。1622 年的《安居法》(the Act of Settlement)奠定了所谓教区农奴制(parish serfdom)的基础,直到 1795 年才告解除。若不是同一 82

年引入的斯品汉姆兰法令或“补贴制度 (allowance system)”，建立一个全国劳动力市场本来是有可能的。斯品汉姆兰法令不是致力于建立劳动力市场，而是倾向于大力强化劳动组织的家长制制度，就像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继承来的那样。在那段灰暗低沉的时期中的一天^①，即 1795 年 5 月 6 日，伯克郡 (Berkshire) 的法官们在斯品汉姆兰靠近纽百瑞 (Newbury) 的鹈鹕旅馆聚首，并作出以下决定：工资之外的津贴应该通过与面包价格挂钩的方式予以确定，以便保证穷人能够得到一个最低收入，而不论他们实际挣得的钱有多少。以下是这些地方长官们^②在这项法令中所作的著名规定：当具有确定质量的 1 加仑面包“价格为 1 先令时，则一个贫穷而勤勉的人每周要有 3 先令的收入来满足他的需要，无论这些钱是由他自己或他的家人的劳动获得，或者是从济贫税中获得的津贴，而为维持他的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则每增加一人，需增加 1 先令 6 便士；当这一加仑面包价格为 1 先令 6 便士时，他每周就需要 4 先令，加上每位家人 1 先令 10 便士；面包的价格在 1 先令之上每增加 1 便士，他就多需要 3 便士，他的每位家人则多需 1 便士。”这个数字在各个不同的郡会稍有变化，但在绝大多数地区，这种斯品汉姆兰式的计算方法都是通用的。当时它是作为一种应急方案被非正式地提出的。虽然通常被称为一项法律，但它本身从未经由国会颁布过。然而它很快成为涵盖几乎所有乡村的法令，之后不久甚至涵盖了许多制造业地区；实际上，它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几乎就意味着“生存权”的要求被提了出来。直至 1834 年被废除，这个法令一直有效地防止了具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在这之前两年的 1832 年，中产阶级实现了他们的权力要求，部分就是为了排除这个通向新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确实，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工资制度迫切要求撤销斯品汉姆兰法令所体现的“生存权”——在经济人的新政体 (regime) 下，如果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就可以生存，那就没有人再愿意为了工资而工作了。

斯品汉姆兰方案撤销后的另一个特征，对于 19 世纪大多数作者来说就不那么明了了，这个特征就是，即使是出于工资劳动者自身的利益，也应当将被阻碍的工资制度普遍化，哪怕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对于生存的合法要求。“生存权”已经被证明是个致命的陷阱。

83

① 这一年欧洲发生饥荒，食品极度短缺，在英国，以食品为指向的骚乱经常发生。——译者注

② 在当时的英国，行政和司法并不像在欧洲大陆上那样得到了比较明确的区分，这里的“地方长官 (the magistrates)”与上文的“法官 (the judges)”当是指同一群人。——译者注

这种自相矛盾仅仅是表面上的。据说,斯品汉姆兰法令意味着济贫法的充分实施——然而事实上,它却转向了济贫法的初衷的反面。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济贫法下,无论工资多少,穷人必须被强迫工作,只有那些实在无法获得工作的人才能获准救济;作为工资补助的救济金是不存在的。而按照斯品汉姆兰法令,人们即便有工作仍然会被救济,只要他的工资总数少于法案确定他应有的家庭收入标准。因此,没有劳动者再因任何金钱利益来取悦其雇主,无论应挣的工资是多少,他的收入都是一样的;只有在工资水平超出法定最低收入水平时,情况才会有所不同,可是这种情况在乡间很少见,因为雇主可以用任何工资水平来获取劳动力;无论他自己支付得如何少,来自法案的补贴都会将工人的收入提升到法定最低收入的水平。在短短数年内,劳动生产率就下降至赤贫劳工(pauper labor)^①的生产率水平,这反过来又为雇主拒绝提高工资提供了理由。因为,一旦劳动强度、劳动的尽心程度和效率降到某个特定水平之下,它就无法区别于“磨洋工(boondoggling)”或者为了维持工作的假象而假装的忙碌。虽然原则上,工作仍然有强制性,然而实际中,济贫所(poorhouse)外的救济(outdoor relief)已被普遍采用;而且即使救济金是在济贫所里以被监控的方式发放的,那些被救济贫民所从事的强制劳动岗位也很难说名副其实。这等于说是废除了都铎王朝的立法,只不过这种废除不是因为减少,而是因为增加了过多的父爱主义因素。所外救济的扩展,工资补助的引入,以及外加的对妻子和孩子的补贴——所有这些项目都与面包挂钩——意味着整体上已经从工业生活中废除了的管制原则,又在劳动力方面戏剧性地重新被引入了。

没有什么措施能比这更深得人心了。^② 父母无须照顾他们的孩子,孩子们也不再依赖他们的父母;雇主们可以任意降低工资,劳动者无论是忙于工作还是无所事事,都可以远离饥饿;人道主义者欢呼这种方法是一项慈悲的行为,尽管它并不公平;那些自私的人庆幸地自我安慰:虽然它是慈悲的,但至少它还不是慷慨大方的;甚至连纳税人都很难意识到,在这样一种制度——它要求保证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而不管他是否能通过工作来赚取生活所需的工资——下,将会发生什么。

84

^① 在本书中,有两个通常都可译为“穷人”的单词:“the poor”与“the pauper”。不过,在作者的用法上,这两者是严格区分并有意加以对比的。所以我们把前者译作“穷人”,指有家庭至少少量生产资料的农民,类似我国传统用法中的“贫雇农”;而把后者译作“赤贫者”,指一般没有家庭,“好吃懒做”、到处游荡的贫民,类似于“流氓无产者”。——译者注

^② Meredith, H. O., *Outline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908.

从长远来看,结果是可怕的。虽然把普通人的自尊降到宁要救济不要工资这样的最低点的过程需要一些时间,可是从一开始就可以肯定的是,他那由公共基金加以补贴的工资最终一定会无限降低,并使他完全依赖于救济。日甚一日,乡间的大众就赤贫化了;“一旦依赖救济,就会永远依赖救济”这句谚语说的是真理。如果不是从这种补贴制度的延长效应(the protracted effects)来看,早期资本主义中人和社会的退化就不可能得到解释。

斯品汉姆兰插曲向那个世纪先进国家中的人们展示了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冒险的真实性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不曾忘记那个愚人的天堂所带来的教训;如果说1832年的《改革法案》(the Reform Bill of 1832)和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of 1834)普遍被当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那是因为它们结束了仁慈的地主及其补贴制度的统治。试图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努力悲惨地失败了。支配资本主义秩序的法则已经表明和坚持了自己的权利要求,并展示了它们与父爱主义原则的根本敌对。这些法则的严厉性已经变得显而易见,违犯它们的后果已经残酷地展现在那些以身试法者身上。

在斯品汉姆兰法令下,社会被两股相反的力量所利用:一种源自父爱主义,保护劳动力免受市场体系的威胁;另一种力量则将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组织到市场体系下,从而剥夺了普通人过去所拥有的地位,强迫他们以出卖自己的劳动谋生,可是与此同时却又剥夺了他们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一个新的雇主阶级被创造了出来,可是同时却没有一个相应的、能将自己组织起来的被雇者阶级。一场新的、规模巨大的圈地浪潮吞噬着土地,并制造出了一个乡村无产阶级,与此同时,“济贫法的应用不当”却阻止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谋生。无怪乎当时的人们惊骇于所看到的悖论现象:几乎奇迹般的生产增长与大众几成饿殍的现象并存。到了1834年,一种已经普遍存在的信念——这种信念被许多深思熟虑的智者所激情持守——是,任何事态都比斯品汉姆兰法案的继续实施要好。要么像卢德分子(Luddites)尝试的那样去捣毁机器,要么去创建一个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人类就这样被迫走上了乌托邦试验之路。

这里不是详细地对斯品汉姆兰法案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地方,将来会有这样的机会的。从表面上看,“生存的权利”本该全面地使工资劳动消失掉。工资水平应该逐渐降为零,实际工资全部由教区来负担,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一安排的荒谬性显现出来。但是别忘了这本质上仍为前资本主义的时代,普通人

的思想意识仍旧是传统的,他们的行为离完全由金钱动机支配还远着呢。这些乡下人的绝大多数拥有自己的住房和简单的生计,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他们觉得任何一种生存方式都比陷入赤贫的境地要好,即使在当时赤贫者的身份还没有像后来发生的那样成为令人讨厌的或可耻的标志。当然,如果当时的劳动者可以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自由地结合到一起,那么这个津贴制度将会对标准工资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因为如此放任的济贫法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有助于减轻工会救济失业行动的行动负担并从中得到极大的好处。这可能是1799—1800年不公正的《反结社法》(Anti-Combination Laws)得以制定的理由之一,否则这一事件将难以解释,因为伯克郡的地方长官和国会的议员们在总体上都关注穷人的经济状况,而且1797年之后政治动荡业已平息。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斯品汉姆兰法令的父爱主义干涉导致了《反结社法》的产生,这是一个进一步的干涉,如果没有《反结社法》,斯品汉姆兰法令所产生的后果可能不是如它实际达到的那样——压低了工资水平,而是提高工资水平。与直到25年之后才被取消的《反结社法》相结合,斯品汉姆兰导致了一个讽刺性的结果:从经济上得到保证的“生存的权利”最终却毁了它原本要去救助的那些人。

对于后代的人来说,下述事实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工资制度与“生存的权利”这两种制度无法兼容——或者说其工资由公共基金所补贴的资本主义秩序不可能正常运转。但是当时的人并不理解他们正在为之铺垫的秩序。只有当大众的生产能力发生严重恶化时——这是一场阻碍机器文明的真正的全国性灾难——公众才认识到废除穷人无条件救济权的必要性。斯品汉姆兰法令的经济学机制的复杂性超出了当时任何一个观察家的理解能力;但看起来无可否认的结论是:工资补助(aid-in-wages)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因为它甚至不可思议地伤害了那些接受补助的人。

市场体系的陷阱至此尚未显现出来。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区分自从机器时代以来,英国劳动人民所身处其间的沧桑巨变:首先,是斯品汉姆兰时期,1795—1834年;第二个阶段,在1834年之后的十年里,济贫法改革所造成的困境;第三个阶段,1834年之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危害,这一阶段延续到1870年代工会被承认为工人提供有效的保护。在编年史的意义,斯品汉姆兰法令催生了市场经济;济贫法修正案的那个十年是向那种经济的转型期。最后一个阶段——它与前一个部分重叠——才是市场经济阶段本身。

三个阶段之间有着醒目的区别。斯品汉姆兰法令是设计来阻止,或者至少是延缓普通人的无产阶级化的;结果却是大众的赤贫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几乎失去了人形(human shape)。

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排除了形成劳动力市场的这一障碍:“生存的权利”被废止了。这一法案所表现出来的系统的、有技术的残忍如此震撼公众情感,以至于1830年代和1840年代人们的激烈抗议使当时的真正图景在后人的眼中变得模糊不清。确实有一些最需要救助的穷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于所外救济的取消而自生自灭了。而受害最深的是那些“该受救济的穷人(deserving poor)”,他们过于骄傲,不愿意进那些已成为耻辱标志的贫民习艺所(workhouse)^①。也许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这更粗暴的社会改革行为了;它碾碎了无数人的生活,却假装是在通过习艺所测试提供真正贫困的标准。心理拷问被温文尔雅的慈善家们冷酷地辩解并付诸实践,以作为工厂机器运转的润滑剂。然而大多数的抱怨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古老的制度如此突然地被取消,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如许迅速地被付诸实现,一切都太突然了。

87 迪斯雷利(Disraeli)公开抨击这个关系人民生命的“不可思议的革命”太鲁莽。但是,如果仅仅以货币收入为标准,人民的生活条件则注定会很快提高。

第三个阶段的问题变得无可比拟地更加深入。在1834年之后的十年中,新的、集权化了的济贫当局对穷人所施加的官僚主义的暴行仅仅是零星的,与所有现代制度中的最强有力者——劳动力市场那无所不在的影响相比,它几乎微不足道。在规模上,它与斯品汉姆兰法令所产生的威胁差不多,不过显著的区别在于,现在不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缺席,而是它的在场成为危险之源。如果说斯品汉姆兰法令曾经阻止了工人阶级的出现,那么现在,穷苦的劳动者则是在无情机制的压力下被结合成了这样一个阶级。如果说在斯品汉姆兰法令之下,人民就像不被稀罕的动物而没有得到照料,那么现在,他们却被预期在重重困境下自己照看自己。如果说斯品汉姆兰法令意味着导致堕落的隐蔽的苦难,那么现在,劳动者则成为社会上的无家可归者。如果说斯品汉姆兰法令是对邻里、家庭和乡村环境之价值的滥用,那么现在,人们则远离家庭和亲属,从他自己的根和一切有意义的环境中强行拔起。简而言之,如果斯

^① 本章中有两个看起来很相似的专门词汇:“poorhouse”和“workhouse”。它们都是穷人在其中劳动、并领受救济的地方,但前者是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实施之前英国传统的、带着父爱主义色彩的“济贫所”,后者则是济贫法修正案所设的严酷的“贫民习艺所”。——译者注

品汉姆兰法令意味着不流动造成的腐败,那么现在的危险则在于遗弃而导致的死亡。

直到 1834 年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才在英国形成;所以,作为社会制度的工业资本主义不能说在此之前就已形成。但是,几乎是与此同时,社会的自我保护也产生了:工厂法(factory law)和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以及一场政治性的和产业性的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形成。正是在避开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全新危机的尝试中,保护行动与这个机制的自我调节发生了殊死的冲突。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19 世纪的社会史正是由从 1834 年《济贫法修正案》中得到解放的市场体系的逻辑所决定的。这一动力机制的起始点是斯品汉姆兰法令。

如果我们说对斯品汉姆兰法令的研究就是对 19 世纪文明降生过程的研究,我们头脑里思考的并不完全是它的经济和政治效果,甚至也不是这些效果对现代政治史的决定性影响,而是下面这一当时人所完全不知道的事实,即我们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正由此被型塑。赤贫者的形象——尽管此后几乎被完全遗忘——支配了当时的讨论,这个讨论的烙印与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事件同样鲜明而深刻。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受惠于伏尔泰(Voltaire)和狄德罗(Diderot)、凯奈(Quesnay)和卢梭的思想的话,那么济贫法的讨论则塑造了边沁(Bentham)和伯克(Burke)、戈德温(Godwin)与马尔萨斯(Malthus)、李嘉图和马克思、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达尔文及斯宾塞的思想,而这些人与法国大革命一起分享着 19 世纪文明精神之父的地位。正是在斯品汉姆兰法令与济贫法改革之后的几十年中,人类的心灵带着新的、痛苦的关照转向了他自身的共同体:伯克郡的法官们努力创造的、并被济贫法修正案最终消除了的革命,使人们的视域发生了转向,他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集体存在(collective being),似乎之前大家曾忽视了它的在场。一个其存在(existence)本身未被察觉的世界被揭示了出来,这个世界就是统辖着一个复杂社会的那些法则的世界。尽管这个在新的、迥异于前的意义上的社会见诸于经济领域,但它与其他领域是普遍关联的。

88

这一新生的现实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形式进入我们意识的。它那令人眩感的规整性和让人瞠目的矛盾性必须被置于哲学与神学的框架,以便能被人类意义所吸纳。那些看起来要取消我们自由的顽固事实和无情法则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自由相调和。这正是暗中支撑着实证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的形而上学力量的主要源泉。在展望人类可能性的未开发领域的时候,无限的

希望和无限的绝望就是人们面对这些尴尬限制所产生的矛盾反应。希望——不断完善的前景——是从人口和工资法则的梦魇中提取出来的，并体现在进步的概念中，这一概念是如此地激动人心，以至于它能使将要到来的巨大而痛苦的混乱(dislocation)变得正当。绝望则被表明是大转变更为坚强有力的动因。

人类被迫将自己托付给现世的永劫(secular perdition)：他被注定了，要么停止自己种族的繁衍，要么有意识地通过战争和瘟疫、饥饿与邪恶来消灭自己。贫穷依然存在于社会之中；正当财富无限增长的允诺就出现在我们眼前时，食物的有限性和人口增长的无限性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这一点使这里的讽刺意味更加辛辣。

89 这就是对作为人类精神整合体的社会的发现；但是，这一新的现实——社会——对人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呢？作为指导实践的、关于和谐与冲突的道德原则被歪曲到了极限，几乎被推入完全矛盾的境地。根据这种歪曲，和谐是内在于经济的，个体的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最终是同一的——但是这种和谐的自我调节要求个体尊重经济规律，即使它一不小心就会毁灭他。冲突，同样，似乎也是内在于经济的，不管是个体的竞争还是阶级的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最终被证明是内在于现时或未来社会更深层次的和谐的唯一动因。

赤贫化(pauperism)、政治经济学与对社会的发现，这三者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赤贫化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样一个无法理解的事实，即贫穷(poverty)伴随着富足一起增长。不过，这仅仅是工业社会带给现代人的诸多悖论中的第一个。它经由经济学之门进入了新的住所，这一偶然形成的环境使得这个时代笼罩着物质主义的氛围。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物质商品更加真实的了。在他们看来，市场法则意味着人类可能性的极限。戈德温则相信人类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必须拒斥市场的法则。欧文是唯一认识到人类可能性不是被市场的法则所限制，而是被社会本身的法则所限制的人，正是他独自察觉到了在市场经济的面纱后面那个正在浮现的实在(reality)——社会。但是，他的洞见却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被遗忘了。

与此同时，正是在与贫困问题的联系中，人们才开始探究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生活的意义。将政治经济学引入广泛领域的视角有两个，它们相互对立：一个是进步与完善，另一个是决定论和诅咒；把它转向实践的，也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通过和谐与自我调节的原则，另一方面是竞争与冲突。经济自由主义和阶级观念在这些矛盾中预先就被构成。随着一个基本事件的终结，一系列新的理念进入了我们的意识。

第八章 前奏与后果

90

斯品汉姆兰体系最初不过是个权宜之计。然而极少有哪个制度如它这般决定性地塑造了整个文明的命运,尽管它自己必须在新时代到来之前被抛弃。它是一个转型时代的典型产物,值得引起现今每一位从事人类事务研究的学者的注意。

在重商主义体系下,英国的劳动组织是以济贫法与工匠法为基础的。济贫法,用来指称在 1563—1601 年起作用的各种法规,被公认是一个误导性的命名;实际上这些法规及其后来的修正案,构成了英国劳工法律的半壁江山;另一半是由 1563 年的工匠法组成的。后者针对的是受雇用者;而济贫法处理的则是我们称之为未被雇用者以及无法被雇用者(老年人与儿童除外)。如我们所看到的,后来这些措施又被 1662 年的《安居法》所补充,这一法律关注人们的法定居住地,并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迁徙流动。(当然,被雇用者、未被雇用者和无法被雇用者之间完全明确的区分是一种时代误置的错误,因为它必须以现代工资体系的存在为前提,而后者直到 250 年之后还尚未完全具备;我们采用这些术语是为了在如此广阔的呈现中尽量获得简便。)

根据工匠法,劳动组织基于三大支柱:强迫劳动(enforcement of labor),七年的学徒期,以及公共机构对工资的年度评估。这一法律——这应该被强调——不仅适用于城镇,同样也适用于乡村地区。大约在 80 年的时间里这项立法得到了严格执行;后来学徒期条款部分被废止,仅限于在传统的手工技艺领域使用;对诸如棉纺业这样的新产业已不适用;基于生活成本之上的工资的年度评估,在王政复辟(1660)之后也在大部分地区被悬置不用。从形式上来讲,该法律的评估条款直到 1813 年才被取消,关于工资的条款在 1814 年才被废弃。但是,在许多方面,学徒期条款的原则比该法律本身存活的时间要长;

91

在英国的技术行业，它依旧是被普遍实践的原则。在乡村，强迫劳动正在一点一点被废弃。不过我们仍旧可以说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工匠法奠定了全国范围内的劳动组织的轮廓，这个轮廓的原则是管制和父爱主义（亦作“家长制”）。

于是，工匠法被济贫法所补充，在现代人看来这个术语^①无比令人迷惑，因为“穷人(poor)”与“赤贫者(pauper)”的发音差不多。实际上，英格兰的绅士们把所有那些没有足够收入支持其悠闲生活的人都当成穷人。故而“穷人”实际上变得跟“普通人”同义，普通人包括了除土地阶级（当时几乎所有成功的商人都拥有自己的地产）之外的所有人。于是术语“穷人”意味着所有那些一直处在需要中的(were in need)人，以及所有那些偶尔或当下处在需要中的(were if and when in need)人。当然，这其中包含了赤贫者，但不仅限于此。年老者、体弱者、孤儿，在一个宣称其范围内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己位置的社会里都必须得到照料。但是此外，还有那些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我们称他们为失业者，因为我们假定只要找得到工作，他们就能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乞讨会被严厉地惩处；流浪，如果是再犯，则是一项最严重的违法行为。1601年的济贫法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应该工作以养活自己，工作由教区提供；救济的负担完全放在教区身上，教区被授权通过地方税费筹集必要款项。这些款项通过对房屋所有者和不动产占有者课税取得，不分贫富，只根据其所拥有的房屋和土地的租金征收。

工匠法与济贫法一起构成了可称之为劳工法(Code of Labor)的法律体系。但是，济贫法的管理运作是地方性的；每一个教区——一个微小的单元——自己拥有可以安置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劳动的岗位；维持一个济贫所的运转；安排孤儿及赤贫户子女当学徒；照顾老弱者；安葬赤贫者；并且每个教区都有自己的救济标准线。不过，所有这些听起来通常都比它实际的情况要壮观得多。许多教区没有济贫所；更多的教区没有合理的岗位提供给有劳动能力者；地方上济贫税赋提供者的懈怠、济贫工作人员的冷漠、对济贫兴趣的麻木不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这个法律的作用。不过，从总体上说，全国为数近16000个济贫机构还是成功地使得乡村生活的组织架构免于破损和毁坏。

但从全国范围的劳动制度来看，这种对失业和贫困救济的地方性组织原则显然是不正常的。各个地方向穷人提供的条件差异越大，运转良好的教区

^① 即“济贫法(the Poor Law)”。——译者注

被蜂拥而至的职业性被救济者挤瘫的危险就越大。王政复辟之后,安居与迁移法(the Act of Settlement and Removal)获得通过,以保护“比较好的”教区免遭赤贫者洪流的冲击。一个多世纪之后,亚当·斯密又猛烈抨击这一法案,因为它把民众限制住了,并由此阻止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同时也阻止了资本家找到雇工。只有在地方长官和教区当局的同意下,一个人才可以在他家乡之外的教区逗留;除此之外,在任何其他地方他都有可能被驱逐,即使他此时拥有工作,处境良好。人民的法律地位因此就是受到深刻限制的自由和平等。在法律面前他们是平等的,在他们的乡亲中间他们是自由的。但他们没有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选择工作的自由,他们没有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的自由,他们被强迫参加劳动。伊丽莎白时代的这两个伟大立法与安居法一起,既是普通人的自由宪章,又是限制他们能力的封铅。

1795年,工业革命正在高歌猛进。在工业需要的压力下,1662年的法案被部分地取消了,教区奴役制度被废止,劳动力的流动也恢复了。现在可以在全国规模上建立一个劳动力市场了。但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恰恰就在同一年,一种济贫管理模式被引入,这种模式意味着对伊丽莎白时代的强迫劳动原则的反动。斯品汉姆兰法令保证了“生存权”;保证了普遍化的工资补助;家庭补助被单独追加;所有这些都是以所外救济的方式——即并不要求救济接受者必须留在济贫所之内——给予的。尽管救济的尺度是微薄的,但它足够维持生存。这是对规制主义和家长制变本加厉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正是在蒸汽机呼唤着劳动者的自由、机器渴求人手的时候。就在这样的時候,斯品汉姆兰法令在安居法退出的关口登场了。对立是明显的:安居法被取消,正是因为工业革命需要为工资而出售的劳动力面向全国范围的供给,然而斯品汉姆兰法令却宣称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任何人都不需要恐惧饥饿,因为不管他所挣几何,教区都会帮助维持他和他家庭的生计。在这两个产业政策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矛盾;除了社会性的大灾难,我们还能从这两项政策的同时并举中期望什么呢?

93

但是斯品汉姆兰时代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在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工业革命的前夜,并没有什么提前到来的先兆或预警。资本主义是悄无声息地到来的。没有人预见机器工业的大发展,它完全是在惊喜中到来的。在阻挡工业革命的大坝将要爆裂之际,有一段时间英国实际上是在预期对外贸易的持久衰退,而这个大坝一旦告破,旧世界就被一往无前冲向全球性经济的激流涤荡得无影无踪。

但是,直到1850年还没有人敢有把握地这么说。要理解斯品汉姆兰的那些地方长官们的建议的关键,在于了解到他们对于摆在他们眼前的发展所包含的更广泛的意义其实一无所知。现在回顾起来,看上去他们好像不仅在尝试不可能的事,而且这种尝试所用的方法也是相互矛盾的,这在那时就应该很明显了。实际上,他们达到了保护乡村免于陷入混乱的预期目的,尽管与此同时他们的政策在别的、未曾预见的方面造成了更具灾难性的后果。斯品汉姆兰政策是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应该以当时政策制定者应对情势的观点来理解。从这个角度看,补助制度其实是为地主阶层设计用来应对一种特定情势的工具,这个情势就是,再也无法拒绝劳动力的流动了,但是地主们期望在接受全国性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同时,避免地方环境变得躁动不安,包括出现高工资。

94 因此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动力机制是根植于其发端的环境的。乡村赤贫者的增加是即将到来的混乱的第一个先兆。但在当时似乎没有人这么想。乡村贫困与世界贸易的冲击之间的关联是隐而不彰的。当时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将村庄里穷人的数量与世界七大洋贸易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穷人数量令人费解的增长几乎普遍被归因于济贫管理方法的不当,这种归因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实际上,在表象的背后,乡村赤贫者的预兆性增长是直接与经济史的总趋向相联系的。但这种联系依然无法被察觉。许多作者试图探究穷人渗入乡村的途径,他们推导出来的理由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让人吃惊。然而当时只有少数作者像现今我们已习惯了的这样从与工业革命相联系的角度来说明这种混乱的表征。直到1785年,除了间歇性的贸易增长与赤贫者数量的增长之外,英国公众对经济生活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依然毫无察觉。

穷人从何而来?这是随着时间推移其厚度不断增加的一堆小册子提出的问题。赤贫化的原因与消除它的手段几乎无法区分开来,因为这些小册子都被同一个信念所激励,那就是,只要赤贫化的最明显的罪恶能被有效地缓解,赤贫化本身将不再存在。在有一点上,大家好像取得了普遍共识,即赤贫化增长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粮食的缺乏;农业回报过高导致食品价格上升;农业工资太低;过高的城市工资;城市就业不稳定;自耕农的消失;城市工人不适应乡村劳动;农场主不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地主担心提高工资会降低地租;济贫所的生产无法与机器竞争;家庭经济的匮乏;褊狭的住所;固执不变的饮食习惯;吸毒的恶习。有的作者责怪一种新型的大绵羊;另外的人认为,应该用牛代替马;还有人鼓励少养狗。有的作者认为穷人应该少吃或不

吃面包,可是另一些人认为即使他们吃“最好的面包也不该受指责”。有的观点认为喝茶损害了穷人的健康,而“家酿的啤酒”则可使之康复;这一观点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们甚至认为最便宜的酒也比茶好。直到四十年后,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依然相信放弃饮茶习惯能帮助缓解贫困。^① 无可否认,不少作者抱怨圈地造成的骚动不安的后果;也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制造业的兴衰损害了乡村的就业。但总体上来说,普遍流行的印象是,贫困化是一种独特(sui generis)的现象,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社会疾病,这些原因大多是在济贫法没能提供正确救治的情况下才变得活跃起来的。

95

贫困化的加重与贫困救济标准线的提高的真正原因当然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隐性失业的增长。这个事实当然不会在那个时代变得显而易见,因为由于村庄工业的特点,甚至就业本身都原则上是隐性的。这些问题仍旧在于:怎样解释这些失业者与未充分就业者数量的增长?为什么眼前的工业变迁的这些征兆甚至逃过了当时最敏锐的观察家的注意?

解释首先在于早期贸易的过分起伏,这种起伏倾向于掩盖贸易的绝对增长。尽管后者造成了就业的增长,但是波动本身则造成了失业的更大增长。在一般就业水平缓慢增长的同时,失业与未充分就业的增长却是迅速的。于是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之为“产业后备军”的迅速扩充远远压倒了工业从业者军队本身的增长。

这个趋势产生的重要后果是,失业与贸易的总体增长之间的联系很容易被忽视。尽管人们经常评论说,失业的增长是由贸易的巨大波动造成的,但以下事实还是逃脱了人们的注意:这些波动形成了一个潜在增长的过程,即越来越倚重制造业的商业的一般增长,这种增长将导致波动的振幅越来越大。对当时的人而言,他们看不出在主要属于城市的制造业工厂与乡下的穷人数量的增长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贸易总量的增长自然使得就业量膨胀,然而地区的专业分工以及贸易的剧烈波动引起了乡村与城镇两者职业岗位的严重混乱,这种混乱导致了失业的迅速增长。远方传来的高工资的谣言使得穷人们不满于农业所能提供的工资,并进而导致对这种劳动的厌恶,因为它被认为是报酬低微的工作。那个时代的工业地区仿佛是一个新的国家,就像另外一个美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移民。移民通常都伴随着相当可观的向乡村的回流,必然存在回流这一判断似

96

^① Martineau, H., *The Hamlet*, 1833.

乎从以下事实中得到支持,即找不到乡村人口绝对下降的记录。这样,当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期被吸引到商业和制造业领域就业,然后又回流到其起始的乡村居住地时,整个人口中的不安因素就渐渐积聚起来。

在针对英国乡村所造成的社会破坏中,有许多是最初源自乡村自身的商业化所造成的混乱。农业革命决定性地催生了工业革命。不管是对公地的圈占还是农地的合并,它们都伴随着农业技术的巨大进步,并且具有强有力的扰动效应。争夺农舍,蚕食农家菜园和庭院,以及对公地使用权利的剥夺,导致了家庭手工业两大支柱的丧失:家庭收入与农业背景。只要家庭手工业能从小菜园、一块小土地或者放牧权利这样的便利和愉悦中得到补充,劳动者对货币收入的依赖性就不会是绝对的;一小块马铃薯地或者一群“矮墩墩的雌鹅”,公地上的一只奶牛甚至一头驴子都会造成决定性的差别;家庭收入是作为某种失业保险而发挥作用的。农业生产的理性化不可避免地使劳动者失去了自己的根,并削弱了他的社会安全。

当然,在城市里,就业波动之鞭抽打的痕迹是触目惊心的。工业一般被认为是死胡同(blind alley)职业。“今天完全就业的工人明天就可能沦落到街头乞讨面包……”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es)这样写道,“劳动条件的不确定性是这些新发明最邪恶的后果。”“当一个从事某种工业的城镇失去这种工业时,其居民就像瘫痪了一样,立即成为教区里的济贫负担;而且悲剧还并不止于这一代人……”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职业分工施展了它的伤害性:失业工人徒劳地回到他的村子,因为“纺织工人一无所长”。城市化致命的不可逆转性在于亚当·斯密所预见的简单事实,他把工业工人描述为在智识上低于哪怕最穷困的土地耕作者,因为后者通常可以去从事各种工作。然而,直到亚当·斯密出版他的《国富论》的时候,贫困化还未曾出现警示性的迅速增长。

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在伯克1775年完成并献给皮特(Pitt)的《关于稀缺的思考与详述》(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一书中,他承认虽然存在着普遍增长,但依然存在着一个“持续二十年的坏周期”。实际上,在七年战争(1763)之后的十年间,失业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这一点可以从所外救济的增长中看出来。这是贸易的繁荣伴随着穷人困苦有增无减这一悖论现象的第一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重复发生的那些现象里,它注定要成为让下一代西方人最迷惑的现象。人口过剩的幽灵开始在人们的脑际萦绕。威廉·汤森(William Townsend)在他的《关于济贫法的论文》(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中警告说:“就事论事地说,实际上在英国,我们的

人口超出了我们供养的能力,更远远超出了在现有法律制度下我们能有效雇佣的能力。”亚当·斯密,在1776年已经开始反思这一悄然的生长。汤森,仅仅在十年之后,则已经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是一场海啸。

然而仅仅五年之后,许多事情就发生了。就连像特尔福德(Telford)这样远离政治、这样成功、这样务实的苏格兰造桥者,也突然认为不可能指望政府通过正常程序引发任何变革了,并认为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希望(其实也就是在汤森提出警告的五年之后)。仅仅一本佩因(Paine)的《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被特尔福德寄回自己家乡,就引发了一场骚乱。巴黎催化了欧洲人的激情。

坎宁(Canning)坚信是济贫法把英格兰从革命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他首先思考的是1790年代和法国战争。圈地运动的新爆发使得乡村中穷人的生活状况恶化了。J. H. 克拉彭(J. H. Clapham),尽管是圈地运动的一个辩护者,也承认:“在一些地区,由于济贫补助标准线的作用,工资得到了系统性的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圈地运动也在这些地区达到了白热化;这两者的并存让人印象深刻。”换言之,若非工资补助的存在,英格兰广大乡村中的穷人早已沉浸在饥馑线之下了。干草堆着火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玩具枪密谋(the Popgun Plot)被广泛地信以为真。骚乱时有发生,而骚乱的谣言更是如此。在汉普郡——当然不止在那里——法庭威胁要将任何试图“强制压低商品价格,不管是在市场上还是在公路上”的人处死;但与此同时,同一个郡的地方长官心急火燎地要求向工资提供补贴。很明显,遏制革命倾向的时代已然来临。

98

但为何,在诸多可能的措施中,被选中的却是事后看起来最不可行的那一个?让我们考虑一下当时的情势与有关的利益牵涉。地主和教区牧师当时依然统治着村庄。汤森对情势总结得很好,他说,拥有地产的绅士与制造业保持着“一个适当的距离”,因为“他考虑到制造业是波动不定的;他们能从中获得的好处不足以抵消它们给他的财产带来的负担……”这种负担主要由制造业的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效应构成,即赤贫者的增加与工资的增长。但是这两者只有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已然存在的前提下才是矛盾的,劳动力市场当然会以降低已被雇者工资的方式消除失业。在市场缺失的情况下——此时安居法仍旧在发挥作用——赤贫者数量与工资水平可以同时增长。在如此条件下城市失业的“社会代价”主要由乡村承担,在遭解雇之后,失业工人通常都会返回家乡。城镇里的高工资对农村经济是更大的负担,农业工资高出农场主的支付能力,但却低于让劳动者维持生存的水平。以长远的观点来看,农业工资无法同城镇工资竞争。另一方面,当时还存在着取消,至少是松动安居法的广泛共识,

99 即便让劳动力能找到工作，也让雇主能找到劳动力。人们感觉到，这将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并附带地降低真正工资的负担。但如果让工资“自动定价”，则城乡工资水平相差甚远的这个问题将更加压得乡村喘不过气来。工业就业的流动和回流与间歇性的失业交织在一起，会使乡村共同体陷入更加可怕的混乱。必须树立起一座大坝，以便保护乡村免受工资上涨的洪流的冲击。必须找到保护乡村环境免于社会混乱的办法，传统权威必须得到加强，必须遏止乡村劳动力源流的枯竭，要在不使农场主负担过重的情况下提高农业劳动工资。这样一个装置就是斯品汉姆兰法令。在被扔进工业革命的激流之后，它肯定要激起一股经济漩涡。但是，它的社会意涵不偏不倚地应对了情势，如果是从乡村的统治利益——地主阶层的利益——的角度来判断的话。

但从济贫管理的角度来看，斯品汉姆兰法令无疑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倒退。二百五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作为济贫管理的单元，教区实在是太小了，因为如果不能有效区分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与老弱儿童，任何济贫措施都将是充分的。这就好比今日由一个小镇单独来应付失业保险，或者将这样的保险与对老人的照料搅和在一起。相应地，只有在某个短促的时期，在济贫管理既是全国性的又是具有区别性的时候，它才可能差不多让人满意。这样的时期就是 1590 年至 1640 年间，在伯利(Burleigh)和劳德当政之时，由国王通过治安法官掌控制济贫法，那时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修造贫民救济所，同时强制劳动——被启动了。但是共和政府时期再次破坏了现在据称是国王的个人之治的这项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接下来的王政复辟完成的却是共和政府的任务。1662 年的安居法把济贫的基础限制在教区范围内，而且直到 18 世纪的 30 年代，立法给予赤贫者的关注少之又少。最后，到了 1722 年，对穷人进行区别对待的努力才告开始；贫民习艺所也在教区联合的基础上被建造起来，以便区别于从前地方性的贫民救济所；而且偶尔的所外救济也被允许了，因为习艺所现在可以提供匮乏测试。1782 年，随着吉尔伯特法案(Gilbert Act)的实施，通过鼓励教区联合，朝着扩大济贫管理单元范围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这时，教区被鼓励在周边给有劳动能力者寻找工作。这样一个政策由允许所外救济甚至工资补助的特许政策而得到补充，目的是减少对有劳动能力者的救济成本。尽管建立教区的联合只是被允许，而不是被要求，它也意味着迈向更大的管理单元以及对受济穷人的种类进行区分的一大进步。所以，100 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缺陷，但吉尔伯特法案代表了朝向正确方向迈进的尝试，并且只要所外救济与工资补助只是积极社会立法的补充，它们就不会对合理

的解决方案形成致命的威胁。然而,斯品汉姆兰法令终止了改革。通过使所外救济和工资补助普遍化,它并没有(像被错误地断言的那样)遵循吉尔伯特法案的既定路线,而是完全逆转了它的趋势,并在实际上推翻了伊丽莎白时代济贫法的整个体系。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来的关于习艺所和济贫所的区分变得毫无意义;各种类别的赤贫者与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现在将不加区分地混合为一群仰仗救济的穷人。与区分过程相反的过程开始起作用:习艺所融入济贫所,济贫所本身则渐渐倾向于消亡;教区再次成为这一真正的制度性退化杰作的全部和最终的单位。

在斯品汉姆兰法令实施之后,地主和教士的至高无上性甚至得到了加强,如果还有这种加强的空间存在的话。济贫管理者所抱怨的“权力的不加区分的慈悲”往最好里说,也不过是扮演了“托利式社会主义”(Tory socialism)的角色,在中和平法官支配着这种慈善权力,而济贫负担的压力却由乡村中产阶级来承担。大多数自耕农早就在农业革命的变幻风云中消失了,剩下的自耕农与房屋所有者在乡村统治者们的眼里,渐渐与农业工人及捡破烂者融为一体。他们不能很好地区分一直处在匮乏中的人(needy people)与暂时处在匮乏中的人(people happened to be in need);从他们那高高在上的位置观察村庄里挣扎着的生命,似乎并不存在将普通穷人(the poor)与赤贫者(the destitute)区分开来的明确界线;在收成不好的年景里,他们也不会过份地惊诧于某个小农场主在被他们灾难性的拉平效应所毁坏之后,变得要“依靠救济过活”。当然这样的情况不会总是发生,但是这种情况之有可能本身就表明许多救济费用缴纳者本身就是穷人。从整体上看,救济费用缴纳者与赤贫者之间的关系类同于当今时代的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在各种保险中的关系,即就业者负担当下失业者的生活。当然,典型的救济费缴纳者一般都不能享受贫困救济,典型的农业劳动力也不会缴纳任何救济费。从政治上看,地主对村庄穷人的提携效应被斯品汉姆兰法令加强了,然而与此同时,乡村中产阶级却被削弱了。

这一体系最不可理喻的地方恰恰在其经济方面。关于“谁为斯品汉姆兰法令买单”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答案。当然,直接而言,主要的负担当然落在济贫费缴纳者身上。但农场主们由于他们向劳动者支付低工资而部分地得到了补偿——这是斯品汉姆兰法令的一个直接后果。而且,农场主们时常被减免部分税费,如果他愿意雇佣一个本来要靠救济生活的农人的话。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该农场主的厨房与后院挤满了不必要的人手,其中有一些不过是逢

场作戏而已，而所有这些造成的开销都被计入农场主济贫账本的出借栏下。那些真正处在依靠救济之中的人的劳动，雇用起来就更便宜了。他们常干的是辗转于不同地方的“送货员(roundsman)”的工作，作为工钱支付给他们的不过是他们的食物，或者在乡村“待售站”拍卖他们的劳动力，这样他们每天也可换取若干便士。这种契约劳动值多少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总而言之，在贫困补助有时被发放给穷人的同时，肆无忌惮的房屋所有者通过向衣衫褴褛的房客索取苛刻房租而大赚其钱，而只要加在这些小茅屋上的济贫费不断征缴上来，地方当局就可以对这些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显而易见，这样一种纠缠不清的三角利益关系将会败坏任何意义上的经济责任，滋生形形色色卑微的腐败。

不过，在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斯品汉姆兰法令的买单者确有其人。它肇始于工资补助，表面上有益于受雇者，实际上是通过公共手段补贴雇主。因为这样一种补贴制度的主要效果是使得工资水平降到生存线以下。在那些完全赤贫化的地区，农场主并不介意雇佣还拥有零星土地的农业劳动力，“因为任何拥有财产的人都不会求助于教区救济，而工资水平又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在没有某种类型的补助的情况下，它并不足以维持一个已婚者的生存”。结果是，在某些地区，只有那些依靠救济的人才有被雇的机会；那些努力远离救济、想要自力更生的人几乎不能保证有份工作。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绝大多数人必然属于后一种，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作为一个阶级的雇主们都榨取了超额利润，因为他们在受益于低工资的同时却不必补偿低工资与贫困线之间的差额。从长期来看，一个如此不经济的制度必将影响劳动生产率并压低工资标准，而且最终甚至会压低地方行政长官们好心为穷人们设立的救济“标准”。

102 到1820年代时，许多郡已经削减了面包的救济标准，穷人们可怜的收入进一步被缩减。在1815到1830年间，本来在全国范围都相差不大的斯品汉姆兰标准差不多缩减了三分之一（这一缩减比例其实也是普遍性的）。克拉彭对济贫总负担是不是像那突发的抱怨所表现的那样严重深感疑虑。他是正确的。因为尽管济贫负担的增长引人注目，而且在某些地区似乎是灾难性的，但实情更可能是：与其说是负担本身，不如说是工资补助制度对劳动生产力产生的经济后果才是麻烦的根源。以受冲击最为猛烈的地区南部英格兰为例，它的济贫支出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不足3.3%——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承受的负担，克拉彭这样认为，因为他看到这笔总数的相当一部分“本该用来支付穷人的工资”。实际上，济贫总费用在1830年代是稳步下降的，而且由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它

们的比重一定下降得更快。在 1818 年实际用于穷人救济的总费用是八百万英镑；它们几乎是在持续下降，到 1826 年已不足六百万英镑，而此一阶段国民收入的增长是迅速的。所以，此时对斯品汉姆兰法令越来越猛烈的批评看起来应该归因于以下事实，即大众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开始使整个国民生活失去活力，并严重地束缚了工业自身的能量。

斯品汉姆兰法令催生了一场社会灾难。我们总是把早期资本主义的种种耸人听闻的现象当做感伤的材料，这是不公平的。作为济贫法修正案的狂热倡导者的哈丽雅特·马蒂诺所描绘的图景与领导反对济贫法修正案的宪章主义鼓吹者所描绘的相比，大同小异；鼓吹立即取消斯品汉姆兰法令的那份著名的济贫法委员会报告(1834)所提出的事实，也可以为狄更斯(Dickens)反对该委员会政策的运动所用。不管是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无论是布莱克(Blake)还是卡莱尔(Carlyle)，都相信人的形象本身已被某种可怕的灾难所玷污了，他们都没错。比诗人和博爱主义者痛苦和愤怒的爆发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目睹这些图景时冷冰冰的沉默，正是从这些图景中诞生了他们那现世永劫的哲学。

103

毋庸置疑，机器与迫使人们服务于机器的环境这两者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产生了许多无可避免的后果。英国的乡村文明不像大陆，它缺少那些后来能让工业城镇成长于其中的城市环境。^① 在它的新城镇里，缺少定居在那里的城市中产阶级，没有由手艺人 and 工匠组成的社会中坚层，没有令人尊敬的小资产阶级和市民来同化这些粗鄙的外来务工者，他们——被高工资吸引而来或者被阴险的圈地运动驱赶而来——在早期的工厂里做着苦工。中部和西北部的工业城镇是文化上的荒漠，它的贫民窟只是反映了它缺少传统和市民的自我尊重。在被扔进这个荒凉的悲惨泥沼后，这些迁移而来的农民，甚至从前的中农和不动产所有者，很快就被转化为泥沼里无法辨认的动物。并不是他们挣得太少，或者劳动时间过长——尽管这两者常常以超限的程度发生——而是因为他们现在生存于否定他作为人的生活的物质环境中。非洲丛林中的黑人，当他发现自己被关在笼子里，并在贩奴船的底舱里拼命喘气的时候所感受到的，大约就是现在这些移民的感觉。然而这些仍不是不可治愈的。只要一个人拥有一个他可以坚守的社会地位，一个由他的亲属或者同伴所设定的行为模式，他就可以为之斗争，并由此重获自己的灵魂。但对于劳动者来说，这

^① 厄舍(Usher)教授把普遍城市化的开始时间定为 1795 年。

只能以一种方式发生：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新阶级的一员。除非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赤贫者。人为地将他置于此种境地，这是斯品汉姆兰法令所造成的后果中最可恶的。这一暧昧的博爱主义行动阻止了劳动者将自己构造成一个经济阶级，并由此剥夺了他们避开在经济磨盘(the economic mill)里那被注定的命运的唯一手段。

104 斯品汉姆兰法令不折不扣地造成了普遍的道德退化。如果说一个人类社会是一架为维系其赖以确立的那些规范而自我运作的机器，那么斯品汉姆兰法令则是一架破坏这些规范，从而使任何社会都无法有稳固基础的自动挖掘机。它不仅给逃避工作与假装匮乏以奖励，而且在人们努力逃脱赤贫化命运的节骨眼儿上增加了赤贫化对人的吸引力。一旦一个人进了济贫所(只要他和他的家庭曾受过救济，他就会经常身陷那里)，他就落入了圈套而很少能够逃脱。许多世纪的定居生活所造就的持重和自尊很快就会在济贫所的混乱中消耗殆尽，在那里人必须小心谨慎，不能造成他要高于其邻居的印象，以免被强迫外出去寻找工作，而不能继续在这个熟悉的空间里“享受福利(boondoggling)”。“贫困救济已成为公共掠夺的赃物(public spoil)……为了得到它，暴戾者胁迫管理者，放荡者展示他们的私生子以表明他们必须被供养，懒汉抱起胳膊等待，直到他们得到为止；无知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为此而结婚；强盗、小偷和娼妓用恐吓和勒索来得到它；地方官员挥霍它以便讨好大众，济贫工作者则为了自己图方便而任凭它流失。这就是这个基金运转的方式……”“与使用适当数量的劳动力耕作他的土地——如在他自己支付工资的情况下那样——相反，农场主被迫采用双倍的人手，后者的工资部分地由救济基金提供；而这些人，由于是被迫受雇于他，也就不受他节制——他们干不干由自己——使农场主的土地质量降低，并使他无从雇用更好的人，即那些为了自己的独立起见原本会努力耕作的人。这些好的人堕落成了最坏的人；那些本来缴纳济贫费的农人，在一番徒劳挣扎之后，只得再次来到纳费桌前，不过这次为的是寻求救济……”哈丽雅特·马蒂诺如是说。^① 后世忸怩作态的自由主义者不光彩地忽略了这位公开支持他们信条的先驱者的这段回忆。不过即使是她的夸大——也正是为他们现今所惧怕的——也起到了使灯光聚焦到正确地方的作用。她本人就属于那个挣扎着的中产阶级，他们那有教养的贫困(genteel poverty)反而使他们对济贫法错综复杂的道德效应更加敏感。她懂

^① Martineau, H.,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peace (1816—1846)*, 1849.

得并清晰地表达了社会对一个新阶级、一个“独立劳动者”阶级的需要。他们是她梦想中的英雄,并且她使得其中的一个——一个拒绝依靠救济的长期失业者——自豪地对一个准备去申请救济的同伴说:“我站在这里,不让任何人敢蔑视我。我可以把我的孩子们放到教堂走廊的中央,而不怕任何人敢于对他们的社会地位表示轻蔑。也许有人更聪明,也许有人要有钱得多,但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有尊严。”而统治阶级的大人物们则还远没有理解对这个新阶级的需要。马蒂诺小姐指出了“贵族阶级的这一庸俗错误,即在财富阶级之下社会上只存在一个下层阶级,贵族的责任就是对付他们。”她抱怨道,艾尔顿(Eldon)勋爵,与其他见多识广的人一样,“在一个名称(“下层阶级”)下囊括了最富有的银行家之外的所有人——工厂主、商人、工匠、劳工与赤贫者……”^①然而恰恰这后两者的区别,她激动地坚持认为,正是社会的未来所系。她写道:“除了统治者与臣属者之间的区分,在英国没有什么社会差异像独立劳工与赤贫者之间的区别那样广泛;而且混淆这两者也与混淆前两者一样无知、不道德和不审慎。”这当然很难说就是事实;在斯品汉姆兰法令之下这两者间的区别已经不存在。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预言性的政策宣言。这个政策就是济贫法改革委员会的政策;这个预言预见到一个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随之出现的工业无产阶级。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除是现代工人阶级真正的诞生之日,他们的直接自我利益注定要使他们成为与机器文明所固有的危险针锋相对的社会保护者。但无论给他们设定的未来如何,从历史上说,工人阶级与市场经济是同时出现的。对公共救济的仇恨,对国家行为的不信任,对尊严与自立的坚持,一直是许多代英国工人的特征。

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除乃是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新阶级的杰作,这个阶级就是英国中产阶级。地主阶级无法完成注定由这个新阶级来完成的使命:把社会转变为市场经济。在这个转变发生之前,几十条法律被取消,而另外又建立了一些法律。1832年的国会修正法案剥夺了已经腐朽的城市代表权并把下议院(the Commons)权力一次性彻底给了下议院议员。他们的第一个重大改革行动就是废止斯品汉姆兰法令。只有我们意识到它的父爱主义方式是怎样融入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即使是改革最激进的支持者也不敢轻易建议一个少于十到十五年的转型期。实际上,它是突然发生的,这使后来英国渐进主义的神话成为一派胡言——其实这种神话是人们为了寻找反对激进

105

106

^① Martineau, H., *The parish*, 1833.

改革的论据而生造出来的。这一事件的粗暴冲击在许多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梦魇^①中萦绕不去。这一开颅剖腹般的手术之所以能够成功,全仗各阶层,包括劳工阶层自身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支撑,这一信念就是:无论斯品汉姆兰体系看起来多么光鲜,它的本质是对大家的掠夺;“生存权”实际上是致命的绝症。

新的法律规定,将来不会有任何所外救济。它的管理是全国性和区别性的。在这方面它也是彻底的改革。当然,工资补助被取消了。习艺所测试被重新引入,当然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现在,由申请者自己决定,他自己是不是已经穷于任何谋生手段而自愿依赖于一个被有意弄得阴森恐怖的屏护之所。习艺所被盖上了耻辱的标记;由于必须遵循其整洁卫生的要求,生活于其中成为一种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煎熬——实际上,这种整洁卫生创造性地成为进一步剥夺的伪装。不再是治安法官,也不再是地方监督者,而是更广泛的权威——济贫管理员——将在独断的中央监督下管理法律的实施。赤贫者的葬礼本身也被弄成了这样一种行为,即让死者的伙伴们宣布,即使死后也要与他划清界限。

107 在1834年,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整装待发,济贫法改革也告启动。屏护了乡村英国和更广泛的劳动人民并使其免于市场机制全力发挥所带来的威胁的斯品汉姆兰法案已深入社会的骨髓。在它被取消时,劳动大众已不具人形,而更像梦魇中的鬼魂。但是如果说工人从身体上被非人化了,那么所有者阶级则从道德上被降格了。传统整合的基督教社会现在已让位于一个富裕者阶级拒绝对其穷困邻人的生存条件担负责任的社会。两个国度的世界(the Two Nations)正在形成。让那些思考着的大脑感到迷惑的是,闻所未闻的财富被证明是与同样闻所未闻的贫困密不可分的。学者们一致宣布,一门不容置疑地颁布统治人类世界之法门的科学被发现了。正是在这些法则的命令下,同情被驱逐出心灵,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名而拒斥人类团结的斯多葛式的决定论自此获得了世俗宗教的崇高地位。

市场的机制正在自我确证并叫嚷着自身的完善:人类劳动必须被变成商品。反动的父爱主义曾徒劳地试图抵抗这种必然性。从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噩梦中逃脱出来之后,人们盲目地冲向了市场经济乌托邦的屏护。

① 原文作“daydream”,即“白日梦”、“妄想”之意,似乎与上下文不符,改译成“梦魇”。——译者注

第九章 贫困与乌托邦

贫困问题集中于两个紧密相连的主题：赤贫化与政治经济学。尽管我们将分别讨论它们对现代人类意识的冲击，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事实就是：社会的被发现。 108

直到斯品汉姆兰时期，对于穷人们到底是从哪里涌出来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在 18 世纪思想家中间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贫困化与进步之间密不可分。最大多数的穷人不在荒凉的国家或者未开化的民族，而是存在于最富饶、最文明的国度，约翰·穆法兰(John M'Farlane)在 1782 年这样写道。贾马里亚·奥特斯(Giammaria Ortes)，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在他 1774 年宣称的一条公理中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其人口成正比；而其悲惨程度(misery)则与其财富成正比。即使是亚当·斯密也以他小心谨慎的方式宣布，劳动工资并不是在最富裕的国家里才最高。因此，当穆法兰表明他的以下信念时，他并不是在表达一种不同寻常的观点，他说，由于英格兰尚未达到它伟大的顶点，所以“穷人的数量还将持续增长”。^①

同样，对一个英国人而言，预言商业将出现停滞也不过是在重复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如果说 1782 年之前半个世纪的出口增长让人瞠目，那么它的大起大落更是如此。贸易正在从一次几乎降至半个世纪之前水平的暴跌中恢复过来。对当时人而言，七年战争之后贸易的巨大扩张与国民财富的明显增长，仅仅表明英格兰也抓住了自己的机会，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都曾经历过的一样。现在它的陡然增长已成为过去，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它的增长将 109

^① 穆法兰, J.,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亦参见 Postlethwayt 在 1757 年的大辞典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中对 1531 年 10 月 7 日生效的荷兰济贫法的编辑评论。

会持续,这种增长看起来不过是一次幸运的战争的产物。几乎不约而同地,如我们所见,人们预料的都是贸易的衰退。

而实际上,繁荣的曙光正从黎明前的黑暗背后悄悄来临,这个繁荣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注定要改变的不仅是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但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没有人对它的即将到来作出哪怕最微弱的预言。对政治家而言,这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事,因为在接下来两代人的时间里,扶摇直上的贸易额也仅仅只在微乎其微的程度上能缓解大众苦难。但就经济学家而言,这完全是一个不幸,因为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反常的”洪流中树立起来的,贸易和生产的巨大增长碰巧伴随着人类苦难的巨大增长——实际上,马尔萨斯、李嘉图与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所赖以建立原理的那些事实仅仅反映了一个界限清楚的转型时期那些无所不在的悖论倾向。

110 情势确实令人迷惑。穷人第一次在英格兰出现是在16世纪上半叶,他们作为脱离采邑“或任何封建等级(feudal superior)”的个体而引起注意。由于对流浪的暴戾惩罚和由国际贸易持续增长所推动的家庭工业迅速发展的联合作用,这些穷人逐渐转变为一个自由劳动者阶级。在整个17世纪期间,很少有人提到贫困现象,甚至安居法的那些激烈措施,也被顺利通过而没有引起公众讨论。当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和早期济贫法公布都已经150年之久、17世纪正走向尾声的时候,讨论方才复活,而此时修道院的解体和凯特叛乱(Kett's Rebellion)已经被人们遗忘多年。某些圈地和“占地”一直继续着,例如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新阶级已经稳定下来了。虽然在16世纪中叶,穷人对于社会而言是一种如临大敌的威胁,但是到了17世纪末,穷人变得仅仅只是救济税负的负担而已。另一方面,此时的社会不再是一个半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半商业化社会,其中多数人是出于工作本身的原因而乐于工作,他们既不能接受中世纪那种认为贫困不是问题的观点,也不能接受成功的圈地者们那种觉得失业者都是些游手好闲的懒汉的论调。自此之后,对赤贫化的看法开始反映为哲学观点,很像此前对待神学问题那样。关于穷人的看法越来越反映为关于整体生存的看法。因此,这些观点虽然各异且眼花缭乱,却也反映了对我们文明史的最主要的兴趣所在。

110 资格派教徒(The Quakers)是探索现代生存之可能性的先驱,他们首先认识到非志愿性失业必然是劳动组织的某些缺陷造成的结果。倚仗着对有条不紊的办事方法的信念,他们成功地把集体自助的原则应用于他们中间的穷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可以不必在当局关押这些可怜人的同时,还要向当

局掏钱来感谢这种关押——在他们看来,这是与当局暴政的可耻合作。劳森(Lawson),这个狂热的贵格派教徒,出版了一本名为《就穷人问题对国会的呼吁:应该让英格兰没有乞丐》的小册子作为他的“施政纲领”,在其中他提议建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就业机构的劳动交易所(Labour Exchanges)。这是1660年的事;而在此之前十年,亨利·罗宾逊(Henry Robinson)已经建议成立一个“常住与流动地址登记局”。但复辟政府偏爱的是更缺乏想象力的做法;1662年的安居法完全与任何一种理性的劳动交换体系相抵触,这种体系本来可以产生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安置(settlement)——这个字眼首次进入法律——将劳动者束缚于教区之中。

光荣革命(1688年)之后,贵格派哲学在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那里,产生了一个体现出遥远未来之社会思想的预言。在受难礼拜会(the Meetings of Sufferings)所营造的气氛——该会的统计数据经常用来为宗教济贫政策提供精确的科学依据——中,他于1696年提出关于建立“产业团会(Colleges of Industry)”的建议,在其中,穷人的非志愿性空闲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作为这个建议基础的,不是劳动交换(labor exchange)的原则,而是完全不同的交换劳动(exchange of labor)的原则。前者仅仅与为失业者找个雇主的常见理念相联系,后者所意味的,则等于说只要劳工们能直接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劳动者就根本不需要雇主。“穷人的劳动是财富之源,”贝勒斯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反过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通过开发这种财富而养活自己,甚至有所盈余呢?为此,所需的一切不过是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可以让他们汇聚自己的努力的“团会(College)”或者法团。这正是后来所有关于贫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这些思想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欧文的联合村庄(Villages of Union),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s),蒲鲁东的交换银行(Bank of Exchange),路易斯·布朗(Louis Blanc)的国家工场(Ateliers Nationaux),拉萨尔的国家工厂(Nationale Werkstätten),或者就此而言,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贝勒斯的这本书实际上包含了自现代社会首次出现机器所造成的巨大混乱以来的绝大多数相关建议。“这样一种团会关系(college-fellowship)将使劳动而不是货币,成为一切必需品的价值标准……”它被设计为“囊括所有必要的行业团会,每一个团会都为其他团会而努力,不再需要依靠外来救济……”劳动券、自助与合作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意义重大的。劳动者的数量达到三百,就可以自我维持,并共同为他们的生存而奋斗。“如果干得比这更多,就该因此得到报酬。”于是为满足生存需要的定量配给就与按劳取

酬的原则相结合。在一些规模稍小的自助实验中,经济剩余的去向是“受难礼拜会”,它们被用来为该信仰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谋福利。这种剩余注定要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利润这个新概念在当时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万能药。贝勒斯失业救济的全国性框架实际上被资本家用来牟利了!在同一年,1696年,约翰·卡里(John Cary)筹划成立了布里斯托尔济贫公司(the Bristol Corporation for the Poor),这个公司最终与所有其他同类的尝试一样,在最初的成功之后无法持续盈利。但贝勒斯的建议的基础与约翰·洛克的劳动比率制度(labor-rate system)——巧的是,这个体系也是1696年提出的——是一样的,即应该根据济贫费缴纳者的交费金额,把乡村穷人按比例分配给他们,为他们工作。这正是吉尔伯特法案(Gilbert's Act)下粗暴的巡回工作制度(system of roundsmen)的源头。赤贫者可以被用来从事付薪工作这一想法紧紧抓住了人们的心。

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作为最多产的社会设计师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才推出了大规模使用赤贫者操作机器来完成木工和铁器活儿的计划,这些机器是他更具创造才能的兄弟萨缪尔(Samuel)所发明的。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爵士说,“边沁同他的兄弟一起,曾经希望捣鼓出一台蒸汽机。不过现在他们想要利用的,不再是蒸汽,而是犯人。”这是在1794年;边沁那能够廉价而有效地进行监视的圆形监狱设计已经存在两三年了,现在他决定将其用于他的靠犯人劳动的工厂;只是犯人的位置将被穷人所代替。不久,他们兄弟俩的私人商业冒险融入了一个试图从总体上解决该社会问题的一般框架。斯品汉姆兰地方长官的决定,惠特布雷德(Whitbread)的最低工资的议案,以及最为重要的,皮特那私下流传的关于济贫法改革的法律草案,所有这些都使贫困成为政治家们讨论的议题。边沁——他对皮特法案的批评被认为导致了这一法案的撤销——现在走到前台来,在阿瑟·杨(Arthur Young)的《年鉴》上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建议(1797年)。他的那些“工业厂房(Industry-Houses)”——基于他的圆形监狱式设计,目的是剥削受助穷人的劳动,其规格是五层十二个单元——被位于首都的中央董事会控制,这个董事会仿照英格兰银行董事会,所有拥有五或十英镑股份的成员都拥有投票权。数年之后发表的一个文本里这样说:“(1)对南英格兰所有贫民事务的管理应被置于一个机构之下,其费用由一个基金支出。(2)这个机构,是一个名为国家

慈善公司(National Charity Company)的联合股份公司。”^①待建的工厂将不少于250个,大致容纳50万人。这一计划附带着一份对失业种类的详细分析,这种分析让边沁超前一个多世纪得到了后世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他的分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对现实主义的把握能力(capacity for realism)。那些最近才被解雇的“不合适的人手”被区别于那些由于“间歇性萧条”所造成的失业者;季节性工人的“周期性不景气”应区别于“被取代的失业”,例如“由于机器的引入而造成剩余的”失业,或者用更现代的术语说,技术性失业;最后一类是“裁员造成的失业”,这是在边沁那个时代由法国内战引起的另一个现代范畴。但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一类,还是上面提到的“间歇性萧条”所造成的失业,其中不止包括了那些岗位依赖于流行风尚的手艺人与工匠,更重要的包括了那些“在制造业的综合性萧条中”失业的人。边沁的计划从整体上相当于通过大规模地将失业商业化来抹平商业周期本身。

113

在1819年,罗伯特·欧文重新出版了贝勒斯120多年前建立产业团会的计划。此时间歇性的贫困已演变成苦难的洪流。欧文的联合新村与贝勒斯的区别只在于它规模上更大了,由1200人组成,占地的英亩数也是1200。在为这一旨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高度实验性的计划募捐委员会里,包含了大卫·李嘉图这样的权威。可是并没有任何捐款者出现。晚些时候,法国人傅立叶由于整天期盼一些匿名合伙人来投资他的法伦斯泰尔计划而受嘲笑,这个计划基于当时英国最出色的财务专家所激发出来的理念。其实罗伯特·欧文在新拉纳克(New Lanark)的公司——杰里米·边沁作为该公司的匿名合伙人——不也是由于它的慈善计划在财务上的成功而世界知名的吗?这个时候还没有关于贫困的标准看法,也没有从穷人身上盈利的可行方法。

欧文从贝勒斯那里接过劳动券的理念,并在1832年将其应用在他的全国劳动公平交换机构(National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中,不过这项尝试失败了。与之紧密相关的劳动阶级经济自足理念——这同样是贝勒斯的——是接下来两年里那场著名的工会运动的基础。这个工会是所有行业公会的总联合,包括工匠、手艺人,也不排除小业主,其不甚清晰的目的在于用和平的方式把自己组成一个社会团体。谁能想到它就是接下来一百年里如此壮烈的大工会(One Big Union)运动的胚胎?工团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它们对待穷人的方式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蒲鲁东1848年的交

^① 边沁, J., *Pauper Management*。首版于1797年。

换银行,作为无政府主义的首次实践,本质上是欧文实验的产物。马克思,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①,严厉抨击了蒲鲁东的理念,并认为只有国家才是为这种集体主义框架提供资本的合适主体,而在这种框架的诸多变种里,只有路易斯·布朗和拉萨尔被载入了史册。

114 为何不能从赤贫者身上赚到钱,经济方面的原因并不神秘。答案是由150年前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提供的,他出版于1704年的小册子中止了贝勒斯和洛克所引发的讨论。笛福坚持认为如果穷人被救济了,他们就不会为了工资而工作;如果他们被组织在公共工厂里从事生产,那只会私人工厂中制造更多的失业。笛福的小册子有一个撒旦式的标题:“施舍并非仁慈;雇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随后是曼德维尔医生(Doctor Mandeville)更著名的打油诗,说的是一种高级的蜜蜂,其家族之繁荣盖缘于对自负与嫉妒、邪恶与浪费的鼓励。但如果说后面这个古怪的医生沉浸于狭隘的道德悖论之中的话,前面那个小册子的作者倒是点中了新政治经济学的要害。可是笛福的小册子很快被“下层政治(inferior politics)”——18世纪时“对济贫监管问题的”称呼——圈子之外的人遗忘了,而曼德维尔的廉价悖论却影响了像贝克莱、休谟以及斯密这样优秀的头脑。很明显,在18世纪前半叶,动产依然是个道德问题,而贫困则还不是。清教徒阶级震惊于封建式的铺张浪费,他们的良心认为这是奢侈和邪恶,可是他们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同意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如果没了这些罪恶,商业与贸易将会迅速衰败。后来这些富有的商人再次从道德上使生意得到肯定:新兴的棉纺工业再也不是去迎合无聊的炫耀,而是为满足平淡的日常所需,由此形式微妙的浪费发展了起来——它表面上不显眼,可实际上比原有形式造成的浪费更甚。笛福对救济穷人的嘲弄并不足以穿透那些担心财富的道德危险的良心;工业革命尚未到来。但是,就现状而言,笛福的悖论则是对即将到来的那个死结的预告:“施舍并非仁慈”——因为去除了饥饿的危险也就阻碍了生产并因而产生了饥荒;“雇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因为通过创造公共就业,就会增加市场上物品的供给过剩,从而加速毁坏私有商行。17世纪初,在约翰·贝勒斯这个贵格派教徒与丹尼尔·笛福这个见风使舵的记者之间,在神圣与愤世嫉俗之间,这些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数的工作与思考、希望与苦难,都是想为

^① 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纳粹主义;其英文为“state-socialism”,而不是“national-socialism”。“state”与“nation”虽然都译为国家,但前者偏重政权,后者偏重民族。——译者注

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但在斯品汉姆兰时期,贫困化的真正本质仍然未被认识。对于巨大数量的人口,存在着普遍的共识,人口应该尽可能地多,因为国力是由人构成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关于廉价劳动力的共识,因为只有劳动力廉价,制造业才能繁荣昌盛。而且,除了穷人,谁愿意做船上的水手,谁愿意奔赴前线?但是,对于贫困到底能否不被视为一种恶,人们还是有疑问的。并且,为什么穷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像为私人企业赚钱那样为公共福利而受雇于公共机构?对这些问题,尚无具有说服力的答案。笛福撞上了真理,这个真理在70年之后可能(也可能没有)被亚当·斯密所理解;市场体系的未发展状态掩盖了它的先天缺陷。不管是新出现的财富,还是新出现的贫困,此时都不大容易被理解。

115

问题尚处在化蛹期,这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体现出来:尽管这些大脑如此不同——贝勒斯是贵格派教徒,欧文是无神论者,边沁是功利主义者——可他们所设计的蓝图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欧文,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平等与天赋人权的热忱信仰者;而边沁蔑视平等主义,嘲讽人的权利而极端倾向自由放任。但是欧文的“平行四边形(parallelograms)”计划与边沁的工业厂房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人们可能想象他的灵感完全是被后者激发的,如果大家想不起他其实是继承自贝勒斯的话。所有这三个人都相信,对失业者的适当的组织必然会生产出剩余,对于这些剩余,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贝勒斯首先希望以此解救其他的受苦者;边沁,一个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则希望将其馈赠给股东;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欧文,则希望将其返还给劳动者本人。然而,尽管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揭示出将来三者之间分裂的几乎不可察觉的信号,他们共同的错觉却暴露了他们对新生的市场经济中赤贫化问题的理解的根本错误。比他们之间所有其他差异都重要得多的差异是,在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时期,穷人的数量发生了持续的增长:1696年,当贝勒斯写作时,济贫总费用大约40万英镑;在1796年,当边沁抨击皮特法案时,这个数字大约突破了200万英镑;到1818年罗伯特·欧文时代开始时,费用总数已接近800万英镑。在这120年的时间里,人口大约增加了两倍,但济贫费用却增加了20倍。贫困化已成为一种征兆。但它的意涵仍只在人们的猜测之中。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116 当贫困的意义被揭示时,19世纪也即将到来。分水岭大致是在1780年左右。在亚当·斯密的巨著中,济贫尚未成为问题,仅在十几年之后,在汤森的《论济贫法》中,它就上升为一个广泛的议题,并且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从未从人们的头脑中消退过。

的确,从亚当·斯密到汤森,氛围的变化是惊人的。前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由国家的开创者托马斯·莫尔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路德(Luther)和加尔文所开启的;后者属于19世纪,此时李嘉图和黑格尔从相反的角度发现了一个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受国家法律支配的,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使国家服从它的法律。必须承认,亚当·斯密把物质财富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加以探讨;他怀着巨大的现实意识去完成这一研究,这使得他成为一门新学科——经济学——的创始人。然而,财富对他来说仅仅是公共生活的一个方面,相对于公共生活的目的而言财富只是从属性的;它是国家在历史的生存斗争中的附属品,并且不能与国家相分离。在他看来,在决定国家财富的诸多条件中有一组取决于这个国家在整体上是处于上升、稳定还是衰落阶段;另一组则取决于安全保障的最高重要性以及势力均衡的需要;还有一组取决于政府决策支持的是城镇还是农村,是工业还是农业;所以,在他看来,只有在一种既定的政治框架内才有可能来阐述财富问题,这一政治框架指的是“人民所组成的巨大总体”的物质福利。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倾向认为是那些资本家的经济利益给社会制定了法则;没有倾向认为资本家是那个把经济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加以支配的那种神圣旨意的世俗代言人。对于他而言,经济领域还不曾有它自己那种能为我们提供善恶标准的法则。

斯密希望把国民财富看成是国民生活的一种功能,包括物质的和道德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海军政策与克伦威尔(Cromwell)的海事法如此契合的原因,也是他关于人类社会的观念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自然权利体系相符合的原因。在他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社会中存在着一个可以提供道德法则和政治义务的经济领域。自利动机只是促成我们去做那些本质上也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像屠夫的自利原则将最后供应我们晚餐所需的肉食一样。一种广泛的乐观主义占据着斯密的头脑,在他那里,统治着世界的经济部分的法则与统治着世界其他部分的法则一样,是与人的命运和谐一致的。并没有无形之手试图以自利原则的名义强加给我们自相残杀的习俗。人的尊严是他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尊严,他是作为家庭、国家和“人类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 of mankind)”的公民秩序的一个成员。理性和人性给计件工作设定了限制,竞争和营利也必须给前两者让路。自然的东西即是与人的精神原则相一致的东西,而自然秩序则是与那些原则相一致的秩序。在财富问题上斯密有意识地排除了物理意义上的自然。“无论土壤、气候或特定国家的领土范围是怎样的,它的年度物质供给是丰富还是匮乏,在那个给定的条件下,取决于两种情况”,即劳动技能和社会上工作人员与空闲成员之间的比例。并非自然因素,而是人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在他书的开始部分就排除了这种生物和地理的因素,这种做法其实是有意如此的。重农主义者的谬见被他用作一种警示;他们对农业的偏爱诱导他们将物理性质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混淆,并且促使他们认为只有土地才是真正有创造力的。认为他会赞美重农主义,这是对斯密思想的最大误解。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应该涉及的是那些对于人而言本是自然的事,而不是自然本身。

十年后出现的汤森的那篇长篇论文,讲述了一个关于山羊和狗的法则。故事发生在太平洋上智利沿海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的那个小岛。在这座岛上胡安·费尔南德斯(Juan Fernandez)放养了一些山羊,以便提供自己将来前来游玩时所需的肉食。山羊以神话般的速度繁殖,并且成了私掠海盗的便利食物储备,这些海盗多数是骚扰西班牙贸易的英国人。为了毁掉这些海盗的食物储备,西班牙当局在岛上放养了一只公狗和一只母狗,随着时间的推移,狗繁殖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于是减少了海盗所能吃的羊的数量。“然后一种新的平衡重新建立起来了,”汤森写到,“两个物种中,首先是最弱者偿还自然之债;最活跃和强健者则保存了生命”。对此他又写到:“正是食物的数量控制着人口的数量”。

我们注意到,对资料进行的探究^①无法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胡安·费尔南德斯确实放养了山羊;但是传说中的狗被威廉·芬内尔(William Funnell)描述为美丽的猫,并且据说无论是猫还是狗都没有大量繁殖;此外,山羊都居住在不易接近的岩石上,而所有说法都一致表明,当时海滩有很多更吸引野狗去捕食的肥海豹。然而,范式并不取决于经验的支持。缺乏考古的真实性对以下事实毫无损害: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灵感盖源于此——马尔萨斯从孔多塞(Condorcet)那里获悉这个故事,而达尔文对此事的了解则来源于马尔萨斯。然而不管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都无法对现代社会施加任何重要的影响,假如没有下面这些格言在他们的理论中起作用的话(这些格言是汤森从他的山羊和狗推断出来并继而希望适用于济贫法改革的):“饥饿将驯服最凶猛的动物,它将教导最执拗的人正派和谦恭、恭顺和服从。一般地,只有饥饿才能激励并且驱策他们[穷人]去劳动;然而我们的法律却说他们绝不应该挨饿。必须承认,法律同样说过,应该迫使穷人们去工作。然而法律对穷人的这些约束伴随着许多纷争、暴力与不和谐;也制造着恶意,并且从未提供过良好的和可接受的服务:然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安静的、永不懈怠的压力,作为工业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机它能唤起最强有力的努力;并且,当它被别人的自愿施舍所满足时,饥饿就会为善意和感激铺设持续和确定的基础。奴隶必须被强迫工作,但是应该让自由人保留他自己的判断和审慎;应该保护他自己全部地享受,不管是多还是少;一旦他侵犯周围人的财产,就要受到处罚。”

119

这是政治科学的一个新起点。从动物性方面来探讨人类共同体,汤森绕开了本来被认为无法避开的、关于政府统治的基础的问题;并且由此将一个关于人类事务法则的全新概念引进来了,那就是自然法则。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几何学偏向,休谟(David Hume)、哈特利(David Hartley)、凯奈和爱尔维修(Helvetius)对社会中的牛顿定律的渴望,仅仅是隐喻性的:他们极欲在社会里发现像万有引力定律之于自然界一样的法则。不过,在他们想来,这应该是一条属人的法则(as a human law)——例如,一种精神力量,诸如霍布斯那里的恐惧,哈特利心理学里的联想(association),凯奈那里的自利,或者爱尔维修那里的对效用的追求。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凯奈和柏拉图(Plato)一

^① 参见 Antonio de Ulloa, Wafer, William Funnell 以及 Isaac James (他书中也有 Wood Rogers 船长对 Alexander Selkirk 的描述)的作品以及 Edward Cooke 的观察。

样,时不时站在人类畜养者的立场,而亚当·斯密当然不会忽视实际工资和劳动的长期供给之间的联系。不过,亚里士多德已经教导过我们,只有神或兽才能在社会之外生存,而人既非神亦非兽。基督教思想也认为在人和兽之间的差别是本质性的;任何有关生理学事实的探索都不能混淆于有关人类共同体精神根源的神学。在霍布斯看来,如果人对人像狼一样的话,那是因为超出社会范围的人表现出狼性,而不是因为人和狼在生物学上有任何共同的生物因素。从根本上说,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还没有人构想出不认同法律和政府的存在的共同体。但是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的岛上,既没有政府也没有法律;然而在山羊和狗之间却有平衡。这种平衡是由狗发现的吞食山羊的困难性(山羊逃入了岛中岩石地区)和山羊不得不面对的不便性(逃离狗以获得安全)而保持的。不需要政府去保持这种平衡;一方面是饥饿的折磨,另一方面是食物的缺乏,两者结合即重获平衡。霍布斯已经论证过需要暴君,因为人看起来像野兽;汤森则坚持说人类实际上就是野兽,并且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只需要最小的政府。从这个新颖的观点看,一个自由社会可能被认为是由两种人组成:有产者和劳动者。后者的数量由食品数量限制;并且只要财产是安全的,饥饿将迫使他们工作。行政长官是不必要的,因为饥饿是一个比行政长官更好的惩戒者。求助于行政长官,汤森尖刻地评论道,将是“撇开强者而去求助于弱者的权威”。

120

这个新基础非常好地适应了正在浮现的社会。自18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小麦的价格再也不是地方性的(local),而是地区性的(regional);这预设了货币的普遍使用和货物的广泛市场化。市场价格与收入,包括地租与工资,都表现出可观的稳定性。重农学派首先注意到这些规律性,可是他们难以将这种规律性建构成一个理论统一体,因为封建收入在法国依旧普遍存在,而劳动者经常是半农奴,这导致不论地租还是工资在原则上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英国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商业社会的重要部分;付给地主的租金和农业劳动者的工资都表现出对市场价格的明显依赖。只有当局确定的工资或价格是例外。然而,在这种奇特的新秩序下,尽管社会旧阶级的法律特权被取消了,并丧失了能力,但它们还继续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以前的等级之中。尽管既没有法律强制劳动者为农场主服务,农场主也没有义务使地主保持丰足,但是劳动者和农场主的行为却显得似乎存在着这样的义务。是什么法则注定了劳动者要服从一位他并没有法律义务要受其约束的主人?是什么力量把社会分成各个阶级,仿佛他们是不同种

类的人？在人类集体内部，是什么使平衡和秩序得以维持而不需要乞求政府干预，也不需要容忍政府干预？

山羊和狗的范例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人的生物本性在这里成为社会的既定基础，而这个社会的秩序并非政治性的。因此，目前开始出现的情况是，经济学家们放弃了亚当·斯密的人道主义基础，而去与汤森的那些基础相结合。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和李嘉图的报酬递减定律，使得人口生育率和土地肥率成为一个新发现王国的基本组成要素。经济社会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政治国家之外出现了。

121 这一让人的总体——一个复杂社会——凸显出来的证据在 19 世纪思想史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由于这个正在浮现的社会其实就是市场体系，所以，人类社会现在就被置于一种危险之中，因为它的原有基础，即部分地由从前的政治机体所构造的道德世界，很可能被一种完全陌生的东西置换掉。显然，正是难以解决的贫困问题迫使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认可了汤森的自然主义的倒退。

伯克完全从公共安全的角度讨论贫困问题。西印度群岛的条件使他坚信，在未对白种主人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养育大量的黑人是危险的，尤其是在黑人被允许武装自己的情况下。以此类推，他认为同样的担忧适用于失业在家的数量大量增加的情况，因为英国政府没有针对这点部署警察力量。虽然伯克是一名彻底的父权传统的辩护人，但他也是一个热情的经济自由主义拥护者，因为他从经济自由主义中看到了极为紧迫的控制贫困问题的答案。地方当局正乐于利用纱厂对贫困孩子的意外需求而从中渔利，本来照顾这些孩子是教区的责任。几百个地方当局与这些工厂签订契约。所有新城镇都发展出对穷人的好胃口，工厂甚至准备有偿使用穷人。成年人被分配给愿意养活他们的任何雇主；就像在巡回工作制下，他们被依次置于教区农场主那里劳动一样。出佃劳动力比运作“无罪监狱”（这是人们通常对贫民习艺所的称呼）要来得省钱。从管理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更持久和更缜密的雇主权”^①代替了政府和教区对劳动的强制。

显然，这里包含了一个政治才能的问题。如果教区最终能够通过把健壮的劳力交给资本主义企业家（他们是如此渴望用健壮的工人来塞满工厂，以至于愿意花钱获得这些人的服务）来履行它的职责，那么，为什么穷人就必须成

^① Webb, S. and B.,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Vols. VII-IX, "Poor Law History." (济贫法史)

为公众负担并且要靠教区来解决他们的生计呢？这不正清楚地表明了与教区救济方式相比，还有一种更便宜的强迫穷人自己谋生的方式么？解决办法就系于废除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同时又不采用任何其他的方法来代替。不再有工资评估，不再有对身体健壮的失业者的救济，甚至也不再最低工资，不再有对生存权利的保障。应该以其所是的方式来对待劳动，即作为一种必须在市场找到其价格的商品。商业法则是自然法则，从而也是上帝的法则。这难道不就是抛开弱势的权威而求助于强有力的权威，抛开治安法官而求助于全能的饥饿痛苦么？对于政治家和管理者来说，自由放任仅仅意味着用最小的代价和努力来达成对法律与秩序的保障。让市场去掌管穷人，一切都能相安无事。

只有在这一点上，作为理性主义者的边沁才与传统主义者伯克相一致。痛苦和快乐的算术要求，避免了一切可避免的痛苦。如果饥饿管用的话，也就不需要其他的惩罚。“对于生存，法律能做什么？”对于该问题，边沁回答道，“坦白而言，什么也做不了。”^①贫困就是社会的自然选择(Nature surviving)；它的肉体惩罚就是饥饿。“肉体惩罚的力量已经足够了，政治惩罚是多余的。”^②除了“科学而经济有效地”对待穷人之外，一切都不必要。^③边沁强烈反对皮特的济贫法案，因为一旦当它允许所外救济和工资补助，这一法案可能已经相当于一个斯品汉姆法令了。然而与他的学生们不同，此时的边沁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工业厂房是一个事无巨细的功利主义管理的噩梦，它是通过科学管理的全部卑鄙手法实施的。他坚持，由于共同体不能面对贫困而完全置之不理，故而这种设置总是需要的。边沁相信贫困是繁荣的一部分。“在社会繁荣的最高阶段，”他说，“除了他们每日的劳动，大部分公民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其他资源，因此总是徘徊在贫困的边缘……”因而他建议“应该为穷人的需求建立常规的捐赠制度”，不过，就像他歉意地补充到的，这样“在理论上需求就会减少，从而使工业受到打击”，因为从功利主义观点出发，为了使饥饿的肉体惩罚有效，政府的任务就是增加需求。^④

让大多数公民濒临贫困是为繁荣的最高阶段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对这一观点的接受伴随着非常不同的人类态度。通过沉浸于偏见和感伤主义之中，

① Bentham, J.,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Ch. 4. (Browning, Vol. I, p. 333.)

② Bentham, J., *ibid.*

③ Bentham, J., *Observation on the Poor Bill*, 1797.

④ Bentham, J.,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p. 314.

汤森重获了他感情的平衡。穷人目光短浅是一条自然法则，否则卑贱、肮脏和不体面的工作就没人去做了。此外，如果我们不依赖穷人，英国的情况将会怎样呢？“除了在底层人民中流行的痛苦和贫困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使他们对暴风雨般的大海或战场上等待着他们的全部恐怖呢？”但是这种粗鲁的爱国主义表现仍然为更温柔的情感留有余地。当然了，穷人救济应该被彻底废除。济贫法“其实是基于近似荒谬的原则，因为它假装要完成那些由世界的本性与结构决定了的不现实的事情”。但是，一旦穷人完全依赖于富人的仁慈，有谁怀疑“唯一的困难”就是阻止后者那些过分激烈的仁慈倾向？然而，慈善的感情难道不比那些出自必须遵守法律义务的救济行为高尚得多吗？“本质上，还有比仁慈心的适度满足更美妙的事吗？”他呼吁，并把仁慈与冷酷无情的“教区缴费桌”相对照，在后者那里根本看不到“对意外援助的真实感激的朴实表达……”“当穷人被迫与富人培养友谊时，富人绝不会缺乏把穷人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倾向……”凡是读过《一世两国度（穷人与富人）》中有关亲密生活的感人描绘的人，都会相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从山羊和狗的小岛上无意中获得其情感教育的。

埃德蒙·伯克是一个境界不同的人。别人，像汤森，是失误在小处，而他是失误在大处。他的天才使他把野蛮的事实提升为悲剧，并且赋予感伤情绪以神秘主义的光环。“我们装模作样地怜悯那些穷人，可实际上没有他们的劳动，世界就不能存在，所以我们是在嘲弄人类的生存条件。”这无疑要好于粗鄙的冷漠、空洞的哀歌或者同情拔高的伪善之言。但是这一现实态度的男子气概却被他那难以捉摸的自负削弱了，正是这种自负使他强调贵族式的壮观。124 结果是他比希律王更希律王，却没能把握适时改革的机会。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要是伯克活着的话，结束古老政体的 1832 年的国会修正法案，就只能以一次本可避免的流血革命为代价才可能通过。然而即便如此，伯克仍会反驳说，一旦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注定了大众要永远在苦难里辛劳，那么平等的理念除了是将人类引向自我毁灭的残忍诱饵之外，还能是其他什么吗？

边沁既没有汤森圆滑的自满，也没有伯克贸然轻率的历史循环论。相反，对于他这个理性和改革的信奉者而言，这个新发现的社会法则无疑是可用于功利主义实验的处女地。像伯克一样，他拒绝屈从于动物学决定论（zoological determinism），同时他也拒绝经济学对政治学的优势地位。虽然身为《论高利贷》以及《政治经济学手册》的作者，但他是这门科学的外行，甚至没能提供功利主义或许本来可以为经济学提供的巨大贡献，即价值源于效用

的发现。相反,他却被联想主义心理学所吸引,因为后者可以放任其作为一位社会工程师的富于无限想象的能力。对于边沁而言,自由放任仅仅意味着另一套社会动力机制。工业革命在智识上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的而非技术的创新。自然科学对工程技术的决定性贡献直到整整一个世纪过后才出现,而那时工业革命早就结束了。对桥梁或者运河的实际建造者、机器或者发动机的设计者而言,在力学和化学方面的新兴应用科学发展之前,关于自然的一般法则的知识完全没用。特尔福德,土木工程师协会的创始人和终身领导人,拒绝了那些研究过物理学的人对他的协会的成员资格申请,并且,据大卫·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爵士所言,他甚至从未使自己明白哪怕一点点几何学原理。从确切的意义上讲,自然科学获得的胜利仅仅是理论上的,它们无法与当时那些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实际重要性相比。正是后者,才为整个科学赢得了反对陈规和传统的威望,而且在我们这一代人看起来难以置信的是,自然科学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与人文学科的联系而取得的。经济学的发现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启示,它极大地加速了社会的转型和市场体系的建立,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机器却都是没受过教育的技师发明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都没有读写能力。因此对于人类而言,应该将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作为征服自然力量的机械革命的智识上的父母,这才是公允和恰当的。

125

边沁本人确信他已经发现一门关于道德和法律的新的社会科学。它允许精确的计算,是借助联想主义心理学,根据效用原则而建立的。科学,恰恰因为它开始在人类事务的范围内生效,因此在18世纪的英国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一门基于经验知识的实际艺术。这样一种实用态度的需要在当时的确是压倒一切的。由于不能得到统计数字,所以通常弄不清人口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也弄不清外贸平衡的趋势是什么,或者说人口中的哪个阶级在剥削另一个阶级。像国家的财富正在增加还是减少,穷人来自哪里,信贷、银行业的形势如何,或者利润是多少这些事情,往往都只能靠猜测。用经验的而不是靠揣测或者靠古物收藏般的好奇和热情来对待事情,是“科学”这个词的首要含义;并且由于实际利益自然是极为重要的,故而怎样调节和组织好范围广泛、为数巨大的新现象,也成为科学必须为之提供建议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先贤们是怎样被贫困的性质所迷惑,也看到他们如何足智多谋地进行自助试验;利润的观念是怎样被作为医治形形色色的病症的一种万灵药而受到欢呼;人们是怎样说不清贫困化究竟是好的征兆还是坏的征兆;即使是科学化管理的习艺所也发现自己无法从穷人身上赚到钱,他们是多么不知所措;欧文是怎样

通过按照慈善原则运作的工厂赚到了钱；许多其他实验是怎样令人惋惜地失败了，尽管这些实验似乎都使用了相同的开明自助(enlightened self-help)技术，这种失败又是如何引起了它们的慈善发起人那可怕的困惑感。如果我们把范围从贫穷扩大到信贷、硬币(specie)、垄断、储蓄、保险、投资、公共财政，或者在这一方面扩大到监狱、教育和彩票的范围的话，我们就能轻易地发现，与其中任何一个有关的新尝试，都不会比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贫穷的尝试少。

126 随着边沁的去世，这个时期大致就完结了；^①从19世纪40年代起，商业上的规划师仅仅是特定投机活动的促进者，不再是所谓相互依存、信任、风险等普遍原则和其他商业的要素之新应用的发现者。自此以后，商人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他们的活动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在建立一家银行之前，他们很少去研究货币的性质。如今，通常只有在怪人和骗子中间才能发现社会工程师，而且这些人往往被监狱的铁栏杆限制着自由。从佩特森(Paterson)和约翰·劳(John Law)到佩雷尔斯(Pereires)的工业体系和银行体系的滚滚洪流，已经涌入了证券交易所，而此时宗教的、社会的和学术的设计所剩下的只是涓涓细流。就从事常规生意的人而言，分析性的理念已不受欢迎了。对社会的探索已经结束了，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在人类事务的版图上已没有空白留下来。一个世纪以来，再也找不到一个具有边沁气质的人了。一旦工业生活的市场组织成为主导，所有其他制度领域都会从属于这种模式；能对社会进行人为设计的天才变得无家可归。

边沁的圆形监狱不仅是一个“使流氓变得诚实和让无所事事的人变得勤奋的工厂”^②；它也将像英格兰银行一样，支付红利。他发起的建议品种繁多：改进专利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建立卫生部；使储蓄普及的生息票据；供蔬菜和水果用的冷藏室；最终由犯人劳动者或者受助穷人作业并且坚持新技术原则的军火工厂；给上层中产阶级传授功利主义的选读日校；房地产登记；公共账目系统；关于公共教育(public instruction)的改革；兵役登记；高利贷的免除；殖民地的放弃；使贫困率处于低水平的避孕器的使用；通过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连接大西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其中的一些方案包含大量真实的小进步，例如，在工业厂房中包含的改进就是基于联想主义心理学的成就来改良和开发人的一簇革新。虽然汤森和伯克把自由放任与立

① 1832.

② Stephen, Sir L.,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1900.

法上的无为主义相联系,边沁却不认为其中有任何阻挠改革的障碍。

在我们着手考察马尔萨斯在 1798 年向戈德温提供的答案(随之,古典经济学真正开始了)之前,让我们记住时代背景。戈德温撰写《政治正义》是为了反对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1790)。它恰好出现在废除人身保护权(1794)和对民主的通信团体(Correspondence Societies)进行迫害等镇压浪潮前夕。那时英国和法国在交战,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使得“民主”一词与社会革命相等同。然而英国的民主运动,虽然由普赖斯医生(Dr. Price)的“老犹太人”训诫(1789)而得到助长,并在佩因的《人的权利》(1791)那里达到纸面上的高潮,却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劳动贫民的不满在其中得不到共鸣;济贫法问题在为普选权和年度议会高声叫喊的小册子里几乎看不到。然而实际上,正是在济贫法的领域里,地主阶级决定性的对抗运动以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形式来临了。教区在一种人为困境之后隐退了,然而在这一困境的掩护下它存活的时间却延伸至滑铁卢战役之后二十年。1790 年代政治镇压的恐怖行动的恶果可以很快被克服,如果创伤仅此而已的话;然而,由斯品汉姆兰法令开始的退化过程却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地主阶级 40 年的苟延残喘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活力为代价的。“当所有者阶级抱怨济贫费变得越来越沉重的时候,”芒图(Mantoux)说,“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济贫费其实等于一张抵消革命的保险单,而工人阶级,当他们接受微薄补贴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这些补贴是部分地通过缩减他们自己的合法收入而得到的。因为‘补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将工资压到最低水平,甚至迫使工资低到让劳动者无法满足其无从削减之需求的程度。农场主或制造商依赖教区来补足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与工人能够维持生存的收入之间的差额。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轻易地从济贫费缴付者身上获得这种好处?另一方面,那些接受教区救济的人愿意为一份更低的工资工作,因此那些得不到教区帮助的人根本不可能与之竞争;得出的悖论性的结果是:所谓的‘济贫费’对那些雇主意味着节省,而对于不期望从公共慈善得到什么的勤奋工人则意味着损失。这样,利益之间无情的相互作用已经把一部慈善法律变成了镣铐。”^①

127

128

我们承认,正是以这个镣铐为基础,关于工资与人口的新法则才建立起来。像伯克和边沁一样,马尔萨斯自己也强烈反对斯品汉姆兰法令并提倡彻底废除济贫法。他们谁都没有预见斯品汉姆兰法令会迫使劳动者的工资降到

^① Mantoux, P. 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28.

和低于勉强糊口的水平；相反，他们预期它会迫使工资上升，或者至少人为地维持工资——如果没有反结社法，情况可能确实会是这样。这一错误的预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对农村的低工资水平的解释没有被他们追溯到斯品汉姆兰法令——这才是前者的真正原因——却是被他们认作所谓工资铁律运作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个新经济科学的基础。

汤森的自然主义无疑不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一个经济社会的存在体现在价格的规律性和依赖价格的收入的稳定性中；因此，经济法则最好直接基于价格。促使正统经济学在自然主义里寻找其基础的，正是无法解释的大部分生产者的苦难——这种苦难，正如我们今天所知，已经无法从老市场的法则去推断了。但是在当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事实大致是这样的：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劳动人民已经习惯于濒临贫困（至少，如果把习惯生活水平的变动计算在内的话）；自从机器出现后，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没有超出生存水平以上；现在经济社会最后成形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几十上百年过去了，劳动贫民的生活物质水平没有一丁点儿改进，如果实际上它没有变得更糟糕的话。

假如把这些事实作为压倒一切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看起来都指向同一点，即工资铁律。这条规律说的是，劳动者一直生活在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平这一事实，是一条规律作用的结果，这条规律倾向于把他们的工资压到这个水平，以至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不再有其他可能性。当然，这种假象(semblance)不仅是误导性的，而且从任何资本主义情形下一贯的价格与收入理论的观点来看都是荒谬的。然而归根到底，正是由于这个虚假的外表，才使得工资规律无法
129 基于任何人类行为的合理规则，而必须从关于人口生育率和土地肥率的自然主义事实之中演绎出来，正如马尔萨斯通过他的人口率和边际报酬递减率的组合提供在世人面前的那样。正统经济学基础中的自然主义因素主要是由斯品汉姆兰法令所创造的那些条件的结果。

自然，无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都没能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运作的。直到《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世纪，人们才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市场体系下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了产品的生产，并且当产量增加时，生产要素的绝对份额一定上涨。^①虽然亚当·斯密延续了洛克关于劳动价值起源的错误出发点，但他现实主义的直觉使他避免了一直错下去。因此虽然他在价格要素问题上存

^① Cannan, E., *A 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 1930.

在着混乱的观点,但却恰当地坚持说,一个社会中如果其大多数成员是贫穷和痛苦的,那么它就不可能繁荣。然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自明之理的,在他的时代却是自相矛盾的。斯密自己的观念是,普遍富裕不可能不渗透到民众之中;不可能社会越来越富有而民众却越来越贫穷。令人遗憾的是,在随之而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似乎并没有为他作证;而且当时的理论家又必须对事实作出解释,李嘉图开始论证社会越进步,获得食物的困难越大,地主变得更富有,资本家和工人都被剥削;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注定是彼此敌对的,尽管这种敌对最终是无效的,因为工人工资绝不可能上升到生存水平以上,而且无论如何,利润肯定会缩小。在某种微不足道的意义上,所有这些断言都包含着事实的因子,但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解释,它已经不真实不深奥到了极点。然而,事实本身是以互相矛盾的模式形成的,时至今日,我们甚至发现想要阐明它们仍是困难的。难怪动植物繁殖必须被作为“解围者”(dues ex machina)^①引入这个科学体系,尽管这个体系的作者们声称要从人的而不是植物的或动物的行为中演绎出生产和分配的法则。

让我们简短探究一下这一事实的后果,看看经济理论的基础在斯品汉姆兰时期——一个表面上存在着竞争性市场经济,实质上却是没有劳动力市场的资本主义时期——被奠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130

首先,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混淆不清的。财富与价值的平行对应将最令人迷惑的虚假问题引入了李嘉图经济学的每一个部分。工资基金理论,作为斯密的一项遗产,是一个产生误解的丰富源泉。除了诸如关于地租、税收和对外贸易的一些特殊理论包含了深刻洞见之外,古典经济学理论其实是由一系列试图获得明确结论的无望尝试所组成的,希望以未明确定义的术语达到对价格行为、收入形成、生产过程、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利润水平、工资及利息的解释,而实际上这些主题中的绝大多数仍旧像从前一样模糊不清。

其次,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到别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贯的理论能够解释那些事实,因为它们并不构成一个体系,事实上它们不过是社会机体对两个互不相交的制度的自发反应的结果,这两个制度,一个是新生的市场经济,另一个是在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领域里的父爱式的规制主义。

第三,古典经济学家所诉求的解决方案对于理解经济社会的性质产生了

^① 这是西方戏剧或小说中关于情节的一个专有词组,意指当故事情节出现按照常理无法继续发展下去的死结时,突然降临的力量和事件,比如天神的干预等等,由此故事得以继续。——译者注

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当统治着市场经济的法则被渐渐领会的时候,这些法则就被置于自然本身的权威之下了。报酬递减率是一条关于植物生理学的法则。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律反映了人类的繁殖力和土地产出力之间的关系。在以上两者中,产生作用的力量都是自然的力量,即动物的性本能与给定土壤中的植物生长。在这里,相关的原理与在汤森的山羊和狗那里的是相同的:存在着自然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人类就不能繁殖,这个界限是由所能获得的食物决定的。与汤森一样,马尔萨斯总结说,过剩的个体将被消灭掉;山羊被狗
131 消灭,狗则会因食物不足而饥饿至死。在马尔萨斯那里,压制性的机制就是来自自然的残暴力量对多余个体的毁灭。当然人类还会被饥饿之外的因素——例如,战争、瘟疫和邪恶——所毁,这些因素等同于自然的破坏力量。严格说来,这里包含了一种不一贯性,因为它用社会的力量来达到自然所要求的平衡。对这个批评,马尔萨斯本可以回应道,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一个道德的共同体里——美德所节省下来的人口数将被饥饿分毫不差地耗尽。本质上说,经济社会奠基于自然的严酷事实之上;如果人类不遵循统治着该社会的那些法则,这个残暴的刽子手将掐死这些短视者的后代。竞争性社会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

让人备受折磨的贫困问题的真正意涵此时已昭然若揭:支配着经济社会的法则并非属人的法则。亚当·斯密与汤森之间的嫌隙已扩展为鸿沟,标志着19世纪意识之诞生的二元对立出现了。自此之后,自然主义的幽灵就一直萦绕在人的科学的左右,将社会重新整合进人类世界成为演进着的社会思想不懈追求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此方面——是一次本质上不成功的尝试,其失败之根源在于马克思太过执著于坚持李嘉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

古典经济学家们自己也远非对这一需要毫无察觉。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任何意义上都并非对穷人的命运无动于衷,然而他们的人性关怀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将一个错误的理论推向更拐弯抹角的小径。工资铁律附带着一个众所周知的保留条款,即劳动阶级的惯有需求越高,他们的生存水平就越高,纵使铁律也无法将工资降到这个水平之下。正是在这个“悲惨标准”之上,马尔萨斯保留了自己的希望^①,他想尽一切努力提高这个标准,因为只有这样,他觉得,才能使那些依照他的法则本身是注定不幸的人从最低形式的悲惨中被解

^① Hazlitt, W., *A Reply to the Essay on Population by the Rev. T. A. Malthus in a Series of Letters*, 1803.

救出来。出于同样的原因,李嘉图也希望所有国家的劳动阶级都拥有享受舒适和娱乐的品味,“并且应该以各种法律手段激发他们获得这种品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规避自然的法则,在这里人们被命令去提高他们本身的饥饿水平。不过,这些理论保留毫无疑问地是古典经济学家们解救穷人的真诚努力,尽管后者的命运正是由他们的理论所预备下的。

132

在李嘉图那里,理论本身包含了平抑严格自然主义的因素。这个贯穿他整个理论体系,并作为其价格理论之基础的因素就是劳动的原理。他完成了洛克与斯密开启的使经济价值人性化的进程;重农主义者归之于自然的,被李嘉图重新归属于人的名下。在一个大错特错的定理中他赋予劳动以构成价值之全部的能力,由此将经济社会中所有能够想象的连带(transactions)^①,都化约为自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中的公平交易原则。

在李嘉图体系本身之中,自然主义因素与人文主义因素就是并存着的,它们都在争夺经济社会里的至高地位。这一情势的动力机制具有压倒性的力量。作为其结果,达成一个竞争性市场的动机获得了一种来自自然进程的不可抗拒的动力。因为自我调节的市场现在被视作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给市场松绑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劳动力市场的创造是在社会肌体上进行的活体解剖,而且,只有科学提供的保证才能坚定进行这种解剖所需要的决心。必须取消济贫法这个信念正是这种确定性的一部分。“这些法则能够将财富与活力转变成苦难与虚弱,它的确定性甚至超过了万有引力定律……直到最后,所有的阶级都被这种普遍化的贫困瘟疫所感染”,李嘉图这样写道^②。如果一个人知道这一点,却找不到足够的勇气,通过废除贫困救济这个残忍的手术来解救人类,那么他就是一个道德上的懦夫。正是在这一点上,汤森,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边沁与伯克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在方法和观点上有着巨大差别,但在对政治经济学原则和反对斯品汉姆兰法令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使得经济自由主义变得不可抵抗的,正是这些完全对立立场之间的这种观点一致性;超级改革家边沁和超级传统主义者伯克所同样赞赏的东西似乎就成为自明之理了。

唯独一人理解了磨难的真正意涵,这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最睿智的人

133

^① 在波兰尼后来发展出来的经济人类学理论中,“transaction”这个词被赋予了非常丰富微妙的内涵,这里从日本学者粟本慎一郎的译法将其译为“连带”,参见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译者注

^② Ricardo, 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ed. Gonner, 1929, p. 86.

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关于工业的真知灼见,也只有他同时具有内在视野(inner vision)。在向工业社会的王国的挺进中,没有一个思想家比罗伯特·欧文走得更远。他深刻地意识到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分;虽然他不像戈德温那样对国家抱有偏见,但是他把国家只看做它所能承担的角色:能够为了使共同体避免受伤害而进行有益的干涉,但一定不能承担起组织社会之责。同样地,他并没有滋生出对机器的仇恨,他认识到了它的中立性。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性机制,还是机器的技术性构造,都没能在他面前掩饰真正的现象:社会。他拒绝从动物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拒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此类谬论。他思想的支点在于他对基督教的摒弃,后者被他斥为“个体化”,或者说,基督教将责任系于个体自身的性格,并由此——对欧文而言——否定了社会的现实以及它对性格型塑的强大无比的形式化影响力。对“个体化”攻击的真正意涵在于他坚持人类动机的社会起源:“个体化的人,以及基督教中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彼此之间分离得如此之远,以致于完全不可能在永恒中达到联合。”正是对社会的发现使欧文超越了基督教,并立足于基督教之外的基础。他领悟到了这样一个真理,即由于社会是真实的,人们最终必须从属于社会。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就是基于对人类意识的改革,这种改革将通过对社会实在的意识而实现。“一旦某些罪恶的根源连人类即将获得的新力量也无法将它们祛除,”他写道,“人们将会了解到,它们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幼稚而无用的抱怨也就不再会产生。”

134 欧文可能夸大了这些力量;否则他不会向拉纳克(Lanark)郡的地方长官建议,社会应该马上从他在他的实验村落共同体中发现的“社会基点(nucleus of society)”出发而进行重组。这种想象力的流淌是天才的特权,没有这些天才,人类将因无法理解自身而不能存在。而更加重要的是,他指出了自由的无法动摇的边界(frontier),这个边界是由社会祛除罪恶的极限决定的。但欧文觉得,只有到了人们借助于新获得的力量完成社会转型的时候,他们才能以成熟的心态,而非幼稚的抱怨,来接受这个边界。

罗伯特·欧文在1817年描绘了西方人已经步入的进程,他的话其实总结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将要面对的问题。他指出了,威力无比的影响将从制造业中产生,“若任其自然,”“制造业在全国范围的普遍扩散将在这个国家的居民中创生出一种全新的性格;并且由于这种性格是基于一种完全不利于个体或者普遍幸福的原则而产生的,它将产生最可憎恶的持久罪恶,除非它的倾向能被立法干预和法律导向所平抑。”将整个社会依照获利原则组织起

来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从人类特征方面列举了这些后果。新制度体系的最为显著的后果在于,它造成了定居人群的传统特征的毁灭,并将其转变成一种新类型的人,迁移着的,飘荡着的,缺少自尊和纪律的人——粗鲁麻木的存在,劳动力和资本家都是这种存在的代表。他进一步概括说,由此产生的原则显然不利于个体与社会的幸福。沉重的罪恶将由此产生,除非市场制度的内在倾向能被立法所体现的有意识的社会引导所阻遏。确实,他所痛恨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部分地是由“补助制度”造成的。但从本质上说,他的观察对城镇和乡村劳动者都同样适用,那就是“他们被置于一种比制造业工厂引入之前要退化和悲惨许多倍的境地中,但是现在他们的勉强生存却依赖于这些工厂的成功”。他在这里再一次地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强调的不是收入而是退化和悲惨。这种退化的首要原因,他再次正确地指出,就是生存本身被系于工厂。他抓住了事实:表面上看似不过一个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一个社会问题。从经济上说工人当然被剥削了:他并没有在交换中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但尽管这很重要,却还远不是全部。如果没有剥削,他可能在经济上比从前要好些。但对个体和全体的幸福都不利的一条原则正在严重地破坏着他的社会环境、他的邻里关系、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以及他的行会组织;一句话,破坏着他从前的经济存在所嵌入其中的那些同自然和人的关系。工业革命正在导致无比巨大的社会混乱。贫困化问题仅仅是这一事件的经济方面。欧文正确地宣布,除非通过立法的干预和法律导向平抑这些毁灭性的力量,否则巨大和持久的罪恶将接踵而至。

135

不过这一次,欧文没有预见到,他所呼唤的社会保护运动将被证明与经济体系自身的运转无法兼容。

第二卷 自我保护的社会

第十一章 人、自然与生产组织

136

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虽然这种反向运动对于保护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相容的,因此,也是与市场体系本身不相容的。

市场体系快速地发展着,它吞没了空间和时间,并且通过创造银行货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推进动力。当它在 1914 年左右达到自己的极限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现有居民还是尚未出生的后代,无论生理意义上的个人还是所谓公司这样的巨大虚构体,都被包含在这个体系内了。一种自从基督教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声称拥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已经在全球展开,只不过这一次是在纯粹的物质层面上。

与此同时,同步的反向运动也在进行中。它不只是社会面临变迁时的一般防御行为;更是对损害社会组织的那种混乱的反抗,并且,这种混乱将摧毁的正是市场所呼唤形成的生产组织。

罗伯特·欧文确有远见卓识:如果听任市场经济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灾难。

生产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如果这个过程是经由贸易和交换的自我调节机制所组织起来的,那么人和自然都必然会被纳入它的运行轨道;它们必将从属于供给和需求,也就是说,像为了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一样被买卖。

这恰恰是市场体系下的组织方式。人以劳动力的形式,自然以土地的形式,可用于出售;劳动的使用可以一种所谓“工资”的价格被普遍购买和出售,土地的使用可以根据所谓“租金”的价格转让。劳动和土地都有市场,工资和租金的高低各自调节着它们的供给和需求;劳动和土地为出售而生产的这种虚构假设得到了始终一贯的坚持。因而,被投入到人与土地各种各样的组合之中的资本,可以根据不同部门的利润自动平衡的要求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动。

137

然而,虽然可以用这种方式在理论上把生产组织起来,但这种商品化虚构(commodity fiction)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土地和人口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就等于消灭了它们。因此,反向运动坚持在生产、劳动和土地等要素方面对市场活动进行控制,这是干涉主义的主要作用。

生产组织也遭到来自同样方面的威胁。单独的企业——无论是工业的、农业的或商业的——都会受到威胁,只要他们受价格水平变动的影 响。因为在市场体系下,如果价格下降,生意就会受损;除非所有影响成本的因素都按比例下降,否则“各相关企业(going concern)”都会面临破产,可是,价格下降可能并不是由于成本的全面下降,而仅仅与金融系统的组织方式有关。实际上,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是自我调节市场的事实。

原则上,购买力是由市场自身活动提供和管理的;当我们说货币是商品时,我们的意思也就是如此:它是市场上的一种物品,其数量被对它的供求所控制,只不过这种物品碰巧被用来承担货币的功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经典货币理论。根据这一学说,货币只是一种更经常地被用于交易的商品的另一个名称,因此,获取它主要是为了便利交易。无论是兽皮、公牛、贝壳还是黄金被用于这个目的,都没关系;作为货币而发挥作用的那些东西之价值的确定,似乎只是依赖于它们在营养、衣着、装饰或其他方面的用途。如果黄金碰巧作为货币,它的价值、数量和流通方式都将被适用于其他商品的同一法则所支配。任何其他的交换手段都必然会创造出市场之外的通货,而这种创造活动——无论是由银行还是由政府创造——构成了对市场的自我调节的干扰。关键的一点是,用作货币的物品与其他商品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供给和需 求之受市场支配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因此,所有赋予货币以任何其他性质——即超过用作间接交易手段的商品的性质——的观点本质上都是荒谬的。同样道理,如果黄金被用作货币,那么银行钞票,如果存在的话,就必须代表黄金。正是根据这样一个看法,李嘉图学派才希望通过英格兰银行组织通货供应。

138

确实,无法想象会有其他方法能够阻止货币系统被国家“干扰”,从而保护市场的自我调节。

因此对商业而言,情势跟社会的自然本质和人文本质所遇到的一样:自我调节的市场对于它们都是一种威胁,而且威胁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工厂立法和社会立法被要求用来保护产业工人不受有关劳动力的商品化虚构的危害,如果说土地法规和农业关税的创立是用来保护自然资源和乡村文化,使它们免于商品化虚构,那么同样地,中央银行和对货币体系的管理也是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造业和其他生产企业的的生产安全,防止其卷入货币的商品化虚构所造成的灾难。足够悖谬的是,不仅是人类和自然资源,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自身都不得不躲避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破坏作用。

让我们回到我们所说的双向运动上来吧。它可以体现为依据社会中两种组织原则的行动,它们各自设定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化目标,各有明确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各有特殊的运作方法。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它依仗贸易阶级的支持,主要运用不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手段。另一种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

139 对阶级的强调是重要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构成了整个19世纪的社会历史。针对整体社会情势所要求的各种功能,他们有效地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中产阶级是新生市场经济的抬轿人,他们的商业利益,总的来看,是与关于生产和就业的普遍利益相一致的,如果生意繁荣,就会有就业机会,物主也有了租金。如果市场在扩张,投资就会变得自由而无困难;如果贸易团体对外竞争成功,通货就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商业阶级却没有对危机的感觉能力,这种危机来自对工人体的剥削,对家庭生活的破坏,对邻里关系的破坏,滥伐植被,污染河流,败坏行业规范,损害社会风气,使包括居住环境和艺术在内的生存状态以及不影响利润的无数私人和公共生活方式普遍堕落。中产阶级通过发展一种几乎神圣的信念——利润的普遍有益性——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尽管这种信念使他们无法成为那些至关重要的利益的看护人——这些利益对美好生活的获得而言,与推进生产一样重要。正是在这里,另外一些阶级的机会出现了,这些阶级并不从事那种运用昂贵的、复杂的或特殊的机器来进行生产的活动。大体来说,维护国家

军事实力——它继续有赖于人口和土地——的任务落在了土地贵族和农民的肩上,同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劳工阶级成为眼下已变得无所归依的人类公共利益(the common human interest)的代表。但是时不时地,每一个社会阶级所代表的利益都会比它自身的利益更广泛,即使只是无意识地如此。

在 19 世纪之交——此时普选权已被相当广泛地运用——工人阶级在国家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因素;另一方面,商人阶级——他们对立法权的控制不再是毫无挑战的了——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工业领域的领导权包含着政治力量。在市场系统的持续运作还没有产生更大的压力和张力之前,这种影响力和权力的特定分布并没有引起任何麻烦;然而,由于内在固有的原因,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社会各阶级之间紧张关系的发展,社会自身遭受到来自如下方面的危害:竞争性的党派使政府与商业、国家与工业分别成为它们各自的据点。政治和经济,作为社会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功能,被作为争夺局部利益的武器而利用甚至滥用。20 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正是源自这种危险的僵局。

140

我们打算从两个角度来概括塑造了 19 世纪社会历史的那场运动。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那导致了深入骨髓的社会紧张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与上述第一个方面纠缠在一起,结果把危机变成了大灾难。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

141 经济自由主义乃是一个社会致力于创建市场体系时的组织原则。尽管诞生之初它只是一种对于非官僚主义的方法的偏爱，但渐渐地它演化为一种真正的信仰，认为人可以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世俗性的拯救。这种狂热源自它发现自己承担的任务突然加重了：需要应对无辜民众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在建立新秩序时所引起的广泛而连锁的变迁。只有在对应一个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要时，自由主义信条才显示出它那福音般的热情。

如人们常做的那样将**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的政策提前到 18 世纪中叶——当时这一口号首次在法国出现——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以肯定地说直到此后两代人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才不再仅仅是间歇性的趋势。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它才代表三条古典原则 (*tenet*)：劳动力应由市场决定自己的价格；货币的发行 (*creation*) 应受一种自动机制的支配；货物应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通而不受阻碍或保护；简而言之，即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

142 认为凯奈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形，是荒诞的。重农主义者在一个重商主义世界中所要求的，不过是——为了保证农民、佃户和地主有更好收入的——粮食的自由出口。除此之外，他们的**自然秩序** (*ordre naturel*) 只不过是有一个想象的、全知全能的政府来调节规制工业和农业的指导原则罢了。凯奈的《农业国经济统制的一般准则》(*Maximes*) 就是旨在提供观点给这样的政府，以便它能将他在《经济表》(*Tableau*) 一书——此书以他定期提供的统计数据为基础——中的原则转化为实际政策。而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理念则从未进入他的头脑。

在英国，**自由放任** 同样被狭隘地理解：它仅仅意味着在生产领域免于被规

制；贸易并未包括在内。棉纺制造业，作为那个时代的奇迹，已经从不起眼的产业成长为这个国家的首要出口产业——但印花布的进口仍然被明确的法规所禁止。尽管白棉布和细棉布的生产在国内市场具有传统垄断地位，但其出口仍然被慷慨地允许。保护主义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1800年曼彻斯特的棉纺业主们要求禁止棉纱出口，即使他们很明白这样做对他们意味着生意上的损失。一项在1791年获得通过的法案把针对棉纺生产工具出口的处罚，扩展到包括设计模型或设计说明书的出口。自由贸易起源于棉纺织工业的说法其实是个神话。在生产领域免于被规制，这样的自由是所有产业的要求；而在贸易交换领域的自由仍被认为是一种危险。

人们可能会设想，生产方面的自由会自然而然地从纯粹技术领域扩展到劳动雇佣领域。但是，只是到了比较晚时，曼彻斯特才出现对自由劳动力的要求。棉纺业从未受工匠法的支配，因此也未受年度工资评估和学徒见习年限的规则牵制。另一方面，后来自由主义者所强烈反对的老济贫法，却为棉纺制造业者提供了一种帮助；它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教区的学徒，而且允许他们不承担对解雇员工应负的责任，因而把许多失业的负担扔给了公共基金。即使是斯品汉姆兰体系，起初也不受棉纺制造业者的欢迎；只要津贴制在道德上的影响不致减少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这个产业就可将家庭补贴视作维持劳动力后备军的一种辅助，这种后备军在贸易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是如此迫切地被需要。在一个农业雇佣劳动仍旧按年计酬的时代，处在扩张中的工业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关于流动劳动力的储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业主们会攻击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安居法。然而直到1795年这一法案才被废除——而且是被济贫法的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父爱主义色彩所取代。贫困仍旧是地主和乡村关切的问题；即使是严厉批评斯品汉姆兰法令的伯克、边沁和马尔萨斯等人，也认为他们自己不是工业进步的代表，而是良好的乡村管理法规的倡议者。

143

直到18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才爆发出十字军般的热情，而自由放任则变成一种好战的信条。生产者阶级迫切要求修改济贫法，因为它阻止了依靠劳动成果获得收入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创建一个自由劳动市场所隐含的意义，以及进步的受害者们所承受苦难的程度至此已显现出来。相应地，在1830年代早期，人们的心态也显现了剧烈的改变。汤森《论济贫法》1817年的再版中就包含了一篇序言，称赞作者批评济贫法并要求将之完全废除的远见；不过编者亦指出他那在十年这样短的时间里废除贫民救济的提议过于“鲁莽轻率”。同年出版的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的原理》，也坚持废除津贴制的必

要性,但他强调这种废除只能渐进行。皮特,作为亚当·斯密的门徒,却因为废除济贫法将给无辜者带来苦难而反对废除济贫法。一直到1829年,皮尔(Peel)仍然“怀疑除了渐进的方法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式能够安全废除津贴制”^①。但在1832年中产阶级取得了政治胜利后,济贫法修正案就以最极端的形式获得颁布,并立即生效而没有任何过渡期。自由放任已被催化为一种毫不妥协的残暴行为的动力。

将经济自由主义从一种学术兴趣升级为无限的行动主义,同样发生在工业组织的另外两个领域:通货与贸易。在这两个领域,自由放任增强为一种狂热的信条,尤其当极端的解决方案之外的其他措施都变得明显无效时。

144 生活开支的普遍上升使得英国人民首次意识到了通货问题。1790年到1815年间物价翻了一倍。实际工资下降,商业也由于汇率暴跌而受打击。然而直到1825年经济恐慌时,健全通货才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当李嘉图原则已深深铭刻在政客和商人头脑里的时候,这一“本位(standard)”才被维持住,即使以造成巨大的金融损失为代价。这就是金本位自动导向机制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开端,没有它的话,市场体系就不可能运转。

国际自由贸易其实就是一种信仰。它的含意相当奢侈夸张。它意味着英格兰的食物供给需要依靠海外来源;必要时需牺牲本国农业而进入一种新形式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下,英格兰将成为模糊构想出来的未来世界统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共同体必须是和平的,否则,大不列颠帝国就会运用海军使其变得安全;而且英格兰民族将在对自己高超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坚信中面对持续不断的工业混乱。然而,人们也相信只有全世界的粮食都可以自由地流向英国,她的工厂才可以在全世界廉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再者,决心所需的策略是由完全接受(这种状态)所带来的问题的规模和风险的广度所决定的。但是只要不完全接受(这种状态),就会招致毁灭。

自由放任这一教条拥有数个乌托邦式的思想源泉,如果把这些来源分开来看,就很难完全理解他们。三个信条——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和国际自由贸易——合为一个整体。为实现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因素而作出牺牲是无用的,除非这种牺牲也能同时保证其他两个因素的安全。三个要素,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例如,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金本位制隐含着致命的通货紧缩的危险,在恐慌

^① Webb, S. and B., 前引书。

时甚至可能造成毁灭性的通货紧缩。因此制造商只有在确定一个有利可图的价格并且产量会持续增长时,才会坚持支撑其企业(也就是说,只有在工资至少与一般价格水平同比例下降时,对不断扩张的世界市场的开发才能得以实现)。所以1846年的反谷物法(the Anti-Corn Law Bill)是1844年皮尔银行法(Peel's Bank Act)的必然结果,这两者都假定自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实施以来劳工阶级在饥饿的威胁下拼命工作,因而工资由谷物价格所调节。这三大法案构成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 145

现在可以看一眼经济自由主义横扫全球的态势了。只有世界范围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才能确保这一巨大机制的运作。除非劳动力价格由可获得的最低粮食价格所决定,否则就无法保证那些不受保护的工业不会屈从于自愿被接受的监工——黄金——的掌控。19世纪市场体系的扩张与国际自由贸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制的同时散布是同义的(synonymous),它们同属一体。难怪一旦这一冒险事业的危险变得显而易见时,经济自由主义就转变成为一种世俗宗教。

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正如棉纺制造业——当时主要的自由贸易产业——是在保护性关税、出口津贴和间接工资补助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一样,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出现了各种立法以废除种种限制性的管制,而且国家行政功能也大大增强,国家此时已拥有了集权的科层制度来实现自由主义信徒们所提出的任务。对典型的功利主义者而言,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计划,应该用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自由放任不是一种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它是有待实现的目的本身。确实,除了能废除一些有害的管制,立法不能直接做任何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什么也不能做,尤其在间接方面。相反,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是实现最大幸福的名副其实的代理人。关于物质生活的福利,边沁认为,立法的影响与“警察牧师(minister of the police)”无意识的贡献相比是“一样的微不足道”。在经济成功所需要的三个要素——意向(inclination)、知识和权力——中,私人拥有的只是意向。而知识和权力,边沁教导说,由政府掌管运用比起私人掌握来得更为廉价。收集统计资料和信息、培育科学和实验以及提供各种手段以促成治理任务的最终实现,都是政府行政人员的任务。边沁式的自由主义意味着用行政机构的行动来代替国会行动。 146

对于这一点,运作空间很大。英国的反动力量并没有像法国的反动力量

那样通过行政手段来实施政治压制,而是通过专门的国会立法来实施政治压制。“1785年和1815—1820年间的革命运动不是以政府部门措施而是以国会立法的方式来进行斗争的。人身保护法案(the Habeas Corpus Act)的中止,反诽谤法案(Libel Act)和1819年‘六法案(Six Acts)’的通过,都是严厉的强制措施;可是它们并未显露任何迹象想要把大陆性特征赋予英国的行政机构。要说个人自由被破坏,那是在推行国会法案过程中被破坏的。”^①到1832年局势变得对行政措施完全有利时,经济自由主义者对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成为1832年之后那个时期特征的立法活动的纯后果——尽管在强度上有所不同——在于零零碎碎一步步地构建了一架极其复杂的行政机器,这架机器一如现代工厂一样,面对新的环境条件经常需要修理、更新、重建和调整。”^②这种行政机构的成长反映出功利主义的精神。边沁那传说中的圆形监狱,他的非常个人化的乌托邦,是一种星形建筑,监狱长可以从该建筑的中心对最多的囚犯实行最有效的监管,而且只需花费最少的公款。同样,在这样的功利主义国家中,他最喜爱的“可监督”原则确保位居上层的长官应该对所有的地方行政实现有效的控制。

147 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要使亚当·斯密的“简单而自然的自由主义”与人类社会的需要相协调是一项最为复杂的事务。这一点从以下事例中就可见一斑:无数圈地法案条款的复杂性;在新济贫法的执行中——这是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以来第一次有效的中央控制——涉及的大量官僚控制;或者市政改革中那些卓有成效的举措所导致的政府行政部门的增加。然而所有这些政府干预的重点都是为了将一些简单的自由有机组织起来——诸如土地、劳动力或市政管理的自由。与人们预期相反的是,恰如省力机器的发明没有减少而实际上增加了人力的使用一样,自由市场的引入远远没有消除对控制、规制和干预的需要,反而大大扩张了它们的范围。行政官员必须总是保持警觉以确保这个系统的自由运转。因此,即使是那些最热切地希望免除国家所不必承担之任务的人,即那些以限制政府活动为其哲学的人,也不得不赋予同一个国家以新的权力、机构和手段,以求建立自由放任制度。

^① Redlich and Hirst, J., *Local Government in England*, Vol. II, p. 240, quoted Dicey, A. V., *Law and Opinion in England*, p. 305.

^② Ilbert, *Legislative Methods*, pp. 212—213, quoted Dicey, A. V., 前引书所引。

有比这更矛盾的另一个现象。尽管自由放任经济是有计划的政府行为的产物,但随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却是自发开始的。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planning)却不是。这一论断的前半部分上面已经证实过了。如果真的存在过有意使用行政力量来为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控制政策服务的话,那也是一些功利主义者在自由放任的英雄时期的行为。论断的后半部分首先是由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者戴西(Dicey)提出来讨论的,他以探究“反自由放任”——或者用他的说法,英国公共舆论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的起源为己任,这种倾向自1860年代后期就显现出来了。他惊讶地发现,除了立法行为本身之外,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更确切地说,没有证据能表明公众观点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先于那些似乎代表了这样一种倾向的立法而存在。至于那些后来的“集体主义”观点,戴西推断认为,“集体主义”立法本身可能是它们的主要根源。他的颇具穿透性的研究结果是,在那些直接导致了1870和1880年代的限制性立法的人们身上,并不存在任何扩展国家功能或者限制个人自由的蓄意倾向。1860年之后半个世纪里展开的反向运动,那矛头直指自我调节市场的立法,原来是自发的、事先没有观点指导的,它的实践源自一种纯粹的实用主义精神。

经济自由主义者必然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们的全部社会哲学系于自由放任乃一自然进程,后续的反自由放任立法是反自由主义者之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这样说毫不过分,即对双向运动所作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解释,触及了当今自由主义立场代表的是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

148

像斯宾塞和萨姆纳(Sumner)、米塞斯和李普曼(Lippmann)这样的自由主义作者,对双向运动所作的说明在实质上与我们的很相似,但他们却用完全不同的说法来解释。在我们看来,自我调节市场的概念是乌托邦,它的推进被社会现实的自我保护所阻止,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保护主义都是由不耐烦、贪欲和短视所造成的错误,若没有这些保护主义,市场将自行解决困难。这两种观点哪个正确,也许是近来社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它所涉及的,不亚于决定要不要以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信条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在我们步入事实验证阶段之前,有必要对问题本身进行更精确的界定。

毋庸置疑,将来回顾起来,我们的时代将因为见证了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而著称。1920年代见证了经济自由主义声望的巅峰。数亿人尝到了通货膨胀灾难的滋味,所有的社会阶级,甚至整个国家都被剥夺一空。通货的稳定成为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政治思考的焦点了;金本位制的恢复成为经济领域中一

切有组织努力的至高目标。外债的偿还和向稳健通货的回归被当作判断政治理性的试金石；为了恢复货币的完整性，任何个人苦难或对主权的破坏都被认为是值得的牺牲。通货紧缩造成大量失业者及其贫困潦倒，公务员被解雇时也领不到遣散费而一无所有；甚至放弃国家权利、牺牲宪法保障的自由也被视为履行稳健预算和稳健通货——这些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决条件——的要求而应付出的代价。

149 30年代见证了20年代的绝对措施所带来的问题。在通过几年努力而达到通货重建和预算平衡之后，两个最强有力的国家，大不列颠与美利坚合众国，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并因此放弃了金本位，开始自我掌控通货。它们大规模地拒付国际债务，经济自由主义信条被最富有和最受尊敬的两个国家所抛弃。到30年代中期，法国和其他一些仍然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实际上被英国和美国强迫放弃金本位制，尽管在不久以前，这两个国家还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忠实卫士。

4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经历了更严重的失败。尽管英国和美国背弃了正统的货币主义，但在工业和商业这些经济生活的一般组织上，它们仍保留着自由主义的原则与方式。事后证明，这是加速战争与阻碍防备的一个因素，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制造并强化了专制必将导致经济崩溃的幻象。正是这样一个信条，使得民主政府最晚才理解到被管理的通货与被指导的贸易意味着什么，即使在它们碰巧迫于环境而不得不自己采取这些措施时，情况也是如此；同时，经济自由主义的遗产也阻碍了这些国家以平衡预算和稳定汇率的名义及时重整军备，因为这被认为是战时唯一能够提供经济力量的基础。在大不列颠，有关预算和通货的正统教条导致政府死守传统战略原则，即使事实上国家已面临总体性战争，这种原则仍然只要求对国家担负非常有限的责任；在美利坚合众国，既得利益者——例如，石油工业和铝工业——将自己保护于自由商业的禁忌之后，成功地抵制了为应付工业紧急状况所作的准备工作。如果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自身错误顽固而狂热的坚持，各国的领袖们和自由世界的大众本来可以更好地装备自己以应对时代的磨难，甚至可能避免这场劫难。

遍及整个文明世界的关于社会之组织的俗世信条并未因十年中的那些事件而被驱逐。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独立的商业单位依靠自由放任原则生存。它在一个领域里的令人触目的失败并没有破坏它在总体领域里的权威。实际上，它的部分失色反而可能使对它的信念更加不可动摇，因为这使保卫者们能够争论说正是对它的原则的不彻底的应用，才导致了与

它有关的每一个困境。

实际上,这正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托词。它的辩护者正在以无穷多变的方式重复着:要不是有其批评者所鼓吹的那些政策,自由主义早就带来了那些好处;不是竞争体系和自我调节的市场,而是那些对竞争体系的干扰和对市场的干涉,才应该对我们的病况负责。经济自由主义的这种论调不仅在近来无数对经济自由的侵犯行为中,而且也在以下的无可置疑的事实中找到了证据:将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扩展开去的运动,在19世纪后半期遭遇了旨在阻止这个经济自由运转的持续不断的反向运动。 150

于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得以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把现在与过去联结成一个一贯整体。谁能否认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干预会损害人们的信心?谁又能否认如果不是法律规定提供失业救济保障,失业人数就会少一些?私人企业难道没有被公共工厂的竞争所伤害吗?赤字财政难道没有危及私人投资吗?父爱主义难道没有阻碍商业动力吗?这些情况在当下属实,当然也会在过去发挥作用。当1870年左右普遍的保护主义——包括社会和国家两方面——在欧洲开始出现时,谁会怀疑它妨碍、限制了贸易呢?谁又会怀疑那时的工厂法、社会保险、市政经营、健康服务、公共设施、关税、出口奖励和补贴、行业联盟和托拉斯,以及对移民、投资和进口的限制——更不必提相对不公开的对人、货物和支付的流动的限制——肯定形成了对竞争系统的运转的阻碍,延长了商业萧条,加重了失业,加深了金融崩溃,缩减了贸易,最终严重毁坏了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了呢?所有罪恶的根源,自由主义者坚信,正是从19世纪的第三个25年开始的,各种社会的、国家的、垄断的保护主义学说对就业、贸易和通货自由的干涉;要不是工会和劳工党与垄断厂商及农业既得利益者的不光彩的结盟,要不是它们短视的贪婪联合起来粉碎了经济自由,今天的世界早已享受着几乎能自动生产物质财富的体系所带来的成果。自由主义的领袖们从不倦于重复,19世纪的悲剧源自人类无能坚守早期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我们先人慷慨的首创精神被民族主义的激情和阶级斗争、既得利益者和垄断者所毁坏,而这种毁坏之最重要原因,在于工人们对于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之于全人类利益(包括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最终有益性,盲目无知。他们宣称说,大量智识上和道德上进步的可能性被大众在智识上和道德上的缺陷所粉碎了;启蒙精神所取得的成就被自私的力量化为了乌有。简而言之,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辩护。除非这一点被驳倒,否则他仍会在论争中喋喋不休。 151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同意旨在扩张市场体系的自

由主义运动,遭遇到了—场旨在限制这种扩张的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实际上,这样一个假设潜在于我们的双向运动主题之中。但在我们断定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概念本身固有的荒谬性将要最终毁灭社会的同时,自由主义者则指控诸多保护社会的因素破坏了一种伟大的创造性。由于无法找到人们联合—致来阻遏自由主义运动的任何证据,所以只好说他们进行的是隐秘的行动,而这个假设是无法实际验证的。这就是反自由主义阴谋的神话,这种神话尽管形式各异,但都是在对1870和1880年代那些事件的所有自由主义解释中普遍存在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被不约而同地看做使形势发生改变的首要力量,制造商协会和垄断者、农业利益和工会都被视为恶棍流氓。于是,在其最脱俗(spiritualized)的形式中,自由主义教条假设现代社会中的某种辩证法则在发挥着作用,它使启蒙理性的努力化为愚蠢,而在它最为粗糙的说法中,它将自己化约为对政治民主的—种攻击,政治民主被当作干涉主义的主要源泉。

事实决定性地否定了自由主义的论点。反自由主义阴谋完全是一种虚构。“集体主义的”反向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不是由人们偏好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造成的,而是完全由受到扩张着的市场机制影响的广阔得多的根本性社会利益造成的。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机制的扩张所导致的反向行动几乎无所不在,而且绝大部分都具有务实性的特征。152 思想潮流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相应地,自由主义者所持有的这种偏见——在反自由主义运动背后有—种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存在。尽管1870和1880年代确实见证了自由主义教条的终结,尽管现在所有的关键性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我们仍然不能说,向社会保护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的转变应该归结为—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危险之显现以外的任何其他原因。这一点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首先,行动所针对事项的多样性让人眩目。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排除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让我们引用—下斯宾塞在1884年为指责自由主义者为了“限制性立法”而放弃原则所汇编的—张干预行动的表格^①。主题的多样性几乎不可能更大了。在1860年,官方授权规定“由地方税支付饮食分析专家的费用”;接下来—项法令规定“对煤气工程进行检查”;对矿业法的扩充规定“对雇用12岁以下未受过教育不会读写的男孩为童工者将予以惩罚”。1861年,

^① Spencer, H., *The Man vs. the State*, 1884.

授权“济贫机构的官员，强制穷人接种疫苗”；地方委员会被授权“对运输业雇工资定出标准”；某种地方组织“被授权从地方上抽税，以供乡村排水与灌溉及供牛群饮水设施之用”。在1862年，一项法案被通过，它规定“只有一个通风口的矿井”为非法；另一项法案授予医学教育理事会“提供一部药典”的排他性权利，“其价格由财政部确定”。气得瑟瑟发抖的斯宾塞花了好几页篇幅一一列举这些以及类似的立法措施。在1863年，出现了“强制接种防疫疫苗向苏格兰与爱尔兰的扩展”；还有一项法案指定巡检官鉴定“健康食物与不健康食物”；一项烟囱清扫者法案，旨在解救那些清扫太过狭窄的烟囱的孩子的苦难与致死危险；一项传染病法案；一项公共图书馆法案，给地方以权力“以便多数人可以为他们的图书而向少数人抽税”。斯宾塞引用这些作为反自由主义阴谋的有力证据。可这些法案中的每一个所应对的问题都起源于现代工业状况，它们旨在护卫某些公共利益，以抗拒这些状况——或者在任何程度上对这些状况的市场化处理——中所内含的危险的侵害。对一个不抱偏见的人而言，这些措施证明了这些“集体主义”反向运动纯粹的务实和实用的特征。提出这些措施那些人中，绝大多数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支持者，他们当然不认为他们在伦敦建立一个消防队的建议意味着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相反，这些立法行为的倡议者在原则上是作为社会主义或其他形式的集体主义的不妥协的反对者而行动的。

153

其次，从自由主义解决方案向“集体主义”解决方案的转变有时就发生在一夜之间，而对那些参与这种立法思考的人而言，常常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戴西曾引用工人赔偿法的经典案例，这一法案处理的是在雇用过程中，雇主对工人所受伤害的责任的问题。自1880年以来，体现这一理念的诸多立法，表现出了对个人主义原则的一贯坚持，即雇主对其雇员的责任与他其他人，如陌生人，所负的责任相同。1897年，在没有任何观点改变的情况下，雇主突然被要求成为他的工人的保险者，以便对工人在雇用中出现的任何伤害提供保障，这“完全是一项集体主义的立法”，戴西恰当地评论道。再也没有更好的证据可以用来表明，既不是所牵涉的利益类型的变化，也不是关于该事项观点倾向的改变，导致自由主义原则被反自由主义的原则所取代的，完全是作为背景的问题之发生及寻求解决的不不断演变的条件。

第三，通过对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差异悬殊的许多国家的比较，可以发现间接的、但最为有力的证据。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与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可以说是差异的两极，而且它们都不同于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以及哈布斯堡帝

154 国。然而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经历了一段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时期，而且这一时期都被反自由主义立法阶段所接替，这些立法关注公共健康、工厂环境、市政经营、社会保险、航运补贴、公共设施、贸易协会等等。把发生在不同国家的类似变化列举出来很容易。工人抚恤金制度的颁布在英国是 1880 年和 1897 年，在德国是 1879 年，在奥地利是 1887 年，在法国是 1899 年；工厂安全检查制度被英国采用是在 1833 年，在普鲁士是 1853 年，在奥地利是 1883 年，在法国是 1874 年和 1883 年；市政经营，包括公共设施的运转，是在 1870 年代由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一个非国教派信徒和资本家，引入伯明翰的；而引入帝政的维也纳，则是天主教“社会主义者”和反犹分子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的功劳；引入德国和法国市政当局，则是多种多样的地方联合的结果。支持这种变革的力量有时候是来自一些极端的反动分子、反社会主义者，比如像在维也纳的情况；在另一些时候则是来自“激进的帝国主义者”，像伯明翰的情况那样；或者像法国人、里昂市市长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那样具有纯粹的自由主义色彩。在新教英格兰，保守党和自由党内阁交替执政完成了工厂法的立法。在德国，罗马天主教和社会民主党共同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奥地利，完成这项工作的主角则是教会与其最为好战的支持者；在法国，教会的敌人与狂热的反教权主义者促成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立法。这样，在最为多种多样的口号之下，在差异悬殊的动机之下，许多不同的政党和社会阶层将几乎完全相同的措施在一系列国家付诸实施，应对大量的复杂问题。很明显，没有比如下推断更加荒谬的了：这些措施都是在相同的意识形态或者狭隘的团体利益之下秘密推行的——这就是反自由主义阴谋论之类的说法。相反，所有的证据都倾向于支持另一种观点：具有紧迫性的客观原因迫使立法者不得不如此。

第四，一项意义重大的事实是，在诸多不同的时代，在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明确例子里，经济自由主义者自己主张对契约自由和自由放任施加限制。很自然，反自由主义的偏见不可能是他们的动机。让我们一方面把劳工联合的原则，另一方面把商业团体法一起加以思考。第一个方面涉及工人联合起来要求增加工资的权利；后者，涉及的则是为提高价格而组建托拉斯、行业联盟的权利及其他资本主义式的联合的权利。认为这两种契约自由或者自由放任都被利用来限制贸易，这是一种恰当的指控。不管是工人组织起来试图增加工资，还是厂商组织起来提高价格，自由放任的原则都很明显地被相关利益集团用来限制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商品的市场。具有重大意义的

155

是,在以上每一种情况中,一贯的自由主义者,从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从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到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都将自由放任的原则从属于自由竞争市场的需要;他们强调需要管制和限制,强调需要刑罚和强制,像任何“集体主义者”一样争辩契约自由已被工会或公司“滥用”了。从理论上讲,自由放任或者契约自由意味着工人拥有既可以以个人的方式,也可以以联合的方式保守其劳动力的自由,它也意味着商人们有不顾消费者的意愿联合起来决定销售价格的自由权利。但在实际中,这样的自由与自发调节的市场制度是相冲突的,并且在这样一种冲突中,自发调节的市场不可避免地拥有优先性。换言之,如果自发调节市场的需要被证明与自由放任的原则不能兼容,经济自由主义者就会转而反对自由放任并倾向于——像任何反自由主义者都会做的那样——所谓的集体主义的规制和限制措施。工会法与反托拉斯法就是源自这样一种态度。甚至经济自由主义者自身都必须在工业组织的极其重要的领域经常使用反自由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手段,这一点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采取这些手段的不可避免性。

碰巧,这也有助于我们澄清“干预主义”一词的真正意涵,经济自由主义者喜欢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们政策的对立面,但这么做仅仅暴露了他们的思想混乱。干预主义的反面是自由放任,并且正如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那样,经济自由主义并不能等同于自由放任(尽管在通常的用法里将它们互换使用是无害的)。严格说来,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的组织原则,在其中,工业是基于自发调节的市场制度而组织起来的。确实,一旦这样一个体系大致建立起来,所需要的某种类型的干预就减少了。但是,还远远不能说市场体系与干预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术语。因为只要这个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经济自由主义者必须也愿意毫不犹豫地引入国家干预使之得以建立,而一旦建立起来,又会用同样的手段使之得以维持。于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可以要求国家使用法律力量而不失其立场的一贯性,他们甚至可以诉诸内战的暴力以获得建立自发调节市场的前提条件。在美国,南方各州试图用自由放任的论调使得蓄奴正当化,而北方则吁求武力干预以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自由主义的作者对干预的控告由此成为空洞的口号,因为这意味着对同一套行动的褒贬是基于这种行动是否碰巧为他们所赞成。经济自由主义者唯一可以坚持一贯的原则,只是自发调节的市场的原则,不论它是否包含了干预成分。

小结一下。针对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反向运动拥有无法否认的自

发特征。反向运动发生在无数毫无联系的问题上,而且在直接受影响的利益之间也找不出任何明显联系,相互之间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甚至对同一个问题的处理,就像工人赔偿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解决问题的方案可以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与干预主义等立场之间切换,而在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影响和政治力量上都没有变化,唯一变化的仅仅是对问题性质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从自由放任到“集体主义”的非常近似的转变在许多国家工业发展的特定阶段全都发生了,这使我们意识到这一过程的潜在原因隐藏得多么深,相互之间是多么具有独立性,也让我们认识到,经济自由主义者把这个过程归因于变幻的情绪和多种多样的利益是多么肤浅。最后,分析表明,即使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也逃脱不了那些使自由放任在复杂工业社会中无法付诸实践的法则;因为在至关重要的关于工会法与反托拉斯法的例子中,极端自由主义者本身必须求助于国家的多重干预,以便阻止垄断对自发调节市场的前提条件的冲击。即使是自由贸易和竞争,要想运转下去,也必须要有干预。自由主义者关于1870与1880年代“集体主义”阴谋的神话,与事实完全相反。

157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双向运动的解释是更符合事实的。因为如果像我们所坚持的那样,市场经济确实是对社会组织中的人性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威胁,那么除了预期各类人群被激发起来要求某种保护之外,我们还可能预期什么呢?这正是我们所发现的。同样可以预期的是,这种寻求保护的行动并不以任何理论上和智识上的前见为先导,也与他们对作为市场经济之基础的那些原则的态度无关。再者,这种预期与事实相符。更进一步,如果特定利益可以被证明是独立于一系列不同国家的特定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比较政治史就可以为我们的观点提供近似实验证据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有无可辩驳的证据。最后,自由主义者本身的行为证明,贸易自由——用我们的话说,自发调节的市场——的维持,实际上需要的远不是排除干预,而是需要国家采取这样的行动,正如工会法与反托拉斯法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因此,关于对双重运动的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竞争的一方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主张自由的政策从来没有机会完全付诸实践,而是被短视的工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贪婪的制造商和反动的地主所扭曲;另一方则是他的批判者,认为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普遍发生的针对市场经济扩张的“集体主义”反抗,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乌托邦原则所固有的社会危害性的铁证——哪个更为正确,历史的证据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续): 阶级利益与社会变迁

158

在 19 世纪政策的真实基础被揭示之前,自由主义关于集体主义阴谋的神话必须被彻底驱散。这个神话认为,保护主义仅仅只是平均地权论者、制造商和工会成员的邪恶利益的产物,它们的自私自利破坏了市场的自动运行。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同样片面的观点,尽管其政治倾向与前者相反。(马克思关注社会总体和人的非经济本质的基本哲学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①。)马克思自己承续李嘉图的做法,从经济角度定义阶级,而且无可置疑地,经济剥削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一大特征。

在通俗马克思主义那里,这导致了一种粗糙的关于社会发展的阶级理论。寻求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压力被归结为少数几个金融家的获利动机。帝国主义被解释成一种资本家的阴谋:为了大资本的利益而引诱国家发动战争。战争的发动被归因为这些利益与军火工业的联合,它们奇迹般地获得了权能并使整个民族陷入违背其根本利益的致命政策之中。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下述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保护主义运动来自部门利益的推动;农业保护关税是反动地主政治推动的结果;垄断企业的增长源自工业巨头对利润的饥渴;挑起战争是商业欲望失控的结果。

经济自由主义的看法就这样得到了一种狭隘阶级理论的强力支持。尽管各自采取的阶级立场相互对立,但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假设是相同的。他们把他们的如下论断维护得天衣无缝:19 世纪的保护主义是阶级行动的产物,这样一种行动所维护的首先是相关阶级的成员的利益。两者几

159

^① Marx, K., *Nationalökonomie und Philosophie*. In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1932.

乎全都阻碍了对市场社会的整体认识,也阻碍了对这个社会中保护主义功能的认识。

实际上,阶级利益对社会中的长期运动所能提供的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阶级的命运更多的是被社会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社会的命运被阶级的需要所决定。在一个明确的社会结构给定的情况下,阶级理论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假如社会结构本身在经历变迁的话,情况会怎样呢?一个不再具备功能的阶级可能会解体,并在一夜之间被一个或数个新阶级所取代。同样,不同阶级在一场斗争中胜出的机会取决于它们在本阶级之外赢得支持的能力,而这又取决于他们能否代表其他阶级利益,是否有能力实现这些利益。所以,不管是阶级的诞生还是死亡,不管是它们的目标还是它们实现目标的程度,也不管这些阶级之间是合作还是对立,都不能离开作为整体社会的情况而获得理解。

此时,从原则上讲,这种作为整体社会的情况是由外在原因创生的,诸如气候的变化,庄稼的收成,一个新敌人的出现,或者老敌人手中有了新武器,新的公共目标的出现,或者,在这方面,达成传统目标的新手段的发现。面对这样一种总体性情况,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各阶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些局部利益放在社会整体状况中加以考虑。

阶级利益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任何影响广泛的变迁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共同体的不同部分,即使没有其他因素作用,地理位置和经济文化条件的差异也足以造成这种区别。由此,局部利益乃是推动社会与政治变迁的自然的车轮。不管变迁的根源是贸易还是战争,是重大发明还是自然条件的改变,此时社会的不同部门会采取不同的适应方式(包括强制方式),并调节他们自身利益以适应他们试图领导的其他群体;由此,只有当我们能够把导致变迁的那个或者那几个群体指出来时,我们才能解释这个变迁发生的原因。然而最终的动因是由外在力量决定的,仅仅在涉及变迁的机制时才依赖于内在的力量。“挑战”是针对社会整体的,“应战”才是来自团体、部门和阶级的。

所以说,单单阶级利益并不足以提供对社会长期进程的满意解释。首先,由于这一过程可能会决定这个阶级本身的生存与否;其次,因为给定阶级的利益只决定它们奋斗的目标,而并不能决定到底这些目标能不能被达到。阶级利益并没有魔力能保证让其他阶级的成员支持该阶级的行动。可是这种支持每天都在发生。实际上,保护主义就是一个例子。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

么平均地权论者、制造业主或者工会成员希望通过保护主义行动增加他们的收入,而在于究竟为何他们竟能成功地做到这些;不在于为什么商人和工人希望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垄断,而在于为何他们达到了目的;不在于为什么不少大陆国家中的一些群体以相同的方式采取行动,而在于为何这些群体会存在于如此不同的国家之中,并且都同样达到了目的;不在于为什么那些生产粮食的人试图高价售出他们的产品,而在于为何他们往往能成功地说服购买者帮助提高粮食的价格。

其次,认为阶级利益的本质是经济性的——这样一种教条也完全是错误的。尽管人类社会自然要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人类个体的动机却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由物质满足的需要所决定。19世纪的社会是在假定这种动机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性的体现。所以适当的做法是,在分析社会时,对经济动机扮演的角色作比较宽泛的审视。但我们必须警惕先入为主的偏见,因为正是这种偏见使得这种不常见的动机具有了普遍的效力。

纯粹的经济事务,诸如那些与需求满足相关的东西,它们与阶级行动的相关性远远无法与诸如社会承认这样的问题相比。当然,需求满足可能是这种社会承认的结果,特别是作为社会承认的外在表现或者奖品。但是一个阶级的利益最直接地是指身份(standing)和等级(rank)、地位和安全,也就是说,它们首先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

1870年之后,那些断断续续参加保护主义普遍运动的阶级和群体,这么做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利益所系。在那些关键性年代里采取的“集体主义的”手段表明,除了偶尔的例外,卷入其中的都不是单个阶级的利益,即使出现只有单个阶级的利益被卷入的情况,这种利益也极少是经济性的。可以肯定的是,授权市镇当局维护公共活动空间的法令,要求面包房至少每半年用热水和肥皂清洗一次的规章,要求对缆绳和锚进行检测的法案,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某种“短视的经济利益”。这些干涉措施的绝大部分都对收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措施仅仅是对工业文明的某些需要的反应,因为这些需要是市场手段所无法应对的。实际上,这一点对于所有与健康 and 居住以及公共环境和图书馆、生产条件和社会保险等有关的立法都是适用的。它对公共设施、教育、交通和无数其他事项也同样适用。即便某些措施涉及金钱利益,它相对其他利益而言也只是次要的。几乎不用问,问题肯定集中在职业地位、安全与保障、人们的生活方式、寿命、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稳定性等等这些

方面。对于诸如关税壁垒、工伤赔偿等典型的干预形式，其金钱方面的重要关注当然不能被忽略。但即使在这样一些例子里，金钱利益也是与非金钱利益不可分割的。关税壁垒对资本家意味着利润，对工人意味着工资，然而最终它意味的是就业保障、地区条件的稳定、保障企业以免倒闭，以及，或许最为重要的是，避免丧失地位的痛苦，因为当一个人从他所熟悉的工作转向另一份他没有技能也没有经验的工作时，必然会面临先前地位丧失的痛苦。

一旦我们去除了困扰，不再错误地认为是局部的而不是普遍的利益在起作用，不再抱有类似的偏见，即认为人类群体的利益就是他们的金钱收入，这时保护主义运动的广泛性和全面性就不再神秘莫知了。尽管金钱利益必然由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表达，但其他方面的利益则有更为广泛的支持者。它们以无数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诸如邻里、专业人士、消费者、行人、经常乘车往返者、运动员、徒步旅行者、园丁、病人、母亲或者情人——并且同样他们都可以由任何地方性或者功能性团体所代表，比如教堂、同乡、大学生联谊会、工会，或者最为常见的、基于广泛的政见原则的政治党派。一种对利益的太过偏狭的理解必然会在实际上导致对社会和政治历史的狭窄理解，将利益单纯定义成金钱利益并不能解释那种对保护的生死攸关的需要，对这种需要的代表一般而言落在那些掌管共同体普遍利益的人们身上——在现代条件下，就是政府当局。恰恰是因为整个人民中纵横交错的局部利益——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利益——被市场所威胁，属于不同经济阶层的人们才会不自觉地合力应对这一危险。

于是，市场的扩张既受阶级力量的推动，也被它阻碍。由于建立市场体系需要机器生产，所以商贸阶级自身就单独成为早期转型中的领导力量。制造业主阶级在旧有阶级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他们掌控着一种能促进整个共同体利益的发展过程。如果说工业阶级、制造业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兴起是由于它们在扩张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结果，那么对这一扩张运动的防卫则落到了传统的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工人阶级的身上。如果说在商贸共同体中，代表市场体系结构原则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那么社会架构的誓死捍卫者则一方面封建贵族，另一方面是新生的工业无产者。地主阶级自然不惜代价地想寻找一种能够维持过去传统的解决方案，但工人阶级的做法与之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想超越市场社会的限制，并从未来那里找到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可能的行动选择在于要么回到封建时代，要么宣布社会主义的到来；但它确实指示出平均地权论者和城市工人阶级力量寻求解决燃眉之急的完全不

同的方向。如果市场经济崩溃了,如同每个重大危机所威胁人们的那样,地主阶级可能试图回到父权主义的军事或封建统治中去,而工厂工人则希望建立一个合作性的劳动共同体。在一个危机中,“反应”可能指向相互排斥的解决方案。阶级利益小小的相互抵触,在别的情况下本来可以通过妥协得到解决,而在此时却具有了最大的重要性。 163

所有这些都警告我们在解释历史时不要过分依赖特定阶级的经济利益。这种研究路径的隐含前提是那些阶级是确定不变的,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阶级只有在金刚不坏的(indestructible)社会中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假设不能包括历史的那些关键阶段,即一个文明毁灭了,或正在经历一场转变,一般而言此时新的阶级正在形成,有时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形成,而且是在旧阶级的废墟上,甚至是在外来因素——例如,外国冒险家或者流浪者——的基础上形成。经常性地,在一个历史的节骨眼儿上,新阶级应呼唤而出现,它们仅仅是应运而生。所以,最终,正是一个阶级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决定了它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它的成功是由它能够为之服务的利益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而不是它自身的利益所决定的。实际上,只关注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的政策甚至不能护卫这种利益本身——这是一条只是偶尔才出现例外的规律。除非想把社会推向彻底毁灭,否则没有任何粗暴自私的阶级能够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

为了归罪于所谓的集体主义阴谋,经济自由主义者必须否认已经出现任何保护社会的需要。近来,他们开始宣扬某些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不承认关于工业革命的传统看法,否认在1790年代左右,曾有一场灾难降临在英国劳工阶级身上。根据这些作者的说法,人民大众并没有经历任何突然性的生活标准恶化。平均而言,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工厂引入之前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并且,从数字上讲,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工人数量的迅速增加。通过体现经济福利的指标——实际工资和人口数量——他们坚持,早期资本主义的地狱并没有存在过;工人阶级,远不是被剥削,而是经济上的赢家。那种认为需要保护社会,以抵制一种使所有人都受益的体系的论调,简直不可思议。

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评被这种论调迷惑了。然而在过去70年左右的时间里,学者们与皇家委员会都一致谴责了工业革命的恐怖,多如星辰的诗人、思想家、作家的心里对它的残酷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些注定是不可推翻的事实:冷酷无情的剥削者利用大众的无助,使他们处在牛马般的劳顿和饥饿之中;圈地者剥夺了乡民的家园和居住地,并把他们扔向济贫法改革后所创造的劳动力市场;那些经过证实的,描述小孩有时在矿井和工厂中工作致死 164

的悲剧提供了关于大众命运的梦魇般的证据。实际上,对工业革命众所周知的解释是建立在18世纪圈地运动使高度剥削成为可能这一前提下的;还有,向这些无家可归的工人所支付的低工资,成就了棉纺业的高利润和早期制造业手中的快速资本积累。对他们的指控是控诉他们对自己同胞肆无忌惮的剥削,而这正是无尽苦难和堕落的根源所在。所有这些现在明显被推翻了。经济史学家宣布了这样一个消息,投在工厂体系早期阶段的浓重阴影已经被驱散了。因为,存在着无可置疑的经济改善的地方怎么会有社会灾难呢?

当然,实际上一场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是不能通过收入数据和人口统计来衡量的。很自然,影响到各阶层老百姓的文化灾变不会经常发生;但像工业革命这样的灾难性事件也不会经常发生——这是一场经济上的地震,在不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把在英国乡村中定居的大量人口变成了走投无路的流民。但如果说这种毁灭性的山崩地裂在阶级历史上属于例外的话,那么在多种族人民之间的文化接触中它倒是常有的事。本质上,与这两种情况有关的条件是相同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社会阶级构成是同一地理区域上的社会的一部分,而文化接触通常发生在位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社会之间。在两种情况中,这种接触都可能会对较弱的一方形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当然,经济过程可能为这种毁灭提供了工具,并且经济上的劣势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使弱者一方屈服就范,但其毁灭的直接原因并不在于经济因素;而在于对体现其社会存在的制度设置的致命创伤。后果是其自尊和水准(standard)的丢失,不论其单位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阶级,也不管这一过程来自所谓的“文化冲突”,还是同一社会内部一个阶级的地位的改变。

对于一个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史的学者而言,这样一种类比具有重大意义。非洲某些土著部落今天的条件状况与19世纪早期英国劳工阶级的状况拥有无可置疑的相似性。南非的卡菲尔人(Kaffir),一个高贵的蛮族(noble savage),可以说他们在其部落里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上的安全感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但却被转变成一种像半家养动物一般的人,穿着“不合体的、污秽的、见所未见的破烂衣裳,这种衣裳连最低等的白人都不会穿”^①,一种无可名状的存在,没有自尊或者水准,是名副其实的人类废物。这种描述让我们回忆

^① Millin, Mrs. S. G., *The South Africans*, 1926.

起罗伯特·欧文对他手下工人的形象的描绘,这种描绘发生的场景是这样的:他把他手下的工人集中到新拉纳克(New Lanark),面对面地、客观冷静得像一个社会研究者在陈述事实似地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变成了堕落的下等人。他们堕落的真正原因正是在于他们生活在“文化真空”中——这个术语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①用来描述某些非洲勇敢的黑人部落的状况时用的,当这些部落受到与白人文明接触产生的影响时,发生了文化贬值(debasement)的现象。他们的手艺被荒废了,生存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被破坏了。用里弗斯(Rivers)著名的话说,他们在厌倦中渐渐死去,或者在放荡中浪费他们的生命和财物。在他们的文化再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值得努力和牺牲的目标的同时,种族的偏见和歧视又阻碍他们充分参与白人入侵者的文化^②。如果用社会隔离来替换种族隔离,那么这两个1840年代的不同社会就合成一个了,而卡菲尔人则被金斯利(Kingsley)小说中步履蹒跚的贫民窟居民恰当地取代了。

有些人虽然承认在文化真空中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但他们却往往预期经济需求会自动填补这些空白,从而使任何条件下的生活变得有价值。这种假设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正相抵触。“人们为之工作和奋斗的目标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机体对诸如单纯食物的匮乏这样一种外在的、未经文化决定的情境的反应,”米德(Margaret Mead)博士这样说。“把一群未开化的人转变为金矿矿工或船员的过程,或者仅仅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劳作动机、让他们安详地死在满是鱼儿的小溪边的过程,看起来是如此怪异、如此不合乎社会的本性和它的正常状态,而被我们看作一种病态,”然而,她继续说道,“作为一种规律,这种状况恰恰会发生在处于剧烈变迁中的民族身上(这种变迁是从外部引入的,或至少是外部制造的)……”她总结道:“这种粗暴的接触(contact),这种将原始民族从它的传统道德中连根拔起的事例,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至于社会史学者应该给予真正的关注。”

166

可是,社会历史学家却未能抓住这个提示。他们仍旧拒绝认识文化接触的根本性力量——现在这种力量正在使殖民地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与一个世纪之前造成早期资本主义悲惨景象的力量是相同的。一位人类学

^① Goldenweiser, A., *Anthropology*, 1937.

^② Goldenweiser, A., *ibid.*

家^①给出了一个普遍化的推论：“在无数的差异之下，归根结底来说，异国民族现在所处的困境与我们在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前所处的困境是一样的。新的技术装备、新的知识、新形式的财富和权力增强了社会流动，即个体化的迁移，家族的沉浮，群体的分化，新的领导形式，新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图恩瓦尔德那极具穿透力的大脑意识到，黑人社会今天的文化灾变与资本主义早期大部分的白人社会所经历的灾变惊人相似。只有社会史学家到现在还没意识到这种相似性。

任何力量都不能像经济主义偏见那样有效地模糊我们的社会洞察力。剥削概念在讨论殖民问题时总是争论的重点，所以这个概念值得给予特殊的关注。当然，在人们能明显察觉到的意义上的剥削已经被如此经常、如此不懈、如此粗暴地施加在落后民族身上，以至于在讨论任何殖民问题时，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就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表现。然而，恰恰是这种对剥削的强调往往使得更重大的文化退化问题逃离我们的视野。如果剥削被严格从经济上定义，指交换比率的长久性的不平等(inadequacy)的话，那么事实上到底存不存在剥削还是值得怀疑的。土著共同体的崩溃是对牺牲者基本制度设置(institutions)的迅速而剧烈的破坏的直接后果(在这一过程中是否使用了武力与这里的问题无关)。这些制度被毁坏的原因恰恰在于，市场经济被强加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体身上；劳动力和土地被转化为商品，而且，这仅仅是对有机社会(organic society)每一个和任何一个文化制度设施消散过程的一个简短描述。很明显，收入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无法补偿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谁会否认当一个本来自由的人被变成奴隶时，他是受到了剥削呢？尽管在某种人为的意义上，在他们卖身为奴的国家里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过去的丛林生活有所改善，但也无法改变上述事实。纵使我们的假想被征服的土著仍然保有自由，甚至没有被强迫用高价购买强加于他们的廉价棉纺品，也同样足够造成上面的那些后果，因为他们的饥饿“仅仅”是由他们的社会制度设置被毁坏引起的。

我们可以引用印度的著名案例。印度大众在 19 世纪下半叶饥饿而死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被兰开夏(Lancashire)^②剥削；他们大批死亡是因为印度村庄

^① Thurnwald, R. C., *Black and White in East Africa; The Fabric of a New Civilization*, 1935.

^② 英国纺织业中心。——译者注

共同体被消灭了。这种局面是由经济竞争的力量导致的,即手工织品恰达(chaddar)由于机器制造的布匹的竞争而发生了永久性滞销,这一点无可置疑是真的;但它证明的恰恰不是经济剥削,因为廉价倾销意味着没有高额利润。过去50年中饥荒的实际根源在于粮食的市场化与地方收入降低的联合作用。粮食歉收当然是原因的一部分,但通过铁路运输粮食使得向受威胁地区运送救济成为了可能;麻烦在于人们无力购买价格高得惊人的粮食,在一个自由但组织却不完善的市场中,这种高价是对短缺的必然反映。在从前的时代,有地方上的小粮仓来应对歉收,但现在这些粮仓或者早已不再运转,或者被卷入了大市场中。为这个原因而设立的饥谨防御机制现在常常采取公共工程的形式,以使老百姓在涨了价的情况下购买粮食。由此,自从叛乱(Rebellion)之后英国治下的印度发生的三四次使人口缩减一成以上的大饥荒,既不是自然环境的结果,也不是剥削的结果,而不过是对劳动和土地的新的市场组织方式的结果,这种新方式在打破了古老村庄的同时,却没能在实际上解决其问题。在封建主义或者村落共同体的统治下,贵族责任、家族团结和对粮食市场的规制都阻遏了饥荒的发生,而在市场的统治下,人们却无法通过其运作规律来免除饥荒。术语“剥削”并不能用来充分描绘东印度公司垄断被废除、自由贸易被引入之后印度的情境,此时饥荒情况已经更加严重。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控制下,情况还基本上处于可控制状态,因为有乡间的古老组织相助,还能够自由地分配粮食,然而在自由而平等的交换原则下,印度人成百万地死去。从经济上讲,印度可能——从长期来看情况当然如此——已从经济自由中受益,但从社会上讲,她被解体了,成为苦难和退化的牺牲品。

168

至少在某些情况中,正是剥削的对立面^①——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启动了具有毁灭性的文化交往。1887年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强制土地分配,以我们的经济式思考方式来说,使他们每个个体都受益了。但这一措施几乎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个种族——这是有记载的文化退化的突出例子。像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这样的道德天才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后才从先前的立场上撤退,他认为应该返回部落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今天至少一些地方的北美印第安人又形成了有活力的共同体——不是经济上的改善,而是社会的重建造就了这个奇迹。1890年,著名的鬼舞版(Ghost Dance version)波尼族游戏(the Pawnee Hand Game),以其哀婉动人的面世,记录了一次破坏性文化接触造成的

^① 即给予。——译者注

休克,此时正值不断改善的经济条件使得这些红色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陷入混乱之中。更进一步,即使人口增长的事实——另一个经济指标——也不能排除存在文化灾变的可能性,这也同样是由人类学研究加以证实的。人口以自然增长率增长,实际上既可能是文化活力的外在表现,也可能是文化退化的表现。“无产阶级(proletarian)”一词的最初含义,即把旺盛的生育力与乞讨联系在一起,是对这样一种两面性的惊人表达。

169 经济主义偏见既是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粗俗的剥削理论的根源,也是同样粗俗但更具学术化的、否认社会灾变存在之误解的根源。这种误解隐含的意义,以及最近对历史的重新解释,目的都是要重建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因为如果自由主义经济在过去并没有导致灾难的话,那么从全世界夺走自由市场益处的保护主义,就是一种荒唐的犯罪。“工业革命”这个词本身已经招致不满,因为它夸大了一场本质上是缓慢的变迁过程的剧烈程度。这些学者们坚持,除了技术进步的力量逐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外,任何更严重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毫无疑问,他们也承认有许多人在变迁过程中经受了苦难,但从整体上讲,这是一个持续改善的过程。这样一个幸福的结局是经济力量几乎无意识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些力量还是在面临干扰的情况下做出这些有益贡献的。干扰来自急躁的党派,是这些党派夸大了那个时代里那些不可避免的困难。他们的结论是否认新经济已经带来了对社会的威胁。假如对工业革命历史的这种修正符合事实的话,保护运动就会丧失所有的客观正义性,而自由放任就要反过来被确证为正义。关于社会和文化灾变的唯物主义错觉因而就支持了下面的神话:时代的所有病症都是由我们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背离所导致的。

简而言之,所谓的集体主义运动的根源,并不是单个的群体或者阶级,尽管其后果无疑受到了相关的阶级利益的影响。最终,使事情发生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尽管维护这种利益的责任更倾向于落到人口中的这个部分而不是那个部分身上。看起来合理的做法是,不是将我们所描述的保护运动归因于阶级利益,而是归因于被市场所威胁的社会实质。

危险来自市场体系攻击的主要方向。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攻击了劳动力的载体,即人。国际自由贸易首先是对依赖于自然的最大产业的威胁,这个产业就是农业。金本位制危及生产性组织,因为它们的运转有赖于价格的相对运动。在这每一个领域里,市场发展起来了,这意味着在其存在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社会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市场是很容易辨认的;但要分辨一个文化中的各个部分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些文化部分是分别由人类、他们的自然环境和他们的生产组织构成的。人与自然在文化领域里是一体的;而生产企业的货币方面只分享(enter into)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性利益,即国家(nation)的统一和团结。于是,尽管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虚拟商品的市场是界限清楚并相互分离的,但它们所包含的对社会的威胁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尽管如此,如果对西方社会在关键的 80 年间(1834—1914)的制度发展作一总体勾勒,我们还是可以用同样的词汇来指涉这些危险焦点中的每一个。因为不管涉及的是人,还是自然,或者生产组织,市场组织的发展最终都会形成威胁,而有关的特定群体或阶级都会要求保护。在这些例子中,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发展之间可观的时间差异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到了世纪之交,保护主义反向运动却在所有西方国家都产生了类似的情况。

相应地,我们将分别处理对人、对自然和对生产组织的保卫行动——这是一场自我保存运动,作为其结果,一个联结更紧密的社会出现了,不过这个社会也正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

第十四章 市场与人

171 将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相分离,使之受市场规律支配,这就意味着毁灭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并代之以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即原子主义的和个体主义的组织。

这样一个破坏性阴谋实现的最佳途径有赖于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这意味着非契约关系,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都将被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体的忠诚并因而限制了他的自由。将这一原则作为不干涉主义的一个代表——像经济自由主义者所习惯于做的那样——实际上只是表达了一种偏爱某些特定干涉的固有偏见,也就是偏爱那些毁坏个体间的非契约关系并阻止它们自发恢复的干涉。

172 在今天的殖民地区,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极为显著。土著被迫通过出卖劳动力为生。为达到这个目的,传统的社会制度设置必须被摧毁,而且不能让它们重新形成,因为一般而言,初民社会里的个体并不会被饥饿所威胁,除非整个共同体本身面临同样的威胁。例如,在卡菲尔人的村庄土地制度(Kraal-land system)下,“饥馑是不可能发生的: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都毫无疑问会得到帮助。”^①没有一个夸扣特尔人(Kwakiutl)“会有一点点挨饿的危险”^②。“处在勉强维持生计(subsistence)边缘的社会中是没有饥饿的。”^③免于匮乏的原则在印第安人的村落共同体中也同样得到公认,并且我们还可以说,直到16世纪初,欧洲社会任何类型的社会组织都是如此,当时的人道主义

① Mair, L. P., *An Af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34.

② Loeb, E. M.,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 Early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1936.

③ Herskovits, M. J.,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1940.

者维韦斯(Vives)在索邦神学院提出的关于贫困者的现代观点还引起了争论。初民社会中没有饥饿威胁这一点,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比市场经济更人性化,更少经济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白人对于黑人世界的最初贡献主要在于让他们懂得了如何利用饥饿的鞭策力。由此殖民者可能会决定将面包树砍倒,从而人为地制造食物匮乏,或者对土著人课以房屋税,使其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进行交换。这两种情况产生的效果都和都铎王朝时代的圈地运动效果相似,制造出成群结队的流浪者。国际联盟的一份报告带着毫不令人意外的恐惧提到,16世纪欧洲曾经出现过的一幕近来又出现了——在非洲丛林中出现了“无主人的人(masterless man)”^①。在整个中世纪末期,这样的人只有在社会的“缝隙”中才被发现过。^②然而他们却是19世纪流浪工人的先驱。^③

现在白人在某些偏远地区仍然时不时从事的——破坏当地的社会结构以获取劳动力——也就是18世纪他们抱着相似的目的对其他白人所做过的。霍布斯对于国家的独特见解——一个由无数人类身体组成的怪物——在李嘉图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前相形见绌:这是一群流动的人,数量由供给他们的食物的数量所控制。虽然人们承认市场中的工资往往处在不能再低的最低水平,但是这种低水平工资的维持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劳动者别无选择,要么接受市场提供的工资,要么忍饥挨饿。顺便提一下,这也解释了用别的方式无法说明的古典经济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即为什么只有饥饿的惩罚而不是高工资的诱惑才创造了有效运行的劳动力市场。殖民经历也确证了这点。因为工资越高,对土著人而言,卖力工作的驱动力就越小。他们不像白人,他们的文化标准并不能驱动他们尽力挣更多的钱。下面的类比更令人吃惊:早期的劳动者非常憎恨工厂这个令他们感到地位低下并饱受折磨的地方,就像土著人只有在身体受到残害或是肉体惩罚的威胁时才会服从殖民者,并按照他们要求的方式去劳动一样。18世纪里昂的制造商推行低工资主要是因为社会原因。^④他们辩称,只有过度工作并且受压榨的劳动力,才不会和他的同伴联合起来,设法逃离这样一种他不得不听从主人对他的任何要求的奴役状态。英国的法定劳役和教区农奴制,欧洲大陆专门管制劳动力的警察的严酷,以及美洲早期的定期契约劳动等,都是“心甘情愿的工人”存在的前提条

173

① Thurnwald, R. C., *op. cit.*

② Brinkmann, C.,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1924.

③ Toynbee, A.,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87, p. 98.

④ Heckscher, E. F., *op. cit.*, Vol. II, p. 168.

件。但是最终阶段的达成都依赖于“自然惩罚”——即饥饿的运用。为了释放这种惩罚,消灭有机社会是必要的,因为这种社会不允许个体有遭受饥饿的危险。

最初,保护社会的责任落在了能够直接履行他们意愿的统治者身上。但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太想当然地认为,经济统治者趋向于对社会有利,而政治统治者则不然。亚当·斯密似乎不这么认为,他极力主张应当用直接的英国统治替代特许公司在印度的管理。他认为政治统治者应该和被统治者有相同的利益,因为被统治者的财富会增加统治者的财政收入,而商人的利益与顾客的利益本质上却是对立的。

174 鉴于利益和偏好,保护大众免受工业革命冲击的任务落在了英国地主们身上。斯品汉姆兰法令是在变迁带来的混乱席卷乡间,并使农业变成了不稳定的产业时,为保护传统乡村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出于不情愿服从制造业城镇的天性,英国的大地主们最先站出来参与这场必输无疑的世纪之战。然而他们的抵抗并非徒然,它使几代人免于毁灭,并为彻底的重新调整争取了时间。在40年的关键时段内,它阻滞了经济进步,而当1834年改革议会最终废除斯品汉姆兰法令的时候,地主们将抵抗的方向转向了工厂法。教会和封建领主开始鼓动人们抵抗工场主,因为工场主的优势地位使得要求降低粮价的吁求变得极富诱惑力,从而间接地威胁到地租和农产品什一税的减收。举例来说,奥斯特勒(Oastler)是“一个牧师,同时也是一名托利党员和贸易保护主义者”^①;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慈善家。其他那些对抗工厂运动中的伟大战士同样也是这些托利社会主义成分的不同比例的混合,如萨德勒(Sadler)、索锡(Southey)和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但是他们及其信徒所担心的金钱损失的危险后来被证实是存在的:曼彻斯特的出口商不久就叫嚣着要降低的工资,包括更便宜的粮食——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止和工厂的壮大大事实上为1846年反谷物法(Anti-Corn Law)铺垫了成功的道路。然而由于偶然的原因,英国农业的破坏被推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迪斯雷利(Disraeli)用托利社会主义理论反对济贫法改革的同时,英国的保守派地主们在工业社会中迅速推行新的生存技巧。被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首次胜利的1847年十小时工作制法案,就是开明保守派的功绩。

劳动者本身并不是这场运动的关键要素,这场运动,打个比方说,其后果

^① Dacey, A. V., *op. cit.*, p. 226.

是使他们成功地熬过了严峻的大西洋中央航线(the Middle Passage)^①。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丝毫发言权,就像霍金斯船上的黑奴一样。然而正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决定自己命运方面参与性的缺乏,决定了英国社会的历史,并且,不论是好是坏,都使它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历史。

英国劳动阶级的自发成长以及这个初生阶级的摸索和试错,都有其独特性,而其真正的性质已经在历史上显露。从政治上来说,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在1832年的国会修正法案(the Parliamentary Reform Act)中被定义的,法案拒绝了工人阶级的投票权;从经济上看,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在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法案中被定义的,该法案规定把工人阶级排除在救济对象之外,并且将他们和赤贫者区分开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正在形成中的产业工人阶级并不能确定他们的拯救是否在于回到乡村生活状态和手工业条件中。在斯品汉姆兰法案后的20年里,他们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通过推动实施工匠法中的学徒制条款,或是采取其他直接的行动,例如强烈反对任何进一步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卢德主义(Luddism),来阻止机器的自由使用。这种保守的态度一直作为一股潜流延续着,贯穿了整个欧文运动(the Owenite movement),直到40年代末期,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出台、宪章运动的衰落以及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开始,才消除了那种过去的幻想。一直到那时,处在萌芽状态中的英国的工人阶级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还模糊不明;只有理解了工人们那半无意识状态下的骚动,我们才知道,由于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国民生活之外,英国蒙受了多么大的损失。当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逐渐消退的时候,如果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要在未来的世纪中建立自由社会这一理想的标准来看,英国此时已经变得更加贫穷了。

175

即使欧文运动只是引发了微不足道的地方性活动,它也还是会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丰富想象力的一座丰碑。纵然宪章运动并未扩展到核心人物之外——这些人物创造了“国定假期(national holiday)”概念来增加人民权利——但也足以显示出人民中的一部分仍然有能力拥有自己的梦想,他们还有能力为这个已经忘记了人应该是什么模样的社会筹措对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欧文主义并不是一个小宗派的灵感,宪章运动也不是局限于一小部分政治精英;两个运动都是由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工匠、劳动者和工人组成的,如此大的规模使它们成为现代社会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尽管它们互不相同,其结果也都是失败的,但却

^① 非洲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大西洋中央航线,其航程较其他航线更长。——译者注

证实了保护人类免受市场冲击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

176 欧文运动开始时既不是政治性运动，也不是工人阶级运动。它代表了饱受工厂带来的打击的普通人的愿望，希望能发现一种生存方式——人可以成为机器的主人。从本质上说，它的目标是对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超越。这样的说法显然会是误导性的，因为当时关于资本所起的组织作用以及自我调节市场的性质还未被人认识。然而它或许最好地表达了欧文的精神，他绝对不是机器的敌人。他相信，尽管有了机器，人仍然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合作或者“联合”的原则将会解决机器带来的问题，而不至于牺牲个体的自由或是社会团结，也不至于牺牲人的尊严以及他对同伴的同情心。

欧文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灵感具有突出的可实践性，同时它的方法基于对作为整体的人的充分考虑之上。虽然它所针对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例如食品，住房，教育和工资水平，避免失业，扶助病患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但是所涉及的事项与它们所诉诸的道德力量一样广泛。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人类的生存方式就可以重建，这样一种信念使运动之根能层层穿透，达到使个性本身得以形成的人格层面上。历史上很难找到具有同等规模的不具学究味的社会运动；因此，参与者的信念赋予了琐碎的日常事件以意义，并且根本不需要依赖任何事先定好的教条。他们的信念是预言式的，因为他们所坚持的重建方法超越了市场经济。

177 欧文主义是一种工业的宗教，其教徒是工人阶级。^①它在形式方面和原创力方面的财富是无可匹敌的。实际言之，它是现代工会运动的开端。合作社开始出现，主要从事对其成员的货品零售。这当然不是通常的消费者的合作组织，而是那些热心者们所支持的商店，商店将营业利润用于促进对欧文主义的计划，特别是对建立合作村（Villages of Cooperation）的资助。“他们的活动在具有商业性的同时也具有教育性和宣传性；他们的目的是用他们共同的努力创造新社会（the New Society）”。由工会成员建立的“联合商店”从性质上看更像是生产者的合作组织，失业工人可以在那里找到工作，或者在罢工时期在这里挣点钱以代替罢工津贴。在欧文主义的“劳动交换”中，合作商店这一理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制度。处于交换或商店的核心地位的，是对不同手艺之间互补性的依赖；通过相互提供所需，工匠们可以使自己从市场

^① Cole, G. D. H., *Robert Owen*, 1925, 这是一本我们已经频繁引用的著作。

的跌宕起伏中解放出来；后来，伴随着这种互相依赖，出现了流通范围相当广的劳动券的使用。这样一套操作方式在今天看来或许很荒唐，但是在欧文那个时代，工资劳动和纸币的性质都还没有被研究。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和边沁运动的那些方案和发明并没有什么区别。不仅是叛逆性的反对派，而且有一定地位的中产阶级也都处在一个实验性的心态中。边沁自己也在新拉纳克投资了欧文的未来主义教育计划，并挣得了一笔红利。欧文主义社团从严格意义上讲是这样一些协会和俱乐部，它们被设计出来支持如我们所描述过的那些与救济贫困有关的合作村；这就是农业生产者合作组织的开始，这一构想由来已久，并且有其独特的发展进程。第一个具有工团主义目标的全国劳工组织是建筑业者协会(the Operative Builders' Union)，它试图通过“大规模建造房舍”、引进自己的货币、展示用来实现“旨在解放生产者阶级的伟大联合”的方法等各种方式来直接规制建筑业。这一组织成为19世纪工业生产者组织的先驱。更雄心勃勃的联合同业工会也是从这个建筑业者协会及其“议会”发展而来的，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这个工会就发展成为由近100万工人和工匠以比较松散的工会联盟或合作社团形式构成的组织。它的理念是用和平的方式进行产业工人的反抗，这一理念中并无悖谬，只要我们记得，在运动的弥赛亚式的黎明中，它有意识的使命不过是要使工人的工作热诚变得势不可挡。托尔普德尔(Tolpuddle)的蒙难者就属于这一组织在乡村地区的分支。工厂立法的宣传是由该工会的复新会(Regeneration Societies)开展的。后来又建立了道德委员会，它是世俗主义运动的先驱。非暴力抵抗的理念在当时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如法国的圣西门主义一样，英国的欧文主义显示了精神感召的所有特征；但是圣西门致力于基督教的复兴，而欧文则是现代工人阶级领袖中第一位反对基督教的人。大不列颠的消费者合作组织无疑是欧文主义最杰出的产物，它在世界各地都有人效仿。它的动力的丧失——或者说只是还保留于消费者运动这种非本质的领域中——是工业化英国历史上精神力量的最大一次挫败。然而，如果一个民族在经历了斯品汉姆兰时代的道德堕落之后，仍然保有足够的恢复力，拥有如此富于想象力和持续性的创造力，她肯定具有无边的智慧和情感活力。

178

欧文主义主张把人看作一个整体，仍然带有中世纪合作生活的色彩，这可以在建筑业者协会以及欧文主义社会理念的乡村生活图景——合作村中找到解释。虽然它是社会主义的源头，但其主张并不是建立在财产问题上的，财产问题只是资本主义的法律面向。就如圣西门所做过的一样，在偶然发现工业

的新现象时，它承认了机器对人的挑战。但是欧文主义的标志性特点在于它坚持社会的方法：它拒绝接受将社会划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的分割，并且在实际上拒绝以这种分割为基础的政治行动。对分离出来的经济领域的接受，就意味着承认以获利和利润原则为社会的组织力量。欧文拒绝这样做。他天才地认识到，只有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中机器才可能真正纳入社会。形势的工业性一面在他看来决不仅限于经济（这意味着一种对社会的市场化观点，这是他不接受的）。新拉纳克的经验告诉他，在工人的生活中，工资只是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其他因素还包括诸如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商品的质量和价格、雇佣关系的稳定性、职位安全等等。（新拉纳克的工厂与在它之前的某些工厂一样，即使是在没有工作可做的情况下也照发工资。）但是，除此之外，适应新社会的调整还包括许多内容：对孩子和大人的教育，提供娱乐、舞蹈、音乐，以及高层次道德标准和老人及年轻人个人标准的普遍设定，所有这些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里，工业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新的身份地位。数以千计的人从欧洲（甚至美国）跑来参观新拉纳克，就好像它是属于未来的飞地，它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依靠人性化的运作来成功地运转一个工厂。不过，欧文公司的工资比附近其他城镇工厂的工资都要低好多。新拉纳克工厂的利润主要源于劳动力在较短时间内的低生产力和高生产率，这得益于出色的组织和得到充分休息的工人，实际上要比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实际工资的增长更有价值。然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解释欧文的工人何以愿意依附于他。正是从这些经验中，欧文引申出了应对工业问题的社会的——即宽于经济层面的——途径。

尽管有了这一全面的关照，但他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具体物质状况对工人生存的重要性。这是其洞察力的又一个很好证明。他的宗教意识使他得以叛离汉娜·摩尔(Hannah More)及其《廉价文库》的实用超世论。这些小册子中有一册是颂扬兰开夏一位煤矿女孩的。她在九岁时就和比她小两岁的弟弟一起被送入煤矿当运煤工。^①“她高兴地跟着他(她父亲)一起下到煤矿，将自己埋在煤堆中，在这么幼小的年纪，她就抛开了性别的借口，加入到矿工的行列之中，这些男人们虽然粗鲁，但却为社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她亲眼目睹了父亲死于煤矿事故。后来她申请去当佣人，但是由于她做过矿工而受到了歧视，申请失败了。幸运的是因祸得福，她的举止和耐心受到了关注，有人来煤

^① More, H., *The Lancashire Colliery Girl, May, 1795*; 参见 Hammond, J. L. and B., *The Town Labourer*, 1917, p. 230.

矿了解她的情况,她被雇用了。这本小册子最后总结到:“这个故事告诉穷人,只要他们努力,就有机会上升到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并且在任何境况中,他们都不会完全失去践行许多高尚德行的机会。”摩尔姐妹喜欢与饥饿的劳动者一起工作,但是对他们的身体痛苦却没有太大的兴趣。她们用来解决工业主义所带来的物质问题的方法,仅仅是以她们的宽宏大量,慷慨地授予工人一些空泛的名分和功能。汉娜·摩尔强调她书中女主角的父亲是社会中非常有用的一员,他女儿的地位也是被她的雇主所承认的。汉娜·摩尔相信,对于一个运转中的社会而言,只要有了这些名誉上的东西,就不再需要其他东西了。^①欧文厌恶一种基督教,它放弃了主宰人类世界的任务,宁愿去鼓吹汉娜·摩尔书中想象出来的不幸的女主角所获得的虚幻的身份和(发挥的对社会有益的功能),而不愿去面对那超出了《新约》而存在的可怕的启示,不愿去面对复杂社会中人的条件。没有人能质疑激发汉娜·摩尔的信念的那种真诚,她坚信,穷人对令其退化的处境越是平静地接受,他们就越容易求助于来自天堂的慰藉——在她看来,他们的救赎以及她如此坚信的市场社会的平稳运转,全都维系于这种慰藉。这些基督教的空壳——上层阶级中最为慷慨者的精神生活定值于其中——与上述工业宗教的创造性信念形成了鲜明的比照,相比之下它是如此虚弱,而在工业宗教的创造性精神鼓舞下,英国的广大人民正在努力挽救社会。然而,资本主义仍然储备着一段未来。

宪章运动所诉诸的推动力是如此截然不同,以至于它在欧文主义实践失败之后的出现以及它那些不成熟的倡议几乎都被预测到了。它是一次纯政治的斗争,要求通过宪法渠道影响政府;它给政府施压的尝试与改良运动(the Reform Movement)同属一个传统,后者确保了中产阶级的投票权。宪章运动提出的六点方案要求一个有效的全民选举权。它所遭遇到的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它在三分之一世纪内被改革后的议会不断否决)、宪章请愿运动者在群众支持下所使用的暴力,以及18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对全民政府概念的无比厌恶,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民主的概念对于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只有当工人阶级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工会将工业的顺利运转作为其最大的关注点时,中产阶级才会让步,承认部分条件较好的工人的投

^① 参见 Drucker, P. F.,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1939, p. 93, 关于英国的福音主义者的部分,以及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1942, 第 21 页和第 194 页关于地位与功能的部分。

181 票权；也就是说，直到宪章运动退潮之后很久，能够确定工人们不会利用选举权来为任何属于自己的想法服务的时候，中产阶级才给了工人选举权。从市场形式的生存方式的扩展角度来说，这样做也许是正当的，因为它有利于克服残存于工人中的有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障碍。至于使老百姓——他们的生活被工业革命连根拔起——重获活力，并引导他们融入共同的国民文化这一截然不同的任务，却无人顾及。在工人阶级要求分享领导权的能力已被无可挽救地重创之际，他们为争取投票权所作的投入亦已无法挽回。统治阶级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他们把阶级统治的不妥协原则延伸成为一种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要求国民整体（commonwealth）在文化和教育上的一致，以免于堕落和退化的影响。

宪章运动是政治性的，因而比欧文主义更好理解。但若不对时代背景进行有想象力的参照，则很难意识到这场运动的情感强度和广泛程度。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使革命成为欧洲的一种常规化制度；1848年巴黎起义之前，柏林和伦敦对起义日期预测的准确性使人觉得被预测的是个集市的开放时间，而不是一场社会动乱，紧接着，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和一些意大利的城镇立刻都爆发了后续的革命。伦敦的局势也异常紧张，所有人，包括宪章运动者们自己，都预期会有暴力运动出现而迫使议会同意全民的投票权（当时只有不到15%的成年男性拥有投票权。）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848年4月12日那样，全国的军队都如此集中而有序地为捍卫法律和秩序而准备就绪；当日，成千上万的平民都充当了特别警察的角色，准备将他们的武器指向宪章派。但巴黎革命来得太晚，不可能促使英国的民众运动取得成功。此时，被济贫法修正案和饥饿的40年代唤醒的造反精神正在消殒；贸易的发展提高了就业率，资本主义开始带来好处。宪章派开始和平地解散。他们的议案根本不被国会理睬，一直推迟到后来才被议会下院考虑，他们的申请被五比一的反对率所否决。数百万人的签名成了徒劳。宪章派一向做遵纪守法好市民的行为方式也全然无用。他们的运动被胜利者嘲笑，由此，英格兰人民为建立全民主所作的最伟大努力结束了。一两年后，宪章运动几乎被人完全遗忘了。

182

工业革命在半个世纪后传入欧洲大陆。在那里，工人阶级并没有因为圈地运动而被驱离他们的土地；相反，由于更高的工资和城市生活的诱惑，这些半农奴似的农业劳动力抛弃庄园而移居城镇，并和城镇传统的较低层中产阶

级结合,取得了发展城市品位的时机。他不但不觉得自己地位下降,反而认为新的生活环境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他们的住房条件无疑是恶劣的,酗酒和卖淫在下层城市劳动力中十分猖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尽管如此,在下面这两种情况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一方面是英国手工业生产者和出身体面的小地主所遭受的道德和文化灾难,他们觉得自己正在附近工厂的贫民窟中绝望地沉沦,另一方面是斯洛伐克的或——在这方面——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的农业劳动者,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有固定住所的农业劳动力变成了现代城市的产业工人。一个爱尔兰或威尔士的散工或者是西部苏格兰高地居民,在早期曼彻斯特或是利物浦街道上晃悠的时候,可能会有相似的经历;但是,英国自耕农的儿子或是被驱逐的佃农肯定不会觉得他的地位有所提高。在欧洲大陆,刚刚获得解放的粗笨农民通过做工匠或是商人,有机会带着他们的古代文化传统成为较低的中产阶级的一员,但是,社会地位高于他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却同他们一样,远离实际的统治地位。为了对抗封建贵族统治和罗马主教制度,处在上升中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紧紧地联合在一起。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在反抗专制和特权的斗争中巩固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联合。然而在英国,中产阶级——17世纪的乡村地主和商人,或是19世纪的农场主和贸易商——都拥有独自维护自己权利的力量,即使在1832年他们的努力已使社会濒临革命时,他们也未寻求劳动者的支持。而且,英国的贵族不倦地吸收新起的富有者,扩大社会等级的最高层,而在欧洲大陆,半封建贵族却183
不愿和中产阶级的子女们通婚,并且他们没有长子继承制度,更使得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严密地隔离开来,因此走向平等权利和自由的每一个成功都同时有利于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如果不是从1789年,就是从1830年开始,工人阶级帮助中产阶级对抗封建主义就成为欧洲大陆的传统,只不过最后——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还是被中产阶级骗走了胜利的果实。但是不管工人阶级是输是赢,他们的经验都增加了,他们的目标也提升到了政治水平。这就是所谓的有了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开拓了城市工人的眼界,他们从经验中学会使用工业力量和政治力量作为获得有利政策的武器。而与此同时,英国的工人们在工会主义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发展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包括工业行动的战略战术,从而把国家政治留给了比他们“地位更优越的阶级”,而中欧的工人们则成为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习惯于操纵国家大事,虽然,他们主要还是关注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如果说英国的工业化和欧洲大陆的工业化之间有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间隔,那么两者建立统一国家的时间间隔则更大。意大利和德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达到了英国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就达到的统一水平,而其他东欧小国的统一就来得更晚了。在这些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政治经验。在工业化时代,这样的进程不能不包含社会政策。俾斯麦在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执政期间,试图通过采用一种划时代的社会立法方案来实现统一,而意大利则是由于铁路的国有化加快了统一进程。在多种族和民族聚集的奥匈帝国,统治者多次为中央集权及帝国统一而向工人阶级寻求支持。在这个更大的领域内,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也通过他们对立法的影响力,获得了很多为工业劳动者争取利益的机会。

184 经济主义的偏见使工人阶级问题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英国作家很难理解欧洲大陆观察家对兰开夏早期资本主义状况的可怕印象。他们指出,中欧许多纺织业工厂中工匠的生活水平比英国同类劳动者更低,而他们的工作条件或许和英国的一样差。但是这样的比较遮蔽了本来显而易见的一点,即欧洲大陆工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已经得到提高,而英国工人的地位却降低了。欧洲大陆的劳动者没有经历斯品汉姆兰法案带来的堕落退化,也没有经历过新济贫法之火的炙烤。他只是从一个农奴的身份变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上升为——一个工厂的工人,并且很快有了选举权,成为工会的一员。由此,他没有经历类似英国那紧随工业革命之开启而产生的文化灾变。不仅如此,当欧洲大陆开始工业化时,对新生产技术的适应已经成为可能,这几乎完全是得益于对英国社会保护方法的模仿。^①

欧洲大陆的工人并不需要像面对工业革命冲击所需的那么多的保护——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欧洲大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工业革命——他们更需要的保护是免受工厂常规行动(normal action)和劳动力市场环境带来的伤害。他们主要通过立法来取得这种保护,而英国的工人们更多是依靠自愿的联合——工会——或者是他们对劳动力的垄断权。在欧洲大陆,社会保险比英国更早实行。根据欧洲大陆的政治倾向以及工人阶级较早得到投票权这一事实,就很容易解释这一差别的产生。虽然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强迫性的保护方法(立法)和自愿性的保护方法(工会化)之间的差别很容易被高估,但在政治

^① Knowles, L.,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s,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1926.

上它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欧洲大陆,工会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物,而在英国,政党是工会的产物。欧洲大陆的工会主义者多少带有社会主义者的色彩,而英国甚至连政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都带有工会主义色彩。因此在英国,全民投票倾向于促进国家的统一,而在欧洲大陆有时却有相反的效果。皮特和皮尔、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麦考利(Macaulay)关于民众政府包含着对经济体系的威胁的疑虑是在欧洲大陆成为了事实,而不是在英国。

185

从经济角度看,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保护措施导致了几乎相同的结果。它们达成了预期的目标:为了保护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阻挠了市场的运作。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只有当工资与商品价格相一致时,市场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从人性角度看,这样一种假定对工人来说,意味着不应有稳定的收入,不应有职业保障,应该随时准备着被不加区分地推来搡去,完全被反复无常的市场所支配。米塞斯恰当地指出,假如工人“不像工会主义者那样行动,而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减少他们的需求、改变他们的生活地点和职业,最终他们就能找到工作”。这句话概括了基于将劳动力作为商品这一假设的经济体系的立场。在哪里出售、被使用于何种目的、能以什么价钱转手、如何消费或报废,这些都不是由商品本身能够决定的。这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继续写道:“人们不理解的是:缺乏就业的更好说法是人们缺乏工资,因为失业者失去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的报酬。”米塞斯说得没错,虽然他不该自称是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在他之前150年,惠特利主教(Bishop Whately)就说过:“人乞求工作时,他求的是报酬而非工作。”不过,从技术上讲下面这种说法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源于政府和工会的政策都指向维持与现有劳动生产率不相协调的工资水平。”米塞斯问道,要不是工人“不愿为劳动力市场中他们能够且愿意从事的某种工作的工资水平工作”,又怎么会有失业呢?这就使得为什么雇主需要流动的劳动力和灵活的工资这个问题变得一清二楚了:这就是我们上面所界定的市场,市场需要将劳动力视为商品。

一切社会保护的天然目标都是要摧毁这样一个制度(institution),并使之不可能存在。事实上,只有在工资、工作条件、标准和规则能够保护“劳动力”这种所谓商品的人性特质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才能发挥其功能。若争辩说社会立法、工厂法、失业保险,最重要的是工会等都没有影响到劳动力的流动和工资的涨落(就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那就意味着这些制度完全没有实现它们自身的目标,因为它们的目标就是要干预人类劳动力的供求法则,并使其从市场轨道中脱离出去。

186

第十五章 市场与自然

187 我们所说的土地是一种自然要素,它与人类的制度设置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将它孤立出来并形成—个土地市场,这种做法在我们祖先看来可能是最不可思议的了。

在传统上,土地和劳动力是不分开的;劳动形成生活的一部分,土地仍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和自然形成—个紧密链合的(articulate)整体。土地因此与亲属的、邻里的、行业的和信仰的组织——部落和庙宇、村庄、行会以及教堂——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总市场(One Big Market),是对经济生活的一种特定安排,它包括了生产要素的市场。由于这些要素恰恰不能与人类制度(institutions)的要素,即人和自然区别开来,所以很明显,市场经济意味着被它卷入其中的社会制度不得不从属于市场机制的要求。

关于土地的这种主张和关于劳动的那种主张—样是乌托邦。经济功能仅仅是土地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种。土地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稳定性;为他提供栖息之所;是他生理安全的条件;也是风景和季节。设想人的生命中没有土地,就如想象他出生时没有手脚—样荒唐。可是将土地与人分离,并以满足不动产市场需求的方式来组织社会,这正是市场经济乌托邦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88 另一方面,正是在现代殖民活动的领域中,这种冒险的真正意涵才彰显出来。殖民者是因为埋藏于其中的财富而需要土地,还是因为仅仅希望驱使土著生产剩余食物和原料,这往往无关紧要;土著是在殖民者的直接监视下还是在某种形式的间接强迫下劳动,这也不重要:因为在上述各种或任何一种情况下,土著生活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都必定被先行粉碎了。

今天的殖民情势和一—两个世纪前的西欧本土的情况很相似。所不同的

是,土地的流动化在其他地区是在数年或数十年之内完成的,而在西欧则是在几个世纪中完成的。

挑战来自资本主义的纯粹商业形态之外的增长。即英国自都铎王朝开始的农业资本主义,要求对土地进行个人主义化的使用,不管是通过兼并(conversions)还是圈占。还包括首先属于乡村的——之于法国如同英国——工业资本主义,需要土地来设置厂房和安置劳动力,这是始于18世纪初。不过,最为严重的是19世纪工业城镇的兴起,它实际上需要食物和原材料永无止境的供给,尽管这种改变主要还是在于土地的使用而不是占有。

表面上看,对这些不同挑战的各种回应,并没有什么相似性,可实际上这些挑战却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步骤,这个过程就是使这整个星球的地面从属于一个工业社会的需要。第一个步骤是将土地(soil)商品化,使原本封建性的土地收益流动起来。第二步是迫使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的生产服务于整个国家范围的、迅速增长的工业人口的需要。第三步是将这样一个剩余生产体系延伸至海外与殖民地。随着第三步的迈出,土地及其产品最终被纳入一个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的框架之中。

土地的商品化不过是封建主义消亡的另一种说法,这个过程自14世纪始于西欧的中心城市和英国,大约500年后结束于欧洲的革命浪潮,此时农奴制的最后残余也被废除了。使人脱离于土地意味着将经济性机体(the body economic)分解为其要素,以便每一种要素都能置于这个体系中最能发挥其作用的部分。新体系最初建立在它极力想同化和吸收的老体系边缘,通过确保对仍被前资本主义纽带束缚的土地的某种掌控而达到这种同化目的。对土地的封建式扣押制度被废除了。“目的在于消除所有与邻居和亲属组织、特别是强有力的贵族血统及教会有关的那些权利要求——那些使土地脱离交易和抵押的权利要求。”^①这种目的,有的是通过个体的强迫和暴力,有的是通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革命,有的是通过战争与征服,有的是通过立法,有的通过行政压力,还有的是通过长时期小规模私人自发行为而达到的。由此引发的混乱究竟是被迅速治愈了,还是撕裂了社会肌体,这主要取决于调节该过程的各种手段。政府自身引入了导致变迁和调节的强有力的因素。例如,直到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②时,对教会土地的还俗化一直都是现代国家

189

① Brinkmann, C.,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1924.

② 这场运动发生在19世纪,目的是解放和统一意大利。——译者注

政权的基础,附带地,同时也是将土地有序地转移至私人手中的主要方式。

最为重要的一步是由法国大革命和 19 世纪 30、40 年代的边沁主义改革所迈出的。“对农业繁荣最为有利的条件,”边沁写道,“存在于那些没有限定继承权,没有不可转让的土地赠与,没有公地,没有赎回权,没有什一税……的地方。”这种处置财产、特别是土地财产的自由,形成了边沁所理解的个人自由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展这种自由,是下面这些立法的目标和效果:取得时效法(the Prescriptions Acts)、继承法(the Inheritance Act)、罚金与回收法(the Fines and Recoveries Act)、不动产法(the Real Property Act)、1801 年一般性圈地法及其后续法规^①,加上从 1841 年到 1926 年的土地保有权法(the Copyhold Acts)。在法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拿破仑法典构造了中产阶级的财产权形式,使得土地成为可交易的货物,并使抵押成为一种私人的民事权利。

第二个步骤——部分地与第一步相重叠——是将土地从属于快速扩张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尽管土地不能从物理上流动起来,但它的产品可以,只要交通条件具备、法律许可:“这样,货物的流动就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要素在地区间流动的缺乏;或者说(这实际上是一回事)贸易减轻了生产能力的不合适的地理分布所造成的不便。”^②这样一种观念在传统视界里完全是陌生的。“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早期(这一点应该特别强调),日常生活中的物品都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被买或卖。”^③剩余的粮食被认为应该供给周围地区、特别是地方市镇之用;直到 15 世纪,谷物市场仍旧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地方组织。但城市的生长壮大引诱地主主要为市场而生产,并且——在英国——大都市的发展迫使当局放松了对谷物贸易的限制,让它成为地区范围内的贸易,尽管没有让它成为全国范围的贸易。

最终,18 世纪下半叶工业城镇的人口集聚完全扭转了情势——起初是在全国水平上,继而在世界范围内。

产生这样的变迁正是自由贸易的真正意涵。土地农产品的流动从邻近的乡村扩展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工业—农业的劳动分工在全球范围展开。

^① Dicey, A. V., *op. cit.*, p. 226.

^② Ohlin, B.,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1935, p. 42.

^③ Bücher, K.,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904. 亦参见 Penrose, E. F., *Population Theo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1934, 引用 Longfield, 1834, 后者第一次提到了商品流动可以被看做生产要素流动的替代物这样一种观点。

其结果是,遥远地区的民族被拖入了变迁的漩涡,而他们对这种变迁的发源却一无所知;与此同时,欧洲各民族的日常活动开始依赖于那种并未得到保证的全人类生活的整合。随着自由贸易的扩展,新的、巨大的全球范围相互依赖的风险开始形成了。

抵御这种全面混乱的社会自我防范,与它受到攻击的范围一样宽广。尽管普通法(commom law)与立法有时加速了变迁,但有时它们也缓滞了变迁。然而,普通法与成文立法(statute law)并不必然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向同一个方向起作用。

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之际,普通法主要起的是积极的作用——劳动的商品理论首先不是被经济学家而是被律师雄辩地提出来。同样,在劳动结社与共谋法(the law of conspiracy)的问题上,普通法也站在倾向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立场上,尽管这意味着要限制有组织的工人的结社自由。

但在关于土地的问题上,普通法转变了自己的角色,不再是鼓励变迁,而是反对它。在16、17世纪,普通法更多地是坚持主张所有者有按照增加获利的方式改善自己土地的权利,即使这种改善会在居住和就业方面造成严重的混乱。在欧洲大陆,如我们所知,这种流动化的过程包含了接受罗马法,而在英国,普通法坚持了下来,并且在牺牲对于宪政自由至关重要的法官制定法律的原则的情况下,成功地在中世纪限制性产权与现代个人财产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另一方面,自18世纪始,在土地方面普通法所做的是在面临立法的现代化时起到保守的作用。但最终,边沁主义当道,并在1830年至1860年间,契约自由被延伸到了土地。这一强有力的潮流只有在19世纪70年代立法程序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才被逆转。“集体主义”时代开始了。

191

普通法的惯性被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明确的成文立法而加强了,目的在于保护乡村各阶级的居住和职业免于契约自由效应的危害。为了保证穷人有一定程度的健康适宜的居住条件,人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为他们提供小块土地的出租(allotments),给他们提供“绅士公园”,使他们有机会避开贫民窟并得以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旨在反对致富迷信、决意保护人们栖息之所的立法行动,把悲惨的爱尔兰佃户和伦敦贫民窟居民从市场法则的控制下解救了出来。在欧洲大陆,主要是成文法和行政作用从城市化的最为残酷的后果中拯救了佃户、小自耕农和农业劳动者。普鲁士保守主义者——如罗德贝图斯(Rodbertus),他的容克社会主义曾影响了马克思——是英国托利民主主义者的同胞兄弟。

现在,有关所有国家和各大洲的农业人口保护问题已经出现了。国际自由贸易,如果不加以限制,就必然会消灭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者的联合体。^①这种不可避免的毁坏过程由于现代运输手段发展的内在固有的间断性而被大大地加剧了,除非获利异常丰厚,否则将现代运输手段延伸到新地区就非常不划算。一旦在建造蒸汽船和铁路方面的投资开始产生效益,整个大陆就将门户大开,雪崩般的粮食就会降临于不幸的欧洲。这正与经典的预言相反。李嘉图将最肥沃的土地最先被开发这个命题确立为一个公理。当铁路在这个星球的另一面发现更为肥沃的土地的时候,这个公理则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欧洲中部在其乡村社会面临彻底毁灭的时候,不得不通过引入谷物法来保护它的农民。

但如果欧洲有组织的国家还能够保护自己抵御国际自由贸易的波涛侵害的话,那么那些政治上未组织起来的殖民地人民就惨了。殖民地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叛反其实主要是他们争取政治地位的一种努力,这种地位对于他们保护自己,以避免欧洲贸易政策所造成的混乱的危害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白人能够通过自身所属共同体的统治地位轻松地为自己提供的保护,对有色人群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他们缺少独立自主的政府这个前提条件。

商人阶级提出了土地流动的要求。科布登(Cobden)由于自己的一项发现而把英国的地主们吓坏了,这个发现就是,务农(farming)也是一种“生意”,那些破产者必须被清算出局。工人阶级也被自由贸易争取过去了,因为他们发现自由贸易使食物更便宜了。工会成为反平均地权论的堡垒,革命的社会主义给全世界的农民都贴上了任性的反动大众的标签。毫无疑问,国际劳动分工是一个进步纲领;它的反对者经常是这样一些人,即他的判断力要么是受既得利益的影响,要么本来智商就有问题。极少数独立的、利益无涉的大脑虽然发现了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的谬误,可是他们人数太少,没能在历史中留下任何印记。

但是,这些后果并非因为没有被有意识地认识而不现实。实际上,19世纪西欧土地利益集团和残存于中东欧的封建式生活方式之所以产生了巨大影响,恰恰是因为这些力量阻滞了土地流动从而发挥了保护作用。下面这个问题经常会被提出来:在解除了它们居为优势的军事、司法和行政功能之后,欧

^① Borkenau, F., *The Totalitarian Enemy*, 1939, Chapter "Towards Collectivism".

洲大陆上的封建贵族哪里来的力量左右中产阶级这个特殊阶层？“残存者”理论有时被引用来作为解释，它告诉说，丧失了功能的制度或者特征会由于惯性而存活下来。不过更符合事实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存活得比它的功能更长——当它看起来活得更长的时候，那是因为它正发挥着其他的功能，**这些功能并不必然包括它原有的那些功能**。于是，只要封建主义和土地所有者保守分子还保有着某种效用，它们就仍保有自己的力量，而这种效用碰巧就是限制土地流动的灾难性后果。此时自由贸易者已经忘记了土地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主权的领土特征并不仅仅只是情感交往的结果，而且是包括经济事实在内的大量事实的产物。“与游牧民族相对照，从事种植农业者将自己的经营(improvements)固定于一个特定的地点，要不是这种经营，人类生活必定仍旧是原始性的，与动物的生活相去不远。这种固定状态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是多么重大！正是这些：被开垦和培育的土地、房子和其他的建筑、交通设施、对包括工业和矿业在内的生产必不可少的各式各样的工厂，正是所有这些永久性的和不可移动的经营将一个人类共同体维系于它所在的地点。它们不可能被即席创作出来，而必须由许多代人耐心努力方能造就，而且共同体也无法承受牺牲它们而在别处重新开始的损失。这便是主权的领土特征，它渗透于我们的政治概念之中。”^①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却遭到了嘲笑。

193

经济上的争论很容易地就会扩展到包括安全保障的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同土地及其资源的完整性(integrity)相联系——诸如人口的活力和耐力、食物供给的充分程度、防卫物资的数量和特征，甚至可能是被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沙尘暴侵害的气候条件，最终而言，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土地因素，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对市场的供求机制作出反应。对于一个给定系统，其存在必须完全依赖于市场功能来保证，信任就自然会转向市场体系之外的力量，即有能力保障被这个系统所危及的公共利益的力量。这一观点与我们对阶级影响的真正根源的理解是一致的：并非试图用反动阶级的(未被解释的)影响来解释与时代的普遍趋势相对抗的发展进程，而是要解释这些阶级的影响力本身，即这种影响力取决于这些阶级——尽管是偶然地——代表着仅在表面上与共同体的普遍利益相对立的发展。这些阶级自身的利益常常因一项政策的出台而得到极大的增进，这一事实不过是为以下真理又提供了一个例证：各个

194

^① Hawtrey, R. G., *The Economic Problem*, 1933.

阶级都可以设法从它们为大众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中获得份额极高的收益。

斯品汉姆兰法案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统治着乡村的地主阶层施行了一种延缓乡村工资上涨和防止传统乡村生活结构崩溃的方法。从长期来看,这些方法必然会产生最邪恶的后果;但是,如果不是他们的政策能帮助整个国家应对工业革命这个大泥潭的话,地主们是无法将他们的这些努力维持下去的。

另外,在欧洲大陆,农业保护主义实属必要。可是这个时代最为活跃的智识力量却因忙于一种冒险而转移了他们的视线,他们没有意识到农业困境的真正含意。在那种环境下,一个能代表被危及的乡村利益的群体将获得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成功地使欧洲乡村稳定下来,也成功地削弱了那个时代的灾祸朝向城市的蔓延。反动力量是碰巧行使的对社会有用功能的受益者。同样这种功能,不仅使欧洲反动阶级能够怀着传统情感为争取农业保护关税而斗争,同样也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美国推动了 TVA 的成功^①和其他社会技术的进步。有益于新世界的民主的那些社会需要和在旧世界加强了贵族影响力的那些社会需要,其实是相同的东西。

对应于土地流动的是自由主义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 19 世纪欧洲大陆政治史的社会学背景。在斗争中,军队势力与教会高层是土地阶级的盟友,尽管这些阶层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直接的社会功能。现在,这些阶层对于解决僵局——市场经济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宪政政府所带来的威胁——的任何保守方案来说都是可供倚赖的力量,因为就公共自由与国会统治而言,他们并没有被传统和意识形态捆住手脚。

195 简言之,经济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有着联姻关系,但土地利益集团与自由主义国家却没有这种关系——这是它们在大陆上具有持久政治影响力的根源,正是这一点制造了俾斯麦统治下普鲁士政治的矛盾倾向,加深了法国的教会和军国主义者的复仇情绪,保证了哈布斯堡帝国中封建贵族的宫廷影响力,使得教会与军队成为崩溃中的王权的护卫者。由于这种关联维系超越了关键性的两个世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断言这永远是有效的选择,现在,土地和土地财产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一种天生的偏好。18 世纪英国托利党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和农业倡导者都已被人遗忘了,就像都铎王朝的土地占有者和他们从土地中赚钱的那种革命性方式也被遗忘了

^① 即“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译者注

一样；乡村被想象成一幅永恒的落后景象，这种现代偏见把法国和德国的重农主义地主以及他们的自由贸易热情都从公众记忆中抹去了。作为不朽范例而使一代人感到满足的赫伯特·斯宾塞，就完全把军事主义等同于反动，而最近由日本、俄国或者纳粹军队所显示的社会及技术的适应性对他而言一定是难以置信的。

这些思想具有狭隘的时代局限性。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惊人的工业成就是以巨大的社会危害为代价的。由此，封建阶级发现了重拾自己已经丧失的部分荣誉的一线机会，于是他们转而鼓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德性。在文学的浪漫主义中，大自然自身与过去结成了联盟；在19世纪的农民运动中，封建主义重温旧梦的尝试并没有落空，他们通过把自己装扮成人类的自然栖息场所——土地——的卫士而实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真实存在的危机，这种策略是不会成功的。

另外，军队与教会也因它们承担着“捍卫法律与秩序”的责任而重获荣誉，法律与秩序现在变得非常脆弱，因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中产阶级并不适合来保障新经济的这项要求。对于骚乱，市场体系比我们所知的其他经济体系更加敏感。都铎王朝政府依靠骚乱来感知地方抱怨；除了少数首要分子可能被绞死，其他也就没什么危害可言了。金融市场的兴起意味着与这种姿态的彻底决裂；自1797年之后，作为伦敦生活常见特征的骚乱就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会议，原先那些雨点般的拳头，至少在原则上，都成了会议上的举手表决。^①那个宣称保持和平是他臣民们的头等和首要责任的普鲁士国王，正是由于提出这个悖论而著名，但很快他的论断就成为常识。在19世纪如果出现了暴动，而且是由武装群众发起的话，那就必然会成为一场叛乱的开端，从而对国家造成极严重的威胁；股市崩盘，物价将无止境地狂跌。大都市街头的一场持枪械斗就可能使名义上的国民资本遭受重大损失。然而，中产阶级是非军人化的；大众民主自豪于民众的畅言无忌；并且，在欧洲大陆，资产阶级也只是沉浸在对自己青年时代面对残暴贵族而挺身于街垒的革命回忆之中。终于，受自由主义毒害最少的农民，被认为是所有人中唯一能够站出来“捍卫法律与秩序”的阶层。保守力量的功能之一即被理解为让工人阶级待在他该待

196

^① Trevelyan, G. M., *History of England*, 1926, p. 533. “Walpole 治下的英格兰，仍旧是个由骚动提供调和的贵族社会。”Hannah More 的“祭坛 (repository)”歌，“骚乱”写于“九五年，匮乏与危险的一年”——这正是 Speenhamland 的那一年。参见 *The repository Tracts*, Vol. I, New York, 1835. 亦见 *The Library*, 1940, fourth series, Vol. XX, p. 295, on “Cheap Repository Tracts (1795—1798)”。

的地方,这样市场就不会陷入恐慌之中。尽管需要这种效力的几率非常小,但农民作为护卫财产权的可用性这一点对农业阵营来说依然是一项宝贵的财富。

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的话,那么 1920 年代的历史就无法得到解释。当中欧的社会结构在战争和失败的压力下崩溃时,只有工人阶级才可能担负起维持社会运转的任务。在每一个地方,权力都被赋予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匈牙利、甚至德国,都宣布成为共和国,尽管没听说这些国家曾经有过任何活跃的共和党派。然而,严重的解体危机刚刚过去、工会的事业尚未完全多余时,中产阶级就开始试图在公共生活的影响中排除工人阶级。这就是所谓的战后的反革命阶段。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出现共产主义统治的严重危险,因为组织成党派和工会的工人们对于共产主义并不友善。(匈牙利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插曲,不过这个插曲只是纸面上被迫形成的,因为为了抵抗法国的侵略,别无选择。)危险不在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于在紧急时刻,工会与工人阶级政党会无视市场经济规则。在市场经济下,公共秩序和商业习惯的间歇可能就会造成致命的威胁,尽管在其他情况下这种间歇也许是无害的^①,因为它可能导致经济制度(regime)的崩溃,从而使社会每天需要的面包没有着落。这解释了在一些国家里发生的引人注目的转变,即从假想中迫在眉睫的产业工人阶级的专政转向实际中的农民阶级的专政。整个 20 年代,在不少国家中经济政策的决定都来自农民阶级,尽管在名义上他们扮演的角色很不起眼。此时他们碰巧成为能维持法律与秩序——高度紧张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和秩序——的阶级。

战后欧洲激烈的平均地权运动是由于政治原因而给农民阶级优惠的间接证明。从芬兰的拉蓬运动(Lappo movement)到奥地利的海威尔(Heimwehr),农民都证明了自己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让他们变得在政治上不可缺少。农民的优势所在,有时被归因于战后头几年里的食物短缺,其实并非如此。例如奥地利,尽管非常依赖食品进口,但为了使农民从经济上受益,它还是得维持谷物关税,从而降低了食品标准。即使农业保护主义可能意味着城市居民的不幸,意味着出口产业的生产成本高得不甚合理,但农民利益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加以保护。就这样,以往无足轻重的农民阶级获得了与它们的经济重

^① Hayes, C.,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1870—1890*, 评论道:“绝大多数的个体国家,至少在西部和中部欧洲,现在看起来拥有了最高的内部稳定。”

要性并不相称的优势地位。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是造就农民政治地位坚不可摧的力量。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恐惧并不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事实上,地平线上尚未出现哪怕是微弱的这类信号——而是对市场经济陷入瘫痪的恐惧,除非所有那些可能弃置市场游戏规则的胁迫力量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只要农民阶级仍然是能消除这些力量的唯一阶级,它们就能继续保持高声望,并继续向城市中产阶级勒索赎金。一旦国家权力得以巩固并且——甚至在这之前——城市中产阶级下层得以由法西斯分子武装起来,从而把资产阶级从对农民阶级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农民的声望就会迅速下降。一旦城市和工厂中的“内部敌人”被中立化或者征服,农民阶级就将重新回到它以往在工业社会中那不起眼的地位上。

198

大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力倒并没有经历这种下降。一个更为持久的因素帮助他们——农业自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那个最具战略性的事实回到公众意识中,因恐慌而保存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对世界市场的不假思索的依赖。在专制主义的标志出现时,因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慌而兴起的中欧“重新农业化”就完成了。在“内部敌人”的理由之外,现在又新添了“外部敌人”的理由。与往常一样,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到的只是由不健全的经济学教条所推导出来的浪漫的失态,可实际上不断积累的政治事件正在唤醒那些即使最为简单的头脑,使他们认识到,在面临国际体系解体的情况下,经济考虑是多么的无关紧要。日内瓦继续徒劳地试图让各国人民相信,他们正处心积虑地抵抗着想象中的危险,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自由贸易就能恢复,并让大伙儿都受益。在当时那种特别易于使人轻信的氛围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相信经济问题的解决(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不仅可以缓和战争的威胁,而且实际上还会使这种威胁永久消失。百年和平通过树立起一座无法逾越的幻觉之墙而掩盖了事实。那个时代的作者们对现实感的缺乏简直冠绝群伦:A. J. 汤因比(A. J. Toynbee)视民族国家为一狭隘的偏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把主权看成是一可笑的幻觉,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则以为战争只不过是商业上的算计错误,对政治问题根本性质的意识程度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1846年,自由贸易因通过了谷物法而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80年后,争论重起,不过这次却在同一个问题上失败了。从一开始,专制统治问题就缠绕着市场经济。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天真地将其理由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市场经济假设之上,试图以此来驱逐战争的幽灵。依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们

199 的这种论断仅仅表明，一个民族将其安全托付给像自我调节的市场这样脆弱的制度，会有多么危险。1920年代的专制运动其实是预言性的：它指出在一种秩序消退时需要进行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揭示了危险以及人们相应采取的行动；但是，由于人们的行动晚了十年，所以因果之间的联系就被斥为胡言乱语。“为什么要针对已经过去的危险来自我保护？”这正是当时许多人的论调。这种错误的逻辑不仅使我们对专制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陷入了迷惑。实际上，两者都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解释：一旦普遍的记忆接受了危险的印象，恐惧就会一直潜伏着，只要危险的原因没有被根除。

我们断言，欧洲各国从来没有克服战争经历造成的震荡，这场战争意外地让它们感受到了相互依存的危险。贸易的恢复、蜂拥而起的国际会议上炫耀和平的田园牧歌以及几十上百的国家宣布遵循贸易自由原则，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忘记，除非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食物和原料来源，或者有武力获得的可靠性，否则，不管是殷实可靠的通货还是牢不可破的信用，都不可能使它们从孤弱无助之中得以拯救。没有比基于这种考虑而形成的那些社会政策更合乎逻辑的了。危险的根源并未被消除，惊恐的平息又何以期待呢？

同样的错误也愚弄了那些对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者——他们是绝大多数——这些人把法西斯主义描述成完全没有政治理性的畸形物。他们说，墨索里尼声称已经使意大利避免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但统计资料显示，早在向罗马出征(the March on Rome)之前一年多，罢工浪潮就已经平息了。他们承认，武装工人曾在1921年占领了工厂，但这是工人在1923年被解除武装的原因吗？要知道，此时工人早已从先前他们盘踞的围墙上爬下来了。希特勒宣称他将德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但是失业的洪流不是早在他掌权之前就已经退去了么？如同我们论证过的一样，宣称他避免了在他到来之时就早已不再存在的东西，是与因果法则相抵触的，而因果法则在政治中同样是适用的。

200 实际上，在德国和意大利，战后初期的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但这也不容辩驳地表明，在紧急状况下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和政党，可能会漠视那种将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视为绝对的市场法则——这必将对社会造成最具毁灭性的后果，必将会挫伤投资，阻止资本积累，将工资维持在无法获利的水平上，危及通货，破坏国际信用并使企业瘫痪。并非幻想中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而是工人阶级处在可能产生毁灭性干预

的位置上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才成为潜在恐惧的根源,这种恐惧在关键的当口,在法西斯主义的仓惶中爆发了出来。

对人和对自然的危险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分开来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对市场经济的反应都导致了保护主义,前者主要以社会立法和工厂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则在农业关税壁垒和土地法中得到体现。但两者有如下重要的区别:在紧急情况中,欧洲的农场主和农民会捍卫市场体制,而工人阶级的政策则会危及它。尽管这种内在不稳定的体系的危机是由保护运动的这两翼共同带来的,但与土地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倾向于与市场体系达成妥协,而广大的劳工阶级则对打破市场法毫不畏惧,并公开挑战市场。

第十六章 市场与生产组织

201 甚至连资本主义企业自身都得被保护，以免遭遇不受限制的市场机制运行的危害。这一点应该可以消除像“人”或者“自然”这样的字眼不时地会在某些谙于世故的头脑中唤起的怀疑，这些人倾向于把一切有关保护劳动力和土地的言论都拒斥为陈腐思想的产物，或是纯粹既得利益的伪装。

实际上，生产企业与人和自然一样，都会遭受市场体系真实而客观的危害。对保护的来源源自货币的提供方式是在市场体系下组织起来的这一事实。实际言之，现代中央银行本质上是一种旨在提供保护的机构，假如没有这种保护，市场早就毁掉了它自己的孩子——所有类型的商业企业。但最终，正是这种形式的保护最为直接地导致了国际体系的崩溃。

202 威胁着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漩涡是明摆在那里的，可是货币制度中固有的对商业的危险却不那么容易被察觉。如果利润依赖价格，那么左右价格的货币安排则对任何被利润所驱动的制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从长期看，出售价格的变动并不一定影响利润，因为成本会相应起伏而抵消出售价格的影响，可是短期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被契约固定的价格的变化有个时滞。劳动力的价格，与许多其他的价格一样，自然是被契约所固定的。所以，假如价格水平由于货币方面的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下降，那么伴随着生产组织的解体和资本的巨大破坏，商业就会处于停业清偿的危险之中。造成麻烦的并非低价，而是价格的跌落。休谟是货币数量论的首倡者，他发现，假如货币总量减半，那么由于价格会相应地调整到从前一半的水平，商业将不会受到影响。但他忘记了，商业将可能被毁于这个调整的过程。

上面提供的是对下述问题的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解释：为什么一个在市场机制不被干扰的情况下极易产生的商品货币制度会与工业生产不相兼容？

商品货币仅仅是一种碰巧发挥了货币职能的商品，所以，商品货币的数量，从原则上来说，是不可能增加的，（在缺少货币供应的情况下）只可能减少不作为货币的商品的数量。在实践中商品货币往往是金或银，虽然它们的数量可以增加，但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很多。但是，如果生产和贸易的扩张没有伴随着货币数量的相应增加，那就必然会导致价格水平的下降——这正是我们印象中具有毁灭性的通货紧缩。在17世纪的商人圈里，货币的缺乏是一个永恒的、沉重的抱怨对象。代币(token money)很早就被发展出来保护贸易免于强制性通货紧缩的危害，如果在贸易量膨胀时仍然只使用商品货币，那这种危害就不可避免。没有代币这种人为货币的媒介，任何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

伴随着对稳定的外汇兑换的需要以及相应的对金本位制的引入，真正的困难出现了，这大致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稳定的汇兑对英国经济的生存而言变得不可或缺，伦敦已经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世界贸易的金融中心。可是除了商品货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服务于这个目的，原因很明显，不管是源自银行或是法令产生的代币，都无法在异国的土地上流通。于是，金本位——一个国际商品货币制度的公认称呼——走上了前台。

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对于国内目的而言，商品货币是一种并不充分的货币，因为它是一种商品，其数量不能随意增长。可获得的黄金数量可能以每年百分之几的速度增长，但却不可能在几周内增长百分之几十，而这种速度正是交易在突然扩张时所需要的。如果交易量突然增加，在没有代币的情况下，要么缩减贸易，要么在相当低的价格下从事贸易，由此便导致市场萧条并产生失业。

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把问题呈现出来：商品货币对于国际贸易是必不可少的，代币则对于国内贸易必不可少。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协调一致呢？

203

在19世纪条件下，对外贸易和金本位相比于国内商业的需要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先性。每当汇率下跌的威胁来临，金本位的运转就要求降低国内商品的价格。由于通货紧缩一般是通过信贷限制而发生，所以很自然，商品货币的运转干扰了信用体系的运转。这对商业而言是一个持久的危机。然而，完全抛弃代币、把通货限制在商品货币范围之内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种疗救方案比病症本身更可怕。

中央银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信用货币的这种缺陷。通过集中一国的信贷供给，就有可能避免通货紧缩所导致的整体性的商业和就业的混乱，并

小心翼翼地调控通货紧缩,使它产生的震荡得到吸收,将其产生的压力分散到全国。这一银行的常规功能就是缓冲黄金撤回对票据流通产生的即时影响,以及缓冲票据流通的减少对商业所产生的即时影响。

央行可以采取的手段有很多。短期借贷可以弥补短期黄金短缺所造成的缺口,避免总体上的信贷限制。但即使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信贷限制变得不可避免,央行的行动也有缓冲效果:提高银行利率及公开市场操作都可以将信贷限制产生的影响分散到整个共同体,将其产生的压力置于那些最强壮的肩膀之上。

204 让我们想象一下关键性的、一国向另一国发生单向支付的转移情形,这种情形有可能是由对粮食的需求从国内转向国外时所引发的。现在必需输送至国外以偿付进口粮食的黄金,本来是可以用于国内支付的,它的缺失必然导致国内销售的下降,并进而导致价格下跌。我们把这种性质的通货紧缩称为“交易性的”,因为它是通过偶然的商业交易行为而从一个个别厂商扩散到另一个厂商的。最终,通货紧缩的扩散将到达那些出口厂商并获得代表“真正”资金转移的贸易顺差。但这种通货紧缩扩散方式对共同体在总体上造成的损害,远比为获得这种外贸易顺差所必需的代价大得多。因为永远存在不具备出口能力的厂商,这些厂商只需要稍加诱导,就可以通过轻微削减成本的方式来“渡过难关”,而实现这样一种成本削减的最经济的方法,就是把通货紧缩压力平均分散到整个商界。

这正是央行的功能之一。它的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广泛压力迫使国内价格以相对平均的方式下降,使得“出口方便(export-near)”的厂商恢复和增加出口,只有那些最不具效率的厂商才会被淘汰掉。“真正”的资金转移就可以这样达成,与那种带着偶然性和常常包含灾难性震荡的非理性途径——通过“交易性的”通货紧缩的狭窄渠道传递通货紧缩压力——相比,以这种方式获得等量的贸易顺差,所需付出的混乱代价要小得多。

尽管有以上这些设置来缓冲通货紧缩的影响,结果仍是商业一次又一次地全面解体,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量失业。这一事实是对金本位制最强有力的控诉。

货币的情况与劳动和土地的情况非常相似。将商品化虚构应用于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使它们有效地融入市场体系,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对社会的严重威胁。就货币而言,它所产生的危险指向生产组织,因商品货币的使用而造成的价格水平下跌威胁着生产组织的生存。在这时,同样必须采取保护措施,

而这种保护的结果则是使市场的自我调控机制陷入瘫痪之中。

中央银行的运行将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功能降低到徒有其表的水平。它意味着一种集中管理的通货；操控取代了信贷供给的自发调节机制，尽管这种操控并不总是有意识和有预谋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单个国家放弃中央银行调控，国际金本位制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调控。确实鼓吹迈出这致命一步的是金本位制的纯粹一贯的坚持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的建议如果真有人理会的话，那将会把各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都变成一堆废墟。

货币理论中存在的绝大多数困惑应该归咎于把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做法，这是市场社会的突出特征。一个多世纪以来，货币被看做是完全属于经济的范畴的、一种用于间接交换的商品。如果黄金被如此偏爱，那黄金本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本位”前的特征限定词“国际”毫无意义，因为对经济学家而言，国家并不存在；交换并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个体之间，后者的政治忠诚就像他们的头发颜色一样无关紧要。）李嘉图为19世纪的英国灌输了这样的信念：“货币”这个词的涵义是交换的中介，银行钞票的使用也仅仅是为了方便，它们的效用在于比黄金更便于携带，但是钞票的价值在于，对钞票的拥有为我们提供了随时占有它们所代表的商品本身——黄金——的手段。由此推论，通货的国民性质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不过是同种商品的不同代用物。并且，如果说一个政府试图自己占有黄金是浅薄之举的话（因为这种商品的分配就像其他所有商品的分配一样，会在世界市场上自行调节），那么，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有国别差异的代币与相关国家的福祉和繁荣有任何关联，就更是无知的表现。

205

到目前为止，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制度性分离从来没有彻底实现过，而且恰恰在货币问题上这种分离必然是不彻底的；国家——其造币厂的任务似乎仅仅是确定硬币的重量——实际上是其代币价值的保证者，这些代币被用来支付税负和其他费用。这种货币不是交换手段，它实际上是支付手段；它不是商品，而是购买力；它本身并没有任何效用，仅仅是一种筹码，体现着对可购买事物的数量化了的权利。很明显，这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因为在这种社会中，财物的分配依赖于对购买力的象征物的拥有。

当然，我们在这里论及的并不是现实的图景，而是为了澄清起见而构造出来的概念图式。任何分离于政治领域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建构却成为自李嘉图之后的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它的概念和假设都变得不可理解。根据这种设计，社会是由交换着的个人所组成的，这

206 些个人拥有一整套的商品——货物、土地、劳动力及其合成物。货币仅仅是诸多商品中的一种，只不过它被交换得更加频繁一些，并由此成为专为交换目的而获取的对象。这样一种“社会”可能并不真实，然而它却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用于理论建构的基本骨架。

一幅关于现实世界的更不完整的图景是由购买力经济学提供的。^① 不过，与市场经济的范式相比，它的某些特征却与我们的实际社会更加相似。让我们努力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每个人都赋予确定数量的购买力，使他们有权选购各种明码标价的商品。在这样一种经济中，货币并不是商品；它本身并没有用处；它只能购买那些粘上了价格标签的商品，这同现今我们的商店中出现的情况非常相似。

商品货币理论在 19 世纪远比其竞争对手更占优势，因为那时的制度在许多本质方面遵循着市场模型，然而自 20 世纪初开始，购买力概念就逐渐转为优势。随着金本位制的解体，商品货币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货币的购买力概念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

一旦从机制和概念转向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意识到以下这一点就很重要，那就是统治阶级自身倾力支持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进行管理。当然，这种管理并不被认为是对金本位制的干涉；相反，它被视为游戏规则的一部分，金本位制只有在这种游戏规则之下才得以运转。由于维持金本位制是不证自明的，中央银行机制从未被允许以导致一国放弃 (go off) 金本位的方式运作，相反，央行的至高指导原则是永远并在任何情况下都紧跟黄金，对这一原则的质疑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只有在价格水平的波动仅限于偏离所谓金点 (gold points) 2%—3% 的微小范围内时，情况才是如此；当为了汇率稳定而必须大幅调整国内价格、特别是波动到 10% 或者 30% 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价格水平的这种下跌运动将会导致灾难和毁灭。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管理通货就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央行的那些手段成为政策，即成为政治应该决定的对象。实际上，中央银行巨大的制度重要性在于以下事实，即货币政策由此被引入了政治领域。这种变化的后果不能不是影响深远的。

207 这些影响是双重性的。在国内领域，货币政策只是干预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各种经济阶级之间的冲突，倾向于围绕这个问题——它与金本位制和平衡

① 作为这幅图景的基础的理论已被新西兰惠灵顿的 F. Schafer 阐发出来。

预算紧密相连——而展现出来。1930年代的许多国家的国内冲突,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常常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它在反民主运动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国际领域,国家通货的角色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尽管这一事实在当时极少被意识到。19世纪具有统治地位的哲学是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大体上”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自由贸易的主体,拥有那些在今天看来让人啼笑皆非的资质的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当然,这种世界观的根源在于经济学;许多真正的理想主义来自交换和贸易的领域——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人类的自私欲望居然是在证实他最慷慨的冲动。但自从1870年代之后,感情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主流的理念并未发生相应的断裂。在理念上,这个世界依然相信国际主义和相互依存,但在行动上,却受着民族主义和自力更生冲动的支配。自由民族主义发展成为民族自由主义:对外,明显倾向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内,则倾向垄断的保守主义。这种矛盾在货币领域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要来得尖锐且无意识。因为一方面,国际金本位制的教条式信念仍然享受着人们毫不吝啬的忠诚,而与此同时,代用货币也已经在形形色色的中央银行体系的主权上被建立起来了。在国际主义原则的庇护之下,一种新民族主义坚不可摧的堡垒不知不觉地被建构起来,这个堡垒的外形就是管理钞票发行的中央银行。

事实上,新民族主义是新国际主义的必然产物。国际金本位制不能在那些本应实行此制度的国家里变成现实,除非它能保证不会给这些遵从金本位制的国家带来危险。完全货币化了的共同体无法承受价格突然变动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而这种变动又是保持一种稳定汇率所必然会产生,这就要求价格变动所产生的震荡必须被独立的中央银行政策来缓冲。一国的代用货币就是相对安全的一个保障手段,因为只有依靠它,中央银行才得以在国内和国际经济之间发挥缓冲器的作用。如果支付平衡被兑换危机(illiquidity)所威胁,储备金和国外借贷就可用来渡过难关;如果必须创造一种全新的经济平衡,这种平衡要求降低国内价格水平,那么信贷紧缩将以最为合理的方式扩散开去,淘汰无效率的企业,把压力置于有效率的企业身上。如果缺少这样一种机制,那么对任何发达国家来说,坚持金本位制而不对其福祉造成毁灭性损害都是不可能的,不管这种损害是在生产、收入还是就业方面。

如果说商人阶级是市场经济的主角的话,那么银行家就是这个阶级天生的领导者。就业和收入有赖于企业的盈利性,但企业的盈利性有赖于稳定的

汇率和可靠的信贷状况,这两者都在银行家的照料之下。认为这两者不可分离是他们信条的一部分。稳健的预算和稳定的国内信用条件都以汇率的稳定为前提;反之,若国内信用缺少安全性、国家财政不平衡,汇率也不可能稳定。简言之,银行家的双重责任一方面包含可靠的国内金融,另一方面包含通货的对外稳定性。这正说明了为什么当两者全都失去意义时,作为一个阶级的银行家们却总是最后一个才发现。不管是国际银行家在 20 年代的支配性影响,还是他们在 30 年代的黯然失色,实际上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在 20 年代,金本位制依旧被认为是回归稳定和繁荣的前提条件,所以,只要它的职业卫士——银行家阶级承诺保障汇率的稳定,那么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不会被认为是麻烦的负担;当 1929 年之后,这种稳定被证明为不可能时,保持国内通货的稳定变成了压倒性的要求。这时,就这个要求的达成而言,任何人都能比银行家做得更好。

209 市场经济的崩溃,在货币领域要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来得更突然。干预进口外国农产品的关税破坏了自由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和调节使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大受局限,而这本来是法律留给劳资双方自行决定的。但不管是在劳动力还是在土地的例子中,都没有像在货币领域那样,突然出现与市场经济之间发生的彻底决裂。与大不列颠在 1931 年 9 月 21 日对金本位制的突然放弃相比,或者与美国在 1933 年的 6 月所采取的相同行动相比,其他市场中的任何事情都微不足道。尽管在那之前,1929 年开始的大萧条早已将大部分的世界贸易消灭殆尽,但贸易的方式和占统治地位的理念并未改变。金本位制的最终失败代表了市场经济的最终失败。

经济自由主义开始于 100 年前,并已遭遇了一个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这个运动现在已经攻破了市场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一系列新的理念取代了自发调节市场的世界。相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麻木状态,意想不到的克里斯玛领袖和专制孤立主义的力量爆发出来了,并且把社会熔铸成了新的形式。

第十七章 自我调节的削弱

210

从 1879 年到 1929 年的半个世纪内,西方社会发展成了一个个内部紧密联结的单元,并且强有力的扰乱性力量潜伏在这些单元之中。这一变化趋势的直接根源是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受损。由于社会被迫调整自身以期与市场机制的需要相适应,市场机制自身运行中存在的缺陷会不断地在社会体内积累破坏性的力量。

自我调节机制的受损是保护主义的一个后果。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总是自我调节的,因为市场倾向于产生一个能够使市场出清的价格;不过这对于所有类型的市场来说都是正确的,无论它是不是自由市场。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包含着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即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市场。因为这些市场的运行有毁灭社会的危险,所以共同体的自我保存措施便建立起来了,它要么是有意阻止这些要素市场的建立,要么是干扰它们的自由运行。

美国被经济自由主义者用来作为证明市场经济运行能力的决定性证据。一个世纪以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美国以完全自由的形式交易着,但却没有人宣称需要进行社会保护,并且,除了关税之外,工业生活依然不受政府干预措施的阻挠。

当然,解释是简单的:它们正是自由的劳动、土地和货币。直到 1890 年代,那时的边疆是开放的,有足够的无主土地^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低级劳动力还能自由流入美国;到 20 世纪初,这里还没有保证汇率稳定的承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自由供给一直是可能的,因而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根本

211

^① Penrose, E. F. , *op. cit.* 马尔萨斯法则只有在土地供给被假定为有限的情况下才会有效。

没有形成。只要这些条件普遍存在,人类、自然和工业组织都不需要唯有政府干预才能提供的那种保护。

一旦这些条件不复存在,社会保护就会启动。当较低等级的劳动力不能继续源源不断地从外来移民储备中获得,较高级别的劳动力也无法在土地上自由定居的时候;当土地和自然资源变得稀缺而人们不得不采取节约措施的时候;当金本位制被引入,使得通货和政治相分离、国内贸易与全球贸易相连接时,美国追赶上了一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发展: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保护、通过工会和立法对劳动力提供的社会保障以及通过中央银行进行的调节——它们都以最大规模——统统都出现了。货币保护主义首先出现: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的意图在于平衡金本位制与地方需求之间的关系;对劳动力和土地的保护主义紧随其后。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繁荣足以导致一场如此严重的萧条,以至在这一过程中,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在劳动力和土地周围建起一道防护河,其宽度让欧洲人闻所未闻。因此,美国既从正面,也从反面,为我们的理论——社会保护必然与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如影随形——提供了鲜明的证据。

与此同时,所有地方的保护主义者都在为显现中的社会生活单元铸造坚固的外壳。这一新的单元以民族国家为边界,但这些民族国家与其前身,即以往疆界不明的帝国却绝少共同之处。这种新的甲壳类型的国家通过具有国民象征性的通货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这类通货则得到空前排他的、绝对的主权的保护。从外部看,这些通货也同样是关注焦点,因为正是通过它们,国际金本位制(世界经济的主要工具)才得以建立。如果说现在货币公然地统治着世界,那么这种货币早已被打上了国家的烙印。

212 如此这般强调国家和通货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的意识习惯性地忽视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真实特征。如果说国家在他们看来是过时的,那么国家通货就更不值得看上一眼了。没有哪位有自尊的自由时代的经济学家会对这一事实——不同的纸片被国界线两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名称冠之——的无关紧要性持怀疑态度。没有比通过外汇市场来实现货币种类的兑换更简单的事了,外汇市场是不会停止运转的,因为幸运地,它不在国家或政客的掌握之中。西欧经历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所厌恶的那些事物中,对国家的“部落主义的”理解不幸名列头榜,这种理解所宣称的主权概念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不过是狭隘思想的一个显露罢了。在1930年代的《经济学手册》所包含的信息中,就有下面这种确定的内容:货币

仅仅是交换的工具,因而从定义上看就没有什么重要性。市场主义观念的盲点使他们对国家现象和货币现象同样感觉迟钝。自由贸易主义者在这两方面都是唯名论者。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断断续续地,对自由贸易教条的批评和对货币教条的批评时有发生,但是,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两套教条其实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如果一个是错误的,另一个也难以幸免。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和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都指明了世界性自由贸易的荒谬,但却没有将之与货币相联系;另一方面,麦克劳德(Macleod)和格塞尔(Gesell)在攻击古典货币理论时却坚持世界性贸易体系的主张。在当时,货币对于把国家建成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统一体所具有的重要性,被那些自由主义启蒙家完全忽视了,就像历史被他们18世纪的先辈忽视了一样。这就是从李嘉图到维泽尔(Wieser)、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马歇尔(Marshall)和维克塞尔(Wicksell)这些最杰出的经济思想家所维护的立场;与此同时,一般有教养的人们所受的教育也使他们相信,纠缠于关于国家或者通货这样的经济问题,不过是下等人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如果把这些谬见结合到一起,形成以下怪异命题,即国家通货在我们的文明制度机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不过是制造了一个不知所云的悖论,毫无意义可言。

事实上,新的国家实体和新的国家通货是密不可分的。正是通货为国内和国际体系提供了动力机制,并向这一图景注入了那些使断裂突然发生的因素。作为信用的基础,货币制度成了国内和国际经济的生命线。

213

保护主义之车是三轮驱动的。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各自扮演着它们自己的角色;但如果说与土地和劳动力相联系的是尽管广泛、但却明确的社会阶层——诸如工人或者是农业劳动者——的话,那么在更大的程度上,关于货币的保护主义则是一种全国性因素,它经常将多种多样的利益融为一体。虽然货币政策同样既能被用于联合,也能被用于分化,但是客观上,货币制度确实是能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最强大的一个。

劳动力和土地分别是解释社会立法和谷物关税的主要因素。农民将会抵制落在自己肩上的那些有利于工人及其工资提高的负担,工人们也会抵制食物价格的任何上涨。但是一旦谷物法和劳动法被实施——自从1880年代初期以来的德国就是这样——想要消除其中的一个而同时不去触动另一个,似

乎已不再可能。农产品关税和工业产品关税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密切。自从全面保护主义的主张因俾斯麦而被普遍推行之后(1879年),为互相保证有利于对方的关税而由地主和企业家组成政治联盟,成为德国政治的一大特征。一方面,在关税政策上互相帮助,另一方面,为了从关税壁垒中获取私利而纷纷建立同业联盟,这些举动都是很常见的。

国内的和国外的、社会的和国家的,各种保护主义倾向于相互融合。^①由谷物法导致的生活费用上涨引起了制造商们对保护性关税的要求,他们极少错过这个推行同业联盟政策的理由。工会自然要坚持提高工资以补偿日益增长的生活费用,并且它不太可能反对雇主们希望采取的那些关税政策,因为后者的理由也是为了负担起日益膨胀的工资单。但是一旦关税制约下的工资水平成为社会立法的会计基础,那么从公平的角度看,就不要指望雇主们会去承担这种立法所带来的负担^②,除非他们能够得到会受长久保护的承诺。顺便提及,这些相互作用成为我们提到过的关于集体主义阴谋指控的微弱的事实基础,在这种指控看来,这里所谓的集体主义阴谋应该对发生社会保护运动负责。但是这将事实本末倒置了:这种运动的根源是自发且分散的,而一旦它们开始发生作用,当然也就不能不产生出相互平行的利益,这些利益自身会要求自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214

比利益的相似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保护措施的综合效应产生了能一致向周边扩展的实际条件。如果说不同的国家中的生活条件不一样——事实总是如此——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差别可以被归结为保护主义取向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的差异。因为生产和劳动的条件现在主要取决于关税、税收和社会立法。早在美国和英国当局限制移民之前,从联合王国移民海外的人数就已经缩减了,尽管当时存在着严重的失业问题。无可否认,这正是由于母国国内日益改善的社会气候所引起的。

但如果说关税壁垒和社会立法产生出一种人造气候的话,那么货币政策所创造的则不折不扣是人造的天气条件,它每天都处在变化之中,并且影响着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货币政策的整合力量远远超过了那些迟缓笨重的其他类型的保护主义措施,因为货币保护的效应变幻不定、从不停息。不管

^① Carr, E. H.,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1940.

^② 这里的“负担”应该是指本来由工人和雇主共同承担的市场风险,现在由于社会立法对工人的保护而全部落在了雇主肩上。——译者注

是商人、有组织的劳工、思虑家计的主妇、计划生产的农民，还是权衡子女前程的父母以及等待结婚的恋人，在他们选择时机时，影响他们的最重要的单个因素莫过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果说在通货稳定时情况都是如此的话，那么在通货不稳定、必须做出贬值还是升值的致命决定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从政治上说，对国家的认同是由政府来建立的；从经济上讲，它却是由中央银行建立的。

在国际方面，只要货币政策有可能出现，它就会有更大的重要性。足够悖谬的是，货币的自由是贸易受限制的后果。因为对货物和人的跨国流动的阻碍越多，对支付自由的保护就必然越有效。短期款项可以在一小时内地球的任何两点之间完成流动。政府、私人企业或者个体之间的国际支付形式等等这些都一视同仁地受到管制；拒绝偿还国际债务，或者损害预算保证的企图，即使是发生在落后国家政府身上，也必将触犯众怒——作为惩罚，这些丧失信用者将会被归入不可信任的邪恶之类。在所有与世界货币体系相关的事务周围，都建立起了相关的制度以保证这个体系的运转，诸如：代议制机构（representative bodies），界定这些代议制机构权限并规范预算公开之程序的成文宪法，法律的颁布，条约的批准，金融义务的取得方式，公共会计准则，外国人的权利，法院的权限，汇票支付场所以及由此隐含的纸币发行银行（the bank of issue）及外国债券持有人和各种类型的债权人的地位等等。这涉及纸币和硬币的使用、邮政规则、股票交易以及信贷运作等各方面的相互一致性。没有任何政府——也许最强有力者除外——能够无视关于货币的禁忌。就国际目标而言，通货就是国家，而没有任何国家能在任何时间程度上置身于国际框架之外。

215

与人和货物不同，货币能够不受任何阻滞手段的影响，继续发展其随时随地达成交易的能力。转移实际物体越困难，其所有权的转移就越容易。尽管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颇为迟缓，其平衡也很容易就被破坏，但在全球风行的短期借贷和与实际贸易无甚瓜葛的基金运作的帮助下，支付平衡几乎能够自动保证流畅。支付、债务和所有权转移并没有因为针对货物交易的那重重关卡而被阻滞；在某种程度上，国际货币机制迅速增长的弹性和普遍性是对不断收缩的世界贸易渠道的一种补偿。到 30 年代早期，世界贸易只剩下一线细流时，国际短期借贷的流动性却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只要国际资本运动和短期贷款的机制依旧在运转，实际贸易的任何不平衡都可以用簿记的方式加以克服。在信贷流通的帮助下，社会混乱被避免了；经济上的不平衡被金融手段所

纠正。

216 作为最后一招,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进口无法导致出口,银行准备金的调整让企业感到恐慌,外国债务人拒绝偿债等等这些情况发生时,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社会的整一性就会通过干预行为而体现出来。

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只要投票权被限制着,并且只有少数人具有政治影响力,那就不必急于采取干预行动,而在普选权已经使得国家成为百万民众的统治机器的情形下,局势就不同了——因为在经济领域,这些同质性的大众常常不得不痛苦地背负起作为被统治阶级而需承担的重负。当然,只要就业充分、收入稳定、生产持续、生活标准可靠并且价格稳定,干预主义的压力自然会比长期萧条时工业废弃的情况下要轻得多。

从国际上讲,政治手段同样被用来弥补市场自发调节之不足。李嘉图式的贸易与货币理论忽视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地位差异,这种差异既可能是由于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不同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贸易、运输与金融等方面的经验差异形成的。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大不列颠不过是贸易海洋中无数原子中的一个,其地位与丹麦和危地马拉无异。而实际上,世界是由数量非常有限的国家组成的,并且分化为债权国和债务国、出口国与实际上自给自足的国家。出口国之间也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出口多种商品,而有的国家所有进口和外债清偿都依赖于像小麦或者咖啡这样单一商品的出口。这样一些差异可以从理论上被忽略,但在实践中,它们所产生的后果却是不能被忽视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些国家发现自己无法偿还债务,或者它们的通货发生贬值,而影响了它们的偿还能力;有时候这些国家决定通过政治手段重获平衡,由此就干涉了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利。在这些例子的任何一个当中,经济过程的自我愈合能力都不能被信赖,尽管根据经典教条,市场经济的自我愈合过程能够无一例外地使债务得到偿还,通货得以恢复,并保证外国人不会再次受到损失。但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这些相关国家是世界分工体系中或多或少平等的参与者,217 而很明显这不是事实。我们预期货币贬值了的国家必然会自动地增加出口并进而重获支付平衡,或者预期那些急需外资的国家会被迫赔偿外国投资者并恢复履行偿债义务,但这些都不过是一厢情愿。例如,当债务国的咖啡或者硝酸钾出口数量增长时,反而会使其市场价格触底,并且,拒绝偿还高利贷式的外债看起来要比国家通货的贬值可取得多。世界市场机制是无法承受这种风

险的。相反,派遣炮舰到相应地点,那些未能履行还债责任的国家,不管它们是不是真的狡诈成性,都必须在被轰炸和清偿债务之间作出选择。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既可以使偿债责任得到履行,同时又能够避免巨大损失,并由此而使体系运转下去。当贸易理论上那雄辩的互惠互利的理由没有被土著人迅速地——也许是根本就不会——领会时,同样的方法(武力)也被用来“诱导”殖民地人民去认识贸易的好处。更加明显地需要干涉的情况是:某地区恰好拥有大量欧洲制造业主所需的原料,可是并不存在所谓事先建立的和谐能够保证土著人会满怀渴望地需要欧洲制造业主的产品,因为他们的自然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些困难中,没有任何一个曾被设想过会在据称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中发生。但清偿行为越是只有在武装干涉的威胁下才发生,贸易路线越是要在炮舰的帮助下才得以保持敞开,贸易越是紧随在旗舰之后(旗舰所紧随的则是侵略性政府的需要),那么必须使用政治手段才能获致世界经济的平衡这一点也就变得越明显。

第十八章 破坏性张力

218 潜在的制度安排的这种一致性,使得 1879—1929 年的半个世纪间出现了一种存在范围很广的现象,即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事件的样式都具有引人注目的相似性。

无穷多样的人物和背景、思想状况与历史传统给不同国家的起落变迁赋予了地方色彩和相对的重要性,然而,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看,文明都拥有类似的架构。这种类似的程度超越了不同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所能赋予的范围,一般共同文化特征包括使用同样的工具、进行同样的娱乐活动、以同样的方式奖励上进等等。毋宁说,这种类似性与社会生活的历史情境中具体事件的功能有关,与特定时间范围内集体生活的因素有关。通过对这些典型的张力和压力进行分析,就可以展现这个时代产生这种整齐划一形式的许多机制。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按照主要的制度领域对这些压力进行归类。在国内经济中,广泛而多样的不均衡的症状——比如生产、就业和收入的衰落——在这里用失业这种典型的灾祸来代表。在国内政治领域,问题在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争斗和纠结,这将用**阶级紧张**来代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困难围绕着所谓的支付平衡问题,包括出口的下降、不利的贸易条件、进口原材料的缺乏以及外国投资的丧失,我们将其归为一类,并用**汇兑压力**这种典型的紧张来代表它们。最后,国际政治领域的压力将归为**帝国主义竞争**。

219 现在让我们来设想某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工商业萧条的过程中被失业所困扰。很明显地可以看到,银行为了创造就业而可能采取的经济政策被稳定汇兑的紧迫要求所限制。除非向中央银行请求并得到后者的许可,否则银行将无法扩张或进一步延长对工商业的信贷,但中央银行保证通货安全的任务

要求的是相反的措施,这会使它拒绝这项请求。另一方面,如果紧张从工商业延伸至国家——工会可能通过自己的政党而将问题在议会上提出来——的话,任何救济政策或公共工程的规模必将被限制在预算平衡要求的范围之内,因为这是稳定汇兑的另一个条件。由此,金本位制将非常有效地同时控制财政部和货币发行银行的行动,并且立法机构将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工商业界面对的相同的限制之中。

当然,在一国范围之内,失业的压力可以由工业和政府领域交替承担。如果在一个特定的案例中,危机由于引起工资的通缩压力而得以克服,那么可以说,负担主要落在经济领域中。但是,如果麻烦是依靠遗产税补贴的公共工程的帮助而得以避免,那么这种压力的冲击将落在政治领域(假如带着对既得权利的挑战,政府成功地迫使工会降低了工资,那么压力也是落在了政治领域)。在第一种情况——引起工资的通缩压力——中,压力仍旧停留在市场领域里,并被表现为由价格变化引起的收入的转变;在后一种情况——公共工程或者工会限制——之下,存在着法律地位或者税收政策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影响的是有关群体的政治地位。

更进一步,失业的张力可能会延展出一国的范围而影响汇兑。不管是采取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方式缓解失业,这都有可能发生。在金本位制——我们假定它任何时候都在起作用——下,任何导致预算赤字的政府措施都可能会造成通货的贬值;另一方面,如果失业是由银行信贷的扩张而得到缓解的,那么上升的国内价格将会对出口造成打击并由此而影响支付平衡。不管是哪种情况,汇率都会下跌,该国会感受到其通货贬值的压力。

无论哪种情况,由失业生发出来的张力都可能会导致外部的紧张。如果情况发生在一个弱国身上,这会对其国际地位产生最为严重的后果。它的地位被恶化,权利被否认,外国控制将降临到它头上,它的国民抱负将被挫败。如果情况发生在强国,压力将会转而导致争夺国外市场、殖民地、势力范围以及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220

由市场释放出来的压力就这样在市场和它的主要制度领域之间来回运动,有时候影响政府领域的运转,有时影响金本位制或者势力均衡体系的运转,每个领域都对其他领域有相对独立性,都倾向于达到自身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没能达成,失衡就会向其他领域扩展。正是各领域的相对自治造成了张力(strains)的累积,这种累积进一步导致紧张(tensions)最终以多少有点老套的形式爆发出来。尽管在人们的想象中,整个19世纪都在构建自由主义的

乌托邦,然而实际上它一直在把事务向为数不多的具体制度移交,正是这些制度的机制支配着那个时代。

最便捷有效地表明立场的方式,也许是像一位经济学家在1933年的浮夸矫饰的质问,他质询的对象是“绝大多数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他问道:一项被所有专家异口同声地斥为完全错误、彻底荒唐、与所有经济理论原则相悖的政策,可能是正确的吗?他的回答是无条件的“不!”^①但如果有人试图在自由主义文献中寻找能解释这些明显事实的任何东西,他一定是在白费气力。对政府、政客和政治家的无休止的一味指责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东西,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正是这些行动主体的无知、野心、贪婪和短视的偏见,才造成了“绝大多数”国家中持续不断的保护主义政策。在这个主题上,哪怕稍微通情达理一点的见解也难看到。自从繁琐哲学家对科学的经验事实进行挑战之后,历史上还未发生过如此可怕的彻头彻尾的偏见。对现实的唯一智识反应就是,用帝国主义疯狂的神话来补充保护主义阴谋的神话。

221 自由主义的论证——至少在其已经清楚申明的程度上——宣称,在188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帝国主义激情在西方国家被激发了出来,其情绪性的部落主义偏见摧毁了经济思想家们富有成效的工作。这种情绪化的政策逐渐获得了力量,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大战之后,启蒙的力量曾有光复理性统治的另一次机会,但出乎意料的是帝国主义爆发了,特别是在新成立的小国家,以及接下来在那些“穷国”,诸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种现象的突然出现颠覆了进步之车。“狡诈的动物”,即政客们,已经击败了人类的智能中心——日内瓦、华尔街和伦敦。

在这种流行的政治神学看来,帝国主义代表了人类的本性。认为民族国家和帝国具有帝国主义的天性,他们将吞噬掉自己的邻居而不受任何良心的谴责。这一观点的后半部分是真实的,但前半部分则不然。尽管帝国主义,从它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来看,并不会等到有了合理化和正当化的依据之后才采取扩张行动,但认为这些民族国家和帝国永远是扩张主义者,则是与事实不符的。领土组织并不必然急于扩展其边界;不管是城邦、民族国家还是帝国,都未必被这种冲动所控制。相反的观点是误将独特的情况当作了一般的法则。实际上,与流行的先入之见相反,现代资本主义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收缩主义(contractionism)中开始的,只是到了其生涯的晚期阶段才发生了朝向帝国

^① Haberler, G., *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 1933, p. vi.

主义的转变。

反帝国主义肇始于亚当·斯密,由此他不仅预示了美国革命,也预示了接下来那个世纪里英国的反帝国主义政策运动(the Little England movement)。这种与帝国主义决裂的理由是经济性的:始于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的迅速市场扩张使帝国变得过时了。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与欧洲大陆相对缓慢的交通工具一起,使海外殖民变得有利可图,那么后来迅捷的交通通讯工具则使殖民地变成了一种昂贵的奢侈品。另一个不利于殖民的因素在于,如今出口在重要性上压倒了进口;买方市场的观念让位于卖方市场的观念,后者的目标只要通过简单的倾销手段即可达到,倾销的对象当然首先是竞争对手,然而最终也要包括自己的殖民地本身。一旦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丢失,加拿大也很难再使自己仍旧留在大英帝国之中(1837年);即使迪斯雷利之流也鼓吹放弃英国在西非的殖民地;奥兰治邦(the Orange State)想加入帝国的努力只能是徒劳;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尽管今天被当成世界战略的枢纽,但在当时却一直被拒绝承认。自由贸易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热忱的托利党分子在有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殖民地是一种无用的财产,注定会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负担。在1780—1880年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谈论殖民地的人会被看做旧制度(the ancien régime)的坚守者。中产阶级将战争和征服斥为帝国王朝的诡计,而鼓吹和平主义(弗朗西斯·凯奈是第一个赋予自由放任以和平桂冠的人)。法国和德国紧随英国之后。法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慢了其扩张的速度,并且即使其存在帝国主义扩张,方式也是扩大其领土范围而不是增加海外殖民地。俾斯麦轻蔑地拒绝为巴尔干付出哪怕是一兵一卒的代价,他将自己的所有影响都用来进行反殖民主义宣传。这就是那个时代政府的态度,尽管当时资本主义公司正在全球大陆进行侵略;并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兰开夏一些急切的出口商的一再要求下,东印度公司被解散,不知名的零售商在印度取代了像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和克莱夫(Clive)这样显赫的人物。政府尽量避免介入这些事情。坎宁嘲弄了为了赌博性投资者和海外投机者的利益而由国家进行干预的念头。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现今已延伸到国际事务中。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在严格区分属于她私人的收入和武装私掠的收入时还是老大的不情愿,但是格莱斯顿(Gladstone)却把英国对外政策是服务于对外投资者的这种说法当成是对他的诽谤。允许国家力量与商贸利益融合在一起的想法不是属于19世纪的观念;相反,早期维多利亚政治家已经宣布,政治与经济的相互独立是处理国际事务的中心原

则。只有在范围极小的情况中，外交代表才会被认为应该为了本国国民的私人利益而奔波，这些暗自越权的情况在公开场合是被否认的，而一旦行动已被确认，则相应地会受谴责。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国家不干预私人企业的原则都得到遵循。国内政府不会被认为会干预私人贸易，同样，驻外机构也不会被认为会护卫海外的私人利益，除非这种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当时绝大部分投资都是在农业领域，而且是在国内；海外投资仍旧被视为一种赌博，而且投资者经常遭遇的满盘皆输的结局，被认为是可以从无耻的高利贷似的收益中得到补偿的。

223 变化来得很突然，并且这一变化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同时发生的。虽然德国只是在半个世纪的迟滞之后才重复了英国的国内发展，但是世界范围的外部事件必然要对所有的贸易国家产生同等影响。这一事件就是国际贸易的节奏和数量的增长，以及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大量从这个星球的这一部分运送到另一部分，这一情况所意味的是土地的普遍流动。经济地震将欧洲乡村数以千万计的人带入了混乱之中。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自由贸易已成往事，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已经是在全新的条件下进行了。

这些条件本身是由“双向运动”创生的。保护主义制度的引入与目前正以加速形式扩展的国际贸易模式相互交叉，引入这些制度的目的在于遏制市场的全面行动。农业危机和 1873—1886 年的大萧条动摇了人们对经济自愈能力的信心。自此之后，典型的市场经济制度通常只有在伴随着保护性措施的情况下才能被引入，这一趋势由于 1870 年代末和 1880 年代初国家集团化而变本加厉，因为这些国家集团更可能因为突然性调整造成的混乱而遭受严重苦难，而这种调整可能是对外贸易和汇兑要求所必需的。这时，市场经济扩张的主要工具——金本位制度，就必须有那个时代典型的保护主义政策伴随左右，比如社会立法和关税壁垒。

同样在这一点上，传统自由主义版本的集体主义阴谋也与事实不符。自由贸易与金本位制并不是被自私的关税贩子和好心肠的社会立法所肆意破坏的；相反，金本位制的来临本身加速了这些保护主义制度的传播，将汇率系于黄金的政策(fixed exchange)越显得沉重不堪，这些保护主义制度就越受欢迎。自此之后，关税、工厂法令以及活跃的殖民政策成为稳定的对外货币的前提条件(大不列颠由于其巨大的工业优势而证实了这个法则)。只有这些前提被满足，市场经济的手段才能被安全地引入。如果这些市场经济手段被强加于一个没有此类保护性措施的无助民族——比如在异域或者半殖民地地区，

那么莫可名状的苦难就会降临到它头上。

由此,我们掌握了解那种看起来悖谬的帝国主义现象的钥匙——由于无法从经济上获得解释,这种现象被斥为是对国与国之间不加歧视地相互贸易这一美好图景的非理性拒绝;在这种斥责看来,追求获取海外和异域市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实际上,诸多国家以这种方式行动不过是出于对某些可怕后果的恐惧,这些后果是那些弱小民族所无法避免的。区别仅仅在于,如果说可怜的殖民地上的热带民族被抛入了彻底的苦难和退化,有时甚至是肉体上灭绝的境地,那么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尽管小一些,但仍然足够使他们不惜以任何代价来避免。如同殖民地中的情况一样,威胁本质上是否经济性的这一点,其实并无多大干系;若不带偏见,就不会有任何理由用经济尺度来衡量社会混乱。实际上,预期一个社会仅仅因为经济效益,就可以对失业的痛苦,产业和职业变动造成的挫伤,以及与之相伴的道德和心理上的折磨无动于衷,这实在是荒唐至极。

国家不仅常常是压力的制造者,它们同样也是压力的承受者。如果某种外在事件对一个国家造成沉重压力,它的国内机制就会以惯有的方式运转,把压力从经济领域转移至政治领域,或者反过来。显著的例子发生在战后时期。对一些中欧国家而言,战败产生出一种高度人为的状况,其中包括赔款形式的巨大外在压力。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德国国内的情况就是将外在负担在工商业领域和国家领域之间来回转移——一方面在工资和利润间转移,另一方面在社会福利和税收间转移。作为整体的国家是赔款的担负者,国内情况则视国家——政府与工商业的联合——应对这一任务的方式而定。民族团结由此依托在金本位制上,这使得维持德国货币的对外价值成为至高义务。道斯计划(the Dawes Plan)明确表示要被用来保卫德国通货。杨格计划(the Young Plan)使得同一任务变得绝对化。如果不是从保证马克的外在价值不被破坏这个任务来考虑,那么这一阶段德国国内事务的整个过程就无法理解。对通货的集体责任产生了一个无法毁弃的框架,企业与政党、工业与国家的一切应付压力的行动都只能在这个框架之内运作。然而,战败的德国必须作为战败的后果所承受的压力,却是所有民族在大战之前都已经自愿承受了的,这种承受也就是将它们的国家人为地纳入稳定汇兑的压力之中。只有对市场那无从逃避的法则的屈从,才能解释默默背负起这副沉重的十字架时的那份骄傲。

可能会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这样一种线索的勾勒是过分简化的结果。

224

225

市场经济不曾在一天之内开始，三个市场也不会像三驾马车那样同步运转，保护主义也不会所有的市场产生平行一致的效应，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对的；只是，它遗漏了问题的关键。

我们承认，经济自由主义仅仅是从或多或少已经产生了的市场中创生出一种新的机制；它统一了早已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市场，并把它们的运转协调成一个整体。同样，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在那时也早已在进行之中，货币和信用市场的发展也是如此。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当下都是与过去相联系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突然断裂。

但制度变迁，就其本性而言，是突然开始运作的。关键的阶段是劳动力市场在英国的建立，工人由此被置于饥饿的威胁之下，如果他们不遵守工资劳动的法则。一旦这一重大步骤被采取，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就开始运转了。它对社会的冲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马上、并且在没有任何事先的观念变化的情况下，强有力的保护主义反向运动就开始了。

同样，尽管其性质和起源有着广泛的差异，工业生产诸要素的市场此时表现出一种平行发展的势态。基本上，它也只能如此。对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保护导致了劳动、土地和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的市场的干预，并因而削弱了体系的自发调节。由于干涉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生活及其环境，在于给他们一定程度的地位保障，所以它必然要求减少工资的变动性和劳动力的流动性，稳定收入，持续生产，引入对国家资源的公共控制以及通货管理，以求避免价格水平的无休止变动。

226 1873—1886年的萧条和70年代的农业歉收持续性地加剧了这种紧张压力。在大萧条开始时，欧洲正处在自由贸易的顶峰。新的德意志帝国已强迫法国与自己以及其他国家签订了最惠国条约，自己承诺取消生铁关税，并引入金本位制。而在萧条结束时，德国已将自己包围在保护主义关税之中，并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卡特尔组织和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险体系，并推行高压的殖民地政策。普鲁士主义，一个从前的自由贸易先锋，很明显既不该对“集体主义”的引入负责，也不该对向保护主义的转变负责。美国的关税比德国的更高，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同样地大搞“集体主义”；大力补贴长途铁路建设，并发展出规模庞大的托拉斯。

所有的西方国家，不论国民意识和历史传统如何，都顺应着同一潮流。^①

^① G. D. H. Cole 称 70 年代“是整个 19 世纪中社会立法的活跃程度远远超出其他时期的阶段”。

随着国际金本位制的引入,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市场框架开始投入运转,这意味着市场相对于国家权威的绝对独立。世界贸易现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对生活的组织被置于自发调节的市场之下,这个市场包括了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并以金本位制作为这个巨大的自动操作装置的卫士。大大小小的国家和民族仅仅是这出完全超出大家控制能力之外的大戏中的傀儡。以中央银行、关税壁垒加上移民法为助佑,各国都将自己屏护于失业和动荡的威胁之外。这些装置的用途在于抵抗自由贸易和系于黄金的通货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然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也就在相应程度上干扰了这些机制的运作。尽管每个单一的保护措施都有其受益者,这些受益者之额外的利润或者额外的工资实际上是加在所有其他公民头上的税负,然而不正当的常常只是这个税负的数量,保护本身并无不正当之处。从长期来看,存在全面的价格下降,这将使所有人受惠。

不管保护主义能否被证明是正当的,干预主义使世界市场机制受到了削弱。一国的进口关税阻碍了另一国的出口,并迫使后者在政治上无保护的地区寻求市场。经济帝国主义主要是列强之间争夺向没有政治保护的地区延伸市场特权的斗争。出口压力由于生产狂热所造成的争夺原料供给而加剧。政府开始支持在落后国家经商的国民。贸易和旗舰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方式展开竞赛。帝国主义以及一半是有意识地准备实行专制,成为当时列强的倾向,因为它们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的体系。不过,还是必须严格坚持国际金本位制的完整性。其实这正是造成崩溃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227

同样的矛盾也在国境线之内出现了。保护主义促使竞争性的市场转变成垄断性的市场。市场越来越无法被描述为一种自治的制度,无法被描述为让竞争着的原子在其中运转的自发机制。个体越来越被联合成非竞争性群体的组织、人和资本所取代。经济调整变得缓慢而困难。各种市场的自发调节被严重阻滞了。最终,无法调整的价格与成本结构延长了萧条,无法调整的设备阻碍了对无利可图的投资的清算,无法调节的价格与收入造成了社会紧张。并且无论哪种市场——劳动力的、土地的还是货币的——中的压力都会超出经济领域之外,平衡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才能重新获得。然而,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制度化分离对市场社会而言又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压力有多大,都必须维持这种分离状态。这是崩溃性压力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已经接近了叙述的尾声。不过我们的论证仍有相当一部分尚待展开。因为即使我们已经以无可辩驳的方式成功地证明了这场大转变核心的原因是市场乌托邦的失败,但是,表明实际事件是以何种方式由这个原因所决定的,仍然是我们的任务。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历史不是由任何一个单独原因所决定的。但尽管历史长河无限丰富多样,它仍有其不断重现的情境和可能的选择,正是这些造成了同一时代中各个事件之内在特征的广泛相似性。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典型条件之下支配潮流和逆流的规则,那么我们就无须被边缘性的湍流所困扰。

228 在19世纪,这样一些典型条件是由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所给定的,而相应地,这种市场的必要条件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生活中得到满足。从这种机制之中,产生出这个文明的两大特征:它严格的决定论和它的经济性。当时的观点倾向于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并假定决定论源自经济动机的本性,根据这种本性,个体被预期必定会追求他们的金钱利益。可就实际而言,两者之间并无联系。在许多细节中如此显著的“决定论”,不过是市场社会的机制及其可预期之选择的结果,这种机制的严格性被错误地归结为经济动机的力量。可是实际上,不管个体的动机为何,供需价格机制将永远平衡,并且众所周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经济动机本身比起所谓的情感动机在效能上要差远了。

人类落入了某种控制之中,这种控制不是来自新的动机,而是来自新的机制。简言之,就是来自市场领域的紧张压力;从那里延伸到政治领域,从而将整个社会都囊括进来。但只要世界经济持续运转,在单一国家内部,紧张压力就只是潜在的。只有当最后一个使它苟延残喘的制度——金本位制——解体时,积蓄在各国内部的紧张压力才会释放出来。尽管它们对新的情境反应不一,可从本质而言,它们代表的都是面对传统世界经济体系消亡时所作的调整;当传统世界经济体系解体之时,市场文明自身也被淹没了。这就解释了那个几乎令人无法相信的事实,即一种文明竟然会被一系列没有灵魂的制度的盲目行为毁灭掉,而且这些制度的唯一目的仅仅在于让物质福利自发增长。

但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进程到底是如何实际展开的呢?它是如何被转化为作为历史核心的政治事件的呢?在这个市场经济衰落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性地登场了。

第三篇

进行中的转变



第十九章 大众政府与市场经济

当1920年代国际体系归于失败的时候,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种种早已被遗忘的问题又重新浮出水面。其中首当其冲的莫过于大众政府(popular government)问题。

231

法西斯主义对大众民主的攻击,只不过是再现了在市场经济历史上挥之不去的政治干涉主义,因为这个论题不过是将经济分离于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说法而已。

干预主义问题之走上前台,首先与劳动力有关,一方面是由于斯品汉姆兰法案与新济贫法,另一方面是由于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干涉主义的重要性同样也表现在土地与货币方面,尽管在这两方面引起的冲突不那么引人注目。在欧洲大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三个方面,同样的困难也发生了,不过比英国要晚一些,这种时间上的滞后使得冲突发生在工业更发达、但社会更少联合的环境之中。在每个地方,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分离都是同一类型的发展的结果。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这种发展的起点都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以及政治国家的民主化。

斯品汉姆兰法案被正确地描述为一场阻碍性的干涉行动,它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旨在实现一个工业化英国的战役首先是从斯品汉姆兰法案开始的,并且也是在斯品汉姆兰法案上迷失的。在这场斗争中,干涉主义的标签由古典经济学家们制造出来,并将斯品汉姆兰法案冠以人为干涉市场秩序的罪名,尽管这个市场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汤森、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把古典经济学大厦建立在以济贫法为条件的劣质基础之上,用最令人生畏的摧毁性概念工具始终对准那个早已千疮百孔的旧秩序。然而,对另外的世代而言,补贴制度保护了村庄的边界,使它得以免除城市高工资的诱惑。到了1820年代中期,赫

232

斯基森(Huskisson)和皮尔拓宽了对外贸易的通道,机器出口被允许了,羊毛出口的限量提高了,海运限制被废除了,移民也变得容易了,在《工匠法》中有关学徒条款和工资评估条款被正式废止之后,《反结社法》也被取消了。使人堕落的斯品汉姆兰法案依旧不停息地从这个郡传播到那个郡,阻碍劳动力从事正当的工作,并使独立的劳动者这个概念本身变得丝毫不合时宜。虽然形成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它的真正诞生却被乡村地主的“法律”阻止了。

改革后的议会立刻着手废除补贴制度。达到这个目标的新济贫法曾被称为下议院所通过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立法。然而这一法案的核心不过是废除斯品汉姆兰法案。这一切都已表明,此时人们已经意识到,消除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对于社会的未来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对于消除紧张的经济根源也有同样的重要性。

至于政治方面,1832年的议会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和平的革命。由于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的实施,这个国家的社会分层状况发生了改变,英国人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现在被全新的框架加以重新解释。新济贫法废除了穷人(the poor)这个概括性的范畴,包括“诚实的穷人”或“勤劳的穷人”——这些都曾是伯克深恶痛绝的词汇。从前的穷人现在被分成了物质上无助的赤贫者(paupers)——他们的位置在贫民习艺所——以及依靠工资劳动而得以谋生的独立工人。这样,一种全新的穷人——失业者——就产生出来了,他们开始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如果说赤贫者,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应该得到救济的话,那么失业者,则由于工业的缘故而不应该被救济。虽然失业工人本身对他们的命运没有任何责任,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判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努力寻找之后有没有可能找到工作,而在于如果他不是在饥谨的危险和可怕的习艺所之间作一选择的话,工资制度就会崩溃,整个社会就会因此被抛入苦难与骚乱之中。人们承认,这意味着惩罚无辜者。这种扭曲的残忍手段恰恰存在于对劳动力的解放之中,因为这种解放并不讳言的目的就是运用饥饿效应制造毁灭性的威胁。这种做法使得古典经济学家在他们著作中表达的那种阴沉低叹的感情变得可以理解了。但是,为了把那些多余的人——他们现今已被囚禁于劳动力市场中——牢牢地锁住,政府已被置于一个自我否定的训诫之下,以至于——用哈丽雅特·马蒂诺的话说——对国家来说,向无辜牺牲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救济,都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

233

当宪章运动要求无财产继承者也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时,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就不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成了社会现存系统存续的不可否认的前提

条件。把对新济贫法的管理权及其精神折磨的科学方法,一起移交给这种折磨所针对的那些人的代表,无疑是一种愚蠢行为。麦考利勋爵在众议院发表了一篇演说,这篇演说是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最为雄辩有力的演说之一,而且表现出了他唯一的一贯性:他要求无条件拒绝宪章主义者的请求,理由就是要保证一切文明赖以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制度不受威胁。罗伯特·皮尔男爵称宪章是对宪法的冒犯。劳动力市场越是邪恶地扭曲了工人们的生活,他们就越坚定地要求投票权。要求实现大众政府是紧张压力的政治根源。

在这些条件下,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意义。在此之前,宪法针对非法干涉私有财产权的防范仅仅指向来自上面的武断行为。洛克的视野并未超出土地和商业财产的局限,并且其目的仅仅在于排除来自王权的专横行动,比如亨利八世治下的世俗化、查尔斯一世抢夺造币厂以及查尔斯二世治下“关闭”财政部。在洛克意义上,将政府与商业相分离,已经以1694年独立的英格兰银行的特许状这一范例为标志而实现了。商业资本已经在与王权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

一百年之后,不是商业财产而是工业财产需要被保护,这种保护针对的不再是王权,而是人民。除非是概念混乱,否则17世纪的意义怎能用到19世纪的情境中去?分权的概念,如孟德斯鸠在那时(1748年)所发明的,现在却被用于将人民从针对自己的经济生活的权力中分离出去。美国宪法——它形成于农场主和手工艺人的具体环境中,由被英国工业化景象警示了的领导者们制定出来——将经济领域从宪法的权限中完全独立出来,并由此将私有财产权置于所能想象的最为严格的保护之下,从而创造出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确凿法律基础的市场社会。尽管有普选,美国的选举者们仍然无力对抗所有者。^①

在英国,必须拒绝给予工人阶级选举权这一点已经成为宪法的不成文条款。宪章运动的领袖们被囚禁;他们的追随者,尽管数以百万计,却仍旧被一个只代表人口极小一部分的立法机构所嘲笑,仅仅是对选票的简单要求也会被当局以犯罪论处。所谓英国政治体系之特征的妥协精神——这是后来发明的一种说法——在这里已无踪影。只有到了工人已经度过了饥饿的40年代、新一代驯良的工人开始出现来收获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果实的时候;只有到了上层熟练工人发展出自己的工会,并与一直受贫困所迫、缺乏教养的劳动

^① Hadley, A. T., *Economics: An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Public Welfare*, 1896.

力大众划清界限的时候；只有到了工人们已经屈服于新济贫法强加给他们的体系的时候：他们中的上层才被准许参与这个国家的议会。宪章主义者为了权利而战，目的是为了阻止市场的磨盘继续碾碎人们的生活。但人民只是到了可怕的调整已经完成之时才被赋予这项权利。在英国内外，从麦考利到米塞斯，从斯宾塞到萨姆纳，没有一个好斗的自由主义者不这样表达他的信念：大众民主对资本主义是种危险。

235 在劳动力问题上的经历也同样在通货问题上重现。在此，1790年代的情况同样预示了1920年代的情况。边沁第一个意识到，通胀和通缩都是对财产权的干涉：前者是对工商业的征税，后者是对工商业的干扰。^①自此之后，劳动力与货币、失业与通胀就在政治上成为同一范畴。科贝特(Cobbett)将金本位制与新济贫法一并拒绝；李嘉图则为两者争辩，他觉得出于相同的理由，劳动力与货币一样都是商品，政府无权干涉其中任何一个。反对引入金本位制的银行家，比如伯明翰的阿特伍德(Atwood of Birmingham)，发现他们自己与像欧文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站在了同一立场上。一个世纪之后，米塞斯仍旧在不厌其烦地重复，劳动力和货币与市场上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不应是政府关心的对象。在18世纪建国前的美国，廉价货币是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对等物，也就是说，是政府面临大众的叫嚷所作的一种让步，这种让步在经济上具有败坏道德(demoralizing)的作用。法国大革命和它发行的指券(assignats)表明，人民可能会毁灭通货，美国发展的历史也无法帮助驱除这种猜疑。伯克将美国民主等同于一次又一次的通货困境，而汉密尔顿(Hamilton)所担心的不仅是发生派系内讧，而且还有通货膨胀。不过，如果说在19世纪的美国，人民党和美钞党(greenback parties)与华尔街巨头之间的争执仅仅只是地方性问题的话，那么在欧洲，对通胀政策的质询只有在1920年代才成为针对民主立法机构的有效指控，这种指控的政治影响是深远的。

对货币的社会保护与对通货的干预不仅仅是类似的，它们根本上就是一回事。自从金本位制建立之后，通货受到工资水平上升的威胁程度与受到直接的通货膨胀的威胁程度是一样的——它们都会使出口缩减并最终导致汇率下跌。两种基本干预形式之间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关联，成为1920年代政治杠杆的支点。关心通货安全的党派像反对廉价货币政策一样反对危险的预算赤

^① Bentham, J.,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 44, 通胀被当作“强制性节俭”；p. 45(脚注)被当作“间接税”。亦参见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Ch. 15。

字,也就是说像反对“信用膨胀”一样反对“国库膨胀”;或者用更实际的话说,反对社会负担和高工资、反对工会和劳工政党。他们关注的不是形式,而是实质:谁能否认不受限制的失业救济可以像价格上涨时的超低利率一样破坏预算平衡,并同样对汇兑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呢?格莱斯顿已经把预算当成英国的良心了。对那些较小一些的国家而言,一个稳定的通货可能比稳定的预算来得更重要。但结果是非常相似的。不管是工资还是社会服务,都必须被削减,不作这种削减的后果早已被市场机制无可逃避地设定了。从这种分析的观点看,1931年英国的国民政府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完成了与美国新经济政策相同的功能。两者都是单个国家在伟大转型中所作的调整。不过在大大不列颠的例子中,由于它的有利条件使其避免了像国内冲突以及意识形态转换等复杂因素,所以改革的决定性的特征显现得更加清楚。

自1925年以后,英国通货的位置就不那么稳固了。与黄金重新挂钩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价格水平调整,这种价格水平明显高出世界平均水平。极少有人意识到政府与中央银行、政党与工会所合力开启的这个进程的荒谬性。斯诺登,第一届工党政府(1924)的财政大臣,就是个金本位的瘾君子——如果世界上有这种人的话。不过他没能意识到,通过重新使英镑与黄金挂钩,他实际上已经承诺,他的政党要么担起工资下跌的责任,要么下台。七年之后工党被迫——由斯诺登自己——两项都实践了。到了1931年的秋天,经济萧条的持续压力在英镑上显现出来。尽管1926年大罢工的失败保证了工资不会进一步增长,但它不能阻止社会服务,特别是无条件的失业救济造成的财政压力的增长。这时已经不需要银行家的“欺骗(ramp)”(尽管存在着这种欺骗)这个民族已经明白,选择只能在如下备选项之间作出:一方面是稳健的货币和稳健的财政,另一方面是改善的社会服务和贬值的通货——不管贬值是由高工资和出口下降造成的,还是仅仅由赤字财政造成的。换句话说,要么削减社会服务,要么汇率下跌。工党由于无法下决心选择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削减福利支出违反了工会政策,而与黄金脱钩则是一种渎神行为——它被踢出政府,保守党削减了社会服务,并且,最终与金本位脱了钩。无条件的失业救济被废弃了,一种对(申请补助者)进行的经济情况调查被引入进来。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两党制体系被悬置了,并且没有恢复的迹象。十二年之后两党制前景依旧渺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它不会很快回来。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上的或国民自由上的悲剧性损失,通过放弃金本位制,英国迈出了朝向转型的决定性的一步。在二次大战期间,这一步是伴随着

自由资本主义的种种手段的变化而迈出的。但是,后者的改变并不是永久性的,因而并没有使英国真正远离危险地带。

237 在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都活跃着同样的机制并产生了同样的效果。1923年在奥地利、1926年在比利时和法国、1931年在德国,为了“挽救通货”,工党都不得不下台。像塞佩尔、弗朗科克(Francqui)、普安卡雷(Poincaré)或者布吕宁(Brüning)这样的政治家,都从政府中清除了工党,削减社会服务开支,并努力粉碎工会对工资调整的抵制。无一例外地,危险都来自通货,相应的责任都是要固定膨胀的工资和失衡的预算。这样一种简单化很难说是对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合理对待,这些问题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诸如关于对外贸易、农业与工业的政策。不过我们越是仔细地考虑这些问题,就越能清楚地感觉到,通货和预算的问题最终还是聚焦于怎样在雇主和雇工之间作出选择,而人口中的其余部分则对支持这两大领导阶级中的哪一个,摇摆不定。

所谓的布卢姆试验(Blum experiment,1936)提供了另一种例子。工党仍在政府中,不过是在没有禁止黄金出口的条件下执政。法国的新经济政策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政府在关键的通货问题上备受限制。这个例子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在法国与在英国一样,一旦劳工被制服,中产阶级政党就会放弃对金本位制的维护而不用再费周折。这些都表明,稳健通货的信条对大众政策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238 美国的经验是用另一种方式表明了同一个教训。如果不与金本位脱钩,新经济政策就不可能被启动,尽管对外汇兑实际上对新政关系不大。在金本位制之下,很自然地,金融市场的领袖们是被信任的,他们将维护稳定的汇兑和稳健的国内信用,因为政府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由此银行体系就可以阻挠国内经济领域内它们所不喜欢的任何变动,不管有没有充分的理由。从政治角度来说,在通货和信用问题上,政府必须采纳银行家的建议,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某项金融政策会不会对资本市场和汇兑产生危险。社会保护主义之所以没有在这里导致死结的出现,是因为美国及时地与金本位脱钩了。尽管这一变动的技术上的好处并不多(并且与通常的情况一样,当局并没有对采取这种变动的原因为提供充足的解释),但华尔街在政治上的失势成了这一步骤的后果。金融市场是通过制造恐慌来进行统治的。华尔街在1930年代的式微把美国从欧洲大陆式的社会灾变中解救了出来。

然而,只有在美国,由于它独立于世界贸易之外及其鹤立鸡群的通货地

位,才可以不考虑国际影响而放弃金本位。对其他国家而言,与黄金脱钩不啻于自绝于世界经济。也许唯一的例外是英国,她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可以来制定国际货币体系运作的方式,并由此将金本位制的负担转嫁给别国。在像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没有一个具备这些条件。对它们而言,通货的毁坏就意味着与外部世界断绝联系,并由此牺牲了那些依赖原料进口的产业,破坏了就业所依赖的对外贸易。在遭受这些损失的同时,它们没有任何机会能像大不列颠一样,迫使其承办商实行同等程度的减值,从而避免通货贬值的国内后果。

汇兑是调节工资水平的有效杠杆。在汇兑成为主要问题之前,通常是工资问题在暗地里加剧紧张压力。但如果市场法则通常不能对不情愿的工资劳动者实施强迫的话,对外汇兑机制则可以非常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通货这个指示器可以向所有人展示工会政策的干涉主义对市场机制(其内在缺陷,包括经济周期,现在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造成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对共同体而言,劳动力的商品化虚构的荒谬性最为有效地揭示了市场社会的乌托邦特性。罢工,这种工业行动中常规的讨价还价的武器,越来越经常地被视为是对社会有用工作的轻率干扰,这种干扰削减了整体的社会红利,而工资最终是从这种红利中产生的。协同罢工是被憎恨的,总罢工则被当作对共同体生存的威胁。实际上,重要服务业和公共事业中的罢工是把国民扣押为人质,并把他们卷入劳动力市场的真实运作机制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之中。劳动力被设想成只能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价格,除此之外以任何方式建立起来的价格都会被认为是不经济的。只要劳动者努力使自己与这项要求相符合,它就会像一种参与供给的要素,即“劳动力”商品那样行动,并会拒绝在购买者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以下出售自己。逻辑一贯地看,这就意味着劳动者的首要责任就是几乎持续不断地罢工。这个命题再荒谬不过了,但它确实是劳动力商品理论的逻辑推论。当然,理论与实践之间龃龉的根源在于劳动力并非真的是商品,在于如果劳动仅仅为了获取其真正的价格而被隐忍不用(就像在相同情形下,所有其他商品在供给增加时都会被囤积不出售一样)的话,社会将会很快由于缺乏物质支持而解体。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罢工问题的讨论中,这种考虑极少——如果不是从未——出现。

239

回到现实中来:对任何社会来说,通过罢工途径稳定工资的做法都会造成灾难性打击,更不要说对我们这个以功利理性为荣的社会了。实际上,在私有企业制度下,工人的工作并没有稳定方面的保证,这种状况造成工人地位的严

重恶化。加上大量失业的威胁,工会功能在维护人民中的大多数人的最低生存标准这点上就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从道德上还是从文化上说都是必须的。但很清楚,任何能对工人提供保护的干预手段都必然会对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造成阻碍,并最终使消费者的购买力被削弱,而向工人提供工资的正是这个购买力。

由于内在的必然性,市场社会的根源性问题——干预与通货——再次出现了。它们成为1920年代政治的中心。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干涉主义的区别,在于对问题的不同解答。

240 经济自由主义将恢复这个体系的自发调节作为自己的至高任务,它试图消灭所有干扰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市场自发调节的干涉主义政策。它就像解决紧急问题一样处理自由贸易、自由劳动力市场和自由运转的金本位制这三大基本原则所包含的长期问题。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成了一项英雄主义壮举的急先锋,这项壮举想要恢复世界贸易,消除所有可以避免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并重建稳定的汇兑。最后一个目标对其他几个具有优先性。因为除非对通货的信心恢复了,否则市场机制不会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期望政府不竭尽所能保障自己人民的生命,实在是一种幻想。很自然,这些保护手段首先是旨在保护粮食的关税和就业的社会立法,而这些正是那种使市场机制无法运转的干涉手段。

将国际货币体系的恢复置于首位,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在面临市场解体、汇兑不稳的状况时,国际信用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资本流动(与长期投资相联系的资本不包括在内)的作用仅仅是帮助保持支付流的平衡,但即使是这个作用,也被经济方面的考虑所严格限制。信贷只被给予那些从商业角度看值得信任的对象。现在,情况已被逆转:债务已经由政治基础而产生出来,比如赔款;借款也是从半政治角度给予的,目的是使赔款成为可能。但借款也同样出于经济政策的原因而被授予,目的是稳定世界价格或者恢复金本位制。信用机制被世界经济中相对健全的国家用来缩短它与相对混乱的国家的差距,而不管后者的生产条件与贸易条件。一些国家,在一个被设想为无所不能的国际信用机制的帮助下,支付、预算和汇率的平衡以人为的方式达成了。这种国际信用机制本身的前提是,预期能够很快回归稳定汇兑——这又与回归金本位制是同义语。情况即是如此:一方是一条具有奇妙力量的富有弹性的皮筋,另一方是一个正处在解体之中的经济体系,前者帮助维持了后者表面上的统一;但这条皮筋是否能够承受这种

压力,则取决于各国能不能及时回归金本位制。

241 从其自身的角度看,日内瓦(指国际联盟)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如果它追求的目标不是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实现的话,那这个目标应该早就达到了,因为国际联盟为此所作的努力本身是如此有效、持久和一心一意。相应地,就事实来说,也没有什么干预就其结果而言比日内瓦所努力的结果更具有灾难性的了。正是因为总是显得马上要成功了,它才无限地加重了最终失败的效果。在德国马克几个月内被化为粉末的1923年和世界所有重要通货都与黄金挂钩的1930年初之间,日内瓦使用国际信用机制将东欧尚未完全稳固的经济所造成的压力,先是放到了西方战胜国的肩膀上,接着,又移到美利坚合众国那更加宽阔的肩膀上。^①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本来平常的经济周期中,美国发生了崩溃。然而,在那场可怕的倾覆到来之前,日内瓦与盎格鲁-撒克逊银行界所创制的金融网已经把全世界的经济卷入了可怕的大翻侧之中。

242 但与此相关的还不止这些。在1920年代,根据日内瓦的想法,社会组织的问题必须完全从属于恢复通货的需要。紧缩通货成为当务之急,国内制度必须竭尽所能地调整自己以适应需要。在那个时期,甚至国内自由市场和自由国家的恢复都必须先缓一缓。由于国联黄金委员会(the Gold Delegation)认为,通货紧缩没能“影响某些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并因而没能带来一个新的、稳定的均衡”,所以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以便削减垄断项目的价格,削减已达成协议工资,并削减租金水平。坚持紧缩通货者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强政府下的自由经济”;但如果说关于政府的那个短语——也就是说,强权出现、公共自由被悬置——被实现了的话,“自由经济”在现实中所意味的却与它所声称的相反——亦即,政府调整价格与工资(尽管人们声称,这种调整的目的是重获交易的自由和国内市场的自由)。要求保证汇兑的首要性无异于牺牲自由市场和自由政体——而这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于是,日内瓦代表的是一种目标的转换,而不是方法的转换:执行通货膨胀政策的政府被日内瓦指责为将通货的稳定从属于收入和就业的稳定;而那些执行由日内瓦推动的紧缩通货政策的政府,使用了并不比前者少的干预来使收入和就业的稳定从属于通货的稳定。1932年,国联黄金委员会的报告宣布,随着汇率不稳的重新出现,过去十年中的主要货币成就已化为泡影。这份报告没有说的是,在这种徒

^① Polanyi, K., "Der Mechanismus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 1933 (Supplement).

劳的紧缩通货努力中,自由市场并没有被恢复,尽管自由政体已经被牺牲了。在理论上,经济自由主义者同样反对干涉主义和通货膨胀政策,但他们已经在两者之间作出了选择,并将稳健货币的理想置于非干预的理想之上了。他们这样做,是服从了自发调节经济的内在逻辑。但这样的行动倾向于使危机进一步扩散,它将巨大的经济混乱造成的沉重压力置于金融的肩上,将各国经济的赤字累积了起来,因而使得仅存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崩溃无法避免。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关键的十年里的顽固不化——在通货紧缩政策帮助下——支持独裁主义式的干涉主义,造成了民主力量的致命削弱,本来依靠后者是可以避免法西斯主义大灾难的。大不列颠与合众国——它们是通货的主人而不是仆人——就及时放弃了金本位制从而逃离了这种危险。

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这对产业工人而言是自然的解决方案,他们看不到任何理由不让生产受到直接调控,也无法理解市场为什么会不甘于成为一个自由社会里有用的但却附属于社会的制度。从整个共同体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不过是那种在西欧一直与基督教传统相联系的努力的延续,这种努力就是使社会成为人们之间的独特人性关系(a distinctively human relationship of persons)。相反,如果从经济体系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是对晚近历史的根本转向,因为它与使私人获取金钱动机成为生产活动中普遍动机的努力相决裂,并且不承认私人拥有支配主要生产工具的权利。最终,这就是即使在社会主义政党决定不干涉财产体系的时候,他们改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努力仍旧困难重重的原因。因为,仅仅他们或许会决定干预财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足以破坏对自由主义经济至关重要的那种信心,即对财产权利延续性的绝对信心。尽管财产权的实际内容可能在立法机构手中被重新定义,但保证其形式上的延续性对市场经济的运转还是不可或缺的。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影响社会主义地位的两大变化。首先,市场体系已被证明不可信赖到了几乎会发生彻底崩溃的程度,在从前,这种缺陷即使其批评者也不曾预见;其次,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俄国建立起来,这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尽管这一壮举所发生的条件使其无法在西欧被模仿,但苏俄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项强有力的影响。确实,她转向社会主义是在缺少工业、识字人口和民主传统的条件下完成的——根据西方理念,这三项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些差异使得她的方法和解决方案无法在别的地方被应用,但这并不能阻止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在欧洲大陆,工人政党从

面貌上看一直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并且不用说，他们想要达到的任何改革都被猜疑成是为社会主义目标服务的。在和平时期，这种猜疑可能是不公正的；从整体上说，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是改革资本主义，不是革命性地推翻它。但在紧急状态下情况就不同了。那时，如果常规的手段无效，反常的手段就会被尝试，而对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来说，这些手段就包括了对财产权的否认。在迫在眉睫的压力的危险之下，工人的政党可能会采取社会主义的手段，或者至少看上去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好斗的私人企业的捍卫者。仅仅这样的迹象就足以将市场抛入混乱之中，并造成普遍的恐慌。

在这样的条件下，雇主和工人之间例行的利益冲突带上了不祥的预兆。如果说经济利益上的分歧通常会结束于妥协的话，社会中经济与政治领域相分离的现状则倾向于使这些冲突对共同体产生严重的后果。雇主是工厂和矿山的所有者，他们因而对为社会提供产品负有直接的责任（这与他们获取利润的私人利益不相干）。原则上讲，他应该拥有所有人的支持，大家共同努力使工业持续运转。另一方面，被雇者代表了社会中的大部分，他们的利益同样在一个相当重要的程度上与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是能保护消费者、公民和人类利益的唯一可得的力量，并且，在普选制的情况下，他们的人数将使他们在政治领域里占据优势。但是，立法机构，与工业一样，在社会中有其正式职能要履行。它的成员被赋予信任来完成这些工作：形成公共意志，指导公共政策，起草国内和对外的长期规划。没有任何复杂社会可以离开不停运转的立法机构和政治性代议机构而存在。雇主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发生的群体利益冲突——它们将导致工业机构或者国家机构两者之一或全部陷入瘫痪——形成了对社会迫在眉睫的危险。

244

然而，这正是1920年代确实发生的情况。劳工方面将自己隔离在自己占优势的议会中，而资本家则将工业建成一座堡垒，并借此在这个国家里作威作福。公众团体以对商业肆无忌惮的干涉来作为回应，而置既有形式的工业需要于不顾。工商业的领袖则暗中破坏人民对他们自由选举的统治者的忠诚，而民主机构发动了对工业体系的战争，尽管每个人的生计都仰仗于这个体系。最终，经济和政治两个体系都彻底瘫痪的时刻将会到来。恐惧攫取了人民的心，那些可能提供逃离危险的简单方案的人将被推上领导地位，而不管这种方案的最终代价会是什么。法西斯主义解决方案登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第二十章 社会变迁中的历史

245 如果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政治运动,它并不是偶然因素导致的结果,而是对客观情势需要的反应,那么这个运动非法西斯主义莫属。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解决方案的退化性质是明显的。它提供了逃脱制度死结的一种办法,在众多国家中,这种制度死结实质上是相似的。然而,如果这种治疗方案被尝试的话,它将在各地产生致死的病痛。这就是文明消亡的方式。

解决自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僵局的法西斯主义方案,可被描述为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是以根绝包括工业领域内和政治领域内的所有民主制度为代价来实现的。处于崩溃危险中的经济体制将由此被激活,但人民自身将被置于一种再教育过程之下,这一过程的目的就是将个体去自然化,并使之不能作为政治机体中负责的单位而发挥作用。^① 这种再教育——它包含着否定一切形式的人类友爱的政治信条——是通过对顽固不化者以科学手段施以折磨,使其被洗脑的方式实现的。

246 法西斯运动在世界上的工业国家,甚至在众多的轻微工业化的国家里出现,不应像当代人的一贯做法那样将其归咎为地方原因、民族智力或者历史背景。法西斯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毫不相关,就如同它和凡尔赛和约毫不相关一样;和德国容克军国主义毫不相关,就如同它和意大利气质毫不相关一样。它可以出现在像保加利亚这样的战败国和像南斯拉夫这样的战胜国,出现在像芬兰、挪威这样北方特性的国家和像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南方特性的国家,出现在像英格兰、爱尔兰或者比利时这样的雅利安人种国家以及像日本、匈牙利或者巴勒斯坦这样的非雅利安人种国家,出现在像葡萄牙这样的天

^① Polanyi, K., "The Essence of Fascism."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1935.

主教传统的国家和像荷兰这样的新教徒国家,出现在像普鲁士这样的军人共同体国家和像奥地利这样的平民社会的国家,出现在像法国这样具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和像美国以及拉美国家这样的只有新兴文化的国家。事实上,只要其出现的条件已经具备,就没有一种类型的背景——宗教的、文化的或是民族传统的——能够使一个国家免于法西斯主义。

此外,法西斯运动本身在物质上和数量上的力量同其政治上的效力之间的联系也少得令人吃惊。“运动”这一特定术语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它暗示着个体成群结队地卷入或者参与。可是,如果法西斯主义有什么标志性特征的话,那么这种特征就在于它并不产生这种流行的示威行动。尽管其目标通常在于获得众多的追随者,但是它的潜在力量不在于追随者的数量,而在于它对那些身居要职的大人物的影响力,这些人的良善意愿被法西斯主义领袖所挟制,而这些人共同体中的影响力则被法西斯主义者借助用来躲避造反失败的后果,这样也就摆脱了革命带来的风险。

在标志着一个国家进入法西斯主义阶段的那些运动中,法西斯运动本身恰恰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同样重要的征兆至少包括非理性主义哲学、种族主义美学、反资本主义者的煽动行为、异端的流行观点、对党派体制的批评等的广泛散布以及对“政治制度(regime)”——或者任何对现存民主政治架构的称呼——的毁谤的传播。奥地利的施潘(Othmar Spann)所谓的普遍主义哲学,德国施塔凡·乔治(Stephen George)的诗歌和克雷吉斯(Ludwig Klages)的天体演化学的浪漫主义,英国 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的性爱活力论,法国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对政治神话的膜拜都是法西斯运动中截然不同的各种前驱。正像墨索里尼和里维耶拉(Primo de Rivera)借助各自的君主而掌权一样,希特勒最终依靠兴登堡总统身边的封建主义小团体掌握了政权。然而希特勒有气势庞大的运动支持他,墨索里尼则只有小运动支持,里维耶拉却什么也没有。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都没有进行反抗法定统治者的实际革命;法西斯的策略总是在当局的默许下安排一些虚假的叛乱,而权力当局则假装被武力所击溃。这些只是对一幅复杂图景的简单勾勒,在这幅图景中出现的人物众多,包括工业城市底特律的天主教自由职业的政客、落后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大企业家”、日本的军事阴谋家以及乌克兰的反苏维埃破坏分子。自从 1930 年代以来,法西斯主义就是始终存在的政治可能性,也几乎是每个工业社会的瞬间情绪反应。为了表明危机的非人格化本质——危机的征兆总是模糊不清的,可以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趋势(move)”,而不是一场“运动

(movement)”。人们常常难以确定一场政治演讲、一出戏剧、一次布道传教、一趟公共游行、一种形而上学或一种艺术时尚、一首诗歌或一份党纲到底是否是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既没有一种被认可的标准,也没有一类惯常的信条。而一切有组织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突然爆发和突然退潮,随后在长短不定的一段潜伏期之后又猛烈爆发。所有这些都倾向于表明,它是一种随客观环境变化而起伏的社会力量。

我们简单地称为“法西斯主义情势”,所指的无非是法西斯主义者能轻而易举大获全胜的典型时机。眨眼间,庞大的工业劳动组织和劳工政治组织以及其他宪政自由的忠实支持者都会烟消云散,而不起眼的法西斯军队将会扫除民主政府、政党和工会,尽管这些机构直到此前看起来还拥有压倒性力量。如果“革命情势”指的是所有反抗力量在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瓦解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一小群武装得并不充分的革命者就能够扫除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反动力量的话,那么“法西斯主义情势”完全与它对应,只不过此时被攻击的是民主与宪政自由的堡垒,而且它的防卫同样让人感到弱不禁风。1932年7月,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政府,虽坚拥着其合法权力,却在以赫尔·冯·巴本(Herr von Papen)为首的非法暴力的纯粹恐吓中妥协投降了。又过了六个月,希特勒和平地掌握了最高权力,他立刻发动了一场旨在彻底摧毁魏玛共和国及其宪政党派体系的袭击。如果认为是法西斯运动的力量造成了这样的情势,而不认为是情势的发展产生了这些法西斯运动,那么,我们就会忽略过去几十年中最突出的教训。

248 和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根源于一种已经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因此,法西斯主义是世界范围的,它超越了经济的范畴并引发了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转变,它扩散到人类活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文化的、哲学的、艺术的,或者是宗教的。与此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当地的重要趋向相结合。只有区分了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动向(move)与这种动向在不同国家所融入的表面趋势,我们才可能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有真正的理解。

在1920年代的欧洲,两种这样的倾向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出现了,它们遮掩了较弱一些但要广泛得多的法西斯主义模式,它们是反革命和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counterrevolution and nationalist revisionalism)。当然,它们的直接起点分别是凡尔赛和约与战后革命。尽管反革命和修正主义在各自特定的目标上有明显的界限,但是,它们还是很容易与法西斯主义相混淆。

反革命是事态被猛烈扰动之后，政治钟摆的一种惯性的回复。这样的变动(moves)在欧洲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至少在英联邦成立之后情况是这样，所以它跟它们所处时代的社会进程没有太大的关联。在1920年代，无数这样的情势发生了，因为毁掉中东欧十多个王权的骚乱，部分地是战败所产生的余波，而不是民主性质的变动。反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且——不用说——属于那些在变动中失势的阶级和群体，比如王朝、贵族、教会、重工业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政党。保守派和法西斯主义在这个时期中的联合与冲突主要是关乎法西斯主义在反革命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此时，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革命性倾向，因为它的矛头在指向相互竞争着的各种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同时，也同样指向保守派。这并不排除法西斯会通过为反革命提供服务而谋求在政治领域里的权力。相反，它们常常通过声称保守派不能胜任反革命的任务来强调自己的优先地位——如果要遏制的是社会主义力量的话，保守派的确力不从心。很自然，保守派试图完全垄断反革命带来的荣誉，并且实际上它们在德国也独自做到了这一点。它们在向纳粹屈服的情况下消除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影响和力量。同样地，在奥地利，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一个保守主义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除了工人的武装(1927)，而没有对“来自右翼的革命”作出任何让步。即使是在那些法西斯主义者参与了反革命活动的地方，“强”政府也会建立起来，并将法西斯主义打入囹圄。这也发生在1929年的爱沙尼亚、1932年的芬兰以及1934年的拉脱维亚。伪自由主义政权粉碎了法西斯主义的势力，这一情况1922年发生在匈牙利，1926年发生在保加利亚。只有在意大利，保守势力才无法在不向法西斯分子提供获取权力机会的情况下，重新使工业领域恢复秩序。

249

在军事上战败的那些国家，也包括在“心理上被击败”的意大利，民族问题被放大了。这里所设定的问题几乎没有争辩的余地。战败国的永久性解除武装是比所有其他问题都要严重的问题；在国际法组织、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全都仰仗势力均衡的世界里，一些国家却被解除了所有武装，而且并没有任何新体系来替代依靠势力均衡运作的老体系。往最好里说，国联代表了一个改善了的势力均衡体系，但它实际上还没有达到晚期欧洲协同体的水平，因为缺乏一个力量普遍分散的先决条件。初期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让自己服务于民族问题；倘若没有这份“捡到的”工作，它根本无法存活下去。

不过，法西斯主义只是把这个问题作为垫脚石而已；在其他情况下，它却高唱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调子。在英国和美国，它与绥靖主义结盟；在奥地

利,返乡运动者(the Heimwehr)与各式各样的天主教和平主义力量合作;并且在原则上,天主教法西斯主义是反民族主义者。休伊·朗(Huey Long)从巴滕·卢基(Baton Rouge)开始发动他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时,并不需要借助同密西西比或者德克萨斯的边界冲突。在荷兰和挪威,非民族主义的法西斯运动几乎达到了叛国的程度——吉斯林(Quisling)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法西斯主义者,但当然不会是一个好的爱国主义者。

250 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法西斯主义完全自由地任意弃置或者利用地方性问题。它的目标超出了政治和经济的框架:它是社会的。它将一个政治信仰用来为一个堕落的进程服务。在它兴起的过程中,它只将极少量的社会情绪排除在外;但一旦获得了胜利,它就禁止大多数信念,只允许非常少量的动机保留下来,不过这些保留下来的动机都极端特殊。除非我们细致地区分它在通往权力道路上的伪偏执和取得权力之后的真偏执,否则我们就没有可能理解两者间尽管微妙却具有决定性的区别:一方面是革命时期一些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伪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革命后它们所发展出来的特别帝国主义式的非民族主义。^①

虽然一般而言,保守主义者成功地在国内完成了反革命的任务,但是他们极少能够解决自己国家的国内—国际问题。布吕宁在1940年说,在“兴登堡周围的小圈子”决定将他踢出政府,并把权力授予纳粹分子之前,他就已经解决了德国赔款和裁军的问题,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他获得这个荣誉。^② 在一个很有限的意义上,他所说的是不是事实看起来并没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德国获得平等地位的问题并不像布吕宁所暗示的那样仅限于技术性的裁军,而是包括了同样重要的非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问题;同样地,拒绝承认以下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德国外交从纳粹大众的激进民族主义政策中汲取了相当大的力量。诸多事件决定性地证明了,如果没有一个革命性的起点,德国获取国际上平等地位的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正是通过这一点,纳粹主义的可怕责任——将一个自由、平等的德国变成一个罪行累累的罪犯——才变得明显起来。不管是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攫取权力,只是因为它能够以未解决的民族问题作为自己的杠杆,而在法国和英国,法西斯主义由于它的反爱国主义而被致命地削弱了。只有在弱小并

^① Rauschnig, H., *The Voice of Destruction*, 1940.

^② Heymann, H., *Plan for Permanent Peace*, 1941. 参见 Brüning 在 1940 年 1 月 8 日的信件。

因而有依附性的国家里，臣服于外国势力的灵魂才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财富。

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2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仅仅是出于偶然才与民族主义和反革命倾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些拥有独立起源的运动之间的共生关系，它们能相互加强，并使人产生它们本质上相同的印象，尽管实际上它们并无关联。

从实质言之，法西斯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市场体系的状况。

在1917—1923年期间，一些国家的政府偶尔为了恢复法律和秩序而寻求法西斯主义的帮助：市场体系的运转只需要这两者，此外不需要更多的。但当时法西斯主义还处在未发展的状态之中。

251

在1924—1929年间，当市场体系的恢复看来已经稳固的时候，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完全隐而不见。

在1930年之后，市场经济处在普遍的危机之中。在短短数年中，法西斯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

1917—1923年间这第一个时期，只产生了法西斯这个名称。在不少欧洲国家——像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匈牙利——发生了农民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其他的国家——其中包括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工业工人阶级获得了政治影响力。最终反革命恢复了国内的力量平衡。在大多数国家，农民起而反对城市工人；在有些国家，法西斯主义运动由官员和士绅开启，他们发挥了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在另外一些国家，则像在意大利一样，失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形成法西斯的队伍。在所有的地方，人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没有人会提出激进改革的问题；换言之，不存在法西斯主义革命的任何迹象。这些运动只是在形式上像是法西斯主义的，也就是说，只是出现了平民团伙——所谓的不负责任因素——在当权者的纵容下使用强制和暴力。虽然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哲学早已产生，但它还未成为一个政治因素。1920年，托洛茨基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夜递交了一份关于意大利局势的冗长的报告，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到法西斯主义，尽管法西斯(fasci)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只是到了十年或更久之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进入政府以后，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制度。

在1924年及其之后，欧洲和美国展现出一幅喧嚣的繁荣景象，这种景象

252 打消了人们对市场体系稳固性的任何担心。资本主义已宣告恢复了。除了在边缘地带之外，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消失了。第三国际（the Comintern）宣称，资本主义的巩固已是事实；墨索里尼颂扬自由资本主义；除了大不列颠之外，所有国家都在走上坡路。美国正在享受传奇般的繁荣，欧洲大陆的情况也差不多。希特勒的政变（putsch）已被取缔了，法国已经撤出了鲁尔区，德国马克奇迹般地复原了，道斯计划也将政治抽离于赔款之外，洛加诺（Locarno，瑞士小镇，一战以后的德、法签约地）已近在咫尺，德国正处在七年繁荣的开端。在1926年年末之前，金本位制再次统治了从莫斯科到里斯本的广大世界。

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意义开始显现是在第三个时期——1929年之后。此时市场体系的死结变得非常明显。直到当时，法西斯主义还只不过是意大利独裁政府的特征之一，在其他方面这个政府与传统型政府并没有多大区别。但这时法西斯主义却作为能够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替代方案出现了。在一场全欧洲范围的革命中，德国起了领头作用，各国法西斯党的结盟为她争夺权力的斗争提供了一种动力机制，并且很快就把五大洲都席卷进来。历史被啮合于社会变迁之中。

一次外来的但绝非偶然的事件开启了国际体系的毁灭过程。华尔街股市暴跌波及的范围迅速扩展，继而大不列颠决定与金本位脱钩，并且两年之后，美国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与此同时，裁军会议停止举行，并且1933年，德国退出了国联。

这些具有象征性的事件引出了世界组织发生全面改变的时代。三大强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开始了对现状的反叛，并暗中破坏已经步履蹒跚的和平制度。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实际组织已无法继续运转下去。金本位制已经被它的盎格鲁-撒克逊创造者至少是暂时性地弃置了；债务在拖欠的名义下被拒付；资本市场和世界贸易大量缩水。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几乎同时崩溃了。

在各国内部，变化也同样是彻底性的。两党制被一党政府、有时是国民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所取代。无论如何，专制国家和保持民主化公共舆论的国家之间外在的相似性，只不过显示了自由讨论和决策制度重要性的过于夸张。俄国一变而成专制形式的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在那些为战争做准备的国家——比如德国、日本、意大利——消失了；在稍弱一些的意义，也从美国和大不列颠消失了。但是在这些浮现出来的政体之间，也就是在法西

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间，只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废弃了自由放任原则。

尽管历史是通过一个外在于所有参与者的事件开启了自己的进程，每个国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对这个挑战作出反应。有的反对变迁，有的在变迁到来时热情迎上去，有的则漠然处之。同样地，他们寻求解决方案的方向也各不相同。但从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些通常看起来根本不同的方案，只不过代表了被给定的几种选择途径罢了。 253

那些铁了心要利用普遍混乱来推进自己利益的是一群心怀不满的强国，对他们而言，势力均衡体系——即使是以国联这种比较弱的形式——的消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德国现在急于加速传统世界经济的衰落，因为传统经济仍然为国际秩序提供了一个立足点，她也期望世界经济崩溃，以便自己能够较其对手有先下手的机会。她有意识地切断自己同国际资本、商贸和通货体系的联系，以便在她认为可以拒绝自己的政治义务时，减轻外部世界对她的控制。她培养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便保证自己的长远计划所需要的行动自由。她散尽了自己的黄金储备，通过毫无理由地拒绝履行义务而毁坏了自己的国际信用，甚至在一段时间里，还打破了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对外贸易平衡。她很容易地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因为不管是华尔街、伦敦还是日内瓦，都不可能猜到纳粹的真正目标就是期待 19 世纪经济的最后解体。约翰·西蒙爵士 (Sir John Simon) 和蒙塔古·诺曼 (Montagu Norman) 都坚定地相信，最终沙赫特 (Schacht) 会在德国恢复正统的经济制度，德国现在的作为是因为她在胁迫中被迫如此，只要从经济上给予援助，她最终会浪子回头。像这样的幻想在唐宁街一直存续到慕尼黑会议时期及以后。如果说德国对传统体系解体的适应能力使她在其阴谋中得利的話，那么大不列颠则发现，自己由于坚持那个体系而受到了严重阻碍。

尽管英国曾暂时与黄金脱钩，但她的经济和金融依然是以稳定汇兑和稳健货币为基础的。然而，她重整军备的行动却被缚住了手脚。正如德国在经济上的绝对自主是她军事和政治考虑的结果——这些考虑的目的是企图先行且利用一次普遍性的大转变——一样，大不列颠的战略和对外政策被它保守的财政眼界所阻碍。有限战争的策略反映了一个岛国商业中心的视野，它认为只要自己的海军足够保障其稳健货币在七海购得原料及运输，它就是安全的。当 1933 年达夫·库珀——一个死硬派——还在为削减 1932 年军费预算辩护时，希特勒已经上台了。可笑的库珀说道：军备预算削减是考虑到“面临 254

全国性银行倒闭,这是比作战装备不足更可怕的危险”。三年多后,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主张,和平能够通过经济调整而得到,而且不应该干预贸易,否则将会使经济调整变得更加困难。在慕尼黑协定的同一年,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Chamberlain)仍然用“银弹”和美国给德国的传统贷款这样的思路来确定英国的政策。实际上,即使是在希特勒穿过卢比肯河并占领了布拉格时,西蒙勋爵还在下院赞扬蒙塔古·诺曼的立场,后者将捷克的黄金储备转交给了希特勒。这是西蒙的信念,在他看来,金本位的完整性——他的政治家职责(statesmanship)就是恢复它——比所有其他的考虑都要重要得多。现在人们会认为,西蒙的行为是铁了心的绥靖政策的产物。实际上,原因在于对金本位精神的效忠,这种视野仍旧统治着伦敦那些制定战略和决定政治事务的领导者们。在战争爆发的那一个星期,英国外交部在关于希特勒给张伯伦的一个口信的记者会上,仍然用美国对德国的传统贷款的论调解释英国的政策。^① 英格兰在军事上的无准备主要是她坚持金本位经济的后果。

德国获得了先下手为强的好处。一旦破败不堪的19世纪制度的消散允许她成为领头羊,她在赛跑中的优先地位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自由资本主义、金本位和绝对主权的毁灭是她掠夺性奇袭的附带后果。通过向自己选择的孤立主义的调整,以及在后来她那犹如贩奴者的远征冒险,德国发展出了针对大转变中部分问题的尝试性解决方案。

255 但是,德国此时最重大的政治资本,还是在于她拥有迫使世界各国形成一个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盟的能力。通过在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任务中担当领导角色,她成为大转变中最大的受益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项任务拥有有产阶级的无条件支持,而且它实际上得到的支持还不止于此。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经济利益首要性的假设中,希特勒肯定会赢。但从长期来看,国家的社会整一性比阶级的经济整一性要来得更重要。

俄国的兴起也与它在大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相联系。从1917年到1929年间,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不外乎是对失序(disorder)的恐惧,这种失序会对市场经济的恢复造成致命阻碍,因为市场经济只有在一个全面信任的氛围下才能运转。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社会主义在苏俄变为事实。集体农场意味着俄国以合作的方式,在具有决定重要性的土地方面实现了对市场经济的超越。俄国,从前只是指向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温床的所在地,现在成了能够取

^① *British Blue Book*, No. 74, Cmd. 6106, 1939.

代市场经济的新制度的代表。

经常不被意识到的是,布尔什维克们,尽管自身是热忱的社会主义者,却顽固地拒绝“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单单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自身就足以使他们排除这种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但除了1920年一个完全例外的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插曲之外,领袖们一直坚持世界革命必须由工业化的西欧来发动这样一个立场。对他们而言,隶属于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在语词上就是矛盾的,而且当它变成现实时,老布尔什维克分子无一例外地拒绝承认它。然而正是这种偏离证明了它是一个奇妙的成功。

回顾俄国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可以发现,被我们称为俄国革命的运动,其实是由两个相互分离的革命组成的,第一个体现的是传统的西欧理想,而第二个则成为1930年代全新发展的一部分。1917—1924年的俄国革命实际上是欧洲最后一场政治骚乱,遵循的是英国共和革命(the English Commonwealth)和法国大革命的模式;而1930年始于农业集体化的革命则是在30年代改变世界的第一个重大社会转变。因为第一个俄国革命所达到的是废除专制主义、封建土地关系和种族压迫——这些是1789年理想的真正继承者;而第二个革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结果,第一个革命仅仅只是俄国事件——它在俄国土壤中使一个漫长的西方进程得以最终完成,而第二个革命则构成了同时发生的世界转变的一部分。

256

看起来,1920年代的俄国远离了欧洲,在独自努力完成自身的拯救。但是更切近的分析可能会否定这个表象。因为在迫使她在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里作出决定的因素中,有一个便是国际体系的失败。到了1924年,“战时共产主义”早已成了被遗忘的往事,俄国已经在维持对外贸易和国家控制关键产业的同时,重建了一个自由的国内粮食市场。此时她倾向于使她的对外贸易得到增长,这主要依靠粮食、原木、皮毛和其他一些有机原材料的出口,而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在农业萧条过程中——这发生于普遍的贸易中断形成之前——出现了严重下跌。由于俄国无法发展出一种在有利的贸易条件下的出口贸易,从而限制了她建立自己的国民工业所必需的机器进口;下一步,这又对城乡之间的交换——所谓的“剪刀差”——造成了不利影响,从而使农民对城市工人阶级统治的敌意不断增加。就是这样,世界经济的解体增加了用权宜之计解决俄国农业问题的压力,并由此加速了集体农庄的出现。欧洲传统政治体制的失败所造成的无力提供安全和保障的局面,进一步加重了上述压力,因为它引发了加强军备的需要,并由此使本来就压力巨大的工业化再添重负。19世

纪势力均衡体系的缺失和世界市场无法吸收俄国农产品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迫使俄国不情愿地走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一国胜利的社会主义是由市场经济无力为所有国家提供联系渠道这个事实所造成的;俄国的自给自足所表明的,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一去不复返。

国际体系的失败使得历史的能量被释放出来——但其轨迹却是被市场社会内在固有的倾向所设定好了的。

第二十一章 复杂社会里的自由

19 世纪文明不是毁于野蛮人的外在或内在的攻击；它的活力不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或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或法西斯主义下层中产阶级的反叛所销蚀的。它的失败也不是利润率下降或者消费不足或者生产过剩这样所谓的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它的解体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原因——社会为了使自已不被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作为所毁灭而采取的那些措施——所造成的。除了像开拓时代的北美这样的特例之外，市场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 19 世纪提供了动力机制，并产生了最终摧毁那个社会的典型的紧张和压力。外在的战争只是加速了它的毁灭。

257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盲目“进步”之后，人类正在恢复自己的“家园”。若要使工业主义不致毁灭人类种族的话，就必须让它臣服于人类本性。对市场社会的真正批判并不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或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而是因为它的经济是以自利为基础的。这样一种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完全是反自然的，在最严格的经验意义上是例外的。19 世纪思想家假定人在其经济活动中会追求获利，他的物质主义倾向会诱使人们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努力，并预期会从他自己的劳动中获得报酬；简言之，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倾向于遵循被他们称之为经济理性的东西，并且所有的相反行为都是缘于外在干预。于是，一个由市场组成并完全处在市场价格控制之下的经济体系，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并且由此看来，以这样一些市场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是所有进步的共同目标。不管从道德上看这样一个社会是否值得向往，它的可行性——这是自明的——总是奠基于人类永不磨灭的本性之上。

258

实际上,如我们所知,人类的行为不管是在其原初状态还是在整个历史的过程中,几乎都与这种观点所认为的正好相反。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的“没有任何特殊的人类动机是经济动机”这一命题不仅适用于一般而言的社会生活,而且也适用于经济生活本身。交换的倾向——亚当·斯密在他描绘原初民的形象时如此自信地倚靠的——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并不是通常的倾向,反而是最不平常的倾向。不但现代人类学的证据证明了这些理性主义的建构不过是一堆谎言,而且贸易和市场的历史也同19世纪社会学家的悦耳说教所假设的完全不同。经济史表明,全国性市场的出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渐进、自发地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地干涉的结果。并且切近的观察会发现,19世纪自发调节的市场即使与其最邻近的前身相比,也是本质不同的,差异就在于它将自身的调节依赖于经济上的自利。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当自发调节市场的乌托邦试验仅仅成为记忆的时候,工业文明却仍将存在下去。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把工业文明转移到一个新的、非市场的基础上,这太过于艰难,以至于无法设想。他们害怕出现制度真空或者——更糟的是——自由的丧失。这些危险一定会变成现实吗?

与转型时代无法分离的巨大苦难已经过去了。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萧条的灾难性起伏、通货波动、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地位的变更、历史性国家的轰然倒塌,我们已经把最坏的都经历过了。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付出了变迁所需要的代价。人类还远未使自己适应于机器的使用,有待完成的改变仍然还很艰巨,返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那就像要把我们的麻烦转移到另一个星球上一样。仅仅致力于消除侵略和征服这些邪恶力量也是没有用的,这种徒劳的努力实际上是在保证这些力量的继续存在,即使是在军事上已将其彻底挫败。由于邪恶总是各种可能性的象征,因而总在政治上更具优势,而良好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却恰好相反。

传统体系的崩溃并没有把我们留在真空之中。权宜之中也可能包含了伟大而永久的制度的萌芽,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在各国国内,我们已经在见证一种发展,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这种发展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发生,民主的或贵族统治的,立宪主义的或集权主义的,甚至还可以是我们还完全无法预见的方式。某些国家的未来可能早已成为另一些国家的现

实,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仍旧体现了某些国家的过去。但结果对他们而言是共同的:市场体系将不再是自发调节的了,即使是在原则上也不再如此,因为它已不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

使劳动力摆脱市场,意味着一个根本性转变,其激进程度并不亚于一个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工资合同不再是私人契约,除非这些合同所涉及的不过是次要和附属性的内容。不但工厂里的劳动条件、工作时间、契约的形式,而且基本工资本身都不是由市场决定;工会、国家和其他公众团体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由这些机构的特性决定的,同时也是由生产管理的实际组织所决定的。尽管从事物的本性出发,差别工资必须(而且应该)继续在经济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与直接货币收入无关的其他动机会比劳动的金钱报酬更为重要。

使土地脱离市场,这与把土地归属于确定的制度机构是同一个意思,这样的制度机构包括家庭、合作组织、工厂、市镇、学校、教堂、公园、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等等。无论个人拥有农场将在多么广的范围内继续存在,土地租赁方面的契约需要涉及的只是附属性的要素,因为基本要素已经被移出市场的权限之外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大宗的食物和有机原材料,因为它们的价格也不再交给市场来决定。就像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价格在市场之外被决定,并不会干扰各种产品价格的成本计算功能一样,对于无限多样的产品而言,竞争性市场仍将继续发挥它的功能,并同样不会干扰社会的基本结构。当然,作为这些措施的后果,财产的性质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为保证社会的就业、生产和资源使用,而让源自财产权利的收入不受限制地增长。

260

今天,各国都已经将货币的控制权转移到市场之外。很大程度上,保证金的创设无意中提供了帮助,但1920年代金本位制的危机,证明了商品货币和象征货币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被切断。自从“功能财政”(functional finance)被引入所有重要国家之后,对投资的指导和对储蓄率的调控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任务。

于是,将生产的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移出市场之外,只有从市场的观点来看才是一项一致的行动,因为市场将它们都视为商品。然而从人类现实的观点来看,这是通过在整个社会范围的各个方向上废除商品化虚构假象而实现的社会恢复。实际上,一个统一的市场经济的解体已经导致了各种新社会的形成。同样,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

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但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

261 19世纪欧洲的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都受到了经济学的阻碍。与黄金挂钩的国际汇兑领域与文明的领域是完全同一的。只要金本位制和——基本上是它的必然推导——立宪政府仍在运转，势力均衡就是和平的推进装置。这个体系借助于那些大国而得以运转——这些大国首先是大不列颠，她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并努力在后进国家中推动代议制政府的建立。这种代议制政府是必要的，正如需要对债务国的金融和通货进行监控，因而也有必要对财政预算进行控制——只有责任政府(responsible bodies)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一般而言，这样一些考虑在政治家们的头脑中并没有被明确意识到，因为金本位制运行所需要的条件总被视为是不证自明的。世界范围内整齐划一的货币和代议制度就是这个时代刻板的经济的产物。

19世纪国际生活中的两大原则都与这种情况有关：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家，以及对别国事务的“正当”干预。尽管表面上相互矛盾，但这两者确实是相互关联的。当然，主权，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术语，因为在不被控制的对外贸易和金本位制度下，政府在国际经济方面并没有任何权力。它们既不能也不愿意让它们的国家与金融事务纠缠在一起——这就是它们在法律上的态度。实际上，只有那些拥有一个由中央银行所控制的货币体系的国家才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对强有力的西方国家而言，这种无限制且不受制约的国家货币主权是与它的彻底对立面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将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构造向别处扩张的无止境的压力。结果，在19世纪结束时，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从制度上被标准化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

然而，这个制度却受到它自身复杂性和普及性的限制。正如国际联盟的历史所深刻揭示的那样，无政府状态的主权国是一切有效国际合作的障碍；而强求一致的国内体系则是对国家自由发展的持久性威胁，尤其是对于后进国家，甚至是一些较发达的、但在金融上较软弱的国家。经济合作被局限于私人机构，这种合作就像自由贸易一样反复无常和没有效率，而各国之间的实际合作，即政府间的合作，则根本就无法想象。

262 这种情况足以在外交政策方面产生两项明显不相容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友好国家之间的合作达到19世纪主权国家所难以想象的紧密程度；然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市场被控制，各国政府对外来干涉较之以往更加猜疑。但是，随着金本位制自发调节机制的消失，各国政府都会发现他们已经可以放弃使用

绝对主权国所能采取的最具妨碍性的措施,即在国际经济领域拒绝合作。与此同时,人们也有可能愿意容忍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条件来构造本国的制度了,这样就超越了19世纪的有害教条——在世界经济的要求下各国政体必须整齐划一。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按照自身意愿组织国民生活的自由。在自由贸易的阻碍性体系下,这两种可能性都无法被想象,并且因此国家之间许多合作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和金本位制下,联盟(federation)的想法是不折不扣的集权和划一的噩梦,那么市场经济的终结则意味着各国之间都能够进行保持内政自由前提下的有效合作。

自由的问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浮现了出来;制度的层面和道德或者说宗教的层面。在制度层面上,问题就在于增加的自由和减少的自由之间的平衡;在这里并没有出现什么根本上全新的问题。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自由本身的可能性已经受到了质疑。现实情况是,维护自由的手段本身在掺假,并毁坏了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问题的关键必须要到这后一个层面上去寻找。制度是人类意义和意图的具体体现。除非理解了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真正意义,否则我们无法得到我们所要寻找的自由。

在制度层面上,规制既扩展了自由,也限制了自由;真正有意义的,只是自由的损失和获得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对法律上的自由和实际中的自由都同样适用。闲适阶级(the comfortable class)享受着有保障的生活带来的闲暇所提供的自由;与那些因为缺乏收入而只能满足于最少量的自由的人们相比,这些人当然不急于扩展社会中的自由。当有人建议运用强制手段来使收入、闲暇和社会保障得到更为公正的分配的时候,上述这种区分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尽管制约对所有人一律适用,特权者还是会憎恨它,仿佛制约仅仅只是针对他们而设的。他们所说的奴役,实际上仅仅只是要把他们自己已经享有的自由扩展到别人身上。起初,他们自身的闲暇和保障可能会缩减,但最终,他们的自由以及整个社会的自由水平都会得到提升。无论如何,这样一种自由的转换、重塑和扩大都不能用来为任何类似下面这样的论断提供根据,即所谓新状态必然比老状态要更不自由。

263

然而有些自由的保持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像和平一样,它们是19世纪经济的副产品,并且我们已经开始出于它们自身的原因而珍视它们。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这种分离对社会的存在产生了致命危险——几乎自

动地产生了以公正和安全保障为代价的自由。公民权利、私人企业和工资制度熔铸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大大有利于道德自由和精神独立。法律的自由和实际的自由在这里再一次地融成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的构成要素是无法明确区分开来的。其中,有些如失业和投机利润等,都是罪恶的产物;另一些则属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最可贵的传统;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保留这些从崩溃了的市场经济中继承下来的有价值的遗产。毫无疑问,这是一项伟大的任务。不管是自由还是和平,都不能在那个经济体系之下得到制度化,因为它的目的是生产利润和福利,而不是自由与和平。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拥有自由与和平的话,我们就必须有意识地在将来为它们而奋斗;自由与和平必须成为我们向往的那些社会的既定目标。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就是当今世界努力保障和平和自由的真正涵义。一旦源自 19 世纪经济的和平不再令人关注,和平的愿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就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建立一个国际秩序。至于个人自由的存在与否,则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意识地创造保卫其存续和扩展的机制。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nonconformity)的权利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个体必须能够自由地遵从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惧社会生活某些领域中那些受行政委托的权力。科学与艺术应该永远处在文学艺术界(the republic of letters)的保护之下。强制永远不应该是绝对的;“反对者”应该有一个适当的位置颐养天年,有一个得以维生的“次优”选择。这样就能保证作为一个自由社会标志的不服从的权利。

社会整合的进展应该伴随着自由的增长,计划的发展应该包括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加强。人的不可取消的权利,必须能在法律的保护下得以践行,即使是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个人的还是匿名的。对于作为权力滥用根源的科层制的威胁的真正回应,就是创设一些由牢不可破的规则保护起来的专断的(arbitrary)自由领域。因为,无论权力下放有多么慷慨,中央的权力却总是在加强,并因而总是存在着对自由的威胁。这一点即使对民主社会自身、职业团体以及工会的各种机构而言也不例外,尽管这些组织的职能就是保护每个个体成员的权利。这些组织的庞大规模本身就会使其成员感到无助,即使他没有理由用恶意来揣测它们。一旦成员的观点或行动触及掌权者的敏感之处,情况就更是如此。仅仅只有关于权利的宣称那是不够的,需要有让这些权利发挥作用的制度。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原本不应当是法律确定个人自由的最后的宪法根据。到目前为止尚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必须被添加到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之中。公民权利必须能够压倒一切权威,

不管是国家的、市政的还是职业的。在这些有待承认的个人权利中，第一位的应该是在不断改善条件基础上的工作权，而不论他（或她）的政治观点或宗教观点、肤色或种族是什么。这意味着保证其免于成为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有多么的隐晦。众所周知，产业法庭一直是在保护公众的个体成员免于专断权力——像早期铁路公司这样的凝聚体（agglomerations）——的侵犯。产业法庭碰到的另一种滥用权力的类型，是英国的基本工作秩序（the Essential Works Order）或者美国的“劳工冻结（freezing of labor）”，在紧急状况中，它们会有几乎无限的机会来推行对工人的歧视。只要公共舆论坚定地支持民事权利的改善，就总能发现能够维护个人自由的特别法庭或法院。维护个人自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以生产效率、消费经济和管理理性作为代价。工业社会能够承受自由。

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265 法律和实际的自由能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普遍的方式存在；规制和控制不只是使少数人，而是使所有人获得自由。自由不是作为从源头上就腐败了的特权的附属物，而是作为一种远远超出了政治领域狭隘界限伸展至社会自身内部组织的规范性权利而存在。这样，老的自由和民事权利被添加上了新自由的基础，这种新的自由是由工业社会向所有人提供的闲暇和保障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社会能够同时承担起公正和自由。

但是，我们发现这条道路被一个道德障碍所阻挡。计划和控制被攻击为对自由的否定。自由企业和私人所有权被宣称为是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据称，任何基于其他基础之上的社会都不能被称为是自由的。由规制所创造的自由被指责为不自由，它所提供的公正、自由和福利被贬斥为奴役的伪装。社会主义者徒劳地承诺了一个自由的王国，因为手段决定了目标：使用计划、规制和控制作为其手段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她在宪法中承诺的自由付诸实施，并且，批判者们追加道，这种自由很可能永远不会付诸实施……但是，反对规制也就意味着反对改革。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的理念就堕落为对自由企业的鼓吹——今天，这种想法已被大量出现的巨型托拉斯和壮观的垄断组织化成了一种虚构。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保障无需提高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仅拥有微薄的自由，尽管他们徒劳地试图利用他们的民主权利来获得某种保护，以便使自己免于被财产所有者所携带的权力所伤害。不止如此。在任何地方自由主义者都没能成功地重建自由企业，这种努力由于内在原因注定是要失败的。正是他们这种努力的结果，巨型企业开

始在一些欧洲国家安家落户，附带地，各种牌号的法西斯主义也由此得以确立，比如在奥地利。计划、规制和控制，这些他们希望被作为对自由的威胁而禁止的东西，就这样被自由公认的敌人利用来彻底地废除自由。由于自由主义者对任何包含计划、规制和控制的改革的阻碍，法西斯主义的得逞才变得在实际上无法避免。

266 自由在法西斯主义面前的彻底破灭，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哲学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哲学宣称权力和强制就是罪恶，自由要求它们从人类共同体中消失。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这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已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任何可选择的余地，要么坚持对虚幻的自由理念的绝对忠诚从而拒绝社会的现实，要么接受这个现实从而拒绝自由的理念。第一个是自由主义者的结论；后一个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似乎再没有其他的可能了。

无可逃避地，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自由的可能性本身成了问题。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如果规制是扩大和加强自由的唯一手段，而这个手段的使用又是与自由本身相对立的，那么这样一个社会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非常清楚，这个两难困境的根源在于自由本身的含义。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我们的理想给出了一个错误的指向。它看起来相当于去实现一个本质上是乌托邦的期望。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假定社会单是由人的意志和愿望所塑造，这是一种幻想。然而这正是对社会的市场观点的结论，这种观点将经济等同于契约关系，而将契约关系等同于自由。激进的幻觉认为，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源自个体的意愿，并因而也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人们的意愿所去除的。人们的视野被市场所限制，市场将生活“碎裂”为生产者部分和消费者部分，生产者部分以他的产品到达市场为限，消费者部分则从市场获取所有商品。一个部分“自由地”从市场获得他的收入，另一个部分在市场“自由地”花费他的收入。社会整体性隐匿了。国家的权力被忽略不计，因为它的权力越小，市场机制就运转得越顺畅。不管是投票者或所有者，也无论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谁都不用对诸如发生失业和饥馑时自由所受到的粗暴限制承担责任。每一个正派的个体都可以设想，他不必为他个人所反对的国家的任何强制行为负责；也不必为他个人并未从中获益的社会的经济灾难负责。他“自食其力”，“不欠任何人”，也没有被牵扯进权力和经济价值的罪恶中去。他对此之不负责任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以他自由的名义否认了所有这些罪恶的实际存在。

267 但是权力和经济价值是社会实在的一个范式。它们并非源于人类意愿，

不与它们合作是不可能的。权力的功能是使某种程度的遵从得到保证,这种遵从对群体的生存是必需的;它的最终源泉是某种主张——谁能使自己免于持有这种或那种主张呢?经济价值就在于保证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有用性,它必须先于生产它们的决定而存在,它是劳动分工的保证。经济价值的源泉是人类的欲望和物品的稀缺——我们又如何可能不会渴望某件东西比其他的更甚?任何主张或欲望都会使我们成为创造权力和构造经济价值过程的参与者。任何除此之外的自由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的论证的最后阶段。

放弃了市场经济的乌托邦,我们就得直面社会的现实。这正是作为一方的自由主义与作为另一方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界线。双方之间的首要区别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道德上和信仰上的。即使双方承认相同的经济学说,那也不只是仅有差异,它们实际上体现了相反的原则。将它们区分开来的最终一点仍旧是自由。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社会现实的接受都带着一种终极目的论,这种终极目的论曾经用关于死亡的知识来塑造人类的意识。权力和强制是现实的一部分,将它们拒之于社会之外的理想显然是无效的。使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区别的问题是,在这种关于死亡的知识烛照下,自由的理念还是可以坚持;自由是一句空话、一个诱惑、一个用来毁灭人类及其作品的设计;或者,人类在面临这种知识时,仍可重申他的自由并为在社会中实现自由而奋斗,且同时又不致坠入道德虚无主义的陷阱?

这个急切的问题概括了人类的处境。这项研究的精神和内容应该为此指出一个答案。

我们援引三项基本事实,我们相信正是这三项基本事实构成了西方人的意识:关于死亡的知识,关于自由的知识,关于社会的知识。其中第一个,根据犹太人的传说,是从旧约故事得到的启示。第二个,根据新约的记载,是在耶稣的教导中,通过对人的独特性的发现而得到启示的。第三个启示是我们通过268 在工业社会中的生活而得来的,并没有哪一个单独的伟大名字与这个启示相连,也许罗伯特·欧文最接近于成为它的传递媒介。它是现代人意识中的根本元素。

基于对社会的现实认识,法西斯主义者的回答,是对自由要求的拒绝。基督教关于个体的独特性和人类的一体性(oneness)的发现被法西斯主义拒绝了。这里就是它堕落倾向的根源。

罗伯特·欧文第一个认识到《福音书》忽略了社会现实。他将此称为基督教

对人类的“个体化”，并且似乎相信，只有在一个合作性的共同体(commonwealth)中，“基督教中所有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不会与人分离。欧文意识到我们从耶稣的教导中获得的自由无法应用到一个复杂社会中。他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人类的自由权利的坚守。西方文明的后基督教时代已经开始了，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福音书》不再是完备的，尽管它仍旧是我们文明的根基。

由此，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尽管法西斯主义者甘心让自己放弃自由而去膜拜作为社会现实的权力，但是，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让自己顺应那个现实，另一方面则不顾现实如何，仍然坚守着自由权利。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复杂社会之中。让我们再次引用罗伯特·欧文那富有启发性的话：“如果某些恶的原因不能被人类即将获得的新力量所祛除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明白，这些恶是必然的和无法避免的；他们将不再会因此产生幼稚而徒然的抱怨。”

顺应，一直都是人类的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人类接受了死亡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自己整个生命的意义。人类让自己顺应下面这个真理，即他有一个可能被丢失的灵魂，而丢失灵魂要比死亡更加可怕：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他的自由。在我们的时代，人类让自己顺应了社会的现实，这意味着以往那种自由的终结。但是，再一次地，生命从这种终极的顺应中生发出来。对社会现实毫无怨言的接受给予了人们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来消除所有能被消除的不公正和不自由。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这正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涵义，它给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确定性。

资料来源注释

第一章

1. 作为政策、历史法则、原则和体系的势力均衡

一、势力均衡政策。势力均衡政策是一项仅属于英国的政策。它完全是实用的和从实际出发的,我们既不该把它与势力均衡原则相混淆,也不该把它与势力均衡体系相混淆。这项政策是她作为孤岛的地理位置的结果,而且她面对的是大陆沿海有组织的政治共同体。“她渐渐定型的外交传统,从沃尔西(Wolsey)到塞西尔(Cecil),把势力均衡作为在面对欧洲大陆业已形成的巨大国家时获得安全保障的唯一可能性来追求,”杜维廉(Trevelyan)如是说。这一政策完全是在都铎王朝建立起来的,被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以及坎宁、帕默斯顿(Palmerston)和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所实践。它在大陆上的势力均衡体系出现之前两个世纪就形成了,并且它的发展完全独立于大陆的势力均衡信条,后者是芬奈隆(Fenelon)或者瓦特尔(Vattel)作为一项原则提出来的。但是,英国的国家政策由于这样一个体系而得到巨大助益,因为它使英国更易于组织针对大陆上任何一个支配性势力的联盟。结果,英国政治家倾向于鼓励这样一种观念,即英国的势力均衡政策实际上是势力均衡原则的一种表达;并且,通过遵从这一政策,英国仅仅是在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体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尽管如此,她自己的自卫政策与有助于推动该政策的任何原则之间的区别并没有被她的政治家所混淆。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他的《二十五年》中写道:“大不列颠在理论上并没有反对欧洲出现占优势的强有力的集团,只要它看起来是为了稳定与和平而建立起来的。支持这样一种联合一

一般而言是首选策略。只有当这种支配性势力变得具有侵略性并且她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之时,英国才会通过一种自卫的本能而不是有意的政策,趋向任何一种能够被恰当地描述为势力均衡的政策。”

270 所以说英国对大陆上势力均衡体系发展的支持、对其原则的遵循,都是出于她自己的正当性利益。这样做是她政策的一部分。这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势力均衡的吻合所造成的混淆从以下引用中可以看出。福克斯,在1787年气愤地质问政府:“英格兰是不是不再处于能维持欧洲的势力均衡的位置上了?是不是不再作为她的自由的保护者而被崇敬了?”他声称,接受欧洲势力均衡体系保卫者的角色是英国的职责。伯克,在四年之后,将该体系描述为被强制执行了近两个世纪的“欧洲的公法”。这样把英国的国家政策与欧洲势力均衡体系等同起来的做法,使美国人更加难于区分这两个本来就让他们感到很讨厌的概念。

二、作为一个历史法则的势力均衡。势力均衡的另一个含义直接以权力单元的性质为基础。在现代思想中,它首先由休谟所阐明。在工业革命之后,政治思想几乎完全隐退,休谟的成就也被遗忘了。休谟发现了这一现象的政治性质,并强调了它相对于心理和道德事实的独立性。不论行动者的动机如何,只要他们作为权力的体现而行动,它就会发挥作用。休谟写道,经验显示,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嫉妒性的竞争还是审慎的政治考量”,“效果是一样的”。F.舒曼(F. Schuman)说:“如果设想一个国家体系由三个单位A、B和C组成,很明显,其中任何一个的势力增长都将会导致另外两个势力的削弱。”他推论说势力均衡“就其本原形式来说,是用来维持国家体系中每一个单位的独立”。他也可能将这个命题一般化,以便应用于各种势力单位,不管是不是在有组织的政治体系之中。实际上,这是势力均衡在历史社会学中出现的方式。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提到以下事实,即势力单位倾向于向权力单元的边缘而不是中心扩张,因为在中心将会遭遇最为强大的压力。在西欧和中欧即使是非常小的领土变动实际上都不可能达成的时候,美国、俄国和日本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却都进行了疯狂的扩张。同样类型的历史法则也由皮雷纳(Pirenne)推导出来。他指出,在相对未组织化的共同体中,对外界压力的抵抗的核心通常形成于距离这个强有力的邻居最远的地方。比如,丕平的法兰克王国形成于遥远的北方,或者东普鲁士作为德意志组织中心的出现。同属此类的另一个法则是比利时人德·格里夫(De Greef)关于缓冲国的法则,这个法则可能对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的学派产生了影响,并产

生了把美国西部当成“一个流浪的比利时”的观念。这些关于势力均衡与失衡的概念都独立于道德的、法律的或者心理的观念。它们唯一的指涉是权力。这揭示了它们的政治性质。

三、作为一个原则和体系的势力均衡。一旦人类的某种利益被承认是正当的,某种行为原则就会从中引申出来。自1648年之后,由于芒斯特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ies of Münster and Westphalia),欧洲一些国家的既得利益者地位得到承认,签约国在这个方面的团结建立起来了。1648年条约实际上是所有的欧洲强权参与签署的,它们宣称自己是这个条约的维护者。荷兰和瑞士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就是由此确立起来的。自此之后,各国都有权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任何重大变动都对所有其他国家利益攸关。这就是势力均衡作为各国大家庭的一项原则的原始形式。这样,任何以此原则行事的国家都不会被认为是在对另一个国家采取敌意行动,无论后者关于企图改变势力格局的判断是否正确。很明显,这样一种事态会极大地有助于形成旨在防止这种改变的联合。但是,只是到75年之后,当西班牙领土被分为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时,这个原则才在乌却克条约中被公开承认。通过对这个原则的正式承认,欧洲逐步被组织成一个建立在这个原则上的体系。由于小国被大国吞并或支配将会削弱势力的均衡,所以这个体系间接地保护了小国的存在和独立。1648年乃至1713年之后欧洲组织仍显得朦胧不清,在将近两百年内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它们之所以能维持,其实都应该归功于这个势力均衡体系。无数战争以这个原则为名而发动,而且尽管这些战争必然无一例外地都是由于势力的考虑而发动的,然而在许多情况里,其结果都一样,好像各国都是遵循集体防卫原则而抵抗非正当的入侵行动。任何别的解释都无法说明像丹麦、荷兰、比利时和瑞士这样的小国,怎么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强大无比的武力压境的威胁中存活下来。从逻辑上说,这个原则与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体系之间的区别应该是明确的。但我们不能低估原则在尚未组织化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在尚未达到制度化阶段,仅仅作为一种指导性的习俗时——的有效性。即使在没有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心、例会、共同的机构,或者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众多大臣和外交官员之间的持续而密切的接触,欧洲已经形成一个体系。严格的传统规约着外交照会,“外交方针”,“备忘录”——联合或者单独提交,以相同或不同的条件——作为表达势力情势的手段而不至于使问题复杂化。谈笑间就开启了妥协——或者最终,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共同行动——的新渠道。实际上,强权在其正当利益被威胁时对小

国事务进行联合干预的权利,形成了一个次组织化的欧洲管理机构。

272 或许这个非正式体系最强有力的支柱是无数的国际私人贸易往来,这些贸易通常是通过某种商业条约,或者由习俗或传统造就的其他国际途径而得以运转的。政府与它们的有影响力的公民以无数方式纠缠在这些国际交易所织就的各种各样金融的、经济的以及司法的网线之中。一场局部战争仅仅意味着对这些关联中的某一部分的暂时打断,而仍具永久性或者至少暂时无虞的其他交易中所包含的利益与这些损失相比,是压倒性的多数,就让那些损失作为惩罚敌人的成本吧!孕育了文明共同体的整个生命,并且超越了国境线的私人利益所形成的无声压力是国际互惠关系的中流砥柱,也正是它们,为违反势力均衡原则的行为提供了有效的约束,即使它不曾采取像欧洲协约国或者国联这样的组织化形式。

作为一个历史法则的势力均衡:

Hume, D.,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Works, Vol. III (1854), p. 364. Schuman, 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33), p. 55. Toynbee, A. J., *Study of History*, Vol. III, p. 302. Pirenne, H.,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1600* (England, 1939). Barnes-Becker-Becker, on De Greef, Vol. II, p. 871. Hofmann, A., *Das deutsche Land a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1920). Also Haushofer's Geopolitical School. At the other extreme, Russell, B., *Power*. Lasswell's,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 and other works. Cf. also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Hellenistic World*, Ch. 4, Part I.

作为一项原则和一个体系的势力均衡:

Mayer, J. P., *Political Thought* (1939), p. 464. Vattel, *Le droit des gens* (1758). Hershey A. S.,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nd Organization* (1927), pp. 567—69. Oppenheim, L., *International Law*. Heatley, D. P., *Diplomac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

百年和平：

Leathes,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XII, Ch. 1. Toynbee, A. J., *Study of History*, Vol. IV (C), pp. 142—53. Schuman, 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k. I, Ch. 2. Clapham, J. H.,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p. 3. Robbins, L., *The Great Depression* (1934), p. 1. Lippmann, W., *The Good Society*. Gunningham, W.,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rn Times*. Knowles, L. C. A.,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s in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1927). Carr, E. H., *The 20 Years' Crisis 1919—1939* (1940). Crossman, R. H. S.,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ed* (1939), p. 225. Hawtrey R. G., *The Economic Problem* (1925), p. 265.

巴格达铁路：

冲突被认为通过 1914 年 6 月 15 号的英德协议而得以解决。Buell, R. 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29). Hawtrey, R. G., *The Economic Problem* (1925). Mowat, R. B., *The Concert of Europe* (1930), p. 313. Stolper, G., *This Age of Fable* (1942). 相反的观点见：Fay, S. B.,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p. 312. Feis, H.,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1930), pp. 335 ff.

欧洲协同比(Concert of Europe)：

Langer, W. L., *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1871—1890)* (1931). Sontag, R. J., *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 (1871—1932)* (1933). Onken, H., "The German Empir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XII. Mayer, J. P., *Political Thought* (1939), p. 464. Mowat, R. B., *The Concert of Europe* (1930), p. 23. Phillips, W. A., *The Confederation of Europe 1914* (2d ed., 1920). Lasswell, H. D., *Politics*, p. 53. Muir, R.,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1917), p. 176. Buell, R. L., *International Relation* (1929), p. 512.

2. 百年和平

一、事实。欧洲列强在 1815 年到 1914 年的一个世纪中相互发生战争的时间仅仅限于以下三个小时时间段：1859 年的 6 个月；1866 年的 6 个星期以及 1870—1871 年的 9 个月。确实延续了两年之久的克里米亚战争，其实具有边缘性和半殖民地的性质，这一点是包括克拉彭（Clapham）、杜维廉（Trevelyan）、汤因比（Toynbee）以及宾克莱（Binkley）在内的历史学家都赞同的。顺便提及，战争期间，英国人手中所持有的俄国债券仍可以在伦敦兑现。19 世纪与之前的几个世纪的根本区别，是不定期的全面战争与完全没有全面战争之间的区别。富勒大将军（Major General Fuller）关于 19 世纪没有哪一年没有战争的论断看来无关紧要。昆西·莱特（Quincy Wright）对各世纪中发生战争的年份进行比较，而不顾及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之间的区别的做法，似乎并没有抓住要害。

二、问题。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英国和法国之间几乎从未停息的贸易战争——这种战争往往导致全面战争——停止了。这与经济政策领域中的两个事实有关系：(a) 早期殖民帝国阶段的逝去，以及 (b) 最终步入国际金本位制的自由贸易时代的开始。当战争利益随着新形式的贸易发展迅速下降时，随着新的国际通货和信用结构与金本位挂钩而来的积极的和平利益出现了。整个国民经济体的利益现在与维持稳定通货以及有关世界市场的运转——这可是关系到收入和就业的大问题——绑在了一起。传统的扩张主义被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潮流所取代，直到 1880 年，这种潮流一直在列强中普遍存在。（我们在第十八章处理了这个问题）

但是，在这两个时代之间似乎存在着长达半个多世纪（1815—1880）的脱节：前一个是贸易战争的时代，此时的对外政策被非常自然地假定为关注牟利性生意的推进；后一个时代中，外国的债券持有者和直接投资者的利益又成为外交大臣们要加以正当考量的问题。正是在这两者中间的半个世纪里，必须将私人商业利益的影响排除于外交事务行为之外的教条建立了起来；只有到了这个中间期的末尾，大臣们才在严格限定的情况下，作为对公众观点新潮流的顺应，再次开始考虑这些要求。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源于贸易性质的改变，在 19 世纪的状况下，贸易的规模和成功不再依赖于直接的武力政策；而商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的逐渐恢复，则源于国际通货与信用体系创生出一种新型的、跨越国界的商业利益这一事实。但只要这种利益仅仅只是外国债券持有者

的利益,政府就会极不情愿让它们发言;因为对外放债一直以来都被当作最严格意义上的投机;只有对本国政府债券的投资而形成的既定的收入才是稳定的;没有哪个政府认为卷入类似向信誉可疑的海外政府放债这样极其危险的活动的国民,是值得支持的。坎宁不由分说地拒绝了对外投资者的纠缠,后者期望英国政府能够关心他们的海外损失,并且他还直截了当地拒绝将对拉美共和派的承认与他们是否承认外债相挂钩。帕默斯顿 1848 年的著名文告是态度转变的首次暗示,但这种转变从来没有走得太远;因为贸易界的商业利益分布得太广泛,政府不可能让任何细小的利益都来掺和一个世界帝国的事务运作。对外政策恢复对海外商业利益的关注,主要是自由贸易结束以及接下来向 18 世纪方式回归的结果。但由于贸易现在已经变得与非投机性的对外投资紧密交织在一起,对外政策就转回传统路线,又开始服务于商界的利益。需要解释的不是这后一种事实,而是 1815 年至 1880 年脱节时期这种利益影响力的停止。

第二章

3. 金线的突然断裂

金本位制崩溃的预兆是货币的强制稳定政策。稳定政策的急先锋是日内瓦,它将伦敦和华尔街所产生的压力转嫁到金融上比较弱小的国家身上。

第一组实行稳定政策的国家是战败国,它们的通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崩溃。第二组主要是在第一组之后稳定通货的欧洲战胜国。第三组是金本位利益的主要受益者美国。

I. 战败国		II. 欧洲胜利国			III. 各国的债主	
	稳定		稳定	脱离金本位		脱离金本位
俄国·····	1923	英国·····	1925	1931	美国·····	1933
奥地利·····	1923	法国·····	1926	1936		
匈牙利·····	1924	比利时·····	1926	1936		
德国·····	1924	意大利·····	1926	1933		
保加利亚·····	1925					
芬兰·····	1925					
爱沙尼亚·····	1926					
希腊·····	1926					
波兰·····	1926					

第一组的不平衡由第二组负担一段时间。一旦第二组也稳定了它的通货,它们同样也需要支持,这种支持由第三组提供。最终,第三组,即美国,被欧洲累积下来的不平衡冲击得最为严重。

4. 钟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摆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钟摆的摆动是普遍而迅速的,但振幅很小。在中欧和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1918—1923年这个阶段所带来的,仅仅是一个民主的(或者社会主义的)共和制——作为战败的结果——之后的保守主义回潮;若干年之后,几乎无所不包的一党制政府建立了起来。并且,这个趋势十分普遍。

国家	革命	反革命	一党政府
奥地利	1918.10 社会民主主义共和	1920 中产阶级共和	1934
保加利亚	1918.10 激进农民革命	1923 法西斯主义反革命	1934
爱沙尼亚	1917 社会主义共和	1918 中产阶级共和	1926
芬兰	1917.02 社会主义共和	1918 中产阶级共和	——
德国	1918.11 社会民主主义共和	1918 中产阶级共和	1933
匈牙利	1918.10 民主主义共和	1919 反革命	——
	1919.03 苏维埃		
捷克斯洛伐克	1918 民主联邦制	1926 威权主义军人政府	1929
拉脱维亚	1917 社会主义共和	1918 中产阶级共和	1934
立陶宛	1917 社会主义共和	1918 中产阶级共和	1926
波兰	1919 社会民主主义共和	1926 威权主义政体	——
罗马尼亚	1918 农民革命	1926 威权主义政体	——

5. 金融与和平

关于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际金融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几乎无任何资料可查。科尔蒂(Corti)关于罗斯查尔德家族(Rothschilds)的书只涵盖了欧洲协
276 同体形成之前的时期。他们参与苏伊士股份,布莱切罗德斯家族(Bleichroeders)通过发行国际债券而为1871年法兰西战争的赔款筹集资金,金融支持,在东方铁路(the Oriental Railway)时期的巨额交易等等,这些都未被包括在内。朗格尔(Langer)和桑塔格(Sontag)的历史著作对国际金融仅仅是略加注意

(后者在述及和平因素时忽略了金融), 利斯(Leathes)在《剑桥现代史》中的有关评论几乎是一个孤例。自由派作者的批评要么指责这些资金提供者不爱国, 要么谴责他们支持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倾向, 损害了自由贸易。在法国, 这样的例子是莱希思(Lysis), 而在英国, 这样的例子是霍布森(J. A. Hobson)。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像希法亭或列宁的作品, 强调源自国内银行业的帝国主义力量, 以及它们与重工业的有机联系。这样一种观点, 除了主要仅限于符合德国的经验这个局限性之外, 还必然无法处理国际银行业的利益。

华尔街对 1920 年代事态发展的影响看起来时间上太近了, 无法进行客观的研究。总体上说,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 它影响的结果是使天平向国际缓和与调整的一端倾斜, 这包括从和平条约时期到道斯计划时期以及杨格计划时期, 直至洛桑的赔款清偿及其后的时期。近期的文献倾向于将私人投资问题撇开不谈, 像斯特利(Staley)的著作就是这样, 他明确排除了向政府的贷款, 不管是别的政府提供的还是私人投资者提供的。这样的限制实际上把对国际金融的任何评估都从他那有趣的研究中排除了出去。经常被我们引用的费斯(Feis)的杰出著作, 几乎要从整体上覆盖这个主题, 但同样不可避免地深受第一手材料匮乏之苦, 因为关于国际金融(*haute finance*)的档案材料此时还无法得到。厄尔(Earle)、雷默(Remer)以及瓦伊纳(Viner)所做的很有价值的工作同样面临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第四章

6. 对“诸社会与经济诸体系”的选择性注释

19 世纪试图以个体的获利动机为基础建立起一个自发调节的经济体系。我们认为这种尝试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仅仅关注这种途径所隐含的、对生活和社会扭曲了的观点。例如, 19 世纪思想家假定, 像市场上的贸易者那样行动是“自然的”, 任何别的行为模式都是不自然的经济行为——都是人类本性被干扰的结果; 市场将会自发兴起, 只要不加干涉; 无论从道德角度看这种社会是否可欲, 至少, 它的实践性是建立在人类永恒特性的基石上的, 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然而, 像社会人类学、原始经济学、关于早期文明的历史, 以及一般经济史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所形成的现代研究提供的事实检验表明, 情况与上述论断恰恰相反。实际上, 经济自由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不管是言明的还是隐含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假定几乎没有一个未

被推翻。下面是某些引证。

(a) 获利动机对人而言并不是“自然”的。

“原始经济的标志性特征就是不存在任何通过生产和交换而获利的欲望”(Thurnwald, *Economics in Primitive Communities*, 1932, p. xiii)。“必须被永久地推翻的另一个概念是当前一些流行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原始经济人的概念”(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30, p. 60)。“我们必须拒斥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的理想类型,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都是误导性的”(Brinkmann,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Abt. IV, p. 11)。

(b) 劳动之后期望得到报酬并非人的“本性”。

“获利,尽管在更文明的社会中通常是从事工作的动力,在原初社会中却从来不是从事工作的动力”(Malinowski, 同前引书, p. 156)。“在未受外来文明影响的初民社会里,我们从未发现劳动与酬劳相联系”(Lowie, “Social Organizatio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XIV, p. 14)。“任何地方劳动都不曾被出租或出售”(Thurnwal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Bk. III, 1932, p. 169)。“将劳动作为一种不要求补偿的义务……”是普遍的(Firth, *Primitive Economics of the New Zealand Maori*, 1929)。“即使在中世纪,对陌生人的工作付以报酬,这也是闻所未闻的。”“陌生人并没有人身关系形成的义务,并且因此,他应该为荣誉和被承认而工作。”吟游诗人(Minstrels),是外来的生人,却“接受了报酬,结果是被鄙视”(Lowie, 同前引书)。

(c) 将劳动付出缩减到不能再减的最小值,对人而言并不是“自然的”。

“我们无法不注意到,工作从来不会受限于不可再减少的最小值,而是超出了绝对必要的数量,这是一种自然的或者养成的对活动的功能性驱策”(Thurnwald, *Economics*, p. 209)。“劳动总是倾向于超出严格必要的程度”(Thurnwal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p. 163)。

(d) 劳动通常所依靠的激励并不是获利,而是互惠、竞争,对工作的享受以及社会认可。

互惠:“我们发现,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处在赠礼和回礼的互惠链条上,从长期看,这种互惠链是平衡的,使双方都受益……在其经济交易中老是不遵从法则约束的人很快就会被抛在社会和经济的秩序之外——他能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1926, pp. 40—41)。

竞争：“竞争是激烈的，尽管劳动的目标一致，但表现的完美程度却因人而异。……以不断重复的方式追求卓越”（Goldenweiser, “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1936, p. 99）“在向田园搬运大木柱的过程中，或者在搬运收获的山芋的过程中，人们相互竞争，较量他们的速度、利索程度和负荷的重量”（Malinowski, *Argonauts*, p. 61）。

对工作的享受：“为工作而工作是毛利人（Moari）工作的恒常特征”（Firth, “Some Features of Primitive Industry,” E. F., Vol. I, p. 17）。“许多时间和辛劳都被用在了审美的目的上了，使菜园更整洁，清除所有杂草；修建精致而坚固的围栏；搭建高大坚固的山芋架。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都是作物生长的条件；但无可置疑的是，土著人把他们的辛勤劳作推到了远远超出纯粹必要的程度”（Malinowski, 同前出现, p. 59）。

社会承认：“园艺技术的娴熟程度是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普遍指标”（Malinowski,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 II, 1935, p. 124）。“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被期望表现出正常水平的动手能力”（Firth, *Primitive Polynesian Economy*, 1939, p. 161）。“安达曼（Andaman）岛上的居民视懒惰为反社会行为”（Ratc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将一个人的劳动置于另一个人的差遣之下，这是社会性的服务，而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性服务”（Firth, 前引书, p. 303）。

(e) 有史以来人都是一样的。

林顿（Linton）在他的《人的研究》一书中建议对个性决定论心理学理论保持警惕，并断言“普遍的观察导致如下结论，这些类型的总范围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基本上是一样的……换言之，一旦他（观察者）穿透了文化差异的屏障，他就会发现这些人在本质上跟我们是一样的”（p. 484）。图恩瓦尔德（Thurnwald）强调了人类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类同性：“就人类关系而言，本书前一部分所研究的原始经济并不是与其他任何经济都截然不同的，它们都是以同样的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为基础的”（*Economics*, p. 288）。“一些基本的集体情感本质上对所有人类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这些相同之处是其社会存在的同一构型不断重现的原因”（“Sozialpsychische Abläufe im Völkerleben.”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 383）。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的模式》最终也是建立在同一个假定之上的：“按我的说法，似乎人的气质在全世界是基本保持恒常的；似乎在每一个社会中，这些气质的大致相同的分布都是潜在

地可以实现的；而且，似乎从这些气质中加以选择而形成的文化，根据其传统模式，已经把绝大多数的个体都塑造为它的遵从者。比如，根据这种解释，催眠的体验，是任何人口总体中一定数量的个体的潜在能力。一旦它被推崇和奖励，就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比例达到或引发这种状态……”(p. 233)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著作中一贯地坚持相同的立场。

(f) 经济体系，从原则上说，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物质货品的分配是通过非经济动机来保证的。

原始经济是“一个社会事务，相关的是一个相互连锁的整体中一定数量的人”(Thurnwald, *Economics*, p. xii)。财富、工作和交换都同样如此。“原始财富的性质并不是经济的，而是社会的”(同前)。劳动能够产生“有效率的工作”，因为它“被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到一个有组织的努力之中”(Malinowski, *Argonauts*, p. 157)。“货物和服务的交换通常发生在持续的伙伴关系之间，或者与明确的社会纽带相关，或者与多种多样的非经济事务相伴”(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p. 39)。

统治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原则看来就是互惠和存储一再分配：

“全部的部族生活贯穿着不间断的给予和接受”(Malinowski, *Argonauts*, p. 167)。“今天的给予将会被明天的接收所补偿。这是充斥初民生活的互惠原则的结果”(Thurnwald, *Economics*, p. 106)。为了使这样的互惠成为可能，制度的某种“二重性”或者“结构的对称性会在所有的未开化社会中找到，它们是互惠义务不可缺少的基础”(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p. 25)。“对巴纳罗(Banaro)人来说，他们灵魂的心室的对称性分离是以他们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后者也同样是对称的”(Thurnwald, *Die Gemeinde der Banaro*, 1921, p. 378)。

图恩瓦尔德发现除这种互惠行为之外，或者说与这种行为相并列，还有一种存储与再分配的实践，这种实践应用得甚为广泛，从原始狩猎部落到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货物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向中央集中并进而分配给共同体的成员。例如，在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n)与波利尼西亚(Polynesian)这些群岛上的民族中，“国王作为第一氏族的代表，接受收益，并在之后以赏赐的形式把它分配给广大的民众”(Thurnwald, *Economics*, p. xii)。这种分配功能是中央机构政治权力的最主要来源(同前, p. 107)。

(g) 旨在满足其个人和家庭需要的个体化的食物采集并不是早期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经典作品都假定前经济的人(the pre-economic man)都得照料自己和他的家人。这种假定在世纪之交被卡尔·比歇尔(Karl Bücher)在他开创性的著作中被复活,并广为流传。近期的研究不约而同地在这一点上纠正了布尤切尔。(Firth, *Primitive Economics of the New Zealand Moari*, pp. 12, 206, 305; Thurnwald, *Economics*, pp. 170, 268, an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Vol. III, p. 146; Herskovits,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1940, p. 34; Malinowski, *Argonauts*, p. 167, 脚注)。

(h) 互惠和再分配这两种经济行为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小的初民共同体,也适用于大的、富有的帝国。

“分配有其独有的历史,始自狩猎部族最为原始的生活。”“……对具有更晚近和更明确的分层特征的社会来说,情况是不同的。”“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来自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接触。”“……这些社会中的情况有显著区别。但当少数家族的政治力量增长、僭主出现的时候,分配功能也就随之增长。首领接收农民的礼物,这种礼物现在已经变成了‘税’,并在他的官员——特别是他贴身的宫廷官员——中进行分配。”

“这种发展涉及更为复杂的分配体系……所有的古式国家——古代中国,印加帝国(the Empire of Incas),印度诸王国,埃及,巴比伦——都利用一种金属货币来应对税收和薪俸问题,但它们主要依靠库房里储存的实物来进行支付……并将这些实物分配给官员、士兵以及各个有闲阶级,也就是说,分配给人口中的非生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分配履行了一种极其重要的经济功能”(Thurnwald, *Economics*, pp. 106—8)。

“当我们说起封建制度,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欧洲的中世纪……但是,它是这样一种制度:在分层化了的共同体中以非常快的速度出现。绝大多数交易以实物的方式进行,加上上层等级声称拥有所有的土地和牲畜这些事实,就是封建主义兴起的经济原因”(同前, p. 195)。

第五章

7. 对“市场模式演进”的选择性注释

经济自由主义者有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就是认为它的运作和方式乃是普遍的进步法则的自然产物。为了让这些实践和方式符合这样一种模式,作为自发调节的市场之基础的那些原则就被反向投射到整个人类文明史之中。作

为这种努力的结果,贸易、市场以及货币,加上城市生活和民族国家,所有这些东西的真正性质和起源都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了。

(a) 在初民社会中,个体从事“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这样的行为仅仅是例外。

“物物交换(*barter*)在起初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与拥有一种交换的渴望相反,原始人是要避开它的”(Buecher,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904, p. 109)。“例如,不可能用一定量的食物来表示一个渔钩的价值,因为这样的交换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发生的话,将会被提扣皮亚人(*Tikopia*)视为不可思议……每一种物品都只适合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情境”(Firth, 前引书, p. 340)。

(b) 贸易并不出现于一个共同体内部,它是一种发生在共同体之间的外部事物。

“在其起源阶段,商业是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易;它并不发生在同一部族或者同一共同体的成员之间,而是最古老的社会共同体的外部现象,它所指向的是外部的部落”(M.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 195)。“尽管看起来显得很奇怪,中世纪商业发展的起源是在对外贸易,而不是地方贸易的影响下形成的”(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p. 142)。“远距离贸易是中世纪经济复苏的功臣”(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125)。

(c) 贸易并不依赖于市场;它源自单方面的货物运送,不管这种运送是不是以和平为形式。

图恩瓦尔德澄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贸易的最早形式仅仅是从远距离获取和运送货物。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次猎取性的远征。这种远征是像猎取奴隶一样具有战争的性质,还是具有海盗的性质,主要取决于被遭遇者有没有抵抗(前引书, pp. 145, 146)。“不仅是北欧海盗之中,而且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中,海盗行为都是海上贸易的最初形式;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这两种职业和谐地发展着”(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109)。

(d) 市场的存在与否并不是经济体的本质特征,地方市场并没有不断生长的倾向。

“没有市场的诸经济体系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共同特征”(Thurnwal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Vol. III, p. 137)。在早期市场上“只有在特定数量和特定种类的物品之间才能交换”(同前, p. 137)。“图恩瓦尔德值得特别赞扬,因为他观察发现,原始货币和贸易的重要性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而不是

经济性的”(Loeb,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 Early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 153)。地方市场并不是从“武装贸易”或者“默契交易”或其他形式的对外贸易中发展出来的,而是源自为满足邻里交换的有限需要的集会场所中所维持的“和平”。“地方市场的目标乃是供给该地区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这解释了它们为什么每周举行,也解释了它们物资积聚的狭小空间范围,以及为什么它们的活动仅限于小的零售操作”(Pirenne, 如前引书, Ch. 4, “Commerce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97)。与定期贸易会(fairs)相反,即使是在地方市场的后期发展阶段,也看不出有增长的迹象:“这种市场供给地方所需,并且仅仅只有附近的居民参与;它的商品是乡村产品以及日常生活所用的器皿”(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935, Vol. I, p. 221)。地方贸易“通常发源于自农民以及家庭手工业者的副业活动,并且大体上是一种季节性的活动……”(Weber, 如前所引书, p. 195)。“乍看起来,这样设想似乎很自然:一个商人阶级从农业劳动者人口中一点一点地生长起来。但是这种理论没有任何证据”(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111)。

(e) 劳动分工并非始自贸易与交换,而是始自地理上的、生物上的以及其他非经济事实。

“劳动分工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如理性主义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复杂化的结果,它主要是由与性别和年龄有关的生理区别所导致的”(Thurnwald, *Economics*, p. 212.)。“几乎唯一的劳动分工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分工”(Herskovits, 前引书, p. 13)。源自生物学区别的劳动分工的另一种方式是不同民族群体的共生关系。通过“一个上层等级”在社会中的形成,“民族群体被转变为职业—社会群体”。“由此产生出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一方面基于从属阶级的贡献与服务,另一方面基于领导阶层中家族首领所控制的分配权力”(Thurnwald, *Economics*, p. 86)。由此我们遇到了国家的一种缘起方式(Thurnwald, *Sozialpsychische Abläufe*, p. 387)。

(f) 货币并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发明,货币的有或无并不必然造成经济类型的本质差异。

“仅仅某个部落使用货币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它从经济上与其他不使用货币的部落有真正的区别”(Loeb, 前引书, p. 154)。“即使使用了货币,它的功能也与它在我们的文明中所履行的非常不一样。它从来就是具体物质,从来不曾变成一种完全抽象的、价值的代表”(Thurnwald, *Economics*, p. 107)。

以物易物的困难并不曾造成货币的“发明”。“这种古典经济学的旧观点与民族志的调查所得相抵触”(Loeb, 前引书, p. 167, footnote 6)。为了解释作为货币的商品的特殊效用以及它们作为权力特征的象征意义,求助于“从单方面的理性主义出发的经济占有概念”是不可能的(Thurnwald, *Economics*)。比如,货币可能仅仅用于薪俸和税收的支付(同前, p. 108),或者用来作为对换取一个妻子的支付、对被害人的抚恤金(blood money)以及对某些收费项目(fines)的支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前国家情况的例子中,对贵重物品的估价与习俗性捐献的数量有关,与领导人员所拥有的地位有关,与他们同自己的共同体中普通成员的具体关系有关”(Thurnwald, *Economics*, p. 263)。

283 货币,如同市场一样,主要说来是一种外部现象,它对共同体的重要性主要是由贸易关系决定的。“货币的概念通常是从外部引进的”(Loeb, 前引书, p. 156)。“货币作为一般交换中介的功能始于对外贸易”(Weber, 前引书, p. 238)。

(g) 对外贸易最初不是个体之间,而是集体之间的贸易。

贸易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它涉及的是“集体获取的物品”。它的起源在于“集体贸易之旅”。“这些远程冒险活动通常都具有对外贸易的性质,集体性原则就出现在这种远征行动的安排之中”(Thurnwald, *Economics*, p. 145)。“在任何情况中,最古老的商业都是异族部落之间的交换关系”(Weber, 如前所引书, p. 195)。中世纪贸易也非常明确地不是个体之间的贸易。它是“某些城市之间的贸易,一种共同体之间或者市镇之间的商业”(Ashley,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Part I, “The Middle Ages,” p. 102)。

(h) 乡村被分离于中世纪贸易之外。

“直到 15 世纪,城镇都是商业和工业唯一的中心,以至于任何商业或工业都不能进入到不设防的乡村中去”(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169)。“针对乡村贸易和乡村手工业所展开的斗争至少持续了 700 年到 800 年。”(Heckscher, *Mercantilism*, 1935, Vol. I, p. 129)“这些措施的严厉性随着‘民主政府’的成长而增加……”“整个 14 世纪,正规武装的远征队被派遣到所有附近的村庄中,织布机和蒸洗布料的大桶要么被打碎,要么被运走”(Pirenne, 前引书, p. 211)。

(i) 中世纪并不存在城镇间的非歧视性贸易。

城镇之间的贸易暗含着特定城镇之间或者特定城镇群体之间的优惠关

系,例如,伦敦同业公会与条顿同业公会之间的情况就是这样。互惠与报复是统治着这些城镇之间关系的原則。例如,当发生了拒绝偿还债务的情况时,债主一方的市政当局就会找债务人一方的市政当局,要求债务得到偿还,就像对方自己的民众应该得到的对待那样,“并威胁说,如果不还债,将对对方的民众施加报复”(Ashley,同前所引书,Part I, p. 109)。

(j) 国家保护主义是闻所未闻的。

“在13世纪时极少有必要为了经济目的而区分不同的国家,因为当时在基督教世界中的社会交往不像现在这样有许多障碍”(Cunningham,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 Vol. I, p. 3)。直到15世纪时才在政治国界上出现关税。“在此之前,不存在哪怕最微弱的需要来通过保护国内贸易以免遭遇外来竞争”(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92)。“‘国际’贸易在所有的贸易种类中都是自由的”(Power and Postan,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284

(k) 重商主义强制国境以内的城镇和省区之间的贸易更自由化。

赫克舍(Heckscher)的《重商主义》(1935)第一卷的标题是《作为一个统一体系的重商主义》。如其所言,重商主义“反对任何将经济生活束缚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事物,反对任何阻碍一国国境范围内的贸易流通的事物”(Heckscher, 前引书, Vol. II, p. 273)。“市镇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压制乡村地区发展商业,另一方面反对外来城市的竞争——全都与国家的经济目标相冲突”(同前, Vol. I, p. 131)。“重商主义通过商业行动使得乡村‘全国化(nationalized)’,这种商业行动就是将市镇商业的地方实践向全国领土进行延伸”(Pantlen, “Handel”.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Vol. VI, p. 281)。“竞争通常是重商主义人为促成的,目的是形成通过供求变化达到自发调节的市场”(Heckscher)。第一个意识到重商主义的解放倾向的现代学者是施莫勒(Schmoller, 1884)。

(l) 中世纪的规制主义(regulationism)是极度成功的。

“中世纪城镇的政策可能是自古代世界消亡之后,西欧根据一贯原则对社会的经济方面进行规制的第一次尝试。这次尝试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也许在它处于无可挑战的统治地位的时候,才取得了类似的成功,但从时间上的持续性来看,与城镇政策的持久坚韧相比,自由主义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Heckscher, 同前所引书, p. 139)。“它们通过一个调控体系达到了这种成就,这种成就是如此地符合

于它们的目的,以至于可以被当作同类成就中的大师杰作……城市经济值得作为哥特式建筑的同时代成就而名垂青史”(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217)。

(m) 重商主义将市镇实践延伸应用到国家范围。

“结果就是一种延伸到更广阔范围的城市政策——一种基于一个国家基础上的市镇政策”(Heckscher, 如前所引书, Vol. I, p. 131)。

(n) 重商主义,一个极为成功的政策。

285 “重商主义创造出一个杰出的、复杂而精致的需要—满足体系”(Buecher, 前引书, p. 159)。科尔贝尔的规章作为一个为了高品质生产而生产的体系,其成就是“令人叹为观止的”(Heckscher, 如前所引书, Vol. I, p. 166)。“全国范围的经济生活的出现主要是政治集中化的结果”(Buecher, 如前所引书, p. 157)。“劳动法和劳动纪律的创制,应归功于重商主义的规制体系,这种法律和纪律要比中世纪城市政府的狭隘特殊主义囿于它们的道德和技术限制所能创造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要严格”(Brinkmann,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 Abt. IV)。

第八章

8. 关于斯品汉姆兰的文献

只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以及终了时期,我们才能发现对斯品汉姆兰的决定性重要地位的意识。当然,不管在 1834 年之前还是之后,人们都会时常提及“补贴制度”以及“对济贫法的不良管理(maladministration)”,但这两者并不始自 1795 年的斯品汉姆兰法案,而始自 1782 年的吉尔伯特法案(Gilbert's Act),斯品汉姆兰体系的真正性质并没有在公众的头脑中建立起来。

即使到了今天,情况仍然如此。人们依旧广泛地认为,它仅仅意味着不加区分地济贫。实际上,它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系统的工资补助办法。时人只是部分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实践与都铎王朝法律的原则完全抵触,他们也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与正在浮出水面的工资制度完全不能兼容。在实际效果方面,人们到后来才意识到,它倾向于压制工资,并最终与 1799—1800 年的反结社法相联系,成为对雇主的某种补贴的性质。

古典经济学家从来不曾停止像对地租和通货那样对“补贴制度”进行详尽研究,他们将所有形式的补贴和户外救济都绑到“济贫法”上,并强烈要求把它

从头到脚连根拔除。不管是汤森、马尔萨斯，还是李嘉图，都不主张对济贫法进行改革；他们所要求的是把它取消。单独对这个主题作了研究的边沁，在这个问题上不像其他人那么教条主义。伯克和他都看到了皮特所没能看到的，那就是真正的邪恶原则在于工资补助。

恩格斯与马克思并没有对济贫法进行任何研究。人们可以想象，任何别的东西都不可能比揭示济贫法的虚伪人道主义更适合他们的学说了：用美好的名声来迎合穷人的幻想，与此同时却把他们的工资压制在生存水平之下（在一个特别的反工会法的强有力的帮助下），并将公共的钱财交给富人以便他们从穷人身上赚到更多的钱。但在他们的时代，新济贫法成了唯一的敌人，并且一些宪章主义者也倾向于美化旧济贫法。而且，恩格斯和马克思非常正确地相信，如果资本主义将要到来的话，那么济贫法的修改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不仅错过了某些最佳的辩论要点，而且错失了一项通过斯品汉姆兰法案来加强其理论体系的重要论点，即资本主义不能在没有一个自由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运转。

286

为了对斯品汉姆兰法案的效果进行耸人听闻的描述，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非常多地引用了《济贫法报告》（1834）中的那些经典片段。对她的那些装帧奢华的小书卷提供资助的古尔德家族与巴林家族，不可能找到比她更诚恳，并且总体上更有知识的对他们信条的鼓吹者了。在这些小书卷中，她努力针对穷人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而对他们进行启蒙——她深深地相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唯有对政治经济学法则的了解本身才可能使他们的命运变得可以忍受（*Illustra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1831, Vol. III；亦见 *The Parish* 以及 *The Hamlet in Poor Laws and Paupers*, 1834）。她的《三十年和平，1816—1846》用了一种饱经风霜的语气，表现出对宪章运动要比对自己导师边沁的更大同情（Vol. III, p. 489, and Vol. IV, p. 453）。她用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段落来结束自己的编年史：“我们现在拥有对解决劳工权利这个重大问题的最大兴趣和最高注意力，从国外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警告是，忽视它将会带来致命的毁灭。莫非真的找不到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很可能是下一阶段英国历史的中心问题；将来回过头来再看就会发现，为它作准备正是先前30年和平的核心利益所在。”这是一个延时实现的预言。在英国历史的下一个时期中，劳工问题不再存在了；但它在70年代重新回来，并在另外半个世纪之后确实造成了“致命的毁灭”。很明显，在1840年代要比1940年代更易于辨识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支配着《济贫法修正案》的那些原则。

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及以后,没有任何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关心关于斯品汉姆兰法案的不起眼的经济学。在三个边沁主义的历史学家中,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并没有费力去探究它的细节;哈勒维(Elie Halevy),尽管第一个意识到济贫法在哲学激进主义中的先锋地位,但对这个主题仅有最为模糊的概念。而第三个,戴西(Dicey)的疏忽则更加令人惊奇。他对法律和公共舆论之间关系的无与伦比的分析把“自由放任”与集体主义当成整个分析中的经线和纬线。他相信,这个模式本身,源自那个时代的工业和商业潮流,也就是说,源自塑造经济生活的制度本身。没有人能够比戴西更强调公众舆论中的贫困以及济贫法修正案这两点在边沁主义立法中的重要性。可是他对边沁主义者在其立法框架中赋予济贫法修正案以核心重要性却迷惑不解,以至于他会相信济贫税对工业形成的负担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像熊彼特和米切尔(Mitchell)这样杰出的经济思想史家,在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进行分析时也丝毫没有提到斯品汉姆兰法案的情况。

287 随着 A. 汤因比的演讲发表(1881),工业革命遂成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汤因比认为托利党社会主义者应该对斯品汉姆兰法案及其“通过富人来保护穷人的原则”负责。大约同一时期,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也转向这个主题,于是它奇迹般地复活了;但他的声音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喊。尽管芒图(Mantoux, 1907)受益于坎宁安的代表作(1881),但他还是把斯品汉姆兰法案仅仅看作“另一场改革”,并令人非常奇怪地把它归因于“将穷人撵进劳动力市场”的后果(*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438)。比尔(Beer),尽管其著作是早期英国社会主义史的里程碑,却几乎没有提到济贫法。

直到哈蒙德(Hammond)夫妇(1911)提出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种新文明这样一种新视野,斯品汉姆兰法案才被重新发现。正是由于他们的贡献,后者才成为社会史而不是经济史的一部分。韦布夫妇(The Webbs)继续了这一工作,提出了斯品汉姆兰法案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前提条件这一问题,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处理的其实正是我们时代社会问题的根源。

J. H. 克拉彭(J. H. Clapham)试图建立一个方案用来反对经济史的制度主义方法,恩格斯、马克思、汤因比、坎宁安、芒图以及更为晚近的哈蒙德夫妇是这种制度主义的代表。他拒绝将斯品汉姆兰体系当作一个制度,并把它作为农村里的“农业组织”的一个特征来探讨(Vol. I, Ch. 4)。这样做很难说是充分了,因为恰恰是向城市的扩张导致了这个体系的败落。同时,他将斯品汉

姆兰法案对税率的影响从工资问题中分离出来,并在“国家的经济活动”的主题下讨论这种影响。这又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做法,因为它出于雇主阶级的视角而忽略了斯品汉姆兰法案的经济机制,正是这个阶级从低工资上得到的好处补偿甚至超过了他们在税率上的损失。但克拉彭对事实的兢兢业业的尊重弥补了他对制度的错误处理。在斯品汉姆兰法案被引进的地区所发生的“掠夺般的圈地”造成的决定性后果,以及实际工资由此被压低的程度,正是由于他而第一次得到显示。

斯品汉姆兰法案与工资制度的完全不能相容只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才被永远地记住了。只有他们才认识到,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对劳动的任何一种保护都意味着类似斯品汉姆兰式的保护主义。斯宾塞用“人造工资(make-wages)”这样一种称呼(这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对补贴制度的称谓)来强烈指控任何“集体主义实践”,他可以毫不困难地将这个说法应用于公共教育、住房、提供休闲场所等等。1913年,戴西这样总结他对《养老金法案》(the Old Age Pension Act)的批评:“从本质而言,它无非是对穷人的一种新型的户外救济。”并且他怀疑经济自由主义者能不能得到相当机会来使他们的政策成为成功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的有些建议从来没有被付诸实施;比如,户外救济一直不曾被废除。”如果这就是戴西的观点,那么米塞斯这么说就很自然了,“只要失业救济仍然在发放,失业就必然会存在”(Liberalisms, 1927, p. 74);“失业救助已经被证明是毁灭的最有效武器之一”(Socialism, 1927, p. 484; National ökonomi, 1940, p. 720)。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的《好社会》(Good Society)中竭力试图与斯宾塞划清界限,不过却惹恼了米塞斯。他和李普曼所反映的是自由主义针对1920年代和30年代新保护主义的反动。毋庸置疑,当时情景的许多特征都让人想起斯品汉姆兰。在奥地利,失业救济从一个破了的国库中获得补贴;在大不列颠,“扩展了的失业救济”变得与“施舍(dole)”难以区分;在美国,WPA^①与PWA^②已经启动;实际上,蒙德爵士(Sir Alfred Mond),帝国化学工业部(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的部长,在1926年就曾徒劳地鼓吹英国雇主应该获得失业基金的帮助,以便“补足”工资并由此增进就业。与在通货问题上一样,在失业问题上,自由资本主义在濒临死亡的阵阵剧痛中仍然面临着从它诞生时遗留下来的尚未解决的

① 即“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译者注

② 即“公共工程振兴署(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译者注

问题。

(1957 版的“附加笔记”)

9. 济贫法与对劳动的组织

截至目前,还没有人对斯品汉姆兰体系的深远影响、它的效应展开研究,也没有人关注它突如其来的断裂的原因。这里是一些相关要点。

1. 斯品汉姆兰法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战时措施?

从严格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斯品汉姆兰法案并不能真正被视为一种战时措施,尽管经常有这种断言。当时的人们几乎不曾把工资状况(wages position)与战时紧急状况联系在一起。虽然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工资上涨,但这种上涨早在战争之前就开始了。阿瑟·杨(Arthur Young)在 1795 年试图确定歉收对谷物价格之影响的《函件》(*Circular Letter*)中有这样一个问题(第四点):“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对农业劳动者的工资的增长(如果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呢?”并不意外的是,他的通信对象未能确定“前一个时期”这个短语的确切含义。它既可以指 3 年,也可以指 50 年。它们包含了下列长度的时段:

- 3 年.....J. Boys, p. 97.
- 3—4 年.....J. Boys, p. 90.
- 10 年.....来自 Shropshire, Middlesex,
Cambridgeshire 的报告
- 10—15 年.....Sussex and Hampshire.
- 10—15 年.....E. Harris.
- 20 年.....J. Boys, p. 86.
- 30—40 年.....William Pitt.
- 50 年.....Rev. J. Howlett.

没有人将时段定为两年,即从 1793 年 2 月开始的法国战争开始算。实际上,通信中都没有言及战争。

顺便提及,应对赤贫者增加——这是由坏收成和不利天气条件所造成的失业导致的——的常用方式有以下几种:(1)沿用地方性的传统习惯,包括发放救济金并且以免费方式或者较低价格分配食物和燃料;(2)提供就业。工资通常不受影响;在 1788—1789 年这样一个类似的紧急状况中,实际提供了额

外的雇佣岗位,这种提供是地方性的,并且工资比正常水平低一些。(参见 J. Harvey, "Worcestershire," in *Ann. of Agr.*, v, XII, p. 132, 1789. 亦见 E. Holmes, "Cruckton," l. c., p. 196)

不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战争至少对采用斯品汉姆兰法案这个权宜之计有间接的影响。实际上,市场体系迅速扩张的两个弱点由于战争而被加重,并导致了使斯品汉姆兰法案得以出现的情势:(1)谷物价格波动的趋势,(2)针对这些波动而产生的骚乱所引发的极为有害的后果。刚开放不久的谷物市场,很难经受住战争和封锁威胁所产生的压力。谷物市场也无法抵抗经常性骚乱导致的恐慌,与传统时期相比,这种骚乱获得了显著的重要性。在所谓的“规制体系”中,“有秩序的骚乱”曾被中央权威或多或少地当作地方匮乏程度的指示器而被仁慈地处置;现在它被贬斥为匮乏的原因,被当作对整个共同体、而不仅仅是对穷人的经济威胁。阿瑟·杨发表了一个关于“针对食物高价供给形成的骚乱的后果”的警告,汉娜·摩尔也在她的一首布道诗中传播了同样的观点,这首诗的题目叫做“骚乱,或者,半片面包要比没有好”(要用“皮匠歌唱时”的调子来唱)。她对家庭主妇们的回答仅仅是以押韵诗句的形式重复了杨在一次虚构的对话中的意思:“‘我们应该保持安静,直到饿死吗?’非常肯定,你们不该这样——你们应该抱怨;但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抱怨和行动,即以不加重我们感知到的这种罪恶为限。”她坚持,“如果我们远离骚乱”,就不会有任何饥饿的危险。因为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谷物的供应对恐慌高度敏感。而且,法国大革命赋予骚乱以一种威胁性意涵,哪怕骚乱是温和有秩序的。尽管对工资上涨的恐惧毫无疑问是斯品汉姆兰法案的经济原因,但我们还是可以说,一旦将战争考虑进来,此一情势的意涵就更多的是社会的和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

2. 威廉·杨爵士与安置法的松弛。

两个激烈的济贫法措施可以追溯到 1795 年:斯品汉姆兰法案和“教区农奴制”的放松。很难相信两者的同时发生纯属巧合。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它们的效应是针锋相对的。后者倾向于使劳动者可以流动地去寻找就业机会,而前者的效果则是削减流动的动力。如果用人口流动研究中有时会用到的“推”、“拉”这样的术语来说,在外地“拉”力增加的同时,家乡的“推”力减少了。可能伴随 1662 年安居法的修改而出现大量乡村劳动者居无定所的危险,就这样被斯品汉姆兰法案缓解了。从济贫法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两种措施很明显是互补的。因为 1662 年法案的松动可能会导致当初通过该法案时所试图避

免的那种风险,即穷人会蜂拥而至“待遇比较好”的那些教区。如果不是有了斯品汉姆兰法案,这种情况可能早已发生了。当时人们极少提到这种关联,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甚至1662年法案当年适用时都没有经过公共讨论。不过这种信念肯定在威廉·杨爵士的头脑中存在过,因为他曾两次把这两个措施放在一起倡议。在1795年,他鼓吹修正安居法,而他也是1796年法案的动议者之一,这个法案将斯品汉姆兰原则整合进法律体系。而在这之前的1788年,他也曾倡议过这两项措施而未果。当时他曾与1795年相同的措辞提议取消安居法,并与此同时倡议一种旨在建立某种生存工资(living wage)的济贫措施,这种工资的三分之二由雇主提供,三分之一由济贫基金(the rates)支付(Nicholls, *History of the Poor Law*, Vol. II)。然而,还需要另一次严重歉收加上法国战争所造成的困境,才能让这些原则得到认可。

3. 城镇高工资对乡村共同体产生的影响。

城镇的“拉力”导致了乡村工资的上升,并同时倾向于吸干乡村的农业劳动力储备。在这两个紧密相连的不幸中,后一个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相对充足的劳动力储备对农业产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在农忙的春季和十月所需要的人手比在闲散的冬季所要的多许多。于是,在结构有机的传统社会中,能不能得到这样一个劳动力储备并不仅仅取决于工资水平,而毋宁是取决于人口中比较穷困的那一部分人的身份制度环境。在几乎所有已知的社会中,我们都能发现法律上或者习俗上的安排,让乡村劳动力处在地主的掌控之下,以便在劳力需求的高峰期利用它。身份让位于契约,这就是城镇工资上涨在乡村中造成的情势的症结所在。

在工业革命之前,乡村具有重要的农业劳力储备:存在着家庭和村社工业,让一个劳力在冬季有事可做,而到了春季和秋季,他和他的妻子则可以到田野中从事农活。安置法的存在,使穷人处于实际上的农奴状态,从而依附于地方上的农场主。还有许多其他形式让济贫法得以使定居劳动者成为可张可弛地加以利用的工人,诸如济贫补贴、给劳动力安排住宿(billeting)的制度或者跑街用工(roundsmen)制度。按照许多工业济贫所(Houses of Industry)的规章,赤贫者不仅可以被任意地加以残酷惩罚,而且实际上这种惩罚可以是秘密的;有时寻求救济的人可能会被逮捕并投入济贫所,只要有权在白天强制进入其住所的当局发现他“处于匮乏中,并且应该被救济”(31 Geo. III. c. 78)。这些济贫所中的死亡率是很吓人的。在这一点之外,再加上雇工或北方落后边境居民的环境条件——他们的工资是用实物支付的,而且必须在任何需要

的时候在领主的田野上帮忙——以及伴随着连带紧密的村舍和不稳定的土地租期而来的多重依赖,人们才能领会,乡村雇主手中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一支潜在的、由顺良的劳力组成的后备军。所以,在工资问题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农业劳动力储备的维持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时期可能会有所不同。尽管斯品汉姆兰法案的引入是与农场主对工资上涨的恐惧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补贴制度在农业萧条的后期(1815年之后)的迅速扩散很可能也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但农场主们在30年代早期几乎异口同声地坚持要保留补贴制度,原因并不是因为害怕工资上涨,而是出于对储备随时可动用的劳动力的关切。但是,在任何时期,这后一种考虑都不可能完全不在他们的头脑中,特别是在那个非同寻常的长期农业繁荣阶段(1792—1813),谷物的平均价格扶摇直上,远远超过了劳动价格的上涨。斯品汉姆兰背后的持久性因素不是工资,而是劳动力供给。

努力区分这两组动机的做法看起来有些矫情,因为通常我们可以预期,工资的上升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供给。但在有些情况下,确实有积极的证据表明,两种关切中到底是哪一种在农场主的头脑中占据主要地位。

首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定居穷人(resident poor)的在外就业,也为农场主所敌视,因为这使临时性农事雇用劳动力的难度增大了。1834年报告中的一个证人控告说,定居穷人“外出去捕鲱鱼和鲭鱼,每周挣的钱多达一英镑,却仍将其家庭丢给教区抚养。回家后他们被送进监狱,但他们全不在意,获释后又外出从事此类收入丰厚的工作……”(p. 33)。他抱怨道,这就是“农场主们经常无法找到充分数量的劳动力来从事春耕秋收工作的原因”(Henry Stuart's Report, App. A, Pt. I, p. 334A)。

其次,存在着至关重要的租地分配(allotment)问题。农场主们一致认为,任何东西都不如让人们自己租有一小块土地那样能让他和他的家庭维持不坠入被救济状态。然而,即使济贫的沉重负担也不能诱使他们同意任何形式的针对穷人的小租地分配,因为这可能使定居穷人较少依赖于临时性的农场工作。

这一点值得注意。直到1833年,农场主阶层还在麻木地要求保留斯品汉姆兰。下面是他们对济贫法委员会委员报告的引用:补贴制度意味着“便宜的劳动力,迅速的收割”(Power)。“没有补贴制度的话,农场主就几乎无法继续耕种土地”(Cowell)。“农场主喜欢的是,他们的雇工应该从济贫簿上得到收入”(J. Mann)。“我认为,特别是大农场主,他们不希望它们(济贫线)被削减。只要济贫线岿然不同,他们就总能在有额外需要的时候得到人手,而当天

292 下起雨来,他们则可以将他们再次扔给教区……”(一个农场主的证词)。教区代表“反对任何会导致劳动者独立于教区扶助的措施,通过将其限制在教区范围中,使其总是能够在有紧急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他们宣称“高工资和自由劳动者将把他们压垮”(Pringle)。他们麻木地反对所有赋予穷人以小块租地的建议,因为这将使穷人变得独立起来。使穷人免于饥馑、保有体面和尊严的小块租地,同时也会使他们获得独立并摆脱后备军的地位,而这种后备军正是农业产业所需要的。马金迪(Majendie),一个小块租地分配制度的鼓吹者,认为1/4英亩的面积比较合适,因为“地主害怕劳动者变得独立起来”。帕尔(Power),鼓吹租地分配的另一个朋友,也肯定了这一点。他说,“农场主们广泛反对引入租地分配制度。他们嫉恨自己的占有面积被缩减。为了弄到肥料,他们将被迫走更多的路;他们反对劳动者独立性的增长。”奥基登(Okeden)建议的土地分配面积是1/16英亩,他说,这是因为“劳动者花费在这个面积租地上的时间与他们在家庭工业中花费在纺轮和纺纱杆、梭子和编织针上的时间差不多正好相等”!

这让我们很难怀疑农场主阶层眼中补贴制度的真正功能,就是保证在任何时候都能动用由定居的穷人组成的农业后备劳动力。顺便提及,通过这种方式,斯品汉姆兰创造了农村人口过剩的假象,但是实际上这种过剩并不存在。

4. 工业化城镇中的补贴制度。

斯品汉姆兰法案首先是被设计来缓解乡村状况的措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应用仅局限于农村(villages),因为市场化的城镇,同样也属于乡村(countryside)。1830年代早期,在典型的斯品汉姆兰地区,绝大多数城镇已经引入了补贴制度。例如,从人口是否过剩的角度被分类为“好”的赫里福郡,有六个或超过六个的城镇都承认采取了斯品汉姆兰措施(四个“明确地”,四个“大致上”),而“不好”的苏塞克斯郡的情况是,十二个报告镇中,在严格意义上,九个采取了斯品汉姆兰措施,而另外三个没有。

北部和西北部工业城镇的情况当然与此很不相同。截至1834年,城镇中的依赖性穷人要比在乡村中的少很多,甚至在1795年之前,制造业的临近就已经倾向于大量制造赤贫者。在1789年,约翰·豪利特主教(the Rev. John Howlett)令人信服地驳斥了“这种流行的错误看法,即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制造业城镇中,穷人的比例要比农村教区中的为高。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Annals of Agriculture, v, XI, p. 6, 1789)。

非常不幸的是,人们并不确切知道新兴工业化城镇中的情况。济贫法委

员会的委员们似乎被据说存在的、由斯品汉姆兰措施在制造业城镇中扩展而形成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所困扰。他们承认，“北方诸郡最少被它感染，”不过他们还是宣称，“即使在城镇中它也是非常可怕的危险”。事实却很难与之相符。确实，在曼彻斯特或者欧德汉姆(Oldham)，救济有时会给予那些有全职工作的健康人。所以亨德森(Henderson)写道，在普雷斯顿地方纳税人的集会上，有个赤贫者起来发言，他“已经得到教区的照顾，可是他的周工资却从一镑降至十八先令”。像索尔福德(Salford)、帕蒂汉姆(Padiham)和尤尔瓦斯通(Ulverston)这样的城镇同样也被归入那些“系统地”实践工资补助措施的城镇类别；同样，维甘(Wigan)在织工和制钉工方面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在诺丁汉，袜子以低于最初成本的价格销售，制造商的“利润”显然来自济贫基金对工资的补贴。在对普雷斯顿的报告中，亨德森其实已经通过他的心眼(his mind's eyes)看到了这个邪恶的制度“悄悄地溜了进来，并使谋取私利成为它的保护对象”。根据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此一制度之所以在城镇中的应用相对少一些，仅仅是“因为制造业资本家在济贫费支付者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他们不像乡村中的农场主那样对教区代表有影响力”。

无论从短期而言这一看法多么正确，从长期看，工业资本家们拒绝普遍接受补贴制度的原因还有另外几个方面。

一个是赤贫劳动者的低效率。棉纺工业主要是通过计件工作或者任务工作(task work)来运转的。如今的情况是，即使在农业中，“那些退化了的和低效的教区补贴领取者”干起活来也是如此糟糕，以致于“他们中的四五个才抵得上一个任务工作者”(Select Committee on Laborers' Wages, H. of C. 4, VI, 1824, p. 4)。济贫法委员会报告评论说计件工作也能与斯品汉姆兰措施相兼容，从而并不必然会损害“制造业劳动者的效率”。隐含的意思是说，农业劳动者的低工资并不意味着廉价劳动，因为劳动者的低效率可能会抵消甚至超出他的劳动对雇主而言的低价格。

使企业家反对斯品汉姆兰体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可能会导致出现以低得多的工资成本进行生产的竞争者，因为有工资补助。农场主可以对这种威胁无动于衷，因为他是在未受限制的市场上展开销售的；但城市工厂主则会被这种威胁所困扰。济贫法委员会报告论证说：“一个马克莱斯菲尔德(Macclesfield)制造业主可能会发现，他被低价倾销所打垮，这种倾销是艾塞克斯郡的济贫法管理不当所造成的结果。”威廉·坎宁安看到了1834年法案的重要性在于它对济贫法管理的“全国化”实施，由此消除了向全国市场发展道

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

294 对斯品汉姆兰的第三个反对原因，并且是资本家圈子里权重最大的一个，在于它倾向于阻滞“大量懒惰的剩余劳动者”(Redford)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到了1820年代末，城市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多尔蒂(Doherty)的工会造成了大规模的动荡；这是欧文运动的开始，它导致了英格兰历史上空前的罢工和强制停工(lock-outs)。

所以，从雇主的立场看，长期而言，有三个强有力的原因来反对斯品汉姆兰：它对劳动生产率的破坏性影响；它倾向于在全国不同地区形成成本差异；它助长了在乡村中形成“劳动力的一潭死水”(Webb)，并由此助长了城市工人对劳动力进行垄断的倾向。当然，对个体雇主而言，甚至是对一个地方性雇主群体而言，对这些条件中任何一个的考虑都不会具有多大的权重。他们可能会轻易地因低廉劳动成本而动摇，这种低成本不仅可以用来确保利润，也可以用来与其他城镇的制造业主竞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发现能使孤立的雇主个体或群体受益的东西却对他们集体造成了危险时，作为一个阶级的企业家将会采取十分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正是30年代补贴制度向北方工业城镇的扩散——尽管是以一种削弱了的方式——才凝聚了对斯品汉姆兰的反对意见，并最终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改革。

有证据表明，这或多或少是一项有意识的政策——在城镇里建立起一支产业后备军，以便应对经济活动中的剧烈波动。正如乡村当局不喜欢高工资而喜欢高救济一样，城市当局也不情愿将非定居赤贫者赶回他们的家乡去。在乡村雇主和城市雇主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旨在争夺后备军的竞争。只有在经济萧条严重而漫长的1840年代中期，以高额济贫费为代价来支撑劳动力后备军的做法才变得不切实际。但即使在那时，乡村的和城市的雇主也以类似的方式行动：工业化城镇开始大规模遣返穷人，与此同时，地主们的“清乡运动”也开始了，两者的目的相同，都是减少定居穷人的数量(参见Redford, p. 111)。

5. 城镇相对于乡村的优先性。

根据我们的假定，斯品汉姆兰乃是乡村共同体在面临由城市工资水平上升所代表的威胁时所采取的一场保护运动。这中间就涉及了在商业周期中，城镇相对于乡村的优先性。至少有一个例子——1837—1845年的萧条——让我们能够看清这一点。据1847年进行的一项细致的统计调查显示，萧条始于西北工业城镇，然后蔓延至农业诸郡，而且后来的复苏也是先从工业城镇开

始的。数据显示：“压力最先落在制造业地区，而最后从农业地区移除。”在这份调查中，制造业地区由人口数为 201,000(584 个济贫联盟)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西区(West Riding)来代表；而农业区则由诺森伯兰郡、诺福克郡萨福克郡、剑桥郡、巴克斯(Bucks)郡、赫特福德郡、博克斯(Berks)郡、威尔特郡和德文郡所组成，人口是 208,000(同样是 584 个济贫联盟)。在制造业地区，恢复增长始于 1842 年，此时赤贫者数量增长率从 29.37% 开始下降到 16.72%，而在接下来的 1843 年则变成了绝对下降，下降率达到 29.80%，1844 年下降率是 15.26%，1845 年又下降了 12.24%。与这种发展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地区从 1845 年才开始经济回升，这一年赤贫率才下降了 9.08%。在每一项统计中，济贫支出对于人口数的比例都逐郡逐年地经过了测算(J. T. Danson,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U. K. , 1839—1847,” *Journ. of Stat. Soc.* , Vol. XI, p. 101, 1848)。

6. 乡村中的人口不足和人口过剩。

在整个欧洲，英国是唯一一个城乡劳动管理相统一的国家。像 1563 年的或者 1662 年的法令在乡村和城市教区一视同仁地推行，治安法官们在全国范围内以相同的方式执行法律。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在于乡村的较早工业化，也在于城市工业化的迅速跟上。结果，城乡之间就不像在大陆上那样存在管理上的断裂。反过来这又解释了为什么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显得特别容易。这样，就避免了大陆人口状况的两种最为不幸的特征——即，乡村由于向城市流动而形成的突发性人口不足，以及这种流动的不可逆转性，这种不可逆转性导致了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的那些人从此变成了无根的人。脱离土地(landflucht)是对这种灾难性的乡村耗竭的指称，自从 19 世纪的后半叶以来，这种耗竭一直是中欧农业社区的梦魇。与此相反，在英格兰，我们发现了人口在城乡雇用之间“振荡”的现象。看起来似乎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处在一种悬浮状态中，这种状况使得在国内迁徙运动变得难以随之发生，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同时，只要我们还没忘记，这个国家的城乡布局和无处不在的港口，使得远距离移民变得没什么必要，那么，下述事实就变得十分容易理解了：济贫法管理能够轻松调整，以适应建立全国性劳动组织的需要。乡村教区常常支付户外救济给那些在不远的镇上有工作的非定居穷人，把巡回救济金(round relief money)送到他们的住所；另一方面，制造业城镇，经常向在本城镇没有住所的定居穷人支付救济金。像 1841—1843 年那样由城市当局进行的大规模遣返运动只是例外。根据雷德福(Redford)的研究，在这次运动中从

19个北方制造业城镇遣返的12,628个穷人中,只有1%的人在那9个农业地区拥有自己的住所(如果丹森[Danson]所选的那9个“典型的农业区”被雷德福自己选的9个郡所替换掉的话,结果也只有微小的不同,即从1%变为1.3%)。正如雷德福所表明的那样,长距离流动非常少,大部分的劳动力后备军都控制在雇主们的手中,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在于乡村和制造业城镇十分自由的救济方式。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城镇和乡村会同时出现“人口过剩”,而实际上,在劳力需求的高峰期,兰开夏郡的制造业雇主不得不大量输入爱尔兰工人,而农场主们则断言,如果有任何乡村赤贫者被引诱出门打工,那么庄稼收割就无法及时完成。(“附加笔记”结束)

有关贫困和老济贫法的同时代文献

Acland, *Compulsory Savings Plans* (1786).

Anonymous, *Considerations on Several Proposals Lately Made for the Better Maintenance of the Poor*. With an Appendix (2nd ed., 1752).

Anonymous, *A New Plan for the Better Maintenance of the Poor of England* (1784).

An Address to the Public from the Philanthropic Society, instituted in 1788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mes and the Reform of the Criminal Poor (1788).

Applegarth, Rob., *A Plea for the Poor* (1790).

Belsham, Will, *Remarks on the Bill for the Better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oor* (1797).

Bentham, J., *Pauper Management Improved* (1802).

——, *Observation on the Restrictive and Prohibitory Commercial System* (1821).

——, *Observations on the Poor Bill, introduced by the Right Honorable William Pitt*; written February 1797.

Burke, E., *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 (1795).

Cowe, James, *Religious and Philanthropic Trusts* (1797).

Crumple, Samuel, M. D., *An Essay on the Best Means of Providing Employment for the People* (1793).

Defoe, Daniel, *Giving Alms No Charity, and Employing the Poor a*

Grievance to the Nation (1704).

Dyer, George, *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enevolence* (1795).

——, *The Complaints of the Poor People of England* (1792).

Eden, *On the Poor* (1797), 3 vols.

Gilbert, Thomas, *Plan for the Better Relief and Employment of the Poor* (1781).

Godwin, William, *Thoughts Occasioned by the Perusal of Dr. Parr's Spiritual Sermon, Preached at Christ Church April 15, 1800* (London, 1801).

Hampshire, *State of the Poor* (1795).

Hampshire Magistrate (E. Poulter), *Comments on the Poor Bill* (1797).

Howlett, Rev. J., *Examination of Mr. Pitt's Speech* (1796).

James, Isaac, *Providence Displayed* (London, 1800), p. 20.

Jones, Edw., *The Prevention of Poverty* (1796).

Luson, Hewling, *Inferior Politics; or, Considerations on the Wretchedness and Profligacy of the Poor* (1786).

M'Farlane, John, D. D., *Enquir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Martineau, H., *The Parish* (1833).

——, *The Hamlet* (1833).

——, *The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Peace* (1849), 3 vols.

——, *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32—1834), 9 vols.

Massie, J., *A Plan ... Penitent Prostitutes. Foundling Hospital, Poor and Poor Laws* (1758).

Nasmith, James, D. D., *A Charge, Isle of Ely* (1799).

Owen, Robert,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Relief of the Manufacturing and Labouring Poor* (1818).

Paine, Th., *Agrarian Justice* (1797).

Pew, Rich., *Observations* (1783).

Pitt, Wm. Morton, *An Address to the Landed Interest of the defic. of Habitation and Fuel for the Use of the Poor* (1797).

Plan of a Public Charity, A (1790), "On Starving", a sketch.

First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 and Increasing the Comforts of the Poor.

Second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 (1797).

Ruggles, Tho. , *The History of the Poor* (1793), 2 vols.

Sabatier, Wm. , Esq. , *A Treatise on Poverty* (1797).

Saunders, Robert, *Observations*.

Sherer, Rev. J. G. , *Present State of the Poor* (1796).

Spitalfields institution, *Good Meat Soup* (1799).

St. Giles in the Field, Vestry of the United Parishes of, Criticism of "Bill for the Better Suppor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oor" (1797).

Suffolk Gentleman, *A Letter on the Poor Rates and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1795).

[Townsend, Wm.],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 1786 by A Well-Wisher of Mankind*.

Vancouver, John, *Causes and Production of Poverty* (1796).

Wilson, Rev. Edw. ,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oor* (1795).

Wood, J. , *Letter to Sir William Pulteney* (on Pitt's Bill) (1797).

Young, Sir W. , *Poor Houses and Work-houses* (1796).

一些当代作品:

Ashley, Sir W. J. ,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1931).

Belasco, Ph. S. , "John Bellers, 1654—1725," *Economics*, June, 1925
——, "The Labour Exchange Idea in the 17th Century," *Ec. J.* , Vol. I, p. 275.

Blackmore, J. S. and Mellonie, F. C. , *Family Endowment and the Birthrat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Vol. I.

Clapham, J. H. ,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 I, 1926.

Marshall, Dorothy, "The Old Poor Law, 1662—1795", *The Ec. Hist. Rev.* , Vol. VIII, 1937—1938, p. 38.

Palgrave's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Art. "Poor Law", 1925. 298

Webb, S. and B.,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Vol. 7—9, "Poor Law History", 1927—1929.

Webb, Sidney, "Social Movements," *C. M. H.*, Vol. XII, pp. 730—65.

10. 斯品汉姆兰与维也纳

本书作者最初被吸引去研究斯品汉姆兰及其对古典经济学家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于奥地利在战后的发展中形成的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社会和经济情势。

在这里,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环境中,一个社会主义的自治市建立起了一个被经济自由主义者剧烈围攻的政权。毫无疑问,这个自治市所施行的一些干预主义政策与市场经济的机制是不相容的。但仅仅经济上的论证并不能穷尽一个首先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问题的完整意涵。

关于维也纳的主要事实就是以下这些。在1914—1918年战争之后15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奥地利的失业保险得到公共基金的大量补贴;住房租金被固定在先前水平的极小部分上,并且维也纳的市政当局在非营利的基础上修建了大量的廉租房,通过税收来取得这些投资所必要的资本。不仅没有工资补助,而且全面而有节制的社会服务的提供也可能已经在实际上使工资过分下跌,幸好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会运动得到了广泛扩展的失业救济强大的支持。从经济上说,这样一个体系当然是反常的。被限制到无法获利的水平的房租,与现存的私人企业体系是不能兼容的,特别是在建筑业。而且,在早期,贫困国家中的社会保护总是会干扰稳定通货的努力——通胀主义政策与干预主义政策是同进共退的关系。

最终,与斯品汉姆兰一样,维也纳在由纯经济主张强有力支持的政治力量的攻击下屈服了。1832年的英格兰和1934年的奥地利的政治动乱是被设计来从保护主义干涉中解放劳动力市场的。不管是绅士们的村庄还是工人阶级的维也纳,都不能使自己脱离他们所处的包围圈。

不过很明显,两个干预主义时期之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别。1795年的英国村庄,需要被保护来免除经济进步——城市制造业的巨大进步——所造成的混乱;而1918年维也纳劳动阶级需要被保护来免除的是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后果,这种衰退是战争、失败和工业混乱造成的。斯品汉姆兰最终导致的是劳动组织的危机,并由此打开了一条通向一个繁荣新时代的道路;而奥地利的家园保卫战(the Heimwehr)的胜利却成为国家和社会总体崩溃的一部分。

299 我们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这两种干预的文化和道德后果的巨大差异：斯品汉姆兰是企图阻止市场经济的到来，而维也纳则是试图完全超越这样一种经济的试验。如果说斯品汉姆兰对普通大众造成了真正的灾难，那么维也纳试验则成就了西方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文化胜利之一。1795 这一年导致劳动阶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贬损，他们无法获得工业劳动者的新地位；1918 年则在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人阶级中开始了一个同样史无前例的道德上和智识上的提升，这个阶级在维也纳制度的保护之下，挺住了严重的经济混乱的退化影响，达到了一个任何工业社会中的大众都不曾超过的水平。

很清楚，这应归于社会的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但那些教条主义经济学家可曾正确地抓住干预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特征？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当时认为，维也纳政权是另一个“对济贫法的误用(maladministration)”，另一个“补贴制度”，是古典经济学家要无情扫除的对象。但其实不正是这些思想家自己被斯品汉姆兰所造成的相对持久的状况所误导了吗？他们在与未来有关的方面往往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深刻洞见帮助形成了未来本身，但在关于他们自己的时代的问题上，他们是完全错误的。现代研究业已证明，敏于实际判断的名声其实是错误地被赋予了他们。马尔萨斯完全误读了他那个时代的需求；倘若他那关于人口过剩的有偏向的警告对那些他予以私下告诫的新娘们产生了影响的话，那么“经济增长就会被枪杀在半路上”，T. H. 马歇尔如是说。李嘉图也对通货争论中的诸事实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错误地估计了英格兰银行的角色，同时也没能抓住通货贬值的真正原因，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贬值主要是由政治性支付和流通困难造成的。假如他关于金币报告(Bullion Report)的建议被采纳，那么英国就会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失败，“帝国现在就不会存在了”。

正是这个原因，维也纳试验以及它与斯品汉姆兰的相似——这种相似让一些人回到了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让另一些人对它们颇有疑虑。

第八章

11. 为什么不采用惠特布雷德议案？

看起来，斯品汉姆兰政策的唯一替代方案是 1795 年冬季的惠特布雷德议案(Whitbread's Bill)。它主张扩充 1563 年的工匠法，比如包括对年度最低工资的评估规定。它的提案者说，这样一种措施一方面将会维持伊丽莎白工

资评估的原则,另一方面,不仅规定最高工资,也规定最低工资这一举措,将能阻止乡村中发生饥馑。毫无疑问,它将能满足紧急状况下的需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诸如萨福克郡的议员是支持这个议案的,尽管他们的治安法官们在阿瑟·杨也出席了的一次集会上认可了斯品汉姆兰原则;对普通人的头脑而言,这两种措施之间的差异不可能很大。这并不奇怪。130年后,当蒙德计划(1926, Mond Plan)建议使用失业基金补贴工业中的工资时,公众发现自己还是很难理解对失业的补助与对就业者的工资补贴之间的决定性经济差异。

300

但是,在1795年,要作出的选择是在最低工资和工资补贴之间产生的。两种政策间的区别可由如下途径而清楚地分辨出来,即把它们与同时取消1662年的安置法联系起来考虑。安置法的取消创造出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其主要目的是允许工资“找到自己的价格水平”。惠特布雷德最低工资议案的倾向是与取消安置法的倾向相反的,而斯品汉姆兰法案的倾向却并非如此。通过扩展1601年济贫法而不是延伸1563年工匠法(如惠特布雷德所建议的那样)的应用,地主们得以仅仅在乡村范围内重归家长制,并且还是在对市场干预最小的情况之下完成的这种回归,尽管此举实际上使市场的工资法定机制完全不起作用。以下这一点,即这种所谓的对济贫法的应用实际上是对伊丽莎白式强制劳动原则的彻底废弃,从来没有得到公开承认。

在那些斯品汉姆兰法案的发起者的头脑中,实际的考虑是至高无上的。可能曾是该法案的支持者的爱德华·威尔逊牧师(The Rev. Edward Wilson)——温莎市的教士、波克夏郡的治安法官——在他的一本明确宣示自由放任立场的小册子中这样表达他的观点:“劳动,就像被放到市场上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只要没有法律的干预,在任何时代都能找到它自己的价格。”实际上,对一个英国的治安法官而言,这样说可能更为合适;恰恰相反,劳动从来都没有在缺少法律干预的情况下发现自己的价格。但,威尔逊教士继续说道,数据显示,工资的增长并不像谷物价格上涨速度那么快。由此他可敬地让自己顺从于地方长官的这种考虑:“应该给穷人一个救济额度的计量标准”。对一个有丈夫、妻子和孩子的家庭,一周的救济加总起来是五先令。推销他的这本小册子的“广告”这样说:“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在去年5月6号纽百利(Newbury)召开的郡会议上提出过”。如我们所知,地方长官比这位教士走得还要远:它全体通过了一个五先令六便士的救济量。

第十三章

12. 迪斯雷利的“两国度”与有色种族的问题

是有一些作者坚持殖民问题与早期资本主义问题之间的相似性。但他们未能在另一方面坚持这种类比,也就是说,通过把英国一个世纪之前的贫苦阶级描绘为实际所是的那样——像他们这个时代的解体的、退化的土著那样——来获得对他们生存境遇的洞见。

这一明显的类同被忽视的原因在于我们对自由主义偏见的信仰,这种偏见把过分的关注倾注在一种本质上是非经济性的进程的经济方面。从本质上说,不管是今天某些殖民地区的根本性退化,还是一个世纪之前劳动大众与之类似的非人性化,都不是一种经济性的过程。

301

(a) 具有破坏性的文化接触主要并非是一种经济现象。

梅尔(L. P. Mair)说,绝大多数土著社会现在都处在一种迅速并且被迫的转型过程中,只有革命所造成的剧烈变迁堪与之相比。尽管入侵者的动机确切无疑是经济性的,并且初民社会的崩溃通常也是其经济制度被毁所造成的,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新经济制度未能被消化于土著文化,由此,土著文化只能在没有内在一致的别的价值体系来代替的情况下解体。

在西方制度的各种破坏性倾向中,第一个就数“一个广袤地区的和平”,它粉碎了“氏族生活,家长制权威,年轻人的军事训练;它几乎禁止氏族和部落的流动”(Thurnwald, *Black and White in East Africa; The Fabric of a New Civilization*, 1935, p. 394)。“战争必然一直赋予土著生活一种敏感,这种敏感在这些和平时代可悲地缺失了……”争斗的废弃导致了人口的下降,因为战争导致的伤亡非常有限,但战争的缺失意味着很多习俗和仪式不再被激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乡村生活的不健康的沉闷和冷漠(F. E. Williams, *Depopulation of the Suan District*, 1933, “Anthropology” Report, No. 13, p. 43)。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著在其传统文化环境中那“活力四射的、生机勃勃的、激动人心的存在”(Goldenweiser, *Loose Ends*, p. 99)。

用古登威瑟(Goldenweiser)的话说,真正的危险在于一种“文化的间隔(culture in-between)”(Goldenweiser, *Anthropology*, 1937, p. 429)。关于这一点,学者之间有着一致的看法。“旧的规范在消亡,而新的行动指南并没有被提供出来”(Thurnwald, *Black and White*, p. 111)。“试图维系一个共同

体——在其中,财富的积累被视作反社会行为——并将其整合于当代白人文化,这意味着试图调和两种无法兼容的制度”(Wissel in Introduction to M. Mead,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n Indian Tribe*, 1932)。“外来的文化承载者可能会在成功地消灭一种土著文化的同时,既未能消灭、也未能同化这种土著文化的承载者”(Pitt-Rivers, “The Effect on Native Races of Contact with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Man*, Vol. XXVII, 1927)。或者,用莱塞(Lesser)针对工业文明的另一个牺牲者的辛辣讽刺来说,“他们由作为波尼族的文化的成人而被化约为作为白人的文化的婴儿”(The Pawnee Ghost Dance Hand Game, p. 44)。

这种虽生犹死的状况并不能归因于通常理解的、以另一方受损为代价的一方受益意义上的经济剥削,尽管这种状况固然与下述事项的经济条件的变化紧密相关:土地租赁、战争、婚姻,等等,其中每一项都会影响大量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习惯、习俗和传统。当一种货币经济被强制引入西非的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时,导致土著人“无法购买用来取代不再生产的粮食的食物”的,并不是工资的不足,而是因为“任何别的人都没有可以向他们出售的剩余食物”这一事实(Mair, *An Af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34, p. 5)。他们的制度预设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序列;他们节俭,与此同时也没有市场头脑。“他们会在市场中货品过剩时与货品奇缺、商品走俏时索要相同的价格,与此同时他们会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旅行很长的距离来购买可节省一笔小钱的东西”(Mary H. Kingsley, *West African Studies*, p. 339)。工资的上升通常导致旷工。据说特旺特佩克地峡的萨巴特克(Zapotec)印第安人在工资是 50 分时只工作工资是 25 分时的一半时间。这个矛盾在英格兰工业革命早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302

关于人口变动的经济指标并不比工资指标对我们更有帮助。古登威瑟确证了里弗斯(Rivers)对美拉尼西亚人所作的著名观察:文化上被剥夺了的土著可能会“死于厌倦”。F. E. 威廉姆斯——他本人是一个传教士——写道,“心理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是很容易理解的。“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土著在面临死亡时可能会有的那种让人难忘的从容。”“对他从前所拥有的趣味和活动的限制好像对他的精神有致命的损害。其结果是土著的免疫力被破坏了,他变得很容易被任何疾病所侵袭”(前引书, p. 43)。这跟经济匮乏没有任何关系。“由此,人口极高的自然增长率既可能是文化活跃的征兆,也可能是文化退化的征兆”(Frank Lorimer, *Observations on the Trend of Indi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1)。

文化退化只有通过社会手段——这种手段与生活的经济标准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才能被阻止,比如恢复土地的部族占有,或者将土著共同体从资本主义市场手段的影响中隔离出来。“将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土地上分离开来是对他们最致命的打击。”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在1942年这样说道。1887年的总分配法案(The General Allotment Act)将印第安人的土地“个人化”了,由此导致的文化解体使印第安人失去了这片土地的四分之三,也就是9000万英亩。1934年的印第安重组法案(The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重新整合了部族土地,并通过重新激活其文化,而拯救了印第安共同体。

同样的故事可以从欧洲找到。土地占有的形式占据了人们注意力的中心位置,因为正是它们才是社会组织形成的直接基础。看起来属于经济冲突的现象——高昂的税收和租金,低廉的工资——几乎完全是种种伪装而已,殖民者的实际意图是引诱土著人放弃他们的传统文化,并由此迫使他们去适应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即为工资而劳动,并从市场上获取他们的生活所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部族,诸如卡菲尔人(Kaffirs)或者那些移居城市的部族,丧失了他们世代相传的美德,变成了好吃懒做的庸众、“半家养的动物”,在他们中产生了流浪者、小偷和妓女——后者是他们之前闻所未闻的职业——这种状况与1795—1834年之间英国那些被赤贫化了的人口中的多数情况没有什么两样。

(b) 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劳工阶级的人性退化是一种无法用经济方式衡量的社会灾变的产物。

早在1816年,罗伯特·欧文就从对他手下的劳工的观察中发现:“无论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工资,他们中的多数人必然陷入可悲的境地”(To the British Master Manufacturers, p. 146)。应该记住的是,亚当·斯密已经预期,被剥夺了土地的劳工将会失去所有的智识兴趣。穆法兰(M'Farlane)也预期“在普通大众中,关于书写和计算的能力将会日渐减少”(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p. 249—250)。一代人之后,欧文将劳工的退化归因于“幼年时期被疏于照顾”以及“过度劳累”,并由此导致他们“即使挣得了高工资,也会由于无知而无法妥善使用”。他自己付给他们低工资,并通过为他们创造人为的、全新的文化环境而提高他们的地位。从整体上说,人民中的多数所犯的邪恶,与那些由于文化联系的解体而堕落的有色民族所为的是一样的:懒散易怒、卖淫、盗窃、缺乏活力与自我约束、邋遢、劳动生产率不高、缺乏自尊心和耐

力。市场经济的扩散正在破坏乡村社会的传统肌理,它们包括:村庄共同体、家庭、土地占有的古老形式,以及在一个文化框架中支撑生活的习俗和标准。斯品汉姆兰所提供的保护只是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到 1830 年代,普通人所经历的社会灾变与今天卡菲尔人所经历的一样彻底。只有唯一的一个人,一个杰出的黑人社会学家,查尔斯·S. 约翰逊(Charles S. Johnson),倒转了种族堕落与阶级退化的类比,将其应用于后者:“在工业革命偶然地比欧洲其他地方更先进的英格兰,经济的剧烈重组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将陷入赤贫状态的儿童变成‘碎片(pieces)’,这种碎片正是后来的非洲奴隶将要变成的……而且对童奴制度的辩护也几乎与对奴隶贸易的辩护完全是一样的”(“Race Relations and Social Change.”In E. Thompson, *Race Relations and the Race Problem*, 1939, p. 274)。

索引

A

- Acland, John 296
Act of Settlement 安居法 82, 90, 92,
98-99, 109, 110, 142, 289-290
Africa 非洲 6, 19, 54, 63
colonies 殖民地 221
conditions of natives 土著状况 172
effect of white man on native culture
白人对土著文化的影响 165-166
exploitation of 剥削 166
Agrarian Society 农业社会 43
Agrarianism 平均地权论 197
Agriculture 农业 47, 70
Aid-in-rent 贫困补助 101
Aid-in-wages 工资补助 86, 92,
97-98, 106, 285
Algiers 阿尔及尔 6, 13
Allotments 租地分配 292
Allowance system in industrial towns 工
业化城镇中的补贴制度 292 ff.
Aluminium industry 铝工业 149
Andaman Islanders 安达曼岛 278
Angell, Norman 诺曼·安杰尔 198
Angoulême, Duc d' 丹格林公爵 5
Anti-Combination Laws 反结社法 85,
126, 219, 271
Anti-Corn Law Bill 反谷物法 144, 174
Antwerp 安特卫普 66
Applegarth, Robert 296
Apprenticeship 学徒期 90-91
Arnold, Thurman 瑟曼·阿诺德 155
Ashley, Sir William James 283, 297
Asia 亚洲 19

- Atwood of Birmingham 伯明翰的阿特伍
德 235
Australians (aborigines) 澳大利亚(土著
居民) 62
Austria 奥地利 5, 8, 13, 19, 24, 32,
154, 196, 197, 298
and currency 货币; 通货 26, 238
and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46, 249
and labour 工人, 劳动力 251
Austro-Hungary 奥匈帝国 183
Autarchist empires 专制帝国 24

B

- Babylonia 巴比伦 54, 280
Baghdad Railway 巴格达铁路 13
Balance of power 势力均衡 3, 6 ff, 17,
30, 249
bibliography 参考书目 272
and Bismarck 俾斯麦 19
and disarmament 裁军 22
and peace 和平 19
System 体系 8 ff., 23, 220, 269 ff.
Balkans 巴尔干地区 19, 222
Baltic States 波罗的海诸国 24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10, 27, 233
Bank of Exchange 交换银行 113
Banking: international 国际银行业 10 ff.
national 国内的 11, 13-14
in United States 在美国 237
See also Central Banking 参见中央银行
Barnes-Becker-Becker, 272
Barter, 71. See also Exchange 交易, 参见交
换
Trade, Markets 市场贸易

- Basra 巴士拉城 13
 Bauer, Otto 奥托·鲍尔 26
 Beer, Max 马克斯·比尔 287
 Belasco, P. S. 297
 Belgium 比利时 5, 6, 8
 and currency 通货 238
 Bellers, John 约翰·贝勒斯 110 ff., 115
 Belsham, Will 296
 Benedict, Ruth 鲁思·木尼迪克特 278
 Bentham, Jeremy 杰里米·边沁 88,
 111, ff., 122, 124 ff., 145—146,
 177, 189, 233, 285, 286, 296
 Bentham, Sir Samuel 萨缪尔·边沁爵士
 111
 Bergdama(tribesmen) 伯格达玛族(部落
 成员) 53
 Berkshire magistrates 伯克郡的地方长官
 82, 85, 88
 Berlin 柏林 24, 181
 Berlin, Congress of. *See* Congress of
 Berlin 柏林, 会议, 见柏林会议
 Birmingham 伯明翰 154
 Bismarck-Schönhausen 俾斯麦
 Prince Otto Eduard Leopold von, 19,
 26, 183, 222
 and Austria 奥地利 8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欧洲协同比 8
 and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213
 Blackmore, J. S. 297
 Blake, William 威廉·布莱克 102
 Blanc, Louis 路易斯·布朗 111, 113
 Bleichroeders 布莱切罗德斯家族 276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197, 199,
 251, 254—255
 Borkenau, Franz 191
 Bourbons 波旁王朝 271
 Bourse of Paris. *See* Paris, Bourse 巴黎
 证券交易所
 Brinkmann, C. 172, 189
 Bristol Corporation for the Poor 布里斯
 托尔济贫公司 111
 British Blue Book 254
 British Dominions 英国的自治领 270
 Brüning, John 约翰·布吕宁 237, 250
 Budapest 布达佩斯 24, 181
 Buecher, Carl 卡尔·布尤切尔 279, 280, 285
 Buell, R. L. 272
 Bulgaria 保加利亚 6, 24
 currency 通货 27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45, 249
 Bullion report 金币报告 299
 Burgesses 市民 67, 68
 Burke, Edmund 埃德蒙·伯克 88, 97,
 121 ff., 133, 232, 235, 270, 285,
 297
- ## C
- Cadiz, Spain 西班牙的卡迪兹城 5
 Calvin, John 约翰·加尔文 116
 Canada 加拿大 221
 Cannan, E. 129
 Canning, Charles John 查尔斯·约翰·
 坎宁 97, 222, 269, 274
 Capital 资本 16, 25, 38, 69, 137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6, 29, 84, 102,
 166, 168, 175, 221, 231, 233, 245, 251
 in England 在英国 188
 in France 在法国 188
 Carlyle, Thomas 托马斯·卡莱尔 102
 Carr, E. H. 213, 272
 Cartels 同业联盟 7, 213
 Cary, John 约翰·卡里 111
 Central banking 中央银行 201 ff., 219
 Central Europe 中欧 24, 192, 196, 224
 Centralized State 中央集权化的国家 69
 Chaddar 恰达 167
 Chaga 轧伽 65
 Chamberlain, Joseph 约瑟夫·张伯伦 154
 Chamberlain, Neville 内维尔·张伯伦 254
 Change 变迁 35, 39, 158 ff., 245 ff.
 to one party system 一党制 252
 Charles I, King 国王查尔斯一世 233
 Charles II, King 国王查尔斯二世 233
 Chartism 宪章主义 234
 Chartist Movement 宪章运动 180 ff., 233
 Child labour 童工 121, 164, 179—180, 303
 Chimney Sweepers' Act 烟囱清扫者法案
 152
 China 中国 6, 54, 280
 Chrestomathic Day School 选读日校 126
 Christian Socialists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249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33, 177, 180, 268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26
 City of London 伦敦 14, 27, 221, 253,
 274

- City-states 城邦 6
- Civilization 文明 3, 4, 21, 31, 245, 257 ff., 265
- Clapham, J. H. J. H. 克拉彭 43, 97, 102, 272, 287, 297
- Class interest 阶级利益 158 ff., 259
- Classes 阶级 105—106, 120, 138—139, 158—159, 182
- See also Middle class 参见中产阶级
- Clergy 教士僧侣, 神职人员 194—195
- Clive, Lord (Robert) (罗伯特·) 克莱夫勋爵 222
- Cloth trade 纺织品贸易 68
- Cobbett, William 威廉·科贝特 234
- Cobden, Richard 理查得·科布登 192
- 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 189
- Cole, G. D. H. 176, 226
-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 151, 155, 161, 169—170, 283, 287
- “Collectivist Conspiracy” “集体主义阴谋” 156, 163, 213, 223
- Collectivization of farms 农业集体化 255
- Colleges of industry 产业团会 110 ff.
- Collier, John 约翰·科利尔 168, 302
- Colonial policy 殖民地政策 224
- Colonies 殖民地 221—225
- Coloured races 有色种族 300 ff.
- Comintern. See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 共产国际, 见共产国际会议
- Commerce between belligerents 交战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16—17
- Commercial revolution 商业革命 29, 69
- Commercial society 商业社会 43, 120
-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soil 土地商品化 188
- Commodity fiction 商品化虚构 75, 138, 204
- Commodity money. See Money, commodity 商品(实物)货币
- Commodity prices 商品价格 18, 190
- Common Law 普通法 73
- Commonwealth, British 共和政府(英国) 41, 99
- Communism. See Bolshevism 共产主义, 见布尔什维克主义
- Concert of Europe 欧洲协约国 8—10, 17ff., bibliography 参考书目 273
- Condorcet, Marie Jean, Marquis de 孔多塞 118
- Congress of Berlin 柏林会议 8
-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 第三国际代表大会 251
- Conscience, freedom of 261
- Constitution 宪法 233—234
- Constitutionalism 立宪主义 14, 233
- Consumers' Co-operatives 消费者合作组织 177
- Contagious Diseases Act 传染病法案 152
- Cooke, Edward 118
- Coolidge, Calvin 卡尔文·柯立芝 26
- Cooper, Alfred Duff 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 254
- Copyhold Acts 土地保有权法 189
- Corn Laws 谷物法 198
- Corn markets and prices 谷物市场和价格 289, 291
- Correspondence Societies 通信团体 127
- Corti, Egon Cæsar 埃贡·凯撒·科尔蒂 275
- Cotton industry 棉纺织工业 36, 39, 77, 97, 121, 142, 145
- Counter-revolutions 反革命 248
- Countryside, against town 乡村, 相对于城市 294—295
- depopulation and overpopulation 人口不足和人足过剩 295—296
- Cowe, James 296
- Cowell 291
- Credit 信用, 信贷 23, 199, 203, 240, 274
-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5, 17
- Crumple, Samuel 296
- Cunningham, William 威廉·坎宁安 77, 212, 272, 284, 287, 293
- Currency 通货; 货币 18, 24, 25, 143, 203, 206, 211, 216, 219, 223, 228, 235, 239—240
- depreciation 贬值, 跌落 27
- in Europe 在欧洲 199
- in Great Britain 在大不列颠 236, 242
- international 国际的 273
- restoration 重建 23
- stabilization 稳定性 148
- stabilization table 稳定性表格 275
- United States 美国 242
- See also Money 见货币
- Customs tariffs 关税壁垒 161, 213, 223,

226

Czech gold reserves 捷克的黄金储备 254

D

Danson, J. T. 295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88, 118

Davies, David 大卫·戴维斯 96

Dawes Plan 道斯计划 224, 252

Death 死亡 267

Debt Commission 债务委员会 15

Debtor governments 负债方政府 14

Decree of Muharrem 穆哈伦法令 15

Deflation 通货紧缩 203, 204, 241

Defoe, Daniel 丹尼尔·笛福 113 ff., 296

De Greef's Law 德·格里夫法则 270

Delos, Isle of 狄勒斯岛 56

Democracy 民主 126, 234, 235

Denmark 丹麦 5, 9

Denudation of forests 滥伐森林 193

Depopulation 人口减少 37

Depressions: Great Depression, 1873-1886
1873-1886年的大萧条 223,
225-226post-war, 1929 *et seq.* 战后的, 1929
年等 20, 208

Detroit 底特律 247

Dette Ottomane 小奥图曼国 15

Dicey, A. V. A. V. 戴西 146, 153,
174, 189, 286, 287

Dickens, Charles 查尔斯·狄德罗 102

Diderot, Denis 丹尼斯·狄德罗 88

Dieri (of Central Australia) (澳大利亚中
部的)迪埃里人 62

Diplomacy 外交 10

Disarmament 裁军 22, 23

Disarmament Conference 裁军会议 252

Disraeli, Benjamin, First Earl of Beaconsfield
本杰明·迪斯雷利 86, 174, 221

Doherty's Trade Unions 多尔蒂的工会 294

Drucker, Peter F. 180

Dust bowls 沙尘暴 193

Dyer, George 296

EEarle, Edward Mead 爱德华·米德·厄
尔 276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168, 222

Eastern Europe 东欧 24 ff.

Economic law 经济法 38, 128

Economic liberalism 经济自由主义 31,
35, 121, 132, 138, 141 ff., 148, 155
ff., 195, 209, 225-226, 239, 276,
280Economic Society. *See* Society 经济社
会, 见社会Economic systems 经济体系 17-18,
42 ff., 57 ff.

Economic theory 经济理论 129-132

Economics and politics separated 经济与
政治分离 259

Eden, Sir Frederick Morton 296

Egypt 埃及 5, 20, 53

and currency 货币 280

Eldon, Lord 艾尔顿勋爵 105

Elizabeth, Queen 伊丽莎白女王 222

Enclosure Act 圈地法 189

Enclosures 圈地运动 36 ff., 73, 98

Enemy property 敌对国财产 17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95, 102, 285England 英国 5, 13, 19, 32 ff., 153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势力均衡政
策 269-270

class government 阶级的政府 40

classes 阶级 91

constitutionalism 立宪 40

and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5, 246, 249

immigration of craftsmen 手工艺者的
移民入境 40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36 ff.

and the labour market 劳动力市场 81

Ministry of Health 卫生部 126

pauperism 贫穷 82 ff.

and the Poor Laws 济贫法 83

popular suffrage 大众选举权 181

population 人口 97, 115

social legislation 社会立法 152-153

social conditions 社会条件 94-95,
102-103, 302-303

trade wars 贸易战争 273

England, Bank of. *See*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Erosion 水水流失 193

Essential Works Order 基本工作秩序 264

Estonia 爱沙尼亚 25, 249, 251

Eulenberg, F. 19
 Europe 欧洲 188, 223, 231
 and food 食物 199
 and land 土地 192
 governments after World War I (table)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府(表格
 中) 274—275
 Exchange 交换, 交易 28, 64, 71. *See*
 also Barter.
 Exchanges 汇兑; 交易 202, 218, 238, 241
 Expansion 扩张 16
 Exploitation 剥削 168
 Exports 出口 221, 227

F

Factory inspection 工厂安全检查(制度)
 153
 Factory laws 工厂法令 223
 Factory system 工厂制度 78 ff.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30, 32, 245 ff.
 and Christianity 基督教 268
 and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
 教教堂 249
 Fay, S. B. 273
 Federal Reserve Board 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 27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美国联邦储备体
 系 211
 Feis, H. H. 费斯 10, 273, 276
 Fénelon 芬奈隆 269
 Fernandez, Juan 胡安·费尔南德斯
 118, 119
 Feudalism 封建制度 6, 17, 54, 90,
 188, 192, 195, 280
 abolished 被废除 72—73
 and famines 饥荒 167
 Finance. *See also Haute finance* 金融,
 见国际金融 10 ff.
 Fines and Recoveries Act 罚金与回收法
 189
 Finland 芬兰 24, 197
 and currency 通货 27
 and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45, 249, 251
 Firth, R. 64, 277, 279, 281
 "Flight of capital" "资本逃亡" 25
 Food 食物 194, 199
 Food prices 食品价格 94

Food supplies 食物供给 67
 Fourier, Francois Marie Charles 弗朗索
 瓦斯·傅立叶 110, 113
 Fox, Charles James 查尔斯·詹姆斯·
 福克斯 270
 France 法国 5, 7, 8, 19, 29, 153,
 222, 237
 and Bismarck 俾斯麦 19
 and currency 货币体系 24
 and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46, 250
 and Germany 德国 12, 226
 and liberal government 自由政府 25
 off the gold standard 放弃金本位制 148
 and the Ruhr 鲁尔(联邦德国一地区)
 251
 and the trade wars 贸易战争 273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 5
 Franqui, Emile 爱弥尔·弗朗科克 237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帝 17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18, 19, 23, 29,
 38, 138, 141, 142, 144, 145, 169,
 190, 198, 212, 223
 India 印度 167
 origin 原因 32.
 See also Trade 参见贸易
 Freedom 自由 258 ff.
 Freedom of contract 契约自由 154, 191
 Freezing of labour 劳工冻结 264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7, 17,
 88, 189, 228
 Fuller, Major-General 富勒大将军 273
 Funnell, William 威廉·芬内尔 118

G

Gairdner, J. J. 盖尔德纳 38
 General Allotment Act 总分配法案 302
 Geneva 日内瓦 22, 23, 25, 27, 198,
 221, 240—241, 253, 274
 Gentz, Friedrich von 弗雷德里希·冯·
 根茨 7
 George, Henry 亨利·乔治 26
 George, Stefan 施塔凡·乔治 246
 Germany 德国 6, 19, 24, 30, 32, 196,
 213, 222, 252—253, 254
 and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199
 cartels 卡特尔 226
 colonial policy 殖民地政策 226

-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欧洲协约体 8
 currency 通货 224, 238
 customs tariff 关税壁垒 226
 and disarmament 裁军 250
 and England 英国 13
 factory legislation 工厂立法 153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5, 32, 246, 250
 and France 法国 12, 226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境外投资政策 12
 a "have-not" "穷国" 221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83
 inflation 通货膨胀 24
 labour 劳动力 251
 leaves the League of Nations 退出国联 253
 National Socialist Revolution 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24
 and the peace interest 和平利益 19
 preparations for war 为战争做准备 252
 prosperity 繁荣 252
 social insurance 社会保险 226
 workmen's compensation 工人抚恤金制度 154
 Ghost dance "鬼舞" 168
 Gibbins, H. de B. H. de B. 吉宾斯 38
 Gilbert, Thomas 296
 Gilbert's Act 吉尔伯特法案 100, 111, 285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威廉·爱瓦特·格莱斯顿 222
 Godwin, William 威廉·戈德温 88, 89, 127, 132, 296
 Gold 黄金 137, 203
 Gold standard 金本位制 3, 26-27, 31, 80, 141, 144, 169, 201 ff., 211, 223, 226, 234, 236, 252, 254
 collapse 崩溃 21
 and currency 货币 224
 failure 失败 28, 29
 origin 原因 32
 and the peace factor 和平因素 14
 restoration 重建, 恢复 149
 table of countries off 脱离金本位制的国家表格 275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 211
 Goldenweiser, A. A. 古登威瑟 165, 278, 301, 302
 Government. See Popular government 政府, 见大众政府
 Grant, Irene 艾琳·格兰特 11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英国 20, 30, 253, 254, 299
 balance of power 势力均衡 269
 and Bismarck 俾斯麦 8
 currency 通货 235-236, 242
 expansion 扩张 5, 6
 and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50
 foreign policy 对外政策 222
 general strike 大罢工 236
 and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 149
 National Government 国民政府 235
 off the gold standard 金本位制 24, 27, 149, 208, 252
 trade 贸易 216, 238
 unemployment benefits 失业救济 288
 Great War. See World War I 大战, 见第一次世界大战
 Greece 希腊 16, 33, 236
 currency 通货 27
 Grey, Sir Edward (Lord Grey of Fallodon) 爱德华·格雷爵士 269
 Guilds 行业公会 69, 73
- ## H
- Habeas Corpus Act 人身保护法案 146, 264
 Haberler, G. 220
 Habitation *versus* improvement 居住 vs 利用 35 ff.
 Hadley, A. T. 234
 Hales, John 约翰·黑尔斯 38
 Halévy, Elie 艾烈·哈勒维 286
 Halifax, Lord 哈利法克斯勋爵 254
 Hamburg 汉堡 66
 Hamilton, Alexander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222
 Hammond, Barbara 芭芭拉·哈蒙德 179, 287
 Hammond, J. L. J. L. 哈蒙德 179, 287
 Hammurabi (in Babylonia) 巴比伦的汉默拉比王国 53
 Hampshire 汉普郡 98, 296
 Hanse 汉泽同盟 66
 Hapsburgs 哈布斯堡王朝 271

- Hartley, David 大卫·哈特利 119
 Harvey, J. J. 哈维 285
 Hastings, Warren 沃伦·黑斯廷斯 222
 Haushofer, Karl 272
Haute finance 国际金融 10, 14, 18-19, 23, 29
 England 英国 11
 France 法国 11
 function 发挥作用 10-11
 organization 组织机构 12
 Hawtrey, G. R. G. R. 霍特里 59, 75, 193, 272
 Hayes, C. A. 197
 Hazlitt, W. 131
 Heatley, D. P. 272
 Heckscher, E. F. E. F. 赫克舍 38, 173, 283, 284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尔奥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116
 Heimwehr 返乡运动者 249
 Helvetius, Claude Adrien 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 119
 Henderson, H. D. H. D. 亨德森 72
 Henry VIII, King 亨利八世 233
 Herriot, Edouard 爱德华·赫里欧 154
 Hershey, A. S. A. S. 赫舍 17, 272
 Herskovits, M. J. 280, 282, 171
 Heymann, H. 250
 Hilferding, Rudolf 鲁道夫·希法亭 26, 276
 Hindenburg, 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保罗·冯·贝内肯多夫·翁德·冯·兴登堡 24, 246, 250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199, 246, 247, 251, 254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119, 172
 Hobson, J. A. J. A. 霍布森 276
 Hofmann, A. 272
 Holland 荷兰 29, 271
 and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46, 249
 Holmes, E. E. 福尔摩斯 285
 Holy Alliance 神圣同盟 5 ff., 17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胡佛 25
 Householding 家计 56
 Howlett, Rev. J. J. 豪利特主教 288, 290, 296
 Humanity. *See* Society 人类, 见社会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119, 192 ff., 270, 272
 Hundred Years' Peace 百年和平 3 ff., 198, 273-274
 bibliography 参考书目 272
 Hungary 匈牙利 5, 13, 24, 249
 and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196
 and currency 通货 27
 and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46, 249
 Hungry Forties 饥饿的四十年代 181, 234
 Huskisson, William 威廉·赫斯基森 232
- I
- Immigration 移民 214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16, 158, 192, 218, 221-222, 214-215, 227
 Import tariffs. *See* Customs tariffs 进口关税, 见关税壁垒
 Imports 进口 221
 Improvement *versus* habitation 利用 vs 居住 36 ff.
 Incas 印加(帝国) 54, 280
 India 印度 54, 167-168, 173
 and currency 货币 280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印第安重组法案 302
 Indians, American. *See* North American Indians 美国印第安人, 见北美印第安人
 Individual, rights of, in society 社会中的个人权利 245
 Indo-China 印度支那 6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7, 8, 36, 39 ff., 81, 93, 124, 135, 169, 173
 causes 原因 42-43
 cultural effect 英国 164
 definition 定义 42-43
 England 英国 31, 36 ff., 182
 Europe 欧洲 182-183
 origin 原因 32
 social conditions 社会条件 41-42, 182
 Industry 工业 16
 Industry-houses 工业厂房 112, 122, 126
 Inflation 通货膨胀 24, 25, 27, 148, 235
 Inheritance Act 继承法 189
 Innes, A. D. A. D. 英尼斯 3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国际制度; 3-4

See also Balance of Power; Gold standard. 参见势力均衡;金本位制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国际劳工局 27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peace 国际秩序与和平 260-261
 International system 国际体系 4-5, 16, 21 ff.
 failure 失败 29, 252
 monetary 货币的 16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 10, 207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国际干涉 5
 Interventionism 干涉主义 38-39, 69-70, 155, 161, 207, 215-216, 217, 225, 231, 239
 Investments, foreign 国外投资 11, 15
 Ireland 爱尔兰 246
 Italy 意大利 5, 24, 32, 221, 245-246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199
 currency 货币 26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45-246, 249, 250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183
 preparations for war 为战争做准备 252

J

James, Isaac 118, 296
 Japan 日本 221, 252, 270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46
 Jesus 耶稣 249
 Judaism 犹太教 249
 Johnson, Charles S. 查尔斯·S. 约翰逊 303
 Jones, Edward 296
 Jowett, Benjamin 本杰明·乔伊特 56
 Jugoslavia 南斯拉夫 245

K

Kaffirs 卡菲尔人(南非) 165, 171, 302, 303
 Kett's rebellion 凯特叛乱 37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5
 Kingsley, Charles 查尔斯·金斯利 102, 165
 Kingsley, Mary H. 302
 Klages, Ludwig 路德维格·克雷吉斯 246

Knight, Frank H. 弗兰克·H. 奈特 250
 Knowles, L. C. A. 184, 272
 Kpelle 库佩尔人 62
 Kraal-land system 村庄土地制度 171
 Kula ring 库拉圈 62
 Kula trade 库拉贸易活动 51, 52
 Kwakiutl (tribesmen) 夸扣特尔人(部落名) 53, 171

L

Labour 劳动力 41, 71 ff., 81 ff., 171 ff., 234
 code of 劳工法 91
 division of 劳动分工 282
 enforced 强制劳动 91, 92, 99
 independent 独立劳动者 104
 nationalization 国家化 73
 nomadic 流浪工人 172
 obligations 义务 120
 Labour exchange 劳动交换 110, 113, 176
 Labour legislation, English 劳工立法(英国) 73
 Labour market. See Markets, Labour 劳动力市场
 Labour organization 劳动组织 90, 288 ff.
 Labour parties 劳工党 150, 236, 243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 122, 124, 138, 143, 145, 147, 154 ff., 286
 Land 土地 36, 39, 71 ff., 81, 187 ff.
 colonies 殖民地 188
 Langer, W. L. W. L. 朗格尔 273, 276
 Lassalle, Ferdinand 费迪南德·拉萨尔 26, 111, 113
 Lasswell, H. D. 272, 273
 Latin America and Fascism 拉丁美洲和法西斯主义 246
 Latvia 拉脱维亚 25, 249, 251
 Laud, William, Archbishop 威廉·劳德大主教 37
 Lawrence, D. H. D. H. 劳伦斯 246
 Lawson 劳森 110
 League Council 联盟议会 23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27, 29
 balance of power 势力均衡 22, 249
 collapse 崩溃 24
 gold delegation of (国联的)黄金委员会 242

- Leathes, Sir Stanley Mordaunt 斯坦利·摩当特·利斯爵士 272, 276
- Leigh, Robert D. 罗伯特·D.利 11
- Lenin, Wladimir Ilyitch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16, 24, 26
- Lesser, Alexander 亚利山大·莱塞 301
- Liberal philosophy and Fascism 自由主义哲学和法西斯主义 265—266
- Liberal State 自由主义国家 3, 29, 31, 195
- Linton, Ralph 拉尔夫·林顿 278
- Lippmann, Walter 沃尔特·李普曼 46, 148, 155, 272, 288
- Lipson, Ephraim 282
- Lithuania 立陶宛 25, 251
- Lloyd George, David 大卫·劳埃德·乔治 155
-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111, 117, 129, 233
- Loeb, E. M. 171, 281, 282
- London 伦敦 181, 196, 202
- Long, Huey 休伊·朗 249
- Lorimer, Frank 302
- Lowie, Robert Harry 277
- Luddism 卢德主义 85, 175
- Lueger, Karl 卡尔·卢埃格尔 154
- Luson, Hewling 296
-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116
- Luxembourg, neutralization 卢森堡, 中立 8
- Lyons 里昂 173
- Lysis (Michel le Tellier) 莱希思(米歇尔·勒·泰利耶) 276
- M**
- Macaulay, Thomas Babbington (Lord Macaulay) 托马斯·白比顿·麦考利(麦考利勋爵) 185, 233, 234
- Machiavelli, Niccolo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116
- Machines 机器 77—78, 124—125
-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6
- Mair, L. P. L. P. 梅尔 171, 301
- Majendie 马金迪 292
- Malinowski, Bronislaw 布洛尼斯拉维·马林诺夫斯基 50, 277
- Malthus, Thomas Robert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88, 89, 103, 109, 118, 121, 127—129, 131, 143, 231, 285, 299
-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142, 174
- Mandeville, Doctor 曼德维尔医生 114
- Mankind. *See* Society 人类社会
- Mann, J. 291
- Mantoux, P. L. P. L. 芒图 127, 287
- Manufactures 制造业 98
- 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31 ff, 75 ff., 105, 136, 187 ff., 195, 223 ff., 231, ff., 303
- ancient Greece 古希腊 56
- definition 定义 42, 43—44, 45, 71
- England 英国 31
- successor of Speenhamland 接替斯品汉姆兰法令 106
- Market system 市场体系 40, 44, 78, 85, 129, 136—137, 139, 145, 155 ff., 162, 171 ff., 195, 226
- collapse of 崩溃 243
- selfregulating 自我调节 31—32
- Markets 市场 29, 43, 45—46, 56 ff., 171 ff., 187 ff., 201 ff., 228, 257—258, 276—277, 281—282
- corn 谷物 289
- customs and ceremonies 习俗和仪式 64
- definition 定义 59
- fairs 定期贸易会 63
- free 自由 146
- India 印度 167
- labour 劳动力 73, 75, 81, 82, 84, 92, 122, 132, 141—144, 169 ff., 184—185, 190, 225, 233, 239, 300
- land 土地 75, 169 ff., 187 ff., 225, 239
- local 地方的 61, 64—65, 67
- money 货币 18, 75, 169 ff., 239
- national 全国的 64, 68—69, 120
- one big market 总市场 75, 187
- origin 原因 66—67
- ports 港口 63
- real estate 不动产 187
- selfregulating 自我调节 3, 40, 42 ff., 60, 71 ff., 87, 132, 137—138, 141, 144, 147 ff., 154 ff., 198, 209, 217, 225, 280
- United States 美国 210
- world 世界 79—80

Marshall, Dorothy 297
 Marshall, T. H. T. H. 马歇尔 299
 Martineau, Harriet 哈丽雅特·马蒂诺
 94, 102, 104-105, 233, 286, 297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8, 26, 76,
 88, 113, 131, 158, 174, 285
 Massie, J. 297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31, 42
 Mayer, J. P. 272
 Mead, Margaret 玛格丽特·米德 166,
 301
 Meeting of Sufferings 受难礼拜会 111
 Melanesians 美拉尼西亚人 302
 Mellonie, F. C. 297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38, 70, 73,
 77, 90, 284
 Meredith, H. O. 83
 Metternich, Prince Klemens Wenzel
 Nepomuk Lothar von 梅特涅 7
 M'Farlane, John 约翰·穆法兰 108,
 296, 303
 Micronesians 密克罗尼西亚族 279
 Middle classes 中产阶级 17, 25,
 104-105, 139, 180, 182, 194, 195,
 196
 Austria 奥地利 197. *See also*
 Classes.
 Mill, James 詹姆斯·密尔 166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亚特·密
 尔 26, 88, 212
 Millins, Mrs. S. G. 165
 Mines Act 矿业法 152
 Minstrels 吟游诗人 277
 Mises, Ludwig von 路德维希·冯·米
 塞斯 26, 46, 148, 185, 198, 204,
 234, 235, 287
 Mitchell, W. C. W. C. 米切尔 286
 Mond Plan 蒙德计划 299
 Mond, Sir Alfred 阿尔弗雷德·蒙德爵
 士 288
 Money 货币 25-26, 56, 61, 71 ff.,
 81, 204, 205, 208, 211-212,
 282-283
 commodity 商品 137, 202, 205
 Egypt 埃及 53-54
 free 自由 214-215
 token 代币 202, 205, 208
 United States 美国 235

See also Currency; Wealth 参见通货;
 财富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de 夏
 尔·德·塞孔达·德·孟德斯鸠
 70, 233
 More, Hannah 汉娜·摩尔 179, 196, 289
 More, Thomas 托马斯·莫尔 116
 Morgan, John Pierpont 约翰·皮尔旁特
 ·摩根 29
 Morgans 摩根家族 29
 Morocco 摩洛哥 13, 20
 Mowat, R. B. 273
 Muir, Ramsay 273
 Munich 慕尼黑 253
 Münster, Treaty of 芒斯特条约 7, 270
 Mussolini, Benito 本尼特·墨索里尼
 26, 199, 246, 251

N

Nasmith, James 297
 National Charity Company 国家慈善公司
 112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16, 207-208
 National Socialist Revolution 国家社会
 主义革命 24
 Nazism 纳粹主义 250, 253
 Netherlands. *See* Holland 尼德兰, 见荷
 兰
 Neutralization 中立 8
 New Deal 罗斯福新政 24, 211, 236, 237
 New Lanark 新拉纳克 178-179
 New Poor Law 新济贫法 232, 233
Nicholls History of the Poor Laws 290
 Norman, Montagu 蒙塔谷·诺曼 253,
 254
 North American Indians 北美印第安人
 168, 301-302
 Norway 挪威 8

O

Oastler, Richard 理查德·奥斯特勒 174
 Ohlin, B. 189
 Oil industry 石油工业 149
 Okeden 奥基登 292
 Old Age Pension Act 养老金法案 287
 Oncken, H. 273
 Operative Builders' Union 建筑业者协会

- 177
 Oppenheim, L. 272
 Orange State 奥兰治邦 221
 Ortes, Giammaria 贾马里亚·奥特斯 108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5, 8
 Outdoor relief 所外救济 100
 Owen, Robert 罗伯特·欧文 88, 89,
 111, 113, 115, 125, 133 ff., 165,
 176, 178 ff., 235, 268, 297,
 302—303
 Owenism 欧文主义 175 ff.
 Owenite movement 欧文运动 175 ff., 294
 Owenite Societies 欧文式社会 176

P

- Pacific Islands 太平洋岛屿 221
 Pacifism 和平主义 5, 11
 Paine, Thomas 托马斯·佩因 97, 297
 Palestine 巴勒斯坦 246
 Palgrave, Sir Robert Harry Inglis 298
 Palmerston, Third Viscount 第三子爵帕
 默斯顿 269, 274
 Panopticon 圆形监狱 126, 146
 Pantlen, Herman 284
 Papen, Franz von 弗兰茨·冯·巴本 247
 Paris 巴黎 181
 Paris, Bourse of 巴黎证券交易所 13
 Parish serfdom 教区农奴制 289
 Parliamentary Reform Act 国会修正法案
 105, 124, 174, 232
 Paternalism 家长制 82, 92
 Pauperism 贫困 82 ff., 108, 123, 128,
 232, 296 ff.
 bibliography 文献 296 ff
 first appearance in England 第一次在
 英国出现 109
 rural 乡村 93—94
 See also Speenhamland; Poor Law 见斯
 品汉姆兰; 济贫法
 Pawnee hand game 波尼族游戏 168
 Pax Britannica 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
 14
 Peace 和平 7, 17, 18, 22, 23, 276
 African 非洲 301
 “armed peace” “武装和平” 14
 “Peace interest” 和平利益 7 ff., 11,
 14, 273—274
 Peace Treaties. See Treaties and particular
 Peace Treaties 和平条约, 见条约尤
 其是和平条约
 Peasantry 农民 67, 182, 192, 197
 and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51
 Peel, Robert 罗伯特·皮尔 143, 185,
 232, 233
 Pelican Inn 鹈鹕旅馆 82
 Pengwe of West Africa 西亚的澎维人 62
 Penrose, E. F. 190, 210
 Persia 波斯 20
 Pew, Richard 297
 Pharmacopoeia 药典 152
 Phillips, W. A. 273
 Physiocrats 重农主义者 115, 141, 195
 Piracy 海盗行径 274
 Pirenne, Henri 亨利·皮雷纳 63,
 270, 272, 281, 283 ff.
 Pitt, William 威廉·皮特 112, 122,
 143, 185, 285
 Pitt, William Morton, 296
 Pitt-Rivers 301
 Planning and freedom 计划与自由 262 ff.
 Plato 柏拉图 119
 Poland 波兰 5, 24, 25
 Polanyi, Karl 卡尔·波兰尼 7—10, 241,
 245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 116 f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eparated 政治与
 经济分离 259
 Polynesians 波利尼西亚族 279
 Poor Law 济贫法 73, 82 ff., 123,
 143, 285, 300
 bibliography 相关文献 296 ff.
 New Poor Law 新济贫法 146
 and organization of labour 劳动力组织
 284 ff
 and the parish 教区 91
 rates 数量, 比重 102
 versus revolution vs 革命 97
 Poor Law Amendment 济贫法修正案
 84, 143; bill, 143
 Poor Law Bill 济贫法案 122
 Poor Law Commissioners 济贫法委员会
 委员 291, 292
 Poor Law Reform 济贫法改革 88,
 106, 112, 164
 Act 法案 86, 87, 174, 181

Commissioners 委员会 105
 Poor rates. *See* Rates 济贫费, 见费用
 Popular government 大众政府 231
 Population 人口 41, 130, 168, 301
 Portugal 葡萄牙 29
 Postan, M. M. 284
 Postlethwayt, Malachy 108
 "Post-war Revolutions" "战后革命运动"
 23, 248
 Poverty. *See* Pauperism 贫困
 Power, Eileen Edna 艾里·爱德纳·帕
 尔 284, 291, 292
 Power finance *versus* Dollar diplomacy 强
 权金融 vs 金元外交 10, 14, 15
 Power, function of 强力的功能 266-267
 Prague 布拉格 254
 Prescriptions Acts 取得时效法 189
 Price, Dr. R. R. 普赖斯医生 127
 Prices 71, 120, 129, 201-202. *See also*
 Food prices 价格, 见食品价格
 Primitive man 原始人 46, 47-48, 55-56
 Pringle 292
 Productive organization 生产组织 136
 ff., 201 ff.
 Profits 利润 44
 speculator's 投机商的 260
 "Proletarian" "无产阶级" 168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9, 142, 150,
 158 ff., 169, 185, 213, 214, 220,
 226, 227, 283-284
 Europe 欧洲 200
 United States 美国 211
See also Customs tariffs 见关税壁垒
 Proudhon, Pierre Joseph 皮埃尔·约瑟
 夫·蒲鲁东 26, 111, 113
 Prussia 普鲁士 5, 154, 247
 and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46
 Prussianism 普鲁士主义 226
 Public Libraries Act 公共图书馆法案 152
 Public utilities 公共设施 16
 P. W. A.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公共工程振兴署 288

Q

Quakers 贵格派教徒 110
 Quesnay, Francois 弗朗索瓦斯·凯奈
 88, 119, 141, 222

R

Railways 铁路 15, 16
 Ratcliffe-Brown 278
 Rates 税费 101 ff., 127
 Rauschnig, H. 250
 Raw material 原材料 199
 Real Property Act 不动产法 189
 Reciprocity 互惠 49 ff., 57 ff., 64,
 277-278
 centrality 辐辏 51, 57 ff
 Kula trade 库拉贸易交换 51
 symmetry 对称 51, 57 ff., 279
 Redford 雷德福 294 ff.
 Redistribution 再分配 6, 49 ff., 57,
 59, 279
 Reform Bill 改革法案 84
 Regeneration Societies 复兴会 177
 Reichsmark 德国马克 224, 251
 Remer, Charles Frederick 查尔斯·弗雷
 德里克·雷默 276
 Rhodes, Island 罗德斯岛 56
 Ricardo, David 大卫·李嘉图 26, 88,
 89, 103, 109, 113, 116, 120, 121,
 131, 132, 143, 192, 205, 212, 231,
 234, 285, 299
 "Right to live" "生存权" 82 ff., 92,
 106, 122
 Rivera, Primo de 浦里默·德·里维耶
 拉 246
 Robbins, L. 272
 Robinson, Henry 亨利·罗宾逊 110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洛克菲勒基金 11
 Rodbertus, Johann Karl 约翰恩·卡尔·罗
 德贝图斯 191
 Rogers, Wood 118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天主教教会
 7, 9, 154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155
 Rostovtzeff, M. I. 272
 Rothschild family 罗斯查尔德家族 10,
 18, 29
 Rothschild, Nathan Meyer 内森·迈耶
 ·罗斯查尔德 23
 Romania 罗马尼亚 6, 25, 251
 currency 通货 27
 Rousseau, Jean Jacques 让·雅奎斯·卢

- 梭 7, 46, 88
 Ruggles, Theodore 297
 Russell, Bertrand 272
 Russia 俄国 6, 8, 19, 30, 255
 balance of power 势力均衡 270
 Constitution 宪法 265
 currency 通货 25
 five-year plans 五年计划 24
 Socialism 社会主义 243, 252, 255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255—256
- S**
- Sabatier, William 297
 Sadler, Michael Thomas 迈克尔·托马斯·萨德勒 174
 St. Giles-in-the-Fields, 297
 Saint-Simon, Count Claude Henride 克劳德·亨利德·圣西门伯爵 178
 Satanic mills 撒旦的磨坊 8, 35 ff.
 Saunders, Robert 297
 Savages. *See* Primitive man 野蛮人, 见原始人
 Schacht, Hjalmar 哈尔马·沙赫特 253
 Schafer, Felix 11, 206
 Schmoller, Gustav Friedrich von 古斯塔夫·弗雷德里希·冯·施莫勒 284
 Schuman, F. F·舒曼 270, 272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286
 Seipel, Ignaz 伊格纳兹·塞佩尔 237
 Serbia 塞尔维亚 6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 221
 Shaftesbury, Seventh Earl (Anthony Ashley Cooper) 第七伯爵沙夫茨伯里(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174
 Sheep-farming 牧羊 36
 Sherer, J. G. 297
 Sheriffian empires 西律番帝国 5
 Siam 暹罗 6
 Silesian loan 西里西亚贷款 17
 Simon, Sir John 约翰·西蒙爵士 253
 Slaves 奴隶 121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45, 46, 92, 97, 108, 115, 116, 117, 119, 129, 146, 173, 221, 258, 303
 Snowden, Philip 菲利普·斯诺登 26, 236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 154, 197, 247
 Social insurance 社会保险 184
 Socialism 社会主义 31, 242—243
 Society 社会 3, 26, 32, 42 ff., 48, 57—58, 74—75, 76, 88—89, 116, 159 ff., 195, 205—206, 225, 284
 and freedom 自由 257 ff.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41
 integration of 整合 264
 primitive 原始的 48—49, 60—61
 research on 关于…的研究 276—277
 selfprotection 自我保护 136 ff.
 Sokolnikoff, G. Y. G. Y. 索科涅科夫 26
 Somerset, Lord Protector 保护者萨默塞特勋爵 37
 Sontag, R. J. R. J. 桑塔格 8, 273, 276
 Sorel, Georges 乔治·索雷尔 246
 Southey, Robert 罗伯特·索锡 174
 Spain 西班牙 5, 29, 36
 Spanish-American War 美西战争 17
 Spann, Othmar 奥瑟曼·施潘 246
 Speenhamland 斯品汉姆兰 81 ff., 99 ff., 128, 173, 231, 300, 288—289
 abolition 废除 105
 cotton industry 棉纺工业 143
 law 法令 82, 83, 99, 106
 literature of 文献 285 ff.
 a war measure 战时措施 288 ff.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46, 88, 148, 152, 195, 234, 288
 Spitalfields institution, 297
 Staley, Eugene 尤金·斯特利 276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111
 Statute of Artificers 工匠法 73, 91, 175, 232, 299
 Stephen, Sir Leslie 莱斯利·斯蒂芬爵士 111, 126, 286
 Stolper, G. 273
 Storage (Primitive societies) 储备(原始社会) 50, 51, 54
 Storm troops 突击队 198
 Strafford, First Earl (Thomas Wentworth) 第一伯爵斯特拉福德(托马斯·温特沃斯) 37
 Strains and Stresses 张力和压力 218 ff.
 Strikes 罢工 238—239

Stuart policy 斯图亚特王朝的政策 38, 39, 79
 Stuart, Henry 291
 Sumner, William Graham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148, 234
 Switzerland 瑞士 5
 Synbiosis 共生关系 29, 54, 250, 282
 Syria 叙利亚 6

T

Tariffs. *See* Customs tariffs 关税, 见关税壁垒
 Tawney, R. H. 37
 Telford, Thomas 托马斯·特尔福德 97, 124
 Temple, Sir William 威廉·坦普尔爵士 269
 Ten Hours Bill 十小时工作制法案 174
 Thirty Years' Peace 三十年和平 18
 Thompson, E. 303
 Thurnwald, R. C. R. C. 图恩瓦尔德 54, 61, 66, 166, 172, 277 ff., 281, 301
 Tikopia 提扣皮亚人 281
 Tocqueville, Charles Henri de 查尔斯·亨利·德·托克维尔 185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29
 Town against countryside 城镇对比乡村 292 ff.
 Towns, allowance system in industrial 工业化城镇中的补贴制度 294 ff.
 Townsend, Joseph 约瑟夫·汤森 97, 98, 116 ff., 123, 132, 143, 231, 285, 297
 Toynbee, A. J. A. J. 汤因比 172, 198, 270, 272, 286
 Trade 贸易 95, 108, 273-274, 281-282
 ceremonial 礼仪性的 64-65
 fluctuation 起伏 95-96
 foreign 对外的 216-217, 283
 local 地方的 62, 63-64, 66-67
 long distance 远距离的 62, 66-67
 national 国内的 63-64
 and peace 和平 15-16, 23
 sea-borne 海运的 41
 silent (or dumb) 默不作声的, 默契的 63
 world 世界 226-227
 See also Free trade 参见自由贸易
 Trade cycle 贸易周期 97, 215
 Trade unions 工会 113, 150, 192, 213
 on the Continent 在欧洲大陆 184
 in England 在英国 184
 laws 法律 155
 and Owenism 欧文主义 176-177
 Treaty of Berlin, 1878 1878年柏林协议 15
 Treaty of Münster and Westphalia 芒斯特和威廉特伐利亚条约 7, 270
 Treaty of 1648 1648年条约 271
 Treaty of Utrecht 乌却克条约 7, 271
 Trevelyan, G. M. G. M. 杜维廉 196, 269
 Trobriand Islanders 特罗布里恩岛民 50, 52-53
 Trotsky, Leon 利昂·托洛茨基 24, 26, 251
 Tudor Period 都铎王朝 36 ff.
 Tudors 都铎王朝 79, 195, 285
 Tunis 突尼斯 6
 Turkey 土耳其 8, 15
 Turner,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特纳 270
 T. V. A.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194
 "Two Nations" "一世两国度"(穷人与富人) 123

U

Ukraine 乌克兰 247
 Ulloa, Antonio de, 118
 Unemployment 失业 91, 98, 150, 218 ff., 232, 245
 invisible 隐性的 95
 Union shops 联合商店 176
 United States 美国 29, 30, 226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势力均衡 270
 and customs tariffs 关税壁垒 226
 and expansion 扩张 6
 and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46, 249
 and the gold standard 金本位制 27
 and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 149
 and prosperity 繁荣 251
 off the gold standard 放弃金本位制 149, 208, 238, 252
 Universal suffrage 普选权 216
 Utopia 乌托邦 3, 108 ff., 220

Utu 兀突 64

V

Vaccination 接种疫苗 152
 Vancouver, John 297
 Vattel, Emmeriche de 艾默里切·德·瓦特尔 269
 Venice 威尼斯 5, 66
 Vienna 维也纳 24, 28, 154, 181, 298—299
 Villages of Co-operation 合作村 177—178
 Villages of Union 联合新村 113
 Viner, Charles 查尔斯·瓦伊纳 276
 Vives, Juan Luis 胡安·路易斯·维韦斯 172
 Voltaire, Francois Marie de 弗朗索瓦斯·伏尔泰 88

W

Wafer, Lionel 118
 Wages 工资 42, 82, 94, 100, 101—102, 120, 172—173
 assessments 评估 90
 urban,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城镇和乡村共同体 290 ff.
 Wagner, Adolph 阿道夫·瓦格纳 212
 Wall Street 华尔街 28, 221, 238, 252, 253, 274, 276
 Wealth 财富 116—117. *See also* Money 参见钱
 Webb, Sidney and Beatrice 悉尼·韦布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夫妇 121, 143, 287, 294, 298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48, 281, 283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247
 Western Europe 西欧 25
 Westphalia, Treaty of. *See* Treaty of Münster and Westphalia 威斯特伐

利亚条约

Whately, Bishop 惠特利主教 185
 Whitbread's Bill 惠特布雷德议案 299 ff.
 Whitbread's minimum wage proposal 惠特布雷德最低工资议案 112
 Wicksell, Knut 柯纳特·维克塞尔 212
 Wieser, Friedrich von 弗雷德里希·冯·维泽尔 212
 Williams, F. E. F. E. 威廉姆斯 301—302
 Wilson, Rev. Edward 爱德华·威尔逊牧师 297, 300
 Wilson, Woodrow 乌爵·威尔逊 23, 24
 Wissel, Clark 301
 Wood, J. 297
 Woollen industry 羊毛工业 36, 39, 77
 Working class. *See* Labour 工人阶级, 见劳动力
 Workmen's Compensation 工人抚恤金制度 153—154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 工人赔偿法 153—154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21—22, 24, 197, 199, 221
 compared with World War II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对应 30
 W. P. A.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公共事业振兴署 288
 Wright, Quincy 昆西·莱特 273

Y

Young, Arthur 阿瑟·杨 112, 288, 289
 Young, Sir W. 297
 Young Plan 杨格计划 224

Z

Zamindar 萨巴特克印第安人 158

译后记

波兰尼的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有数个英文本(1944年版、1957年版),我们这个中译本是根据 Beacon Press(Boston, 2001)最新版翻译。在此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王利波女士不辞奔波为我们求得此版本。此书翻译之初曾作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阅读材料,其间胡善平、楚文杰、黄媛媛、刘明明、吴振华等同学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张博、张翼飞同学参与了校对和页码编排工作,在此我们也一并表示感谢。另外,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借鉴了由台湾远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1957年英文版翻译的中译本《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1989年出版,黄树民、石佳音、谬立文译),改正了其中的一些明显错误,尤其是该书第二十一章的漏译部分。

译者

2006.12.1 于浙江大学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Karl Polanyi

中文版根据 Beacon Press 2001 年版译出

© 1944,1957,2001 by Karl Polanyi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Kari Polanyi Levit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 (英) 波兰尼
著；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1辑)

ISBN 978-7-213-03443-5

I. 大… II. ①波… ②冯… ③刘… III. ①国际政治
—研究—20 世纪 ②世界经济—研究—20 世纪 IV. D5 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562 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6-53 号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卡尔·波兰尼 著
冯钢 刘阳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177 号)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数 31.3 万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3-03443-5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 政治与社会译丛/第一辑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 卡尔·波兰尼 著

《民主转型和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美] 胡安·J. 林茨 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著

《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

[英] 凯特·纳什 阿兰·斯科特 主编

《公民权研究手册》

[英] 恩靳·伊辛 布雷恩·特纳 主编

《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

[英] 帕特里克·邓利维 布伦登·奥利里 著

责任编辑：王利波

责任校对：鞠 朗 朱晓阳

封面设计：张志伟